



■ 内部交流读物

• 关心工人话题 • 关注工人前途

工业区的脉搏

珠三角工人抗争案例集

The Pulse of The Industrial Zone

工业区的脉搏

珠三角工人抗争案例集

二〇一八年六月

2018年6月

☆ ☆

2010 年・南海本田罢工 1

序一	1
引子	3
一、入职前：对本田充满希望	4
二、矛盾开始逐渐发生	7
三、2010 年 5 月罢工始末	11
四、第一次劳资谈判	27
五、罢工对我的影响	33
六、工会改选	36
七、希望改变自己，参加高考	38

珠宝厂工人持续一年多的争取社保行动 42

HB 工人抗争的几点分析	42
工人集体维权与工会	44
工人行动与民间劳工机构	47
HB 工人代表的特点	49
工人群体与地方政府	51
PY 珠宝行业及工人情况简介	52
一、PY 珠宝加工制造业简介	52
二、PY 珠宝用工和工人情况简介	55
HB 厂概况	61

工厂背景	61
工厂物料管理	62
工人维权始末	67
附录：工人请愿书	108
大事记	114
工人代表及工人访谈	118
“首席代表” MJ（起版部）	118
工人代表 WSY（起版部）	182
工人代表 HJ（起版部）	190
女工代表 LX（执模部）	203
工人积极分子 YH（执模部）	213
工人代表 LCR（执模部）	224
工人积极分子 LXY（执模部）	227
工人代表 HQ（镶石部）	231
工人代表 YM	236
工人代表 GGQ	243
工人代表 F 哥	248
工人代表 H	253
工人代表阿英	261
工人代表 MXM	267
配石部门代表 QSZ	279
第二批工人代表 HJQ	283
工人代表 XLX 的弟弟	293
工人代表 XLX 的丈夫	298
工人活动家 CHH	301
邻厂追讨社保	307
公益律所指导记录	314

2015 年·某车灯厂工人罢工历程 329

 A 厂基本情况 329

 工厂存在的问题 332

 情绪的酝酿 334

 从联名信到罢工 336

 罢工第一阶段：工人守厂 341

 罢工第二阶段：溃散 361

 第十七天（5 月 15 日）及之后的情况 368

 打官司，以及工人的矛盾 370

 男工和女工的分工 373

 工人代表的作用和分化 374

 政府的角色及对罢工的影响 378

 后话 380



2010 年·南海本田罢工

序一

2014 年的 8 月 30 日，我抱着才三个多月的小孩去参加常德沃尔玛维权经验的分享会，第一次结识了李晓娟。当时，我一进会场，一个长发女孩就过来打招呼、逗小孩，我问了句：“你是？”她大方地自我介绍：“我叫李晓娟，以前是本田的工人”。我当时有一些震惊和惊喜，她就是本田当时的工人代表，一个“历史性人物”！

当年本田罢工时，我们一些朋友曾热烈关注过，当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都是网上的二手消息。罢工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罢工是否就是两个即将离职的“英雄”挑起的，罢工如何组织起来，而资方又如何应对？所谓的“黄帽子工会打工人”是怎么回事，罢工工人为什么提出要改组工会？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找不到答案。如今，当时的工人代表就这么鲜活地站在我的面前，读者可以想象我的欣喜。

互相熟悉了以后，我建议她写一个“自传”，把当时的经历和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她说：“我有写啊！”然后就翻出了一篇两万字左右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了。写得很生动，也有很多过去不了解的信息。但是，也忽略了很多方面，比方说罢工开始后，她和同伴们都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有过哪些情绪、思考，文章里都呈现得不多。再比方说，她自己在斗争过程中的角色，也写得很少，只对

罢工后期当了工人代表以后的活动，有一些阐述。因此我提出，我们一起讨论个提纲，由她来补充。

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李晓娟是这样一种人，只要决定做一件事，她就会努力去做，心无旁骛地做。她从一家 NGO 离职后，开始找工作，每天在网上投简历，面试，没找到工作之前，完全处于焦虑的状态，不能去想找工作之外的事情。后来找到工作了，又成天忙于上班。她这样的人，就是认真于当下的每一件事：工作，生活……后来，她又打算辞职回老家发展，我以为这回有时间写了，不过，好不容易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她又开始认真享受生活，每天都在吃饭、散步、逛街，或者去附近的景区逛逛。

她是广东韶关人，她老公是中专同学，也是同乡。中专毕业后，她老公在格力工作了三年，后来进过一家汽车饰品公司。她公婆五年前到贵州某地开了一家狗肉火锅店，据说前几年生意很好，吃饭还要排队，有些国家单位公款消费，每个月能在他们的店里挂账一万多。这两年，公款吃喝收敛多了，对当地的餐饮业打击很大。他们的狗肉店，也就冬天生意好点，能赚一些钱，夏天基本就是保本。贵州人冬天爱吃狗肉，尤其冬至的时候。去年冬至，他们只有两间包房，大厅有六张桌子的小饭店，请了 6 个人来帮忙砍狗肉。他公公以前做过矿工，后来又学了理发手艺，开过理发店。他们刚来凯里，就在最黄金的地段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三房，里面配的家具和家电档次都不错。当时凯里的房价 4800 元/平米，如今市内房价还跌了一点，不过他们家的地段并没怎么跌。另外，他们还在商业区买了一个门面。

本田罢工结束后，她从工厂辞职，被一所大学的专科录取，当时还想着或许就此改变命运，后来进入一家 NGO 工作，但也谈不上“改变命运”：工作繁重，工资低，依然没法在城市安家，又缺乏足够的精神支撑。所以当她的男友提议回老家发展，跟他爸妈一起开店的时候，她似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她属于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

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普遍的一种类型：他们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他们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完成每一件工作，不去想昨天，也不去想明天，更不会去想那些“不现实”的事情。

由于以上多种原因，我最后决定还是直接访谈她，把她的“自传”里写得不够详细，甚至没有提及的部分，挖掘、整理出来。这本小册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她在大学期间自己写的自述；另一部分是我根据访谈整理的口述。我们力求反映 2010 年本田罢工的真实情景，和工人的真实状态。



引子

2010 年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对工人问题的关注，随后发生的南海本田事件，引领了全国各地的罢工潮。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年轻人，他们选择的方式却完全不一样呢？在南海本田事件中，工人们是怎么想的？如何行动的？本文以回忆录的方式将整个事件还原，也讲讲事件对我的影响。

一、入职前：对本田充满希望

我爸一直都生活在很苦的环境里面，从家里只有几个碗，住篱笆房，到我们三姐妹出生，把我们慢慢抚养长大。他以前没有钱，也坚持把我们送去读完初中，但之后我为家里考虑过，我知道我不会再升学了，要念就只能念职校，念了职校就注定之后进工厂。

2008年6月1日是阳光明媚的日子，刚进入中专第三年的我和几个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南海本田。几个月前，南海本田在我们学校（中专）进行了严格筛选的招工。进本田并不容易，首先要由班主任推荐，我们班三十多人（我是班长），只推荐了四人，我是其中的一个。之后，又进行了一些测试，我顺利地通过各种测试。

这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在这之前，我曾利用周末在肯德基实习，也有挺好的晋升机会，但是由于没有出过远门，对外面的社会非常好奇，所以想到外面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至于到南海本田后将从事的是什么工作，自己并不怎么清楚。关于流水线，也不了解。我只知道想到外面走走。一路上都非常有精神，以前一坐车就吐的我，在这一路破天荒地没有晕车。车子到佛山宾馆就停了，我们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汇合后，一起被送上了南海本田的大巴。

刚进入南海本田，被人事部的人带到事务栋。白色的厂房映入眼帘，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反而看看自己和同学们

大包小包的行李，有点格格不入。放置好行李，培训人员把我们带到培训室，给我们发放工作服，拍工卡的相片。发完工作服，负责人问大家为什么本田的工服是白色的？大家都不清楚。负责人说：白色代表干净、整洁，脏了可以直观地看出来，所表达的含义是：有问题能发现、能面对问题，最重要是面对、解决，是 5S 管理的一个体现，也是本田哲学在实践中的体现。

这样一个铺垫下，我们开始学习本田哲学，为期三天。学完之后，大家对本田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充满了敬意，开始聊的话题也是他如何创业如何经营。大家对本田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就到厂里的“黄埔军校”军训，同样也是三天。第一天教官对我们都特别严格，不断的强调团队精神。艰难的第一天过去之后，教官们安排的更多是团队活动，让大家有竞争。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除了团队游戏，还准备好了菜啊锅啊之类的，让大家自己生火，煮饭菜吃。虽然状况很多，大多数人的饭都没有煮熟，但是大家吃得都非常地开心，因为这个过程又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大家的感情。晚上和其他营一起开联欢会，大家唱啊，跳的，拉队歌，晚上大家都特别开心。最后一天要走了，教官把我们带到一堵大概四米的墙下面，说“黄埔军校”军训的学员都必须爬过这个墙才算毕业。爬的过程中不能利用任何辅助工具，只能靠大家的团结。刚开始大家都非常泄气，说怎么爬呢？那么高？说给两个钟也爬不上去。教官也没有给任何提示，大家商量后就准备用搭人梯的方式来过关，非常的紧张，也非常害怕，摔下来不是闹着玩的。女生都是被男生拖上去的。结果只用了半个钟，将近 50 人全部都爬上去了。整个过程中，教官一直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工作，讲得非常生动，到厂里的车来接了，大家和教官拥抱，眼睛都红了。这段经历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的两周就开始进行制度、质量管理体系、品质管理初级等方面的培训内容。

现在想想，为什么南海本田的同事们感情会那么好，我觉得这

样一个系统的培训，影响是非常大的。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加上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是年轻人，比较具有相似性，所以融入得特别快。

如今我对本田哲学还是印象深刻。“没有理念的行动是凶器，没有行动的理念无价值。”对本田的创始人充满了敬意，一步一步走向今天的世界 500 强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非常喜欢本田经营理念，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个企业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所以我打电话给爸爸说，这里一切都很好啊，当时实习只有 825 元，是有点少，但是我也没有抱怨，因为学习了本田哲学，我觉得这个企业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相信会越来越好。

培训之后我们被分配到变速箱组装科。变速箱是汽车的重要部件，它把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传递给驱动轴、车轮，汽车才能开起来。我的岗位是流水线上的部品配送。工作内容是将一些比较小的零件，配在零件托盘上，然后放到流水线，给下面岗位的人进行安装。这对女生来说是比较累的工作。

南海本田的管理层级：员工—机动人员—代行—替补—班长—系长—科长—总经理；科长以上是日本人。



二、矛盾开始逐渐发生

刚开始觉得非常的新鲜，但过了不久，就对每天 8 小时不断重复的工作步骤觉得乏味，也没有了当初的满足感。一起来的同事，聚在一起开始抱怨，这样子的工作和机器人差不多，工资也不高，这样的日子越来越没有意思。

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较辛苦，所以班上的替补偶尔会过来帮忙。记得有一次生产提早完成，他过来帮我搞卫生，并一起盖防尘膜。但被一个叫“蝦名”的日本人看见了，就把替补骂了一顿，说现在还有大把时间，你自己的工作做好了么？当时觉得挺郁闷。“蝦名”是个将近 50 岁的老头，听说他从初中开始一直都在本田工作。他在变速箱是支援工作，确保顺利生产。他脾气很不好。建厂初期，生产线刚开始投产，每个人都几乎被他骂过。有一次设备故障，一位代行（代班长，相当于副班长）赶紧将生产线关了，但是“蝦名”从办公室出来，没有问清楚，就对那位代行骂了起来，还踢了一脚。旁边的人赶紧将他拉开，大家对他这样的行为非常气愤，集体抗议，要他出来道歉。但是最后他也没有当面道歉，而是变速箱部门的科长，召集部门的全部员工，替他道歉了。这件事这样告一段落。

部门变革

2008 年，我们的车间领导（系长，后来调去党群办，升了科长）提出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说要将变速箱部门打造成在本田最优秀、最前沿的队伍。他把车间所有的基层管理召集起来，成立了“前沿团”，经常一起聚会，比如去 KTV，但玩完了还得开会。基层管理打了鸡血，回来对一线员工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工厂管理守则，要求

工作期间不可以说话，不可以串岗等等。有一个礼拜，他和管理人员开会，说女生的长发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卷到设备里面就危险了，就要求全科女生剪头发。这是超级无理的规定，因为工作期间长头发的女生都是把头发扎起来包在帽子里面，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于是各个班的班长就开始要求女生把头发都剪了。我们班就两个女生，整个部门也就七八个，后来其他女生都剪了，就我一个“钉子户”坚持没剪。管理经常找我谈话，我说工作期间头发都扎起来了，还戴了帽子，根本不会出现安全事故，凭什么要我剪了属于自己的头发。

此外，在休息区不可以玩手机、坐姿要如何、不允许趴着、休息时帽子要如何摆放等等一些规定，也开始制订和实施。在一线员工生产期间，领导还站在车间的楼梯上监视大家。

“前沿团”建立初期，刚好发生了一件重大品质不良事件。一位操作员疏忽，将不同机种的零件误组装了，确认岗位的同事也没有确认出来，一位管理人员突然发现，才知道误组装了，但这时已经流出很多不良品了，导致生产线停止生产。这一次只对组装的那个同事警告处理，对于确认岗位没有处罚，因为是一位新员工。但是一个礼拜后这样重大的品质不良又发生了，同样是那个岗位，那个同事误组装的。确认岗位换了一位老员工，但是刚开始她也没有确认出来，做了几个批次，她才猛然发现，立即上报了。后来这两名员工都被开除了，大家都替确认岗位的同事抱不平，因为同一个事件，前一个没事，而且还被任命为“前沿团秘书”，并且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后一个自己发现了却要被开除。大家自发开始了联名信，要求重新考虑开除确认岗位的人，包括替补都签名了。但是联名信交上去后，系长、班长把替补统统叫出办公室骂了一顿，没有解释的余地，人还是被开除了。

之后几个月又发生了误组装，又开除了一名员工。一线员工没有说话权。发生了这样的事，弄得员工们非常压抑，工作都胆战心

惊的，特别是确认岗位。而且一些规定只限制一线员工，并不限制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上班可以打电话，可以在办公室喝咖啡、吹牛。这让大家心理非常的不平衡。前沿团建立初期设立了员工关注日，刚开始很多一线员工去参加，提意见，但是只有利于生产方面的意见才会被采用，大部分意见根本就没有解决。到最后没有任何人去参加，“关注日”也没有继续开展了。一线员工心里开始有了各种抱怨。其他部门是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规定的，上班期间非常自由，需要上厕所不用报告，自己控制好时间就好，并且生产完之后，他们可以睡觉，加班也相对来说比较多。变速箱一天工作八小时一刻也不可以离开岗位，工作量大，没有加班，发工资的时候也就比其他部门的同事少。

2009年，南海本田的总经理跟媒体说，本厂投产不过两年，一年产量已经超过了本田在印尼的变速箱厂。他还说，2008年的金融风暴影响了公司利润，可是当地政府给予了税务减免的优惠政策，产量恢复了增长。但是厂里每年给员工涨工资时，都只是几十块几十块地涨，2008年公司加了14元。又过了一年，2009年了，公司只加了29元的工资，2010年加了68元的工资，三年了我们的工资就涨111元，这样的工资导致了大量老员工离职。同事们聊的话题，开始离不开工资了。物价翻了几番，这点工资只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而且都要节约着花，同事们的情绪开始越来越不满。每个人在休息时，聚在一起都这样说：“我走的那天一定要做点轰轰烈烈的事，给点颜色给他们瞧瞧，比如说制造非常多的不良品，或把机器给弄坏”。这虽然是开玩笑，但是可以看出大家心中真的是非常地愤怒了。

主要矛盾

在2010年初，变速箱的离职率达到了80%，老员工的面孔越来越

越少。在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下，变速箱部门的员工凝聚力非常的高。2010年，佛山公布在5月份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至920元/月，较原来的770元/月提高了19.5%。当时南海本田1级工资=基本工资675元+职能工资340元+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65元+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1510元，扣除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到手工资为1211元。更过份的是，这只是全厂1800多名员工当中两成正式员工的待遇。其余八成都是还没毕业的学生工，工资只有800元，而且没有社保。

同事们也从各处打听到，许多工厂已经加了工资。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考虑的不是现在能吃饱，不饿着自己就好，而是考虑到以后的生活应该如何过下去。到手这点工资让大家如何成家、如何赡养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后代？有更好出路的，都选择离开了。没有走的同事们就在等待5月的到来，大家说好，如果5月不加工资就集体辞职。反正都还年轻，选择也很多，但本田是流水线生产，少一个人都无法开线，如果一起走，看他去哪里招那么多的人。

一天晚上，我梦到我同事在街上卖东西，那条街是我和同事常常逛的地方。于是，我想到自己也可以摆摊，额外赚点钱。我卖的是情侣服，第一天出去摆的时候很害怕，觉得很丢脸，但有个女孩子来买了一套，还说这边都没有卖情侣服的，看到我在卖很开心。我想如果那天晚上我一套都没有卖出，就不会有动力继续。卖出一套大概赚5块钱吧，没想到我才卖出一套，我男朋友就去买了一瓶水，当天就真的完全没赚到了。之后我一直上中班，晚上人流最多的时候都不在，摆摊也就慢慢地停了。



三、2010年5月罢工始末

工资太低，工人发起第一次罢工

5月渐渐来临了，但公司方没有任何加工资的动静。5月16日晚，因为两位员工（小谭和小肖）交了辞职书，快离职了，我们一群老员工到厂外聚会。原本是单纯的聚会，但是一谈到工资，大家的情绪就都非常地不满，这其中也包括即将离职的小谭。小谭后来对媒体说，他早有反抗的念头，以前员工写过联名信向公司反映意见，但是公司没什么反应，他就在休息、坐通勤车期间，跟一些老员工商量过罢工的事。他说有几个老员工似乎被说动了，但看样子还是需要有人出来挑头。

2010年5月17日早上八点多，一场没有任何预兆的罢工发生了。小谭按下了生产线的急停按钮，警报声顿时充满了整个变速箱部门。老员工们都喊着“工资那么低，大家还干什么干？”，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心声，大家纷纷放下工具，离开了岗位。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随着一部分工人的离开，生产线陷入了瘫痪的状态。

随着口号响起，大家恍然大悟，也都离开了岗位。他们开始去其他车间呼吁大家一起罢工，其他科的员工一头雾水地看着变速箱的同事，并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这使血气方刚的同事们非常气愤，也无奈，只好带着自己的队伍去到操场静坐，也开始通知对勤的同事。很多对勤的同事这时候还在睡梦中，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都非常开心，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等他们来接班。

同时，罢工的工人开始拨打媒体的电话，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同事们也没有去想罢工后来临

的将是什么？但是非常明确一定要团结，齐心协力把工资涨上去，让资方还有一些管理人员知道，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一部人体机器，我们需要好好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变速箱的同事选择了团结在一起，不管后面事件怎么发展，始终没有人回车间，大家始终在一起静坐，接受太阳的曝晒。

早上 8 点半，这群穿着工作服的人被刚上班的公司领导注意到了。很快，总经理也来到了操场。也许事情太过于突然，各位领导也不知道要如何应对，加上大家都不说话，不发表任何意见，更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吃饭时间大家回到饭堂吃饭，因为天气太热就决定在饭堂静坐。这时候有领导拉来几块白板，让大家在白板上写自己的意见，很快白板就被写得密密麻麻。

那阵子我上的是中班，平常都是下午三点多才开始上班，可是八点多刚醒来，就接到电话说有人罢工了。那时候我心想：唉！太给力了！由于大家都很熟，我就被分派任务找记者，那个时候我一个记者都不认识，直觉想到要去找广东卫视什么的，就上网去搜，看看有没有爆料电话。

同事们的交流，平时都是用手机 QQ，每个班组都有自己的 QQ 群。罢工开始后，大家就在群里互相打气，把事情的进展告诉还没上班的同事。二勤上班时，通常都到饭堂集合，但是等二勤的同事来上班时，各个路口都被管理人员拦住，根本没有办法和一勤人员集合，因为各个乘车点的班车不是一起到达公司的，所以到达人员也比较分散。二勤的同事都被拦回了车间。他们选择在休息区静坐，采纳了上午同事们的意见，无论领导说什么都不吭声；有一个同事说话，其他的马上跟着应和，保护说话者。

最后管理人员只好拿来了纸和笔，让大家自己写意见。员工写意见时，管理人员是回避了的。大家一共提交了 117 条要改善的意见。意见上交之后，总经理还有一些高层开始过来说会郑重地考虑大家的意见，在一周后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希望我们先复工。

但是没有人动摇，只是有一个班长不知道怎么说服了他们班的员工，带着他们往 2 号生产线走去。但是员工并没有生产，只是站在生产线旁。这时候有管理者就开始分化 1 号线的员工，对着大家说“你看 2 线已经开始生产了，而且总经理已经答应你们一周后给答复，大家就耐心等等，快去复工吧。”他使用的离间计非常有效，1 线的员工陆续回到岗位开始生产，这位管理者又赶紧跑到 2 线对员工们说：“快开工吧，一号线员工们已经开始生产了。”

这时两条线的员工开始互相抱怨，沟通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中计了。大家开始分析为什么会中计，也总结下以后怎么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但现在既然已经复工，就耐心地等待公司的答复吧。

当天参与罢工的，主要是变速箱组装科的两三百人。厂里面最大的部门叫轴物加工科，当天也有小规模罢工，只不过听到总经理的承诺后，也复工了。

其他车间很快知道了变速箱罢工的消息，也呼应说，如果公司在一周后没有给出合理的答复，会立即支援变速箱，一起共进退。

我们考虑到要有个地方联络大家，所以建了一个新的 QQ 群。先加了一些主要的人，后来就愈加愈多。很多人用的是新号，我用的是旧号。虽说是匿名上网，但是彼此很熟悉，大体知道是谁在发言。

资方试图招聘新员工，员工愤怒发起第二轮罢工

5 月 19 日晚上，有匿名者（管理人员）在 QQ 群里爆料，说公司在湛江地区大量招聘新职员，并说将把 17 日参加罢工的人全部替换。

5 月 20 日，公司提出要工人选代表与厂里协商，每个班派班长和一名一线员工参与。但那根本就不是协商，更像是公司方开会，

告知大家说员工要求太高，代表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公司方的诚意。工会主席也只是主持会议，和总经理站一边。所以开会不久，代表们纷纷离席。员工们收到代表们反馈回来的信息，知道公司不会很有诚意地去处理这件事，开始做最坏的打算。

5月21日下午六点，变速箱几位老员工和轴务加工科的人第一次碰头“交涉”。为应对公司的大量招人，决定今晚开始新一轮的罢工，时间定在吃完晚饭后，直接到操场汇合看星星看月亮。选择这段时间的原因，是因为到时候管理者全都下班，而且大家吃饭要出车间。大家觉得应该开始和公司来一次新的较量，商量好后回到车间，告诉其他员工晚饭后都不回车间，并在群里通知，呼吁文明罢工。

这次罢工，参加的队伍开始不断壮大，从刚开始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当时我们走出车间，觉得空气都变得新鲜。看见不断地有人走进队伍，非常开心，觉得大家的心靠得非常的近。大家一块在操场看星星，几堆几堆地在草地上静坐聊天，一扫一直以来的压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们也没有聊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像这次行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呀，具体要争取哪些成果，都没有很仔细地聊。

我们一开始想游说其他科的人加入队伍，就听说有一个科的人知道我们罢工了，他们部门的领导赶紧召集他们去休息区，隔离起来。休息区在两个车间中间，由透明的玻璃隔着。他们部门的领导站着，其他人都坐着。我们两个部门的人都围满了休息区，在外面很激动地叫他们快点出来罢工，可是他们都不敢看我们，就低头坐着，挺无助的模样。围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有点灰心，就出去草地上聊天。我们走了之后，他们领导也不管他们了，他们就出来了。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刚才这样子，他们就说：“唉，别说了，太丢脸了，以后有行动一定要出来。”

当晚也顺利地将三勤的通勤车拦下。三勤的同事们也义不容辞

地参加了罢工。到了晚上 11 点 50 分，二勤的员工要下班了，嘱咐三勤的同事也将早班的通勤车拦下，让大家直接可以去到操场。大家下班后也都密切关注 QQ 群，看见他们顺利拦截下早班的通勤车，才安心休息。

下午两点公司方通过广播宣布增加生活补贴到 120 元，大家一听就火了。原本生活补贴就有 65 元，这样来说只增加了 55 元而已，开什么玩笑！物价涨成什么样了，55 元能做什么？再说佛山的最低工资都涨了 200 多了。公司此举更加激怒了同事们。一些一直坚守岗位的员工也开始加入罢工的队伍。南海本田全体一线员工都停止了工作。

5 月 21 日晚上，参加罢工的人开始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日本人非常张狂地拿着 DV 对着大家拍，在人群中观察领头者，一发现有比较积极的人，马上上前抢夺工卡。几百人的队伍就被那么几个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拍，这时候大家都感到很大的羞辱，但是还是比较理智，不想升级为打人事件。比较冲动的人也被旁边的人拉住了。领导走了之后，我们就绕着厂房游行抗议。后来因为不同的事情，大家不断游行，包括公司公布不怎么样的涨薪方案，还有带头



罢工的工友小谭被炒等等。游行一般集合地点是在饭堂或者公司外面的天桥底下，都不带东西的。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想游行路线，都是在厂内走一圈，绕着厂房逛个一两遍，然后唱歌什么的。反正整天下来就这样坐着也很无聊。

因为天气很热，没事的时候，大家各自回更衣室休息。游行通常都不是一早定好的，所以我随

时关注 QQ 群。有人说去游行，我就会叫上所有女生一起出去，还常常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有些人比较扭捏，我会直接跟他们说：“我这个女孩子都站出来了，你们这些人还怕什么？”

我们面对面的时候都是闲聊，QQ 群才是整合意见的地方。可是群里经常出现骂粗口的刷屏，我们就说，禁止在群里面讲粗口。不过文明罢工是一开始就有人在强调的。在群里，我们会聊到罢工要达到怎么样的目标。有一个基层管理主动收集这些意见，另外有人把诉求打印了从天桥上撒给大家。那时候觉得很好玩。

由于南海本田一直都在恐吓员工说：“你们是违法的”。大家开始在网上查找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现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罢工是违法行为”。员工将这些信息发布在 QQ 群里，大家也都不想触犯国家的法律，只想争取下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罢工的过程中一直呼吁文明罢工，游行时甚至都不会乱扔垃圾，也不会践踏草地。

5 月 22 日照常罢工，但是这一天，小谭和小肖被开除了。大家通过这件事，越来越看清资方的态度，越来越觉得心里发凉。我们只是想要生活过得好一点，这点要求很过分么？国家都说让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体面劳动，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些劳动者是如何体面劳动的？被压榨得勒紧皮带么？看着他们两个走了，许多人心里很难过，或许有一天，自己也会这样被开除，但是我们绝不会妥协。大家都在对方的眼睛中看到了坚决，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妥协，一定要让小日本和社会各界看到、听到我们的声音！出于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此后我们都带上了口罩，游行，一起高唱国歌，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时媒体也开始对这次事件高度关注。

大家之前没有罢工经验，很多行动不是预先策划的，都是因为公司的做法让大家觉得不受尊重，才有了行动。譬如说，变速箱组装科一直非常积极，开始罢工之后，就没有进车间了，因为我们的车间是封闭的无尘车间，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容易被控制。所以大家只聚集在天桥底下阴凉的地方。很多其他部门的人游行之后，

就回生产线吹空调，但我们变速箱除了不参与罢工的人之外，从来没有人回过车间，因为觉得在外面比较轻松。那时候更衣室本来是有空调的，但公司后来把空调关了，逼得我们只能在天桥底下坐着。

实际上罢工一点也不比工作时轻松，一直在户外接受阳光的洗礼，没有水喝。离工厂近的人在群里知道大家没有水喝后，自己掏钱买水送到厂门口。大家一直相濡以沫，维持着罢工。学校的同学因为在不同的厂工作，平时很少联系。罢工的消息传出之后，有的同学知道是我们的厂之后，特地从广州过来看我，都说你们太厉害了。

资方开始回应加薪要求，工人提出四大意见

5月26日，本田提出增加工资366元，实习生由之前的925元增加到1569元，与正式工相差无几。资方开始分裂实习生群体，并威胁实习生如果再继续下去，将通知学校不发毕业证。

大家经过一段时间对法律的学习，对工会也有所了解。现在的工会，在劳资纠纷发生前后都没有摆正位置，没有维护员工最基本的合法权益。鉴于公司没有诚意，大家在群里商讨了一份员工意见书，提出4大项要求：一、增加工资800元，其中500元加到基本工资；二、今后工资涨幅不得低于15%；三、不得追究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并让被开除的两名同事复职；四、重组工会。

罢工高潮

我们约定，任何一条意见得不到满足，大家都绝不复工，并有人负责打印了意见书，从桥上扔给同事们传阅。在这一天也发生了

罢工的高潮，南海本田所有驻厂日本人都走出了办公室，在员工游行时跟在队伍的后面，所有班长以上的管理人员也在后面跟着，并从队伍中把一些认识的人拉出队伍。这一天大家游行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在群里说那些狗日的在拉人出队伍，大家看见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开始准备围攻日本人。

于是在一块草地上，队伍从后面围了过去，将日本人都包围起来了。那一刻心情真的是好极了。这些日子，这些死日本鬼子也实在是太嚣张了，是时候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了。大家把口罩也都摘了，怕什么，他们爱拍让他们拍个够。这些日本人突然被几百人包围起来，这时候有点害怕了，不停地说：“大家冷静，有事好好商量。”不过大家怎么会听他的话呢！他们一出声，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不要讲鸟语！”女翻译被这种场景吓得有点想哭了。大家把他们越围越紧，僵持了许久，把未署名的意见书交给了日本人。他们说要与总经理商量再给答复。争执了许久，最后还是将日本人放走了。

5月27、28日，日本人似乎松懈了很多，可能被大家吓着了，得压压惊，再想对策对付我们。广播偶尔发出几声：“现在是上班时间，请大家回到岗位！”只要广播一响，大家就对着广播骂起来，解恨！

资方分化工人，逼实习生签署承诺书

5月29日，这天一直不停下雨，上天好像也在替工人们哭泣。大家并没有过分要求什么，为工厂默默奉献自己的血汗，奉献自己的青春，为公司创造了一笔又一笔的财富，现在只是想生活可以更好点，却受到资方不断地漠视和敷衍。

果然没有猜错，资方有了新花招，弄了啥破承诺书，到各个宿舍发，并说在一个什么时候必须交。厂里还把各学校的老师叫来做

实习生的思想工作，把实习生都接到松岗的桃园中学做思想工作。几位老员工撑着伞，来到南国默默地看着实习生们被送到这里，气愤着、紧张着、也同样无奈着，直到实习生们陆陆续续走出来，说并没有理他们，才把紧张的心放松了一点，同样也为实习生们的认识感到欣慰。

资方同时在做另一件事，请班长吃饭，发红包，说要把这事解决了。一些平常暗地透露消息的人也开始改变态度，看来金钱的力量真是大啊。资方似乎是一错再错，因为办公室的人并没有参加罢工，但是也要求他们签承诺书，让他们非常气愤！结果，不但没有人签，反而让罢工队伍更加地团结，甚至某车间的办公室人员也出来参加游行。

“工会”打工人，罢工再次升级

5月31号，早班的人乘坐通勤车来到工厂，突然发现厂区多了将近200名戴着黄帽子、挂着狮山镇总工会标志的人。工人们一下车便被拦进了车间。资方还请来了律师，和管理人员一起给大家施加压力，说要是不愿意干立即签名离职。律师说大家是违法的。我们问“触犯了那条法律？”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

公司附近的道路也被封锁了，还有防暴警察在驻守。在QQ群里看着厂区发生的一切，大家的心都揪着，一边默默为在工厂的人祈福！5月31日，媒体不再报道南海本田事件，我们的QQ群被屏蔽，在各大论坛发帖的人被网警警告。大家都在感受着这个社会(?)对待工人是多么的可恶，气愤已经解决不了什么了。大家只有庆幸，还有那么多员工还是团结在一起。可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有些人已经开始动摇了。

在这关键时刻，有十多名同事，想尽办法从车间往外面倒垃圾

的安全通道走了出来，车间的领导对大家说这些人走出车间，就不再是变速箱的员工了。在操场，所谓“狮山镇总工会”的人，知道他们被口头开除之后，让保安开了拉闸门，试图把他们推出厂区。在这时发生了拉扯，有女生在推拉的过程中被踢了肚子，有工人的脸被刮伤。据说打人者有“工会”的，有带手铐的公安，也有村民，各种人都有。打完人以后，那帮黄帽子迅速上了附近的面包车，跑了。门口许多记者拍下了这个画面，当打人的消息在群里发出，大家各种愤怒，各种担心，事件开始升级了。我们很生气，一定要讨个说法。本来有些车间已经复工了，听到打人的消息，又罢工了。虽然存在封锁，还是有媒体爆料了这个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轰动，大家都对工会开始批评。当天厂里也取消了二勤的通勤车。但是我们也收到消息，国内媒体收到指示，不能再报道这次罢工了。

6月1日，大家非常气愤地回到工厂，想要工厂给被打的人一个说法。这时工厂的领导都回避了。大家见到日本人就过去问：“为什么会发生打人的事！我们只是想加点工资而已，从来没有破坏工厂的任何设备！”日本人用蹩脚的中文说，这件事由工会解释，不关他们的事。当时大家对政府、工会都是极其的失望。

这时候有人在群里看到大家对政府、工会的骂声一片，呼吁大家不要把矛头转向政府、工会，要记住我们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就是一个目的，就是提高待遇，争取增加工资，不要把事件继续升级下去。把矛头对向政府，不是我们主要目的，并且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人现在把责任都推给工会，是计谋，大家要冷静！不要上他们的当！大家渐渐从激动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决定还是游行吧！



为平息罢工，人大代表前来调解

这一天厂外聚集了很多外国记者。就在游行的时候，突然有个叫曾庆鸿的人拿着名片对大家说他是人大代表，但是大家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并不信任。他不断地说：“我是来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好啊，那你给我们被打的人一个说法，那你给我们加工资，那你去和我们老总说答应我们的要求啊！”他表示要大家选出代表来和他聊，这样他一个嘴巴，那么多人很难沟通。大家把他的名片扔了，继续向门口走去，准备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他当时气坏了，说“我真是来为大家说话的，你们在这里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能解决问题么？事情被他们扭曲后会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报道，你们会知道么？你们要冷静地想想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不要轻易被他们利用。”大家看他一直跟来，走在大家面前，一遍遍重申他的来历，满头大汗，就要他在众多记者面前发誓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覆。他说没有问题。在媒体的摄像头下，他说他会以中间人的身份去调停这件事。大家才陆陆续续地散去，回到厂区。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广汽集团的总经理，而南海本田就是本田和广汽的中外合资企业，另一个身份是全国人大广东省代表。

这时候曾庆鸿找到了几名被打的工人，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平复他们的情绪，并让他们在人群中找工人代表，进而协商如何解决问题。曾的秘书找到了我，跟我说就过去和曾先生聊聊。大家也说去吧，聊聊也好，事情总要解决。我去见了曾庆鸿，当时只是想着事情发展成这样，总要解决吧。一直这样耗着，大家也在受着不同程度的煎熬，身心疲惫；去见他，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吧。各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人也被推选做了代表，但大部分的还是变速箱的人，总共有二十几个人。

我们见到曾庆鸿，把我们的意见书递给了他，要求公司方和工会道歉，并慎重地考虑员工意见书上的各项要求。他依照我们的意思，让总经理、厂工会主席、还有狮山镇总工会的主席都过来口头上表示歉意，说发生昨天的打人事件他们表示遗憾。总经理那时候已经显得很憔悴了。对于员工意见，他们说会与曾庆鸿进一步协商，尽快解决。对于狮山镇总工会的道歉，我们并不接受，因为他要道歉的对象是被打的同事，同时工会本应是工人组织的组织，事实却背道而驰。我们要工会出一份书面解释，向外面的人交代，曾庆鸿马上附和说：“对！你们赶紧给我写，明天早上给我贴出来！”他当场命令那个工会的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他真的好像是为我们说话一样。

针对员工意见，曾庆鸿希望大家先复工，有他和公司方协商，并在三天内答复。大家说，之前总经理也是这样承诺的，但是结果呢？他说，如果事情没有解决，“手脚长在你们的身上！”（意即想罢工，想离职随便你们）当时代表们都表示只能听大家的意见，并不可以替大家做决定。

于是召集大家在饭堂开了个员工大会，由曾庆鸿主持。他大致重复了一遍他在会议上所说的，要大家先复工；关于打人事件的处理，后面会协商解决。但是大家对他还是不信服，于是他让之前参加会面的代表都站出来，并说你们的代表已经同意了。当时大家都挺被动，因为我们在会见时根本没有说同意，都很紧张。

一位代表站出来跟大家说：“罢工到今天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月，这半个月我们不停地在游行，特别是变速箱的同事们，一直游行在最前面，一直在被太阳晒着。大家之所以会坚持那么久，是因为我们想要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继续僵持，现在媒体停止了关注，各大网站也都陆续屏蔽了我们的消息。我们罢工并无恶意，既然曾庆鸿愿意出来替大家和公司协商，大家为什么不可以相信他。他刚刚也说了如果三天后没有答复，手脚在我们的身上。”他说完，其他

科的同事表现得比较激动，说为什么要同意，坚决不同意之类的话。但其实一直在外面的都是变速箱组装科的人，其他人都是游行的时候才出来的。变速箱整体的意见都比较统一，面对其他科的同事，代表说只要你们愿意冲锋在前面，我们变速箱的绝对支持你们。没有人再说话，很激动的一小部分员工离开了饭堂。其他的都没有太多异议，当天晚上的晚班就复工了。会议完了之后，曾庆鸿留电话给我，让我作为工人与他的联络人。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内部也很不团结。

在此前后，公司又抛出了一个涨薪方案，说最低月薪会涨至1910元。听起来很多，但这其实跟我们的要求还是有很大差别，因为“最低月薪”当中，基本工资只是其中一部分，还要再加上加班费、岗位补贴和生活津贴。如果公司把基本工资压得很低，那可能会导致两个后果：一，员工要继续靠加班来保持工资水平；二，公司为员工以基本工资为基数缴付的社会保险费用，会很少。

工会“道歉”无诚意，工人发公开信回应

6月2日中班下班后，车间里比较积极的人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有个同事带来了报纸，大家这才知道前一天曾庆鸿叫狮山镇总工会写的“道歉信”已经见报了，但却是一封不负责和扭曲事件的“道歉信”。信件指出：“昨天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述40多名员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大多数员工的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会站出来劝导那些员工正是维护绝大多数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

大家越看越气。就想他们可以发公开信，那我们一样也可以发啊。并且现在代表并没有覆盖到所有的车间，现在人心比较散了，我们可以通过公开信来呼吁没有代表的车间选出代表参加谈判，同

时也通过公开信表示我们并不是这样就妥协了。就这样我们一直协商到深夜4点。为了能让其他新选出来的代表能及时地联系到我们，决定将我的联系方式留在公开信上。并约定好在第二天自己打摩的提前到公司，将打印的一批公开信发放到各个车间休息室。

我们当初谈的时候并没有说要把这个公开信发到媒体上，是我在出发前想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反正就是觉得只向厂区内的人喊话的话，感觉还是很孤立；我们还是需要外界的关注。于是我也给一直跟我们联系的财新网记者发了一份，不过没有跟其他一起派信的人说。

在我们的公开信里，重申了包括全厂员工及实习生基本工资涨800元、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落实职工的组织权等要求，跟之前QQ群上讨论的基本一样，只是写得完整一点，还引用了报纸上写的一些东西。此外还指出资方采用种种手法分化工人，更招来学校领导向实习生施压，并威胁不发毕业证，这是部分员工在5月31日被迫复工的原因。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对此没有批判，更成为其中的帮凶，在休息时间参与逼迫实习生签署不罢工“承诺书。”工会理应维护工人集体利益，领导工人的罢工，但是至今仍在为“工会人员”暴力伤害罢工工人的事件寻找借口，我们表示严厉谴责。对于今天资方在工资上所答应的加幅，是罢工员工在强大的压力下，用血汗争取来的。工会的信件却将之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我们对此极大愤怒。



第一次谈判，人大代表指责工人违法

在复工了一整天后,资方还是没有采取任何的回应措施。这让代表们心中隐隐不安，于是约了曾庆鸿在 6 月 3 日中午两时举行复工后的首次会议。

6 月 3 日，计划如期进行。在会议开始前，也有通过公开信而选举产生过来参会的代表。在会议开始前，我向曾庆鸿递交了那份公开信。刚开始他并没有很大的反应，他刚看完就被门外的一个日本人叫了出去，被告知各个车间都有这些公开信。他进到会议室大发脾气说道：“你们是合法的代表么？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是我任命的！我已经在很努力地帮你们协商了，你们现在是想怎么样？把我也害了么？什么叫满意的答复？就围绕你们公开信上的罢工字眼，有关部门可以直接把你们都抓起来。”我当时表明公开信是我自己写的，与其他人无关。他对着我说：“你以为你一个人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么？你们全部都脱不了干系。我不管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必须把公开信全部撕毁，不然没有人可以帮你们！”他也表示会尽快按照选举办法选出合法的代表，在 6 月 4 日 3 点参加工资集体协商。

担心违法，工人求助常凯教授

会议结束后，心情非常的沉重，走出事务栋，我坐在草地上，头脑一片空白，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违法什么的。想着曾庆鸿的 180° 的转变，还有公开信处理得不好，真的违法怎么办？在来工厂之前我已经把公开信发给记者了，同事们都没有责怪我，让我觉得更加愧疚，在做着最坏的打算。我或许会被真的抓起来，但是一定不可以连累任何一个同事。我也赶紧联系了财经网的记者，看

看是否可以把我的公开信撤下来。她表示已经发表了，但是会尽力去看能不能撤下来。她没有过多地询问我这边的情况，后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介绍了一位我国劳动关系方面很有权威的专家，让我尽快联系他，他愿意免费给我们当法律顾问。他就是常凯教授，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人给我们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之前不懂法律，后面被逼着了解了很多法律法规，但是还是不敢理直气壮地坚信我们没有触犯法律。我们因为不懂法律，所以受到不停恐吓的时候，心里会发慌。

当时马上就要上班了，所以等到吃饭时间，我赶紧给常教授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并咨询到底是否有违法。他已经看过公开信，告诉我，你们写得非常好，没有违法；我愿意给你们担任法律顾问，但是必须要有正式的委托书。当时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一点了。由于我还要生产，所以让一个在办公室的同事给常凯教授打电话，并让他起草委托书。我们当初是邀请他当协商代表和法律顾问的，后来他来了之后，才说不能当协商代表，只能当法律顾问。

因为我们公开信都发出了，当中有要求改选工会，可能让曾庆鸿觉得有压力。他可能觉得尽快展开全厂选举的话，我们也不一定选得上，毕竟我们一开始就不是真正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所以就让厂里的工会主持了协商代表选举。当晚 10 点，工会委员在各科组织选举工人代表，基本上没有候选人，每个人直接在纸上写自己想选谁，放进工会准备的投票箱里就算投了票。没什么规则，也没有人拉票，只是有人说得票不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要重新选。虽然没有人很想当代表，但是氛围还是很严肃，而且大家已经考虑到选出来的人代表大家跟公司谈，所以心里面也会惦念到底是谁会担起这个任务。

最后我当选变速箱的四名代表之一，具体票数已经忘了。虽然一直都在参与，但还是有一点希望大家能看到我所做的事。后来很

多人选我，我就觉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第二天就要参加集体协商了，工人代表必须统一意见才行，所以 12 点一下班，我就一直在联系各科产生的代表，并协商是否要请法律顾问的事。他们均表示同意。一直到深夜 4 点才联系完。对接下来的协商会怎么样，我没什么想像，因为根本没时间想。

6 月 4 日早上，早早地起来，将签好名的委托书传真给常凯教授。同时告知曾庆鸿，我们请了常凯教授做我们的法律顾问，并拜托他在集体协商前，允许我们开代表大会。中午 1 点 30 分，在工会会议室召开了代表大会，我当选劳方发言人。这次七个车间三个班次中推选出代表共 30 人，其中首席代表是工会主席，理由是在工会没有重整之前，让现任工会主席作为谈判代表，可以保证谈判程序和结果的合法性。代表们虽不太愿意，但是为了确保合法性，还是同意他做首席代表。当天下午两点钟，所有被选出来的代表先聚在一起开个会，统一意见。大家都很有力，都来了。有些人是其他车间的，之前都不认识，大多数是一线工人，也有拉长。大家对公开信上面的诉求都很支持，也同意请常老师当法律顾问。

四、第一次劳资谈判

下午 3 点我们和资方一起，进入会场，靠墙对坐，中间是来自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还有曾庆鸿。最后面还准备了一块场地，是留给休会时用的。但是常凯教授还没有赶来，我非常着急，不断发短信询问他到哪里了。



他回复说：“我们在路上了，没有关系你们先开始。”

在佛山劳动局局长的主持下，集体协商如期进行。资方首席代表是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其余 4 名代表包括管理科长、财务科长和技术科长，以及专程从广州本田总部请来的法律顾问。劳方的首席代表为南海本田工会委员会主席，另外 4 名谈判代表均是昨晚到今早上才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场内还有 26 名工人代表列席会议。根据之前的约定，只有首席代表才有发言权，而其他列席的工人代表则可以通过递纸条的方式行使他们的“建议权”。这 30 名工人代表是在 6 月 4 日上午刚刚从不同的班组和车间中临时改选出来的。此前，谈判代表共有 16 名，被认为代表性不足。

第一阶段谈判的主要内容由南海区劳动保障局的领导宣布谈判的基本议程、规则和相关注意事项，并表述了公司方的方案，给了同一个工业园和相关企业工资涨幅的一些数据。

我们一直想着把我们那几条诉求都谈完——涨多少工资、之后每年的涨幅、改组工会等等，但谈判是不可能谈这么多东西的。我们没有一个侧重点，只能详细谈了工资怎么涨，其他都是纯粹宣示性的讲了一下。谈判时，厂方不同意全厂基本工资涨 800 元的方案，一直说最多就是整体月薪涨 500 元。我们那时候想的是 500 元怎么分配的问题——多少在基本工资、多少在津贴，就一直有争论。可是公司怎么也不让步，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就交给仲裁。我们不同意——也没有说为什么不同意，反正就是不同意，因为没法和外面的人交代。听完公司方的方案，我们要求休会，让我们有时间好好讨论下，并研究下公司提供的数据。

在休会过程中大家的意见分歧就比较大，因为缺乏经验，加上首席代表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但是主要发言人是他，大家心里非常不爽。这时候曾庆鸿带着常凯进到会场了。我们见到他非常激动，因为现在比较混乱，大家对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也没有头绪。他的到来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线生机，代表们纷纷起立鼓掌欢迎。常凯

首先向全体代表确认，自己只是作为劳方的法律顾问参与谈判，而不是谈判代表。对此大家一致同意。关于谈判，他对大家说，必须讲究策略，在瞄准最高目标的同时，也要有心中的底线。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过程，如果双方都固执己见，谈判就不可能成功。大家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资方能坐下来与劳方谈判，这已经是巨大的成果。“我们要尽力争取更高的工资增长，但也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接受程度”，常凯说，“关键是资方必须承认工人的地位和权利。”我们对此表示认同。

休会时间到了，我们坐回各自的座位，后面列席的代表纷纷传上字条来。首席代表便照着纸条读出来。对此，大家觉得挺无语的，因为一点都不像在谈判的样子。当时虽然我也是发言人之一，但是看到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我发言也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说。目前的谈判更像是在哀求资方。难道集体协商都是这样的么？这时候我收到同事们的短信，他们不断询问谈判的进度。在谈判的过程中，他们对我们所抱期望非常高。在我们走进谈判的会议室时，他们表示如果资方还是那么强硬，他们绝对用行动支持我们。

大家等了将近四个小时，还是没有看到我们走出会议室。有部分同事早班已经到下班时间，但是还在公司等着我们的消息。他们表示如果在 19 点还没有任何消息，他们就准备罢工来支持我们。当时我也并没有觉得这不可行，告诉他们还在谈判当中。我知道他们会罢工，但也不太方便谈，也没有说不要，就是觉得不是太好，也不是很坏的感觉。到了 19 点他们开始罢工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日本人那里，一个日本人急急忙忙的走进会场说变速箱又罢工了。这一意外使得谈判场上的人们面面相觑，气氛马上紧张起来。原来态度还不错的日本人非常生气，说“我们已经坐下来和你们谈了，你们还罢工，如果这事得不到解决，将之前全部涨幅归零，申请劳动仲裁，由相关部门处理。”

常凯对工人代表说：按照国际惯例，在集体谈判进行过程中，工人绝对不能罢工，这种罢工在规则和法律方面都是不允许的。“这一点必须明确，我们应该组织工人马上恢复生产，否则谈判将前功尽弃。”常凯说，“作为劳方法律顾问，要负责保证谈判的秩序，大家必须要听从我的意见。”大家当时非常茫然，但有个认识就是：如果真的交给劳动部门来处理，我们的工资肯定涨不了多少。我和几位代表简单地商议下，立刻准备回车间。在我走出会议室的那刻，我看见一个日本人看我的眼神，非常让我不舒服。仿佛想把我掐死那样，但是时间很匆忙，我没有时间想太多。回到车间，大家都在休息室静坐，在我走向大家时，有位班长上前指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戴帽子，进车间要戴帽子你不知道么？我当时真的特别无语。什么情况，你还和我说帽子？大家看见我回来了，都不停地问情况。我赶紧把常凯及公司方的意见告诉了大家，希望大家先恢复生产，否则的话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很快，机器开动，工人复工了。一场虚惊过去，谈判继续进行。

工人代表不断提出意见。因为大家都是临时聚在一起，对于谈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计划，只是各自表达自己的意见。诉求不一而足。对于我们的意见，资方也无法立即答复。双方只能再次休会，劳资双方回到自己的独立空间继续讨论，以期形成清晰完整的方案。

曾说目前的方案是他和日本人谈了好几个晚上的成果，已经超出佛山平均工资了，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再加了。常凯召集大家坐下来，告诉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意见过于散乱，因此必须调整策略，首先要明确主要的诉求，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其次要明确意见表达的程序。如果大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需要通过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与资方谈判时，适时的时候要同意，不能一直不同意，否则永远都不会有结果。

关于主要诉求，代表们经商讨整理出四个主要问题。一是工资

总额问题；二是工资增加的部分是作为奖金，还是加入基本工资；三是工龄工资问题；四是重组工会。常凯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首先，重组工会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经资方同意，因此工会重组与这次谈判没有关系。至于工龄工资问题，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是这家外企劳动制度最基本的特色，可以提出在中国实行；但我们没有具体的试行方案，建议这个问题在这次会上提出议案，留待下次谈判解决。这次谈判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即工资增长问题。增加的薪酬如果计入奖金，拿到手的工资总数会多 56 元，但作为基本工资则会扩大工资基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意见分歧。最后决定投票决定。30 个代表，按照意见不同分别站在两边，弃权者站在中间。表决结果，同意加入基础工资的占绝大多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定这一方案。关于谈判策略，常凯教授提出的意见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就是，在资方同意增加的 500 多元中，要尽力争取更多地作为基础工资。对此，我们要有一个争取的目标，但也要有一个底线。谈判就是讨价还价，所提的目标只是要价，对方也要压价。我们要据理力争，坚持底线。

在此基础上，大家确定了具体方案，由总经理和常凯先与资方非正式沟通。我当时觉得，应该跟员工先交代情况，看他们的反应再做决定。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代表也是这个意思，可是这样回去的话，过程又要延长很久。谈判过程中很多政府官员在我们附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是不断在你耳边说：其实你们这个涨幅已经很多了，也要考虑一下同一个园区的水平。我们压力很大，那时候很难做决定，实在不好评估。

沟通的结果，公司同意涨幅还是 500 元，但其中的基本工资增加了 100 元。结果如此顺利，出乎工人代表们的意料。当常凯回到工人代表的房间向大家报告这一消息后，他们都欢呼起来。

第三轮谈判正式开始后，工人代表正式提出增资方案：1544 元（原工资）+300 元（基本工资）+66 元（奖金补贴）+134 元（特

别奖金)。企业方正式表示接受这一方案。并且，具体实施时间回溯到5月份——也就是工人罢工的当月。关于奖金发放的时间和方式，也达成一致意见。工龄工资问题也被提出，资方同意作为下一次谈判的议题。最后，会议主持人问双方还有没有提议。常凯代表劳方提出，资方对罢工工人不得追究责任，参加罢工不能影响工人今后的职位提升和发展，这是解决罢工问题的国际惯例，应该明确地写入协议。对此，资方表示可以接受，将资方不追究停工的工人的责任写入协议。常凯进一步提议，劳资双方应以此为契机，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工资增长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通过制度来解决劳资矛盾，在保证工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会议主持人宣布打印协议文本，准备签字。协议书生成之后，资方首席代表又表示，常教授强调的通过法制解决劳资矛盾，并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意见非常重要，应该写到协议中。这一提议劳方完全同意。工作人员马上重新生成了新协议文本。

在谈判之前，资方强调谈判全程不允许拍摄或照相。但常凯建议，谈判应该留下影视资料，特别是成功达成了协议，更应该留影纪念。大家纷纷表示接受。在频频的闪光灯下，劳方和资方两名首席代表共同在协议书上签字。其后，劳资双方谈判代表以及法律顾问、斡旋人和政府代表共同留影纪念。合影后，资方谈判代表频频向常凯教授鞠躬致敬，我们和资方也相互握手。这时有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悄悄对我说：“小李，以后不要随便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公开了，要懂得保护自己。”常凯和我们也合了影，我就站在他的右边。此时，已是6月4日晚上9点多，距谈判开始时间已过去6个小时。延续十余天的集体劳资争议宣告结束。

随后我再次向常凯表示感谢。我问常凯老师可否去现场与工人见面呢，同时带给大家协商成功的消息。常凯很和蔼地说：“我都已经来到了工厂，肯定要去看看工人。小李你们车间在哪里呢？你带我去吧。”到车间后我们召集全体员工集合，请常凯教授给大家讲话。

在他讲话时，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和我说，等会和工人们宣布结果时要强调什么什么。所以没有怎么听清楚常凯和大家说了些什么，但是后来几个同事和我说，“常教授的话实在让大家热血沸腾啊，被他说得我们有点不好意思了。”罢工持续那么久，除了受到各种打压和威胁，从来没有人对大家说你们是好样的，常凯这样和大家说了，第一次听到别人的认可，大家心里都挺激动的。等我宣布完结果，常凯他们一行已经离开工厂了，对于他敢这样出面公开地替大家说话，我们对他都心存感激。南海本田事件画上圆满的句号。因为一直没有吃饭，宣布结果后，我们就出车间吃东西了。

五、罢工对我的影响

回来后我在生产线上询问，大家对今天谈判的结果是否觉得满意，有没有什么疑问？正聊着，被班上的代行给看见了，过来就说现在是上班时间，请回到你的岗位。我解释了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但是他还是凶巴巴地说：“我不管你什么原因，总之现在是上班时间，请你回岗位。”哎，这些所谓的“领导”没有参与罢工，我们争取的工资有没有少他一分，现在又来发挥他领导的风范了，让我觉得透心凉。

事件是结束了，对我的影响却还在继续着。6月8日，有狮山镇的有关部门的人员，委托刚到本田的实习



生暗地调查我，和实习生是这么说的：“她罢工那么积极，是不是家里真的很困难啊，我们了解下情况。”主要关于我何时上班、何时下班、住哪里之类的一些情况，当同事们告诉我，我实在被吓了一跳，我不明白为什么。

罢工结束几个月后，常老师邀请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劳动关系的研讨会。有一个来自基层的声音，仿佛是整个研讨会的亮点。我也没有想太多，反正常老师之前帮助过我们，他现在需要我，我也就应该去。但是连假都还没请，工会领导就知道了，直接走进车间，叫我不要去北京。那时候我没有听工会领导的，就去了，虽然一直也很犹豫该不该去。

本田罢工后引发了各地的罢工潮。6月11日，因为供应商罢工，所以我们这一天是休息的。这一天我接到爸爸的电话，说我们当地的书记找到他，说要和他一起来看我。我更加意外了，这是怎么了？我立刻问人大代表曾庆鸿，他是否知道此事。他说他并不知道，应该不会怎么样，让我们好好团聚下。整个事件我从来没有和爸爸说过。有一天他看新闻看到南海本田罢工了，就立即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做不下去就不在那里做好了。”爸爸要下来佛山了，我只好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他听完之后也表示支持我，跟我在短信里说：“小娟，你已经懂事了，我很高兴特别是你的所作所为，胆量过人，为人有勇气，虽然你是个女孩，但看起来都比别人的男孩强，能为整体着想，做的很好，我担心的是你年纪还小，内心的压力太大。所以你要保重你的身体，愿你在人生中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接到这条短信，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其实我从来都不想让他操心的。在事件发生时，我从来没想到要流眼泪，但是爸爸对我的认可，真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小就那么的努力，就想爸爸知道，我们女孩也从来不比男孩差。我和他说：“爸，你就当下来旅游吧，也没有怎么来过佛山。让书记带你到处走走。”爸爸说如果有其他人一起他就不来了。

下午他们就到了佛山，坐着警车过来。老爸说本来路上很塞车，但是没有堵到他们的车，挺快的。他还给我带了家乡的鸡蛋。看着爸爸抱着个纸箱，憨厚的农民打扮，在这里肯定觉得浑身都不太自在吧，但是爸爸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一块吃了饭，书记语重心长地和我说：“小娟，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年纪轻轻的千万别上别人的当，你看的那些什么法律，全都不要看了，那些不是我们国家的，不符合我们国情。知道不？”简单聊了会，书记去上洗手间，爸爸偷偷和我说还有很多公安部门的人在另一部车上。我说：“爸你不要担心我，我一个女孩子能有多大本事，用不了那么多人对付我。他们应该是还有其他事。你下来了，就好好到处走走。”

其实被监控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有些时候回到住的地方，很害怕房间里有没有摄像头，在群里不记得聊什么，说了句会尽力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很快书记就又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是敏感时期，不要说这些话。有些时候下班一下车，有同事就说看见一辆车里面有摄像机在拍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有点像崩溃的感觉。爸爸和我说让我换个手机号码，我说：“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做过一件违法的事。他们喜欢监控，那就监控吧。我的生活就是每天上班下班，我不知道他们听着这些无不无聊，但是花那么多人力在我这个弱女子身上，真觉得是莫大的浪费啊。”

非常郁闷时，我就发短信给常凯老师。我当时觉得他的一句话，就像定心丸。如果他说没事，应该就没有什么事吧。毕竟自己还是不知道到底有事还是没事。

那时候我还是很大胆的，在车间看到总经理，我就脱掉手套冲到他面前直接说：“我们罢工是善意的！希望以后有和平沟通的渠道！”总经理也说，他们会尽快把这些渠道建立起来，什么什么的。

六、工会改造

6月14日，广州日报报导，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表示准备在南海本田试点，改造工会，加强民主化建设。看到这个报道，我们非常开心，因为重组工会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重点。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工会法是非常完整、全面的，可惜的是没有落实。我当时就特别想联系到副主席孔祥鸿，想知道他是准备如何改造我们的工会呢。皇天不负有心人，我通过别人问到了他的电话，并马上联系了他，问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事呢？他说：“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有打算在南海本田试点，近期就会到南海本田去了解情况。”然后我就问他，是否可以在他来公司时，和代表们见上一面。他也欣然同意了。当时我又聚起了之前在罢工中很积极的一群人，还有所有的协商代表，跟他们讲这个好消息。那时候我真的好厉害啊，可以召集这么一群人，当时大家为什么会挺我的呢？讲起来好像挺好玩的，但也没有想太多。不过，后来参选工会选举的只有我一个。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形式而已，搞这个工会没有意思，有没有都用处不大。

6月28日，和员工代表们一起见了孔主席。他说要健全目前工会的网络，之后还要建共青团组织。这段时间，他会带着他的工作小组，充分了解员工各方面的诉求。

7月22日，公司针对员工117条意见开了答复会。我作为代表之一参加。

9月2日，我当选南海本田选举委员会的委员，负责筹备和推进各分会选举小组长、分会委员、分会主席以及增选公司工会委员和工会副主席等工作。虽然之前已经经历过选举，但这次算是比较正式的。先从工会小组长选起，每个班组选一个。没有候选人，无记名投票，也是把想选的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小组长选出来之后，

就让他们提名推荐四个分会候选人，也会把他们的资料贴出来让大家看一段时间，再由全车间的人投票，最后选出来一个主席和两个委员，但是还不算是本田工会的工会委员，需要再选工会委员会，由每个分会提名，再由 12 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工会委员的候选人。所以这是一次间接选举，不是直接选举。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想要真正地选出代表，选举委员会的作用真的非常重要。在这次选举中遇到各种突发状况，例如这个班的人选了那个班的，这样的票理应作废，但是为了顺利地完成选举，就不理会了。还有些班组有些人比较权威点，虽然是匿名，但是他们会和大家说选我啊，迫于压力，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当选这个事有多重要，就随便选了。在我所在的班组，是管理人员在选举前直接和大家说不要选李晓娟，所以班组上没有选到我。但全车间一起选的时候，我就选上了，成为分会委员。

我觉得挺好玩的。我费心去为大家谋利，这样是何必呢？不选我，我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清楚我为人的还是会投我一票。整个选举过程，我从来没有拉过票。我也挺想看看到底群众的眼睛是否是



雪亮的。在由整个车间选举委员和主席时，候选人我是直接过半数的。看到大家还是信任我，我挺开心的，这就够了。分会的选举完成后，就到公司工会的委员选举了，这是由于候选人是每个分会提名三个交由选举委员会酝酿产生候选人，再由全体会员代表选举。

选举委员会里有七个都是之前的工会委员，都是副科级。后来增选五个委员，我也在里面，但就只有我一个一线的。我是唯一的

一线员工。另外两名是轴务加工科的代行。到我的名字由选举委员会投票时，我自己是不能投的，揭票时我得了两票，就是那两位代行投的。我觉得在意料之中了，他们还替我觉得不公平。在这种选举中，我是不可能被选上的，毕竟没有这么多力量跟他们斗。如果这个选举是全厂一起投的话，还有机会。而且省总工会那边一直不同意我们罢免工会主席，那时候我们觉得他什么都不推动，很讨厌，干嘛不换？最后还是没有换，只增选了副主席。

七、希望改变自己，参加高考

9月19日，受常凯教授邀请，到北京参加《集体劳动争议状况及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研讨会》。第一次跳出工人的视野，看见有那么多学者对劳动者的关注，让我觉得挺感动的，当初觉得工人被孤立的感觉减少了很多。常凯教授跟我说，他以前也是工人，经历了很多才有今天的成就，关键是要不断去学习，不断去努力，才能改变自己。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学生蔡红老师，以前也是一位工人，现在是大学老师。在他们身上我似乎看见了自己前进的方向，我应该努力去改变自己只是个工人的现状。工作在一线的劳动者是伟大的，但是流动的生产线，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虽然当时我也是个小小的分会委员及小组长。但是自己能力有限，环境也对自己处处限制。在常老师的鼓励下，在蔡红老师告知我可以通过三加证书的方式，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时，我义不容辞地投身备考中。

经过大半年的备考，在2011年6月参加了全国统考。我对于自己的能力非常清楚，我对自己说就当是一次机会，失败了也没有关系。我还有很多可爱的同事，还有很多朋友，我可以选择其他的途径。备考的过程中，上班只要有休息的间隙都会复习，下班之后就

躲在房间里拼命地复习。曾经的初中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刚好51放了半个月的长假，我跑去他们大学，租了一个五十元的单间。他们免费给我辅导了两天一夜。考完之后，我给曾帮助过的人都发短信，感谢他们之前的帮助，因为觉得发挥得不好，考完我和同学们约在一块，跑到珠海玩了两天，回来时可以查到成绩了。当时在回来的车上知道了我的成绩，我觉得我真是太对不起看好我的人了。不过很幸运，我还是被录取了。我的同事们也为我感到开心。我当时觉得上天真是对我非常眷顾，心中充满了感激。

录取之后我才考虑到学费。一查学费真的不是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我马上又想到了孔主席，于是又和他联系了，希望他可以提供帮助。孔主席也很高兴我能考上大学，帮我减免了80%的学费。

2011年8月份，一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联系到我。我们在罢工时就认识了，并以朋友的方式一直联系。他和我说他报社准备出一本关于劳动者的书，他觉得我的经历还挺典型的，希望我接受他的采访。我没有考虑太多就答应他了，因为备考期间，他帮我找高考的辅导班。也挺感谢他的。

2011年9月5日是我离开南海本田的日子。许多同事给我送上了上学需要的物品。住在一起的两个女生知道我上学需要花很多钱，还给我准备了红包。看见她们沉甸甸的心意，我的眼泪不停地流。在人事办理离职手续时，许多领导和我说：“加油！”虽然之前也不太认识，但是他们对我说这两个字，让我非常感动。一位财务部的负责人问我QQ号。她说：“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呢。在那次去贫困山区小学慰问活动中，你带了很多娃娃送给小朋友，很有爱心哦，以后有活动也叫上你吧。”人事部的负责人陪我聊了会，问了下是什么原因要离职呢，以后还愿意到南海本田工作么？走出南海本田之后，我哭了好久。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在这里过了三年，突然觉得真的很不舍。

2011年9月9日阳光明媚，这一天我踏上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到南华工商学院劳动关系系，从工人的身份正式转为一个学生。我除了上课，就是在广州的茶餐厅打工攒生活费。

2011年10月14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我的报道。我很紧张地跑到报亭去买读完了报纸。读完之后，感觉像在读别人的故事。我一不小心成为别人口中的“名人”，一不小心又见报了。但是我的未来在哪里，我依然很茫然。能力，知识都需要提升。我不知道三年后的我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我？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当听老师说有一个同学因为家庭经济问题，不能来上学，我感触非常大。希望他明年可以攒到钱，来上学。或者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很好地发展下去。

而我自己只能一步一步地靠自己走下去。我没有很优越的家庭，没有宽广的人脉，也没有丰厚的知识，没有很高的能力。曾经我很天真地以为常老师或者是某个人会一直引领着自己向前走，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他或许可以指出个方向，但是很多时候选择是要自己决定的，但是选择的过程中要割舍很多东西。当初奋不顾身地为大家谋利益，我的目的是想大家可以拿到应该属于自己的工资，让大家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我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回报或者从中获得什么。即使我真的被抓了，我也无怨无悔。后来奋不顾身地跳出工人的角色，目的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想一辈子的生活都是在流水线旁，我也不想我们被称为“农民工”。

小时候上学经常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变成了祖国最苦最累生活得最没有价值的机械人了呢？我们是来自农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就变成农民工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个群体莫大的歧视，我们和城市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不一样，却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对待。我可以割舍我的工作来学校学习知识，有人说我伟大有人说白痴。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看法也不一样。今后我也要奋不顾身地往前走。未来的路任重道远，我想我也会一步一个脚印去走。我想要这个社会更加和谐，我想要工

作在一线的劳动者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我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个社会或许经常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仍然的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经历过后就都会是自己莫大的财富，我经常对自己说：“加油吧，李晓娟，你比很多人都幸运，因为你拥有着一段宝贵的财富，它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你得好好学习，充分利用上天给你的这段经历。”其实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能做的就是把握现在。我不怕吃苦，无论未来的路可以走向哪里，我都会坚持不懈地保持乐观，保持积极的心态！我相信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机遇和挑战，学会把握机遇和接受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完善自己。



珠宝厂工人持续一年多的 争取社保行动

HB 工人抗争的几点分析

2010 年 7 月到 2012 年 4 月，G 市 HB 工人从了解到补缴社保的政策，到第一批工人成功补缴社保，整整用了一年九个月的时间。

HB 工人的行动经历了较为长时间的动员过程。他们在一年多的集体维权过程中，心理及行动的变化，反映了珠三角工人的一些典型特点。

这部分工人，年龄主要在 25 到 40 岁之间，在珠三角工作了大约 10 至 20 年，是工业生产中的主力，可以说他们的思想状态决定了目前珠三角工人行动的整体水平。他们来自各地农村，没有社会大生产的经验，不了解工人斗争的历史和经验。国内 1990 年到 2000 年前后，虽然国企工人在下岗失业风潮中有过几轮反击，但社会整体的气氛仍旧保守沉闷，如何谋求更好的个人利益成为主流思潮。在这种大背景下，这一代打工者抱着赚钱养家的想法来到珠三角打工。多年来的工资收入确实改善了生活，积累了一些物质财富，所以绝大多数人虽对辛苦严格的工厂工作有牢骚不满，但整体上适应

了打工生活，成为了珠三角产业无产阶级稳定的一员。

他们目前的经济和思想状态的主要特征是，随着年龄增大，自己的工人身份逐渐固定，家庭经济负担逐渐加重，不得不更多地思考个人的长远生活保障、子女教育、父母及自身养老问题等等。由于需要一份稳定些的收入和工作，他们不会轻易离职。常年的工厂生活使得他们比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工人更遵守工业纪律，很少和管理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集体行动中，会较为小心谨慎，尤其不会轻易和官方发生冲突。另外，由于长期在某个地区居住工作，有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会通过这个人际网络传递交流各类信息。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HB 工人的抗争是珠三角到现在所知不多的、由在职工人自发进行的时间较长的维权行动。我们了解的不少提出补缴社保要求的罢工或集体行动，大都是在工厂面临搬迁或者倒闭的情形下，工人将社保等问题作为最后的反击，尽可能减少损失的“一次性”防御性抗争。而 HB 厂还在正常运作，工人便提出补缴社保的要求，并与工厂管理层进行交涉。所以他们并不像关厂罢工中某些工龄较长的工人那样，要借最后的机会和工厂较量一番，能够很快发展到比较激烈的程度。由于绝大部分工人只是想补缴社保，并不想丢掉工作，因此他们并不想一开始便和公司严重对抗冲突，这也是 HB 工人的抗争初始显得不那么激烈的主要原因。不过随着事态发展，工人只要坚持想补缴社保，就不得不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并被一步步逼得反抗。正如积极分子 YH 所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被逼出来的。

另一方面，这种在职抗争，比起关厂的“一次性”抗争来讲，可以在该厂工人中产生更长期的影响。一部分积极参与过行动的工人从以前资方主导一切、工人只能服从的状态下，逐渐解脱出来，意识到工人也有权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且通过行动来改变现状。

工人集体维权与工会

维权工人对工会的评价

在维权初期，工人曾在劳工机构的建议下，找过当地工会求助。不过 HB 公司所在的地区工会没有帮什么忙，甚至没有像样的反应，属于当时珠三角官方工会的典型反应：根本不想卷入，也无力介入已经发生的工人集体维权。最后 HB 工人评价“找工会完全没用”。直到现在，很多去找过工会的维权工人仍然这么说。

工人自行成立或改选工会

前文介绍过，HB 工人由在职工人发起且维权时间较长，比起其他进行数天即结束的罢工、关厂维权行动，更有建立自我组织的基础。在 HB 工人的抗争过程中，一些劳工学者也曾建议他们在厂内成立或改选工会，利用工会的框架与资方开展正式的集体谈判。这样工人代表也可以获得一个法律认可的身份。但这个提议引不起一般工人的兴趣，工人代表也对此不置可否。对于补缴社保这个单一的要求，工人更愿意采取简单、直接的行动方式——写集体要求书，一起去和公司面谈，通过自荐或推选代表去谈判等等，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整套集体谈判机制去和公司对话。另外，HB 想要补缴社保的工人人数在厂内不过五分之一，工人也没有信心发动全厂工人去搞工会选举。在没有外界足够的支持下，如果真的有工人代表把力气花在了了解工会法律，通过繁琐的程序来建立工会，成为工会干部，得到官方、资方认可的地位，然后再谈判，工人行动的力量反而会

被分散，同时也会失去大多数追缴社保的工人的支持。

不只是 HB 工人，目前珠三角工人仍极少认真地将成立、改选工会作为一种维权的手段。这和工人争取的目标较单一，集中于经济利益，且资方较容易让步有很大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HB 事件正发生在上层略微放开一些权力，工人在参与工会和集体协商方面相对活跃的时期。

2011-2012 年正值“本田事件”后，广东推行企业内工会直选、改选的活跃时期，随后还制定了《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统治者真的允许工人进行自我组织。事实上，在了解过几宗由官方、资方联合操纵的集体协商、工会直选的实例后，我们看到，这些不过只是官方工会试图配合统治者维稳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大资本希望能够更有效解决工人的自发行动带来的破坏，而做出的看似让步，实则为了更进一步掌控工人行动和情绪的一系列动作。在进行工会直选时，通常也会向工人讲到：有了工会就通过工会反映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罢工，会给公司带来很多损失。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和 HB 同时期发生的自上而下改良工会的案例，来理解官方和资方是如何相互配合来压制工人自我组织的势头的。

2010 年，珠三角某日资汽配厂在地区官方工会的指导下，进行了公司内工会选举，资方不认可当时选举出的工会主席，最后还是由日方的总经理直接任命了一个公司元老做工会主席。2011 年，该公司进行了首次员工工资集体协商，3 个青年人作为员工代表，参加了由资方、公司工会进行的谈判。由于员工代表没经验及各种原因，第一年的谈判流于形式，员工工资只涨了 100 多，很多人不满意。2012 年第二次协商时，员工们认真了，希望能够通过工资

协商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新当选的年轻员工代表们也很认真地准备了谈判：搜集员工意见，搜集法律依据，与周边工厂的情况作对比，在员工中进行有关协商过程的宣传等等。同时还和公司内工会干部斗智斗勇，防止他们提前给资方泄露员工的协商方案。马上，员工代表们就面临了来自资方的压力。厂内员工的任何反抗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员工代表煽动。最后这场历经 4 个月的谈判以每月增加 400 多元工资，以及一些福利结束。相比第一次谈判，员工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而 2013 年年初，由于之前集体协商的一些福利还未落实，以及年终奖等问题，员工们自行发动了罢工，同时提出罢免不作为的工会主席、全体员工直选工会委员会等要求。公司却趁此机会狠狠打击了 2012 年参与集体协商的员工代表，指控他们煽动了罢工，将其开除。当地警方将两位员工代表关押了一个多月。虽然最后被无罪释放，但被关的员工代表却无法要到解雇赔偿。地方劳动部门、工会口径一致：公司这样解雇是合法的，无需赔偿。

由此不难看出，自上而下进行的工会选举及集体协商，刺激了工人尤其是一些青年工人的思想，但一旦工人认真起来，准备将这种形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资方和官方马上收拢拳头，全力打击，压制工人任何自我组织的势头。

不过，这种情形随着目前经济恶化，也有了转变。工人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越来越需要进一步进行自我组织。而这不仅意味着和资方的对立，也意味着和官方的对立。



工人行动与民间劳工机构

珠三角不但是目前国内工人罢工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关注劳工议题、直接为工人提供各类服务的劳工机构最集中的地区。

当时支持 HB 工人追缴社保的劳工机构，属于 1990 年代在珠三角地区成立的第一批民间劳工组织。这类组织在以前都是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工人个案为主。往往是工伤、拖欠工资、离职纠纷一类的个人问题。在 2010 年之后，工人集体抗争进入到一个新高潮，再加之关厂搬迁潮，去这类劳工机构咨询的工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涉及社保、工龄补偿等等涉及工人普遍利益的方面。劳工机构顺应这种需要，也纷纷酝酿转型，逐步从服务工人个体转向集体行动的推动上去。HB 是该机构涉及的第一个称得上是集体案例的事件。当时机构的人员对于如何指导集体案例还没有完整的思路。机构领导者在最开始提出的向工会求助，以及鼓动工人成立工会的策略都宣告无效。只有推选代表的建议适应了当时维权的需要，被工人采纳，发挥了作用。机构职员给工人提的建议，也比较实用，比如劝告工人代表不要与公司单独协商，以免被资方套话而且同时容易让同事猜疑等等。

需要帮助的工人们通过去劳工机构学习法律，和其他维权工人、各类关注劳工问题的人士交流，开阔了眼界，建立了信心，参加机构活动的同时形成了固定聚会的习惯。劳工机构的存在，让工人感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给予了维权工人经验建议和信心，后来一些工人积极分子评论说，要是没有机构，他们坚持不了这么久，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这类劳工机构立场和利益所在和工人并不完全一致。劳工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运作，需要争取项目资金，按照项目方要求做活动。咨询问题的工人对于机构来讲是维持他们各项目运作的对象。

为了维持和机构的关系，维权工人会按照机构的要求去参加一些和自身要求无关，甚至不感兴趣的活动。某积极分子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工人都没文化，还非要参加什么工人文化节”。这些活动对于某些工人来讲可能确实开阔了眼界，扩展了社交面，但对于正在进行集体行动的多数工人便显得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尤其当工人们遇到棘手难题，想去到机构找工作人员咨询讨论，可工作人员却要按部就班地把自己要做的文娱活动完成，然后才能和迫不及待的工人们讨论他们遇到的困难，还不一定有什么结论。时间长了，大部分工人们便不愿再去机构讨论问题，而是选择自己讨论自己解决。而工作人员由于考虑到集体事件的敏感性，自身的安危，也会和维权工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此外，在我们所了解的案例中，机构由于项目要求以及本身的思路或偏见，在推动工人行动中可能造成不良影响。最典型的表现是鼓动工人设立一个名义上的组织称号，但形式胜于实质，实际上的组织动员工作几乎没有。比如，让一些工人积极分子相信有了“首席代表”、“某某工人委员会主任”的称号，就能利用上相关法律的护身符，有了合法谈判的权力，免受资方和官方的压力。当然，搞起宣传来也冠冕堂皇。事实上，最能保护代表的，是工人集体本身。这些法律、称号等等，只是工人维护权益的工具。其次，由于资助方的方向要求，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会把工人引导到不切实际的方向，比如，劝工人向工会寻求帮助。

在后来越来越多的集体案例中，这类机构逐渐积累了涉入集体案例的经验，也有可能得到一些专门用于资助专职组织者的项目资金。在这些集体行动中出现的一些活跃的工人代表，便被机构吸收为专职组织者。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参与到了更多其他工人的集体维权中，从自发参与工人斗争转变为自觉参与。这类工人出身的组织者一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工人的需求和心理，更灵活地处理机构活动和工人行动之间的关系。由于经历过与资方和政府的

正面冲突，他们比之前的工作人员对各方面压力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可以更深度地涉入到工人的集体行动中。

不过，某些组织者与维权的普通工人仍有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主要表现为：在他们眼中，普通工人在参与行动的时候大都是盲目的，需要被领导，而不需要知道太多事情。

组织者对普通工人的态度，以及对集体行动的认识，决定了他们采用的手法。一些操纵性的手法或许的确有助于成功实现具体的目的，比如更快地补缴到社保，争取到补偿金等等。但在提高工人整体的斗争意识、集体意识方面的作用，却是另外一码事。

HB 工人代表的特点

由于补缴社保的难度较大，维权时间较长，HB 工人采取了多次集体行动。在这期间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分工：负责谈判的代表，分析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的积极分子小组，分散于各车间起到上传下达、统一工人行动作用的联络员，主管财务的人员等等。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有人退出，但只要工人整体还没有放弃，便总会有人补充进来。即便在最后工人占领办公楼的行动中，两位工人代表以“非法禁锢”的罪名被关押，其余的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们并没有退却，而是组织工人筹款、签署联名信，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这不仅是保护工人代表本人，也是对一年多来工人集体行动成果的捍卫。在那个关键时刻，这批工人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持用集体力量继续维权，为 HB 厂工人最终成功追缴到社保，起了重要作用。

HB 工人虽然在机构的建议下设置了首席代表，做了一些代表分工。但他们的集体行动的方向和策略并不是由首席代表一人决定，而是由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组成的小组来决定。只是，工人们对于如

何做代表，如何更有效地开会，还没有足够经验。

一年多的维权历程中，从这群看起来对行动犹犹豫豫，不被资方逼迫就很难做出下一步决定的普通工人们当中，锻炼出了一批又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原本有的是腼腆内向、下班按时回家的好爸爸，有的是在家贤妻良母、在工厂任劳任怨的传统妇女，有的是敢说敢干但是缺少思考的愣头青，有的是有社会阅历的老油条，也有活泼开朗、小主意很多的机灵鬼。社保问题像一个套索，将这群人从原本平静、不需要有思想的生活中拉了出来，让他们有机会真正开始思考，开始通过行动改变自身的处境。

为了实现自己补社保的想法，需要和其他人团结到一起。而为了保持团结，便要有人站出来做组织工作。在 HB，这个自发组织的形成过程相对漫长，所以这些能够留在积极分子团体中发挥作用的工人，是其中最具有韧性和决心的工人。他们因为参与集体行动而占用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很多无私付出却受到来自亲友的责备。由于直接面对资方和政府的压力，让他们更清楚什么是工人利益，以及如何坚持。作为代表的责任感和来自工人集体的压力，促使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快地从个人转变为集体。

对比一下其他集体案例不难发现，在持续时间较短的集体行动中，因集体行动影响到自己生活的人很少，也就更难以有思想上的触动和影响。很多抗争来得快，也去得快，工人还没有完整地经历抗争中的发展变化、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的充分展开，抗争便匆匆结束，也就很难得到深刻的冲击和更多历练。



工人群体与地方政府

工人对政府的态度

在 HB 事件中，工人对政府的认识和态度，在一般珠三角工人当中是很有普遍性的。在日常生活中，政府是一个冷冰冰管理者的形象。工人固然不会感到亲切，但也未必感到彼此之间的对立关系。一般情况下，从农村出来、在工厂里老实做工的工人很少有机会直接与政府机关打交道。除了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官员形象，他们接触的“政府”，早年，在农村是严查超生的计生人员；后来到了城市，是追着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现在是时常和小摊贩爆发冲突的蛮横城管。总之，在工人眼里，政府始终是社会的管理者，同时又是所有问题的终极裁决者。因此，工人在维权过程中，通过上访——将与公司的劳资矛盾转化为面对政府的诉求，请求政府部门出面解决，是常用的手段。

也因此，当 HB 工人维权过程中出现一个看似说话算数，或者同情工人的官员时，工人马上就会产生好感，很容易相信自己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清官、好官，自己的诉求有望顺利解决了。当然，这种幻想通常破灭得也很快。工人的自身经验很容易让他们意识到，看起来再好的“官”，也只是官僚体系中的一枚棋子。



PY 珠宝行业及工人情况简介

一、PY 珠宝加工制造业简介¹

PY 区位于 GZ 市中南部，该地区的珠宝首饰加工制造业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香港珠宝制造商利用内地的开放政策，低廉的人工和费用，将珠宝加工业向内地转移，在内地生产产品，在香港等地销售，从中赚取巨大的差价。至今 PY 已成为全中国规模最大的金银珠宝首饰加工基地。据查，截止到 2011 年，全区有 400 多家大型珠宝企业，1600 多家小型加工厂，从业人员近 10 万。（《广东地区黄金珠宝行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其中，百人以上中大型加工企业以港资、台资为主，兼有其他外资企业。几十人的小加工厂则以内地老板居多。95% 的产品以出口为主，主要经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以及返销国内市场。“世界珠宝，PY 制造”的口号由此而来。

PY 的珠宝行业伴随着中国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兴盛而兴盛。据资料以及工人介绍的情况，1990 年到 2000 年左右是珠宝行业大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大量外资涌入 PY 建厂，许多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珠宝产业链。

1991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PY 珠宝厂商会成立。商会是行业内老板们进行密切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是和政府部门沟通的桥梁。各级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经济政策之后，会有专员来给各个会员企业解读，手把手地教给他们如何操作，窍门在哪里。当然也会包括如何规避用工中产生的劳资纠纷（就是怎样钻法律空子）。另

¹ 本篇资料结合了网络信息、统计数字以及工人口述。

一方面，商会也制定了行业内的竞争规则，提高行业的准入标准，保持已有企业的竞争优势，约束彼此的行为。不用多说，在商会内，大老板永远比小老板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这段大发展时期中，逐渐形成了由少数几个大老板把持的行业商会。以至于某些新入行的老板想要和大老板共享资源、信息，减免应对政府各级部门盘剥的苦恼，就要缴纳“份钱”，把自己的厂子挂靠在几个大企业名下。这也是 PY 遍地可见某某珠宝公司第几分厂和某某珠宝公司第几加工车间牌子的原因。

PY 的珠宝商会除了行业内的协调作用，也交换有关工人的信息。比如，在珠宝商会的行业规则中有如下规定：“为了方便商会协调对员工的管理，会员如有必要可填报《员工动态表》反映员工的流动情况，商会并将员工动态通报全区各珠宝首饰厂，供各厂在招工参考。员工因违法或严重违反厂规被开除的，会员应上报商会，由商会向其他会员发出通知。”这就是珠宝行业工人“黑名单”的起源。最初，“黑名单”主要是针对在厂内有偷盗行为的工人，但随着行业内个人和集体劳资纠纷的增多，“黑名单”把矛头指向了敢于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人。

1996 年国家开始降低珠宝行业的监管门槛后，PY 珠宝业迎来第一个发展高潮。这段时间，珠宝行业的利润是丰厚的，市场似乎无限巨大。从原料加工到设计制作，加工设备制造到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各种围绕着珠宝生产的行业都逐渐发展起来。几年时间，一些只有一两百人的加工厂已经发展到上千人，产量翻了数番。原有的市桥、大罗塘、小平等地已经不能满足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的工厂需要。于是发展扩大到周边更多区域，相继建立了多个珠宝产业园。2000 年后新兴的中小加工厂的老板，多出身于外资大厂的核心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掌握技术和一部分订单，或者给大厂做二级供应商，或者自己联系客户进行生产。他们虽然没有像那些已经成势的大老板那样，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政

府、客户人脉资源，但通过偷漏税、压低工人工资，加强劳动强度等等手段，也获得了相当的利润。

尽管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给对外向加工型经济发展打了一支强心针，以港商为主的 PY 珠宝加工业更因为 2003 年签订的 CEPA 协议而迎来又一次发展的小高潮。²但市场不是无限的，行业内的盲目扩张和激烈竞争不断摊薄着利润。2004 年以后，随着加工厂、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多，新技术的应用，生产效率的提高，PY 珠宝对外加工市场趋于饱和，熟练技术工人也感到珠宝行业的工资优势远不像以前那样明显。业内人士已开始出谋划策：珠宝行业要转型，要从海外市场转向开拓内销市场。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使直接受世界市场影响的 PY 珠宝企业像服装、玩具等其他以出口为主的加工企业一样，受到巨大冲击。因为国外订单减少，利润下滑，大厂商们想出各种对策来维持利润。首先便是拿工人开刀。先向工人哭穷，降低工人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一些大厂逐步将各车间外包给个人，以便甩开工人工资、社保等相关包袱。此外还用解雇不给赔偿、放长假不给工资、不安排加班等方式来迫使工人自动离厂。还有一些厂悄悄关厂、搬厂。各种侵害工人利益的做法导致个体、集体的维权案例增多。这段期间，不仅内地工人利益受损，珠宝公司的香港雇员们也难逃一劫。因为 1 名香港雇员的工资大概相当于内地 5-6 人的工资，所以香港的贸易商们不断地将原本在香港的一些贸易业务转移到内地，用内地的人来做之前香港员工的工作，以此降低用工成本。

2010 年后，经济有了起色，珠宝行业经过一轮调整又恢复了一些生机，但是珠宝厂商们却统统忘记了恢复工人们在经济危机期间失掉的待遇，只是忙于寻找新的市场，保持和增加利润。此时，与电子、玩具等其他行业相比，珠宝工人的收入几乎完全没有了优势。

²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该协议极大地降低了港资企业在内地的经营成本。

二、PY 珠宝用工和工人情况简介

工人来源

由于珠宝加工的原材料涉及贵金属和宝石，珠宝厂最早都是以招收当地人为主，或者要有当地人担保的外地人。另一方面，工人之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用工需求急剧上升，本地人的数量就远远不足了。工厂于是放宽了招工限制，只要厂里有人担保即可进厂。再后来，只需要收取一定的押金便可进厂做工。到现在，珠宝厂的一些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工种，招工和电子厂普工没有太大差别，各地的打工仔打工妹，有无经验均可进厂。因为一些工种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早期的工人来源也呈现地域性特点，老乡带老乡，亲友教亲友比较普遍。越到后期，随着工作选择性增加，培训学校的普及，这种老乡关系就越趋于淡薄了。

工人收入

一般人的印象中珠宝行业工人的收入很高，福利待遇也很好。直到现在，一些人听到珠宝厂的工作，还是这样的印象。但事实上，珠宝行业的工人并非一直高薪，行业内生熟手、不同工种的工人工资差别也很大。

1990 年代初期，PY 珠宝加工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刚刚起步，普通珠宝工人的收入和电子厂、服装厂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极少数熟练技术工人能够获得较高收入。1996 年以后，行业扩张快，熟手稀缺，他们的工资水涨船高。刚进厂的生手只能拿到每月 200

块底薪的时候，熟手可以拿到 600-700 了。加速发展的珠宝加工业带动了配套产业的发展。大量想在正规珠宝厂找到工作的工人们主要通过在小加工坊做没有报酬的学徒磨练手艺，或者在短期培训班中学习实用技能来尽快获取资历，提升收入。同时，各类职业学校、技校纷纷开展相关技术培训，以满足珠宝厂商对相对于香港雇员廉价的大陆中高级专业人员的需要。

但随着工厂越来越多，行业利润逐渐被摊薄，大量技术工人的涌入，不断简化的加工技术，使得熟练工人收入增长的速度变慢，和其他行业的熟练工人收入不相上下。加上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老员工的收入降低，对于新入行的工人来说，珠宝厂的工作和其他厂相比一点优势都没有了。参见表一。

表一：1999-2011 年 HB 厂配石科（非技术性部门）某工人的工资收入变化情况（单位：元）

年 月	底薪	加班费	其他	工资总额
1999 年 3 月	655	617	185	1457
2002 年 9 月	1130	1113（134 小时）	0	2243
2002 年 12 月	1130	0	315	1445
2003 年 9 月	1210	1415（159 小时）	347	2972
2003 年 12 月	1210	89	325	1624
2004 年 12 月	1300	163	241	1704
2005 年 12 月	1390	0	276	1666
2007 年 1 月	1390	961（94 小时）	636	2987
2008 年 1 月	1510	733（66 小时）	386	2629
2009 年 5 月	1000	0	719	1719
2010 年 1 月	1200	386	766	2352
2011 年 3 月	1300	357	522	2179

注：2009 年以后加班费才开始区分平时、周末。

珠宝工人的工资由于工位的不同也有不少差别。其中起版和执模是收入相对较高的两个部门。

珠宝加工的工艺流程一般有以下几个步骤：起版（制版），执模，倒模，研磨（滚桶），配石，镶石。其中，起版是珠宝加工中的第一步。工人需要将设计师的平面图转化成实际的金属模型，再由倒模工人将金属模转成一定数量的蜡模，执模工人将粗加工的金属首饰进行再打磨抛光，使之美观，镶石工人则按要求将各类宝石镶嵌在首饰上。



起版最初是纯人工制作，对工人的技术、经验要求较高，也是珠宝厂工人工资相对最高的部门。现在随着制作工艺的发展，利用电脑软件和制版机，可将设计图直接做成蜡模，大大降低了对工人手工技术水平的要求。很多培训班专门培训电脑起版的软件操作。一个初高中文化水平的初学者，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就可以入厂工作，而不是像过去要入行好几年以后才能独立操作。当然，这样一来，减少了起版工人和其他部门的收入差距，本部门之间新熟手的收入差距也随之缩小。

由于金属加工中会有不可避免的损耗，一般的珠宝加工厂会设定一个损耗范围，比如 1000g 金加工成首饰，可以有 2 克的损耗。如果工人技术熟练，只消耗了 1 克，那么剩下 1 克金子便可以算作工人自己所得，称作“赚金”。相应的，如果工人消耗了 3 克，就要从工人工资里扣掉 1 克的钱，称作“亏金”。所以，熟练的执模工人在金价较好的时候，可以赚到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但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和工人平均技术水平提高，工厂不断提高加工标准，严格

控制损耗的克数，工人的“赚金”也越来越少了。

起初，珠宝厂大都实行计时工资制。2000年后，很多工厂逐渐改用计件工资，或者计时计件相结合。厂方采用计件工资可以不按劳动法的规定支付加班费。计件工资还造成工人之间收入差距变大，内部矛盾增多，使得不熟练的工人自离。

工人抗争概况

珠三角工人的抗争有着由个体冲突转向集体行动、自发性强、组织性较差的普遍特点，同时又有行业的自身特点。PY地区珠宝工人的抗争也不例外。

1990年代一直到2006年左右，是珠宝行业整体大发展的时期，压榨员工的手段也较为原始，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低生手工资等等来获取额外利润。这一时期由于野蛮的管理方式，责骂、罚款、克扣工资加班费、栽赃工人盗窃、遗失珠宝等等，工人和管理发生的个体冲突最为常见。此外，一些技术岗位的大师傅因为各种原因离厂时，可能会带走跟随自己的一批员工，此时会和原来的老板之间产生较大的利益冲突。

前期，由于行业利润率高，工人整体收入和福利待遇相对其他行业优势较多。加之工人最初多由熟人介绍入厂，主要在本地区行业内流动，就业范围较窄，再加上行业黑名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工人可能的反抗。同时由于生熟手、岗位、计时计件产生的各种工资差异也使工人内部的矛盾较多，给工人的集体抗争设置了很多障碍。

越到后期，随着珠宝行业平均利润率降低，工人入行门槛降低，工资失去行业优势，工人在各行业间的流动性相对增加。之前珠宝行业普遍存在的诸多违法行为，比如不合法的工资、加班费、押金

制度、罚款，遭到越来越多的工人消极或积极的反抗。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兴于百业后，衰于百业前”的珠宝行业已经感受到寒意。一些中小规模的工厂开始减产，裁员，工人工资被拖欠，直接导致集体劳资纠纷数量的增长。前文提到，2008 年危机爆发后，曾经靠工人们发了横财的珠宝老板们，此时要求工人和他们“共度时艰”。厂方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成本，维持利润：降低工人收入，减免福利待遇，放假、裁员，有些老板干脆一跑了之。不过，工人并没有全部买账。由于关厂、裁员造成的工人堵路、厂内静坐、上访的集体维权事件屡见不鲜。工人和厂方的个体冲突也变得更为激烈，直到现在很多工人都会说起 2009 年 3 月的血案。当时某珠宝厂工人因被厂方恶意解雇而拿不到应有的赔偿，在和厂方交涉时受到管理的辱骂殴打之后，捅杀了人事总监和经理，自己随后跳楼身亡。出事第二天，附近邻厂的老板便赶忙给本厂员工发放了拖欠的工资。

PY 地区珠宝行业工人社会保险概况

1999 年国务院制订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出台，虽然 PY 珠宝加工厂等外商投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均在此征收范围内，但和其他很多工厂一样，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并没有真正执行。2001 年 12 月，劳动部下发《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农民合同制员工缴纳、终止养老保险的方式。这以后，PY 地区的一些大珠宝厂陆续开始为厂内小部分员工缴纳社保，一般以中高层管理及管理层的亲信为主。

随着 2010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国家加强社保的推广力度，地方上也将社保和其他政策挂钩施行。除了养老金、看病报销的基本功能以外，在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入公立学校

的条件中，增加了父母一方需要缴纳社保的要求，外地人买车买房，甚至办理信用卡都要求有缴纳社保的记录。社保转移手续简化也让外地务工者有了更大的动力缴纳社保。政策环境的变化，也促使之前不关心社保的工人逐渐感受到社保的重要性。

珠宝厂商极少主动为工人缴纳社保，甚至直到 2012 年，一些看似正规的大厂在员工入厂时还要求他们签订一份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声明。这时期，由于行业不景气，工作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一些工龄较长的工人比以前更为关注养老问题，再加上公立中小学对于学生家长社保的要求，工人对社保的需求明显比以前增加了。

与其他行业一样，PY 珠宝工人掀起了一轮以争取社保为主要诉求的集体行动，HB 厂工人的行动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HB 厂概况

工厂背景

HB 厂前身 HY 厂，于 1991 年在 PY 区的市桥镇建立，产品以金饰为主，主要给欧美的珠宝商代工。和其他三来一补企业一样，为了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几经更名。2004 年由“HY”改为“HB”。伴随 PY 珠宝业的兴旺，十年时间 HB 厂由最初的七八十人发展到最兴盛时的两千余人。2000 年 10 月，搬至 LH 镇。老板用十多年来通过工人辛苦劳作赚到的钱，在 LH 买地皮、建厂房，同时做慈善，捐钱办学校，树立自己的形象。成为 LH 镇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大公司之一。

据相关官网信息显示，HB 厂的法人是 PY 珠宝商会的理事，也是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其他几个大珠宝厂的老板不是亲戚兄弟，就是朋友熟人。他们或是香港人，或是移民香港又回来投资的大陆人。几个大老板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共同维护着 PY 区大珠宝加工商的整体利益。

HB 厂的老板究竟有多大势力，工人们其实并不清楚，很多也是传闻。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个拥有两千人的加工厂，在珠宝行业已属凤毛麟角。在工人们维权之初，几乎没有人认为凭工人自己的力量能够与这个大公司抗衡。

工厂物料管理

90 年代初的珠宝厂管理相对比较松懈。工人们刚出来打工，对于所生产的物品知之甚少。管理骗大家说金子是铜块，员工就信了。工人们有的甚至拿着金子当石头扔来扔去地玩。后来厂外面出现了专门收金子的人，工人才逐渐知道这是值钱的金子。开始有人想办法偷金出去卖。老板当然不能忍受这种损失，珠宝厂的管理也日渐严格起来。

根据自身规模以及加工产品的对象和环节的不同，珠宝厂的物料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大型珠宝厂，出货量很大，除了平时生产严格计数，控制损耗以外，对工人从头防范到脚。过安检门时，全身不可以戴任何金属制品，包括腰带、女性内衣不可以有金属物，手机严禁带到车间里。如果警报器响了，还要脱衣检查。甚至进出一些重要的部门时，还要张开嘴巴检查一遍。

HB 厂主要是靠生产中的计数来控制。比起其他一些珠宝厂来说比较宽松。这也是一些老工人在收入变差之后仍选择在那里工作的原因之一。工人可以带手机、钥匙进出车间。在车间工作时一般也比较宽松。生产淡季，大家没货做的时候，说说话聊聊天都可以，甚至有人上厕所的时候带份报纸看半天，师傅也不会说什么。

珠宝厂的罚款

珠宝厂的罚款现象比较普遍。HB 也不例外。厂牌丢失会罚 100 元。漏刷考勤卡，第一次口头警告，第二次扣半天工资。假如货品丢失，罚款就更严厉了，根据货物价值，几百到几千不等，按月从工资里扣除。访谈到的工人几乎都有因为丢失货物而被罚的经历。

曾经有人被扣了一年多，直到自己辞职都没还清罚款。此外，吸烟、迟到、不听从管理安排等等，都会被罚款。

HB 厂的管理层

生产部门的管理层级是：工人→组长→师傅→部门主管→厂长
经理

组长一般由师傅从员工里提拔挑选。主要负责物料和生产安排，有时也会从事一线生产。

师傅大都是香港人，虽然号称师傅，但跟工人并非师徒关系，更多的是上下级关系。他们并不真的教授工人技术。有些师傅自己掌握一些关键工序的技术，工人做次要些的工序，要想有所收获只能靠偷学。

部门主管也大都是香港人。

管理者的风格，有的很严，有的比较松。但凡工人觉得为人还可以，能够帮工人说几句话，争取些福利的，最后都被老板以各种理由辞掉了。老板教育这些管理：“对工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在社保维权中，工人们给他们要应对的几位管理，起了五花八门的外号。

“奶妈”：工人们刚开始维权时的人事主管是老板的熟人，来厂里之前据说是在酒楼里做经理。HB 搬到 LH 镇后，便安排到公司做人事。她是个说话狠毒又没水平的大嗓门婆娘，对工人很不客气，什么事情都是脸难看事难办，以此来压制个别工人的要求。因为和老板的暧昧关系，大家背后都叫她“奶妈”。社保维权开始后，面对团结起来、了解了自身权益的工人，奶妈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就失去了以前的效果。讲法律甚至讲不过工人，只会含糊其辞：公司会安排的，会考虑的，回去等消息啦，诸如此类。

“公公”：眼看威风不在的奶妈招架不住一波波工人，老板找关系新安排了一个人做人事主管。这个主管据说挺有来头，之前在政府部门做事，精通法律，谈判技巧娴熟，很会处理各类矛盾。他说话不温不火，头头是道，对待工人的要求，往往打着官腔说：“这个我们会按照法律程序办理。法律怎么规定，我们就怎么处理。”可是事情还是照样不做，能拖就拖。工人开始还真不知怎么应对这类人，直到最后被拖得忍无可忍了，才跳出他话里的圈套。对于这么一个看似软绵绵其实难对付的中年男，工人们送他“公公”（太监）的外号。

“大水牛”：工厂后勤总管兼工会主席，老板的妹夫。因为身材高大，脸短嘴长，为人凶狠，故有此雅号。开始工人并不知道他还是工会主席。社保维权之后，因为几次找上级工会投诉，公司的这个挂名工会才被人所知。他常代表厂方和工人谈话并发生冲突。

工人收入待遇情况

从工人们的整体印象看，HB 厂在搬到 LH 之前的福利待遇还算可以——每年有旅游、聚餐，过节发慰问品，有饭补，熟手的工资在同行业也算不低。搬厂之后，老板通过惠东老家的相关部门，招了一大批工人。员工人数由原来不到 1000 人迅速扩展到 2000 多人。中高层管理也换了一批人。新上任的奶妈（人事经理）和大水牛（后勤部长）联合发力，两年之内，很多福利逐渐被取消。公司没有旅游了，过节也不再发东西，女员工妇女节的福利，由多发一天工资减为半天，后来干脆取消。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HB 厂和其他工厂一样，把工人的底薪降到最低工资水平，减掉的部分变成岗位津贴或者奖金。这样操作既不明显违法，还让根据底薪基数计算的加班费少了一大截。同时取消全勤奖，宿舍也不再免费。

社保维权以前，HB 厂实行计时工资制，但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同一部门内部的工人之间，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前文介绍过，由于起版部的重要性，在一般的珠宝公司都是工人收入较高的部门，HB 厂也不例外。起版部员工的平均工资大概能高出其他部门一倍。比如起版部员工的底薪在 2008 年以前都在 3000 元以上，而其他部门 1500 元算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部门只有 800 多元。工厂要求工人之间工资保密，而起版部内部员工因为技术水平和分工差异，工资也能相差将近一倍。这样工人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和猜忌，相比那些工资标准一致的工厂，工资问题往往容易分散为个人诉求——要么靠关系，要么靠能力。

2008 年以后，随着工资底薪的调整，各种福利的削减，部门之间的差距、部门内部员工的差距都变小了。起版部员工的工资受的影响最大，也是追缴社保中参与程度最高、最积极的。生熟手的底薪也调整到同一个标准。新进厂的员工和做了十年的老员工拿一样的工资，这尤其让一些老员工感到不平衡。

2009 年公司还采取了把部分订单外包，给自己员工放长假而不给工资的做法来降低经营成本。经过这些变动，很多员工都选择离厂，工厂人数锐减到 1000 人左右。

但是绝大多数老员工（5 年以上）还是选择忍受公司的这些苛刻条件。原因主要是，当时整个行业都是这种状况，去别的厂也是差不多的待遇。对于一些中年技术工人来说，珠宝行从业时间长了，其他技术不会，转行并非易事：要么从头学起，要么就是做没技术含量的普工；而且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圈子，新换一个环境对于家庭生活来说将是巨大的变动。不到迫不得已，不会愿意做大的变动。

工人由于收入、待遇下降的不满，被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暂时压制住了。不过，矛盾并不会就此停止，终归在继续积累，最后还是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

HB 员工社保情况

这种背景下，HB 厂越来越多的老员工开始关注社保问题，并由此进行了长达一年半争取社保的维权行动。

整个维权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要求厂方给从未买过社保的老员工缴纳社保。第二阶段是要求厂方补缴员工入职以来的社保。

第一阶段的维权过程相对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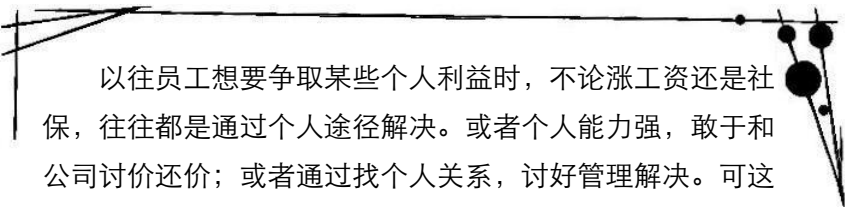
工人维权始末

管理被炒工人传递法律信息

凡是大点的事件，一般都有一个导火索。最先激起 HB 工人集体要求厂方缴纳社保的想法的，是发生在厂内的一起劳资纠纷。

2009 年 HB 厂炒掉了一个在老板眼里“无所事事”的管理。这个人咨询了律师，和公司谈判后，要回了经济补偿金，几年没买的社保也折算成现金，赔到了一些钱。管理的一个亲戚和起版部的同事吹嘘此事，大家听说后纷纷议论：“他赔都可以赔几年的社保，我们却连买都不能买。”

工人们在平日里看新闻、跟亲友交流的时候，了解到法律规定公司必须要给员工缴纳社保。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酝酿，2010 年 7 月，起版部工人写了一份要求厂方缴纳社保的集体签名信，交到人事部。虽然当时人事主管“奶妈”的态度比较恶劣，和工人们发生争吵。但因为当时不缴纳社保已属明显违法，公司权衡利弊后于 8 月份贴出通知，会为所有自愿提出申请的员工缴纳社保。不过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如果不缴纳社保，工资可以涨 100 元，要求买的只能涨 20-30 元。厂方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尽量减少在工人社保费用上的开销。而且每年的 8 月份是 HB 厂涨薪的时候，这样一来，一方面厂方将自己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转嫁一部分到工人身上，一方面又让那些还没下定决心缴纳社保的工人，因为眼前既得的好处而放弃缴纳社保的要求。



以往员工想要争取某些个人利益时，不论涨工资还是社保，往往都是通过个人途径解决。或者个人能力强，敢于和公司讨价还价；或者通过找个人关系，讨好管理解决。可这些做法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的问题能解决。涉及大部分工人的问题只能通过集体的方式才有希望解决。



集体签名是一种比较温和的集体行动方式。工人用书面的形式把共同的要求传达给厂方，署名表示支持，并不影响生产。对于缴纳社保——这种厂方应该履行的基本法律义务而言，一个关键部门的员工集体签名已经有足够的压力让厂方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厂方顺势答应员工的要求，也可以避免矛盾激化——既然缴纳社保逃不掉了，也完全有能力购买，何必让工人更加不满呢？

这一回合，工人轻松小胜。但员工再进一步要求公司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时，就没那么容易了。

七人仲裁引发工人进一步行动

2010 年底，厂里陆续解雇了一批员工。起版部是技术部门，平时很少有人变动，员工的工龄都在 5 年以上，这回却一口气炒掉 7 个合同到期的员工，而且支付给各人的离职补偿金并不合法，只按照最后一次合同签订日期支付。这样使得一个工作了 5 年签过两次合同的工人，可能只拿到 2 年的补偿金。被炒掉的工人认为厂方极有可能是因为社保的事情在报复。他们想要回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每个人的账都应该怎么算呢？工人们长年累月地在公

司工作，和外界交流有限，虽然对于一些热点的劳动法律知识，比如经济补偿金、社保有所耳闻，也常会在亲友间流传某人打官司赢了，公司赔给多少钱一类的消息，但真的遇到事情了，具体的法律规定是什么，怎么理解那些术语成堆的法律条文，怎么走法律程序，大都并不清楚。

前文介绍过，珠宝厂之间的老乡、熟人网络比较发达，除就业信息以外，维权信息也会通过这个途径传播。起版部被炒的工友通过熟人介绍，来到劳工机构进行法律咨询，了解清楚自己在辞职时能够享有的法定权利之后，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厂方按照法律标准支付离职补偿金，并向社保部门投诉，要求厂方补缴员工入职以来的社保费用。

通过 7 人的官司，其他工人了解到：只要社保未缴满两年，之前未买的还可以向公司追缴。起版部有一半多的工人工龄在 10 年以上，如果能够补到之前的社保，他们很多人就可以达到或者接近 15 年的社保，即可在退休后享受养老金。这正是工龄比较长的工人们最希望实现的结果。

有了上次集体向厂方要求缴纳社保的成功经验，工人们想要进一步争取补缴社保的想法更强烈了。但要怎么补缴呢？工人们能够想到，补缴社保将更为复杂、难度更大。工人们需要了解更多的法律依据和现实情况，来增加自己的信心和底气。这样也才能知道自己的社保费用怎么计算，有更明确的争取目标。于是，2011 年 5 月份，几个积极工人通过同事介绍来到了劳工机构，想要弄明白法律究竟是怎么规定的，补缴社保的可能性有多大，如何去做。

经过一番咨询，工人们了解到只要准备好工资的银行流水、劳动合同，能够证明他们在公司做了多少年，就有可能追回这些年的社保。此外还有年休假和高温津贴等等都可以争取。经劳工机构建议，工人们回去后将这些消息告诉其他同事，争取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除了法律学习，工人要树立维权信心还有一个重要方式——与其他维权工人交流。劳工机构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通过组织各厂工人在一起交流，由维权工人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其他工人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案例，能够有效增强工人的信心。活动时安排了律师一同参与，这也让工人感到自己通过劳工机构可以得到法律支持，而不是孤身奋战。

公司答复无果转向工会

通过各类学习和劳工机构人员的讲解，工人们认识到仲裁庭和法院都不受理社保方面的申诉，不能通过打官司解决。

最后工人们决定接受机构人员的建议，在厂内通过熟人朋友各类关系，宣传社保规定，尽量让更多的工人参与进来，通过集体行动去争取社保。2011年5月，来自三个部门的38名工人——他们也是后来维权工人队伍中的核心力量，很多代表、积极分子都出自于这38人——第一次向厂方提出《工人的书面要求》（见附录一）。《要求》中提出补缴社保，补发高温津贴，休年休假，以及拿回一直被厂方扣压的劳动合同，等等，明确限定了公司应回复的日期，还有公司不得打击报复员工的声明。

面对工人这样一份涉及金额较大的“正式”书面要求，人事部主任不敢马上答复，而是以老板不在公司为由，要工人们等老板回来。

6月8号，老板回来了，要求的答复期限也到了。三十多名工人们一起来到人事部询问。人事部主任面对着众多工人，几句话便推卸了公司的责任，又不在关键问题上给工人任何实质性的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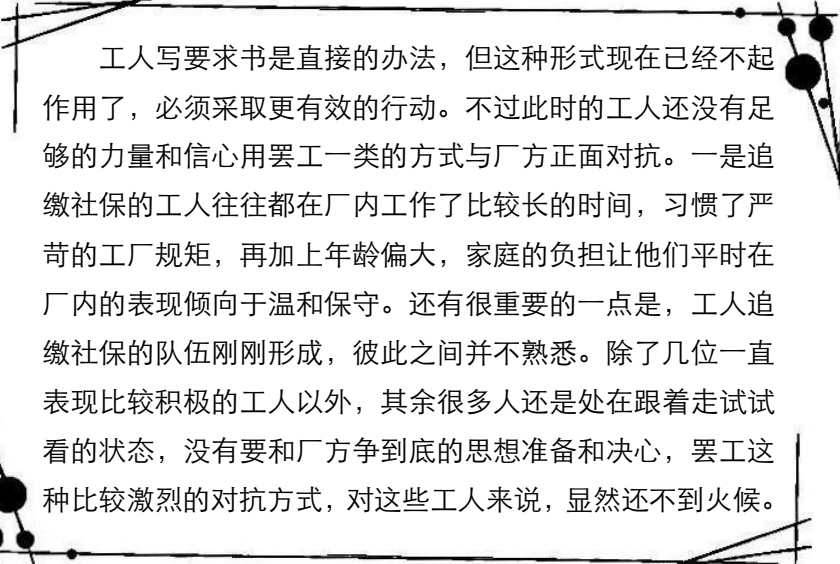
“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这件事情上，政府、公司和员工都有责任。因为之前公司一直都是按照政府给出的配额购买，如果员工对

公司的行为有意见，按法律途径处理就行了。法院怎么判公司就怎么做。至于合同，公司是代为保管，如果员工想拿回就返还。高温补贴，年休假是公司的一种福利，可以给可以不给。”

等了好几天消息的工人得到这样的结果，感到十分气闷。但如果就此罢休，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了。工人们没有放弃，一些积极的工人做起了部门间的联络员，一方面参加机构的活动，学习法律知识，一方面在自己部门内宣传，给其他工人讲社保的好处，争取更多的人参与。后来这些联络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部门的代表。逐渐地，其他部门的工人陆续加入到追讨社保的队伍中来。6月10日，另外51名工人再次向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6月14日，又有28名工人加入进来。截止到6月中旬，形成了第一批追缴社保的工人队伍。

但无论几拨工人轮番去问，公司总是那几句话。看来，不给公司多施加些压力，社保的事情不可能有进展。

怎样再给公司施加压力呢？办法无非两种，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



工人写要求书是直接的办法，但这种形式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必须采取更有效的行动。不过此时的工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用罢工一类的方式与厂方正面对抗。一是追缴社保的工人往往都在厂内工作了比较长的时间，习惯了严苛的工厂规矩，再加上年龄偏大，家庭的负担让他们平时在厂内的表现倾向于温和保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人追缴社保的队伍刚刚形成，彼此之间并不熟悉。除了几位一直表现比较积极的工人以外，其余很多人还是处在跟着走试试看的状态，没有要和厂方争到底的思想准备和决心，罢工这种比较激烈的对抗方式，对这些工人来说，显然还不到火候。

劳工机构建议工人去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工人们也倾向于求助政府给公司加压这样一个间接的办法。而在之前的交涉中，厂方也已经把一部分责任推给了政府。但补缴社保不同于一般的劳资纠纷，先找哪个部门投诉呢？当时劳工机构的负责人由于自身工作导向的原因，极力向工人介绍工会，并解释说找工会解决问题是维权必须走的程序。

工人们并不清楚找工会有什么用处。即便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也往往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在工人的印象中，工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且不像劳动局、法院是能够办事、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但既然劳工机构的负责人都这样说了，他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工会求助。6月24号，工人们向省市区三级工会同时递交了《请求书》（见附录二）。并收到回复说将在几天后到公司调查。

7月4号，在等待了10天之后，区工会终于派人下来了解情况。但座谈会的结果让工人有些失望。工会说话的态度是偏向厂方的，只给工人一个官样回复：“我们会尽快了解调查，你们等消息吧。”次日，心急的工人致电区工会询问进展，得到的答复一如既往：“我们会跟进。”7号，工人直接打电话到省工会，要求工会应该在给予的时间期限内给出正面的答复。省工会的答复是：“我们工会很关注，很重视你们的请求，但凡事也有一个过程……”接着又把工人推给



区工会和当地的镇工会。当日下午，区工会打电话来，语气有点重，说工人不要在事情没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就向省工会汇报，感觉像在投诉他们。但半个月过去了，得到的答复仍然还是调查，调查。工人们很怀疑找工会到底有什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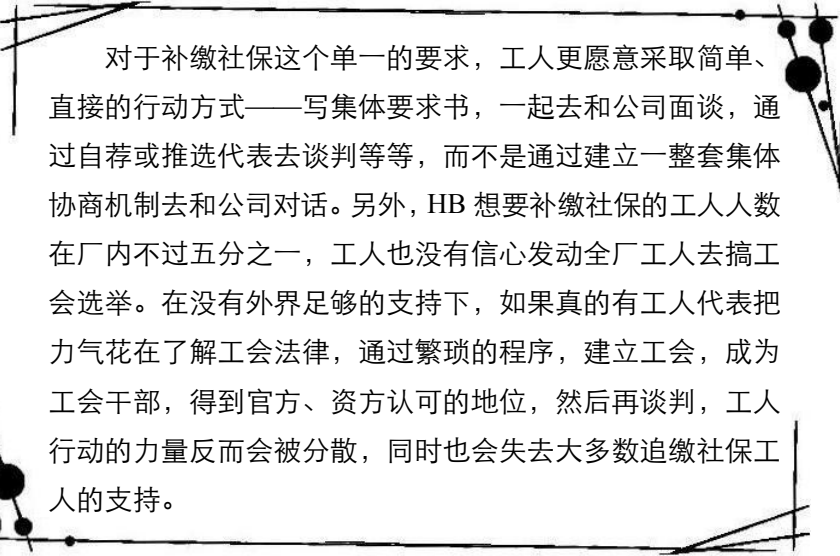
2011年7月13日，在镇工会办公处举行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座谈会，比起上一次的座谈会，工人感到这次工会的人友善了很多。不过，除了厂方早先已经口头答应返还的劳动合同，其他工人的要求，工会并没有直接支持。工人最关注的社保，工会也只是建议走法律程序。工人们向工会求助的结果，和公司起初的口头答复简直没什么两样，只是又被拖延了20多天。有了这个教训，当后来HB工人给其他厂的工人介绍自己追社保经历时，提起工会，工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不要找工会，没用！**

事情进展到这里，工人得到的结果是很多维权案例中都可以看到的。工人们有了一些行动，但还没有触及老板痛处，工厂往往只是将之前明显违法的地方改一改，其他法律规定模糊或者厂方不愿直接回复的要求，就以各种借口推脱，或是让工人走法律程序。

说起工会，还有一个插曲。HB的工人代表在参加某次劳资话题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些教授学者建议工人先成立工会再维权。当时工人代表听到建议之后，觉得可以一试，因为专家们说成立了工会，工人代表们便可以工会的名义去做事情，这样比现在更有合法的身份。可是回来和其他人一说，大家反应很冷淡。大部分工人不清楚成立工会、改组工会和自己追到社保究竟有什么实际关系、好处。和工会打交道的经验更让工人觉得工会这东西什么用处都没有。最关键的，第一批追社保的大部分工人肯站出来，替大家出头，与厂方对抗的，多少都抱有“大不了不在这个厂做下去”的想法，没有兴趣花费力气建立工会这种维护日常利益的组织。

当听到相关部门对工人改组工会要求的答复时，工人仅有的一点热情也被打消了：“现在你们厂有工会，你改组工会干什么？你知

不知道要交工会会费的？现在都是老板替你们交会费，老板的人做工会主席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对于补缴社保这个单一的要求，工人更愿意采取简单、直接的行动方式——写集体要求书，一起去和公司面谈，通过自荐或推选代表去谈判等等，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整套集体协商机制去和公司对话。另外，HB 想要补缴社保的工人人数在厂内不过五分之一，工人也没有信心发动全厂工人去搞工会选举。在没有外界足够的支持下，如果真的有工人代表把力气花在了了解工会法律，通过繁琐的程序，建立工会，成为工会干部，得到官方、资方认可的地位，然后再谈判，工人行动的力量反而会被分散，同时也会失去大多数追缴社保工人的支持。

多次交锋积累经验，工人缓步向前

面对工会含糊的态度，工人只能再去尝试其他办法。7月19日，多位不同部门的工人一同到人事部再一次询问合同、年休假的问题。经过前几个回合，这次和厂方的交锋，工人比起以前更有经验，底气也更足，并用手机拍视频留证，以防厂方再耍赖。但在精通各种手段的人事主任面前，辩论中总体上仍然处于下风。对工人和厂方的对话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厂方对付工人时惯用的伎俩：一是颠倒黑白，二是尽量推卸责任，三是想方设法拖延，四是以厂方管理者的地位进行威压。简单说是一骗，二推，三拖，四压。

工人要工厂给回扣押的合同，人事主任马上狡辩“那些是你们

放在我们这里，不是我们扣留的”，虽然答应给工人退还合同，但要工人等通知，且不回复具体时间。

工人提到年假问题，人事主任振振有词，先是说以前过年的时候已经白给工人多放了好几天假，工人还跑来要求什么呢？却闭口不提这些因工厂停工待料而给的“假期”从没给过工资的问题。然后又说，年假要怎么放由公司规定，不是工人想什么时候休就什么时候休，最后强调，要以生产为主。总之，一切要听公司的，工人没有发言权。

工人则认为在自己需要休假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年假，并举例说香港师傅就是这样做的。人事主任一句香港人是由香港的法律来管，便把工人堵了回去。工人一时找不到话还击，问道，请假超过一个月还有没有社保。人事主任马上跟工人们说诉苦，说好多员工不守信用，之前某个工人，这边和公司请假买着社保，那边给别人打工，到最后人说走就走了，公司亏了的钱到现在都还没找回来云云。工人问到之前的社保给不给补缴，人事主任没好气地说：一切依照法律办。

而年休假问题，也是在工人们和工厂周旋了一番之后才终于得到正式的通知。工人记录道：

镶石部员工梁勇梅辞工。她也是我们追讨社保的员工，她向人事部要求拿回她未休的带薪年假，遭到人事部主任的拒绝，并且告诉她：“你都辞工了还有什么年休假？公司已经在过年的时候给了你们年休假！”梁勇梅 1997 年入职 HB 公司，已有十多年的工龄，她的年休假绝对未休完，应该给予经济补偿，但却遭到拒绝。她的权益也关系到我们其他 131 位员工的权益。当日下午两点，我们鼓起勇气，七十多位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直接找老板协商，询问如何解决我们的年休假问题。经过四十分钟的商讨，终于达成

协议，老板答应尽快处理我们年休假的问题。不到一个星期，公司就贴了通知，说明如何安排工龄在十年以上的员工的年休假。我们的成功有赖工友们的勇气和智慧，而更重要的则是团结，因为团结才能产生力量！

某珠三角维权工人代表在总结自己组织工人集体行动的经验时，曾说过：做工人工作，一定要能够给工人争取到看得见的利益，这样工人才有信心走下去。社保补缴涉及到的钱数较大，牵扯很多部门，工人队伍自身要聚集起力量去对抗厂方、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些都决定了 HB 工人补缴社保之路不会很快走完。拿回合同、争取到年休假，这些利益虽小，但都让工人们看到通过大家的行动，可以争取到实实在在的东西，从而建立信心。工人们之间的了解、信任、联系也在这些集体行动的过程中逐渐加强。

7月26日，工人向市、区两级社保局递交《劳动监察投诉书》，期望通过向劳动部门投诉，给厂方施压，促使社保的事情尽快有着落。

8月15日，工人们在等待了半个多月以后，五位代表来到了区劳动监察大队上访。可是，遇到的工作人员态度并不友善，只是开了一份回执，冷冰冰地叫工人们回去等消息。工人遇到这种办事人员，也有些火：“我们已经等了三个多月了，到底还要等多久？起码也要给一个期限。”后来有个级别比较高的工作人员过来解释说，这个事情已经交给了社保部门跟进，让工人



们拿回执去社保局跟进情况。工人便去社保局询问。社保局承认已经收到《投诉书》。接待员向工人询问了相关情况，说如果工人讲的情况属实，并能提供相应的材料，应该可以取得之前的社保。有了这些话，工人心里觉得踏实多了。因为之前只是劳工机构说可以补缴，现在政府部门也给了比较明确的回复。工人们从社保局出来时，遇到一位好心的领导，他听到工人们的诉说后，教了工人一些方法：交了资料，有时间就要打电话询问情况，不然办事人员会一拖再拖；还说，打工者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政府会依法办事，但打工者必须对自己的权益有一定的认识，不然谁都帮不了；并劝工人们有时间就要多学习一些法律法规，会有帮助。

社保局的回复，领导的几句指点，让工人感到有了希望——毕竟政府的领导都表态支持了啊！几位代表回去以后赶忙向其他工人讲述进展，并按照规定收集、上交了各人的材料。

2011年9月7日，区社保局的书面回复上清楚地写着HB公司的回应。公司方表示，首先要确定员工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然后尽量在10月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为投诉员工进行补缴。区社保办稽核科将继续跟进该公司的补缴情况。工人代表把书面回复的内容通报给了其他工友，开始等待公司履行承诺。

从向厂方提出补缴社保的要求到现在已经4个月过去了，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答复，这不仅给正在争取社保的工人们增添了信心，也促使其他处在观望中的工人们开始躁动起来。这些工人也想补缴社保，但因为各种原因，之前没有站出来争取。或者是还不了解社保对自己到底有多少用处，或者是在公司工作年限不算很长，争取补缴的动力不足，或者是认为公司肯定不会给，闹了也是白闹，还有很多人是等着看前面的人能够得到什么结果的心理。此时，看到第一批工人拿到了社保局、公司这么一份书面回复，他们动心了，于是形成了第二批争取社保的工人。

追缴人数增多，劳资矛盾升级

事实上，只要社保还没补缴，这事就还没算完。工人们需要持续发力，否则即便是书面的回复，即便是有厂方、政府的公章，终究也只是白纸一张。

果然，等到9月底，仍然没什么消息。两位工人代表去到社保局询问补缴情况，却没有明确答复，只说一定会按照法定程序帮工人补缴，要工人回去耐心等待。又过了半个月，第一批追缴社保的一百多名工人一起到公司人事部追问社保问题的进展情况，要求给一个正面答复。人事部主任说他做不了主，最后通知工人说，要等下周二（10月18日）香港的董事会开会后才有答复。于是工人们又要多等几天，多受几天的煎熬。

10月18日一上班，第一批追缴社保的一百多名工人仍然没有等来公司的正面答复。大家很不满，集体出了车间去到办公楼，要找老板问个清楚。另外还有两百多名此前一直在观望进展的工人也受到感染，跟着他们去。这样全厂有三百多人停止了工作，去办公楼要说法。人事主任反问工人要递交劳动关系的证据。工人们也不含糊，回答道：证据已经交到社保局了，公司自己也应该有一份，工人没义务提供给公司；公司要想核对信息，自己去社保局要。

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争取社保的工人，公司赶忙使出各种招数来应对。

10月19日上午，公司跟各车间代表们说，工人昨天的行为扰乱了生产秩序，下次不能这么多人一起去，而且要经过车间主管批准才能出去，否则车间里丢了东西要工人负责。下午，工人代表听说有两位执模部的积极工人被解雇，当时工人们很担心，没想到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几个工人代表下去人事部理论。人事经理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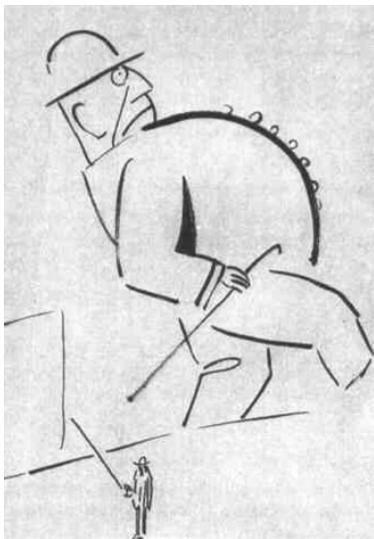
们是因为合同期满，公司与他们终止合同。要补偿的话，公司会补偿给他们。但事实上，其中一位要到明年二月份合同才到期。人事经理又改口说，公司有权提前跟工人终止合同，有什么争议工人可以去走法律途径。

后来，执模部几十位工友也下来讨说法：因为今天是这两个人被炒，明天可能是其他人，大家都很担心。公司见工人越聚越多，叫了部门师傅来镇压，让工人回车间工作，说没有经过师傅同意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人事经理也赶工人代表走，结果双方言语冲突起来。工人对人事经理说：“你是工会主席，为什么不帮工人只帮公司？那做工会主席干嘛？”大家喊着要撤销他的工会主席的身份。人事经理听到这些就拍桌大喊，说：“你们的事去找工会，不要在这里吵，叫他们帮你们解决。”工人回敬道：“大声解决不了问题。”人事经理竟然又把责任推给工人，说：“公司都没有说要炒她们，现在你们下来大闹一场，现在不炒也没办法。”工人就说：“你说炒就炒？那可以炒掉我们全部人。”经理就出声了。后来，又有管理出面调解，说炒掉他们是公司的事，他们合同期满，该赔偿的公司会计算。然后要求工人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第二天，工人打电话给镇工会求助，希望能帮助他们。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起作用，只知道打完电话一段时间，工厂的管理层内部开会。两位工人代表在会后找部门师傅问话：“我们是不是被炒了？”他说：“不是，只是对你们例行检查，公司不是解雇你们。”十一点半，135 位工友得到通知，到饭堂开会。这是第一次全体工人与厂方正式坐下来谈社保补缴的问题。公司的人事主任、经理说：公司现在有一个方案，工人的社保先补两年的，由 2008 年至 2010 年 8 月分时段购买，即是今年在职一年买一年，连续买三年，其他的以后慢慢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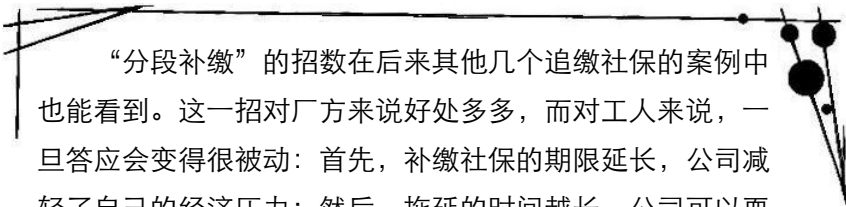
135 位工友当即反对这个方案。大家担心，公司补缴两年之后会找理由不再补缴其他年份的。工人坚决要求从入职之日起购买，

如果补缴的起始时间跟工人入职时间不符合，工人不会接受。公司一方面推脱说资金紧张，不能拿出那么多钱，一方面又说社保局说 2008 年之前的不能补缴。可无论公司怎样说，工人代表和工人都很坚定。公司方又转移话题说，工人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公司会归纳，再作出答复。工人回敬道，书面的要求早就提交上去了，不用再交了。



这次会开下来，工人感到公司显然没有诚意解决补缴社保的问题。会议过程中又问到那两个代表被炒的问题，厂方非但不承认，还语气蛮横，气氛变得紧张。后来工会主席大水牛扬起拳头差点没和工人代表打起来，最后双方被拉开，不欢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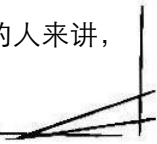
到了下午，倒模的一位工友被放假了。师傅口头上说放 3 天，但等到放假通知书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了 18 天。上面写道：“因你所在岗位暂时没有货做，放假 18 天，待公司安排相应工作岗位通知返回公司上班。放假期间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支付停工待料工资。”那位工友所在的部门每晚加班至 11 点，现在说因为没货做实属无理。134 位工友随即写了一份声明书到人事部，说：“我们的工友没有违反厂规，公司方不得无理对我们放假、调动职位、解雇等。不然我们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公司人事主任却说：“你们写了声明书也无用，公司有权放假、解雇等，如果有争议可去劳动仲裁。”工人听了气愤又无奈，很担心下一个被放假的是不是自己。几位工人代表赶忙去劳工机构寻求法律援助，希望能够帮他们出主意解决问题。



“分段补缴”的招数在后来其他几个追缴社保的案例中也能看到。这一招对厂方来说好处多多，而对工人来说，一旦答应会变得很被动：首先，补缴社保的期限延长，公司减轻了自己的经济压力；然后，拖延的时间越长，公司可以耍的花样便越多，工人代表们越有机会被一个个对付，处理掉。这样，工人的队伍被越拖越散。究竟有多少人能坚持到最后让公司把社保补缴完，会成为一个未知数。HB 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一直坚持原则，是后来实现全部补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几位主要的工人代表一直在坚持。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更快更好地补到社保。除了在厂内宣传，他们还想办法给不断跟进的工人“打气”——找有经验的人、懂法律的人来给其他工人们讲解社保知识。对此，工人代表们解释说，自己掌握的知识有限，表达能力又不好，给工人宣传，有时大家并不信。请外面的人来讲，效果就会好很多，其他工人更愿意听。



公司工人拉锯战，代表应运而生

追讨社保的队伍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展到一百多人，还有一些犹豫不决的人在观望，随时有可能加入进来。积极争取社保的几个核心工人有热情，但缺乏经验。工人们也不想和公司直接对抗。公司方则一直在拖延。很多方面都显示工人们不大可能在短期内追到社保。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自从工人追缴社保一开始，便出现一些积极工人。这些工人或

者是因为自身对社保比较关注，或者是比较热心，会主动找人、找途径了解社保的政策，在与厂方集体交涉时也冲在前面，据理力争。另外，他们还主动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身边信任的人，将更多的工人带到机构去学习法律知识，进行了最初步的宣传、组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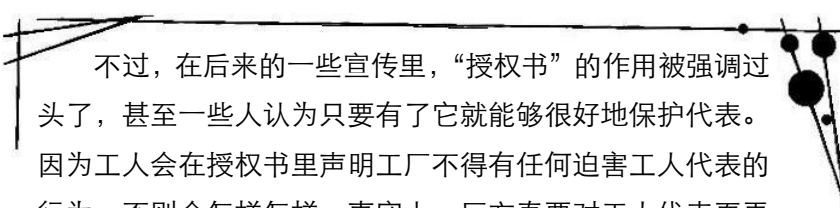
然而，随着事态进展，工人们要和公司、政府进行越来越多的交涉：和公司对话，向各部门投诉，递交各种材料。这些具体的事情不可能每次都出动全体工人去做，需要有代表代为执行。同时还面临着要更有效地在工人中宣传，扩大追缴队伍，联合更多工人起来行动的需要。之前靠一两个人打电话的联络方式就变得很低效。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固然力量大，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工龄有长有短，工资有高有低，有人除了社保还有其他要求。怎么把这么多人的想法统一在一起，如何统一集体行动，让大家把劲儿往一处使，是个大问题。

一般的情况下，让工人选出代表，对厂方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如果每次和工人谈都是一堆人叽叽喳喳地你一句我一句，谈判效率会很低。而且很多人都扔下手头的工作去谈的话，和罢工没什么区别，势必影响生产。所以，厂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力求避免混乱无序的工人集体抗议，改为几个人在会议室和公司座谈，剩下的工人继续老老实实工作，等待会谈结果。另外，每次都是一帮人来谈，厂方负责人面临的压力自然会比只是几个工人代表来谈要大得多。将工人人数缩减为几个代表，公司要耍各种手段，收买、施加压力等等，方便操作。何况，如果能将代表（无论是不是真正的带头人）各个击破，还能有效压制工人集体行动的势头。

不管是工人行动的内在需要，还是厂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都促使工人产生代表。对工人来说，如何产生可靠的代表，如何保证代表能够持续为大家做事，代表大家的利益，是应当严肃考虑的问题。这不同于维权初期，往往靠几个富有责任感的工人主动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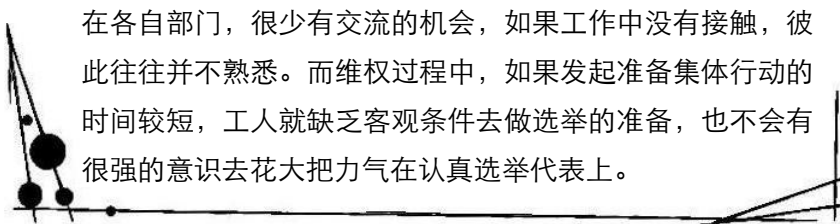
在 HB 工人中，代表并不是由工人一开始就直接选举产生，

而是由维权行动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们自愿担任的。这种代表产生的方式和工人内部的熟悉程度以及维权发起的过程有关。前文提到，工人追缴社保队伍是从起版部开始的，通过老乡、同事等各种关系将信息传递给其他部门。各部门关心社保并愿意行动的人成为“联络员”，向本部门的工人传递了解到的社保信息、法律常识，传送各类资料、材料。最后，这些联络员自然而然地成为部门代表。后来在机构的提议下，工人们出具了一份书面的授权书，明确了代表们的地位，同时希望能够像机构说的那样，有了工人代表的身份便可以有更多的法律保障。



不过，在后来的一些宣传里，“授权书”的作用被强调过头了，甚至一些人认为只要有了它就能够很好地保护代表。

因为工人会在授权书里声明工厂不得有任何迫害工人代表的行为，否则会怎样怎样。事实上，厂方真要对工人代表耍弄任何手段的话，是不会受授权书约束的。在你来我往的对抗中，资方的动作都是在估量当前局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如果以较小的代价便可以搞掉几个工人代表，打击工人士气，那么，资方会很乐于随时以各种理由破坏授权书里的条款。所以，要有力地保护工人代表，关键在于有组织有决心的工人集体的支持，而不是授权书的魔力。甚而至于，授权书还可能让资方报复的矛头更集中于首席代表、代表身上。



真正由全体工人直接投票选举代表的情况，在实际的维权案例中还很少见。这主要是因为工人流动性较大，又分散在各自部门，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如果工作中没有接触，彼此往往并不熟悉。而维权过程中，如果发起准备集体行动的时间较短，工人就缺乏客观条件去做选举的准备，也不会有很强的意识去花大把力气在认真选举代表上。

工人代表正式亮相，威胁随之而至

2011年10月28日，工人们听从了劳工机构的建议，拟出《代表告知书》、《意见书》，另外带上10月20日协商的协议书前往人事部。《告知书》列出了几位工人代表的名字，要求以后公司要找人谈话一定要找工人代表。

《意见书》有五项内容：一，社保从入职之日补缴；二，不得对135位工人无理地放假、解雇、调动职位等；三、公司不得对工人代表采取歧视性行为，不得违法解除或变更其劳动合同；四，公司要在2011年11月7日之前给工人一个正面的答复。

2011年11月1日，公司还没有任何回复，早上镇政府却打电话来约一位代表下午过去“了解情况”。因为之前已经和政府的人谈过好几次，工人们开始并不敢拒绝，但因为和政府人员的谈话总是没有结果，工人们不想再浪费时间，而且这次只叫一个人过去谈话，有可能会产生误解，让工人对代表起疑心。那个代表也觉得压力很大，有些害怕。工人坚持说不能一个代表去，要两三个人才行。镇政府的人就说：“我只负责传话，其他情况不知道。”到了下午，人事部打电话来，又叫起版部的两位代表自己去镇政府谈话。两代表就说没车不去。后来镇政府的朱主任打电话来，要求一位代表到镇政府来。工人干脆提出条件说：不能一人去，要去就派车送三个代表一起去。最终在工人的坚持下，公司派车送三人到镇政府。

到了镇政府，代表们听到的始终是那几句话：政府是员工与公司之间沟通的一个平台，有什么困难尽管向他们申请，会帮忙转达。还说如果工人一定要公司从入职起一次性补缴社保，在现今经济的调控下企业会有困难，到头来只会逼到公司倒闭卖厂。一个主任还批评代表，现在是在和公司进行协商，工人必须要有所让步，一步

都不让，这不叫协商。又问到代表们为什么会知道写劳动法里的条文来追社保，是有高人指点，还是有不法律师教唆，警告工人不要被人利用。代表们也没中圈套，说这些法律法规只要上网一查就清楚，而且现在 PY 那么多工人追社保，向外面的工人借鉴就行了，不用教都知道。代表们还反问主任：“我们追社保合不合法？”他只好说：“合法。”工人们一直相信，只要做的事合法，不闹事，政府就不会为难。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地方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他们留下一位代表，好像审犯人一样，手不停地指着代表问话，态度非常不友善。原来，这是因为工人曾要求公司在 11 月 7 日给一个正面的答复，而劳工机构恰巧在这个时间组织了一个大型活动，被公司的人知道了。公司担心工人会在这段时间搞事，就把信息报给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恐吓代表：“如果在这段时间有什么事发生，就找你们三个代表，你们是带头的。”

三位代表临走时，那位主任又告诫工人，有困难就找他，不要轻信外面的团体。然后把社保问题引伸到了政治层面，说道：现今全球动荡，像美国华尔街罢工，超过一百多城市加入游行，影响深远；现在一些有企图的人在中国找目标，煽动群众，策划行动；工人要相信政府，政府是会帮工人办事、解决问题的。代表们回答说：“我们的事没有你讲得那么严重。我们只想追缴社保，其他犯法的事我们不会做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经过这次谈话，工人代表感到，在劳动市场，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看得见的官员的拳头。社保的事搞到现在，公司变成了配角，政府倒成了主角。公司只找工人正式协商过

一次，政府却已经找工人谈了无数次了！

不管工人怎样催问，公司还是老样子，尽量地施展拖字诀。拖时间有利于公司考虑对策，去打通各种关系。工人则有点不耐烦了，所以 2 天后，也就是 2011 年 11 月 3 日下午，两位工人代表和第二批的代表又去社保局了解情况，同时把第二批工人的资料交过去立案。工人从社保局主任那里得到了明确的回复：现在社保正在和地税核算工人的金额，如果工人协商不成功，两日内司法就会介入，强制执行。听到社保局如此肯定的答复，工人们非常振奋！

2011 年 11 月 7 日，是工人的《意见书》里要求公司正面回复的最后期限。有人认为，已经从社保局得到明确回复，就不用再跟公司谈了。但商讨之后，几个工人代表还是决定去人事部问问。开始人事主任说老板没回来，下午 3 点再跟工人谈。后来到了下午两点多钟，人事部又打电话来要工人代表到镇政府谈。工人代表都不同意再去政府谈，认为去那边谈来谈去没实质的结果，只看政府和公司演双簧戏。工人们咨询劳工机构的意见，那边也是建议：“没什么好谈了，督促社保局尽快处理。”

但政府那边一定要代表去，三位代表无奈之下还是去了。到了政府那边，除了公司的人事主任、主管，还有法律顾问也在，派出所、劳动局、工会、司法局的人也到场了。十多号人坐在一起面对三个工人代表，场面真震撼。

一位官员开场说：“这次谈是为了给公司和员工一个沟通的平台，是政府第一次介入该案件。”代表们很奇怪，反问道：“谈了那么多次怎么还说是第一次？”那人又解释说政府正式介入谈判才第一次，之前的都不是，工人有什么要求、意见，现在可以提出。公司也可表态，政府给意见，提供法律知识。

公司和工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公司在补缴社保方面抛出一个新方案：按不同人的年龄、工作的年限、户籍来补缴。例如，来自湖南的就按湖南当地的社保基数补缴，如果经

济困难可以分批补缴，年纪大了的那批则按其它不同的方案补缴。总之将工人各种情况拆散开来。

工人代表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没有公平对待。工人经济困难，公司不用操心，需要一次性补缴的钱，借钱都会交上去。工人只按社保局的方案，社保局认为工人要买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而且老板当初也拍板答应说，按照社保法规来，该买多少就买多少，他一分钱都不会少给。工人说道：“是老板的话给了我们信心走法律途径的。”

公司的人事主任赶忙辩解：“老板是香港人，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法律，乱说的。”

工人亮明底线，最迟要从 1999 年 GZ 市要求企业缴纳社保那时起补缴，一天都不会让步。政府的人这时站出来说工人的态度太强硬了，不肯退让是不行的。公司方则不停地声称自己经济困难，到时只会两败俱伤，一个失业一个倒闭。

代表们并不理会这些听了几百遍的说辞，说只想拿回自己应得的。公司最后说会在这周内列出几个方案来，给工人看看是否接受，工人有意见再列出。其实工人早已说得很明白了，什么都不用多谈，公司再多的方案也是多余。公司只是不断想着拖时间，想办法如何省钱。当天还有一位工人代表去了社保局，咨询补缴的情况。社保局那边说，这个案件进入了监察科，地税局已算清了数据，等监察科核实资料，就可强制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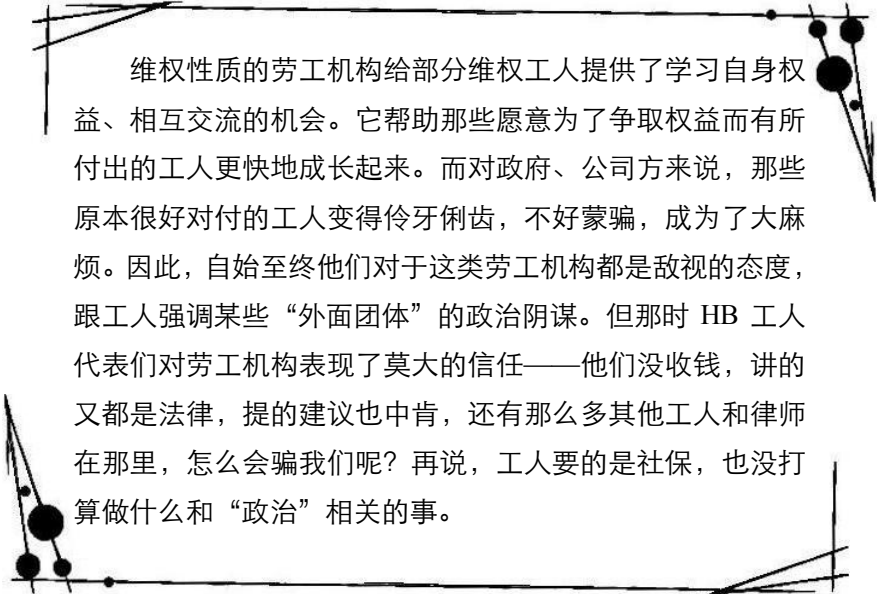
不过，三个工人代表毕竟说不过十多张嘴巴，虽然没有答应公司的方案，但还是被人家给顶住了，没占上风。11 月 8 日晚上，十三位工人代表冒着倾盆大雨，去劳工机构寻求帮助。机构一位社会经验丰富的老义工接待了工人，帮助工人分析了情况，说工人还是太嫩了，谈判的底气不够，一句话就被人家吃住。跟厂方协商一定要一句话就说出重点，提出的问题要尖锐合理，让对方兜不住；对方说的话不一定要回答，思维不要跟着对方走，否则会说多错多，

被抓住弱点；谈话内容不用太长，说出核心就行。工人自己也总结了经验：谈判一定要三个以上的代表。谈判之前也要尽量通知其他工友，不然都不知道代表为大家做了这么多事。

11月9日，第二批追缴社保的手链部员工还没有拿回劳动合同。几个代表和一些工友建议他们一定要拿到，因为这是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重要证据。但是手链部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原本是公司的一个加工部门，后来是包给了老板的一个亲戚做，等于是同厂不同老板。他们几个员工去跟他们的老板拿合同的时候，后者说合同就没有，如果要就立刻给工人“放假”。外包老板语气很重，态度很不好。员工跟他说：“如果放假就要‘放假通知书’，没通知书就不会走。”那老板就指着他们说：“放假通知书没有，现在你们立刻走人。”员工也没有被他吓住，理直气壮地跟他说：“我们合同也要拿，放假通知书也要，没有我们就不会走。”最终那老板也没办法，叫他们到人事部去拿放假通知书。这些工人叫上了几个第一批的代表，帮忙一起去找人事主任：“之前你在政府那边说如果我们要合同，你就一定给，为什么他们几个拿不到。”说得人事主任也心虚了，最后答应给工人合同。

11月11日，工人听到消息说，厂方准备每个部门放一批人的假，但谁也没有收到正式通知，谁会被放假也不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在猜疑会不会是自己。有代表去社保局那里了解进展，得到回复说：“社保的基数核算出来了，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要跟地税局那边核对。现在事情已经转到了监察科。监察科还要我们再与厂方沟通、协商”。代表急了，说：“我们现在跟厂方没的协商了，你们赶快进入程序办事。我们再跟厂方、政府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只会拖我们的时间。你们不是说我们的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很快要厂方强制执行。为什么到现在又走前面的路再去协商？我们已经跟厂方谈了几个月了，根本达不到我们基本的要求！”社保局的人总是说急不来，要按程序办事。但是立案已将近三个月了，至今没一个正

面的结果，还说要等第二批的人一起办理，那更不知要等到何时了。公司要放假，这边社保的结果又变得不明确，工人都很沮丧，不知该怎么办好。



维权性质的劳工机构给部分维权工人提供了学习自身权益、相互交流的机会。它帮助那些愿意为了争取权益而有所付出的工人更快地成长起来。而对政府、公司方来说，那些原本很好对付的工人变得伶牙俐齿，不好蒙骗，成为了大麻烦。因此，自始至终他们对于这类劳工机构都是敌视的态度，跟工人强调某些“外面团体”的政治阴谋。但那时 HB 工人代表们对劳工机构表现了莫大的信任——他们没收钱，讲的又都是法律，提的建议也中肯，还有那么多其他工人和律师在那里，怎么会骗我们呢？再说，工人要的是社保，也没打算做什么和“政治”相关的事。

公司出毒招，工人成批被放假

11 月 14 号下午四点多，配石部的员工有十几人接到了“放假通知书”。到下班时，一共有 89 人接到了通知书。工人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生产旺季是过去了，但真的没订单给工人做了吗？当然不是。放假的 89 人全都是要求公司补缴社保的工人，所有的工人代表全部被放假，有第一批也有第二批。他们作为工厂的老员工，都是各部门的熟手。就在前几天，他们还在公司加班，有些人甚至通宵赶货，今天却突然被放假了。而且那些比他们做得慢、做得差的新手都没

有放假，还在加班呢！

工厂拖延这么久，早已为放假做足了准备：进入生产淡季仍然招工，同时大量转移订单，外发给别的厂做。这样公司便能在既不影响自己生产的情况下，又狠狠打击这些工人——首先，工人不能再在公司做任何行动，对生产无法造成威胁。一旦放假，工人就会分散在厂外各地，各忙各的，不会再像在公司那样有什么突发的事情，发个 QQ 信息便可以召集不少人。其次，放假时间长，工人收入降低，工人有可能降低要求，以尽早解决社保问题。

被放假的工人们，连同担心自己将会被放假的工人，下班后聚集在公司一楼大厅，向老板讨说法。老板说：“现在没货做，肯定要放假，工资按法律法规补偿给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去找人事部问清楚，不要在这里闹事。”大家又找人事主任，回复说：“现在公司没货做，放你们假，待遇会按法律法规来补偿。有什么不明白的去问律师。”

有些工友很气愤：“昨天还加班，今天手上还有很多货做，这一下子就说没货，要我们放假，根本没有道理。我们不认识什么法律法规，要以书面形式写出来给我们。”

问到放假待遇问题，人事经理便说：“你们背后肯定有人支持，不然不会走到这一步。你们回去找你们的律师问，不用在这里闹。”

工人代表问她放假工资如何支付，人事主任说按法律法规，按当地最低工资的 80% 支付。工人代表说不合理，人事主任说，有争议你们就去劳动仲裁，如果判该支付就给你们。

大家因为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都不肯走，留在公司一楼的大厅里。部门师傅出面轰赶工人，工



“请问您打算失业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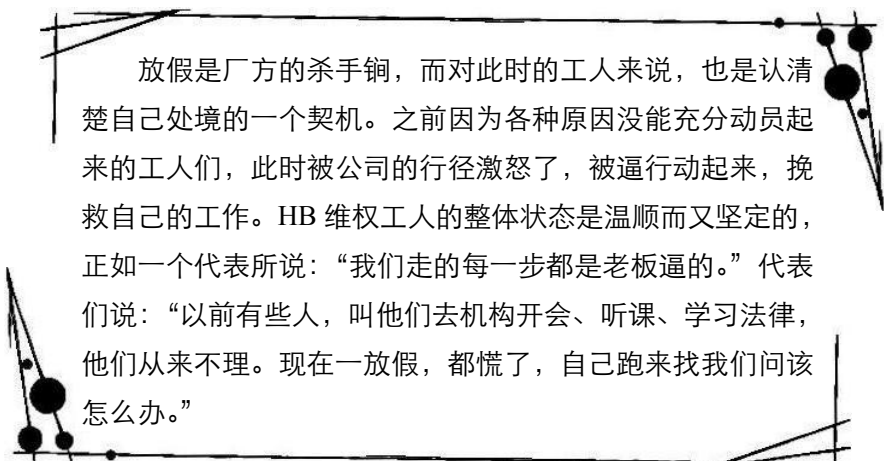
人反击：“你们没资格这样做，你们也是打工的，迟早有一天轮到你们。”公司见工人不肯走，便报警。但工人们认为，自己不是闹事，只是讨说法，也没破坏公司里面的东西，叫警察也不怕。

后来劳动局的人也来了，跟工人讲：“公司按最低工资的 80% 发放工资，符合工资支付条例。”工人不答应，认为公司在没事先通知工人的情况下，以没货做为由，一下子放了 89 个人的假。可现在公司上面还有人在加班，这根本不合理。

学习过相关法律的工人们跟劳动局的人讲起了“三方四家”：即如果用人单位发生劳动者集体停工、怠工事件，当事人未提出调停申请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所在的区、县、市三方协商进行调停。工人问劳动局主任：“公司如果无理放假，且带有针对性，这合不合法？要不要申报？”劳动局主任不回答，甚至说不知道什么是“三方四家”。工人们嘲笑劳动局的主任没有与时俱进。劳动局的主任发火了：“既然公司也说了按相关法律不给你们，你们那么多人在这里闹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吃饭，回去吧。”工人说要公司提供书面的解释才会走。后来劳动局主任干脆带着政府部门的人走了，公司的人事主管也走了，只剩下一百多个工人在大厅里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工人们不服气，但也找不到其他办法，因为咨询了很多，包括律师，都说厂方有权放假。

工人从六点多钟开始打电话找记者，但没有联系到一家媒体愿意来。工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报料那么容易，他们这么大的事情就无人理会呢？有工人说，对方一听说“HB”的名字，马上找个理由挂掉电话。之前公司方一遇到工人在厂内集体抗议，便报警求助，这次也不例外。公司报警，警察很快出动，劳动局的人也跑得飞快。可是工人遇到问题时却是求助无门，谁都不应。

大家心里很急，也很气愤，但直到晚上九点，一百多工人仍然找不到任何有效的办法。大家只好相约明天再回公司讨说法。就这样，工人们怀着愤怒和不甘的心情回去了。



放假是厂方的杀手锏，而对此时的工人来说，也是认清自己处境的一个契机。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充分动员起来的工人们，此时被公司的行径激怒了，被逼行动起来，挽救自己的工作。HB 维权工人的整体状态是温顺而又坚定的，正如一个代表所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老板逼的。”代表们说：“以前有些人，叫他们去机构开会、听课、学习法律，他们从来不理。现在一放假，都慌了，自己跑来找我们问该怎么办。”

被逼走出厂门，工人逐级上访

11 月 15 日，早上八点半，被放假的员工全部都到公司的饭堂集合。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想办法。各代表先给区、市、省工会打电话求助，向新闻媒体求助。但全部的答复都是先了解情况，情况属实再安排。工人感到这些人不过是在敷衍，根本不想帮忙。大家又打电话到镇劳动局那里，对方一会儿说等一下会安排人过去跟工人谈，一会儿又要工人派三个人到局里谈，多几个工人去都不行。最后大家干脆对劳动局的领导说：要谈就请领导们到公司来谈。局里的主任说很难办到，又搬出信访条例来敷衍工人。求助劳动局不成，工人又打市长热线求助。接听热线的人听完工人的讲述就说：“既然社保局接手了你们的案子，那就等他们来处理吧。”一句话就把工人顶回去了。

看来这样打电话求助是完全没作用了。大家一商量，干脆下午全部都去区政府信访，看看能有什么结果。已经有多次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历的工人们，讨论了到区政府之后如何提问题，如何不

会自乱阵脚，并收集整理了几个诉求。

下午两点多钟，有 75 名工友在 PY 广场集中，浩浩荡荡地向区政府信访办走去，大家守规矩地走人行道、斑马线，不闹事、不喊口号，因为大家之前向机构询问过注意事项，不想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人说他们聚众闹事，抓人了。

到了信访办门口，工人们一拥而进，把信访办坐满了。事先商量好并向信访办递交的几个诉求是：一、公司有针对性地放工人的假，且待遇不明；二、员工休产假的待遇（之前有女职工休完三个月产假之后被逼重新填了入职表，工龄清零）；三、要求让放假的员工复工。

工作人员要求安排五位代表跟他们谈。工人选了五个人（其中一个不是授权书里的工人代表）进去谈。区政府的人按照工人列出的三个要求逐一提问，工人进行解释。谈了没多久，镇政府的人来了，还和工人打招呼。工人心想，区里真是官大一级，镇上的那么快就被叫来了。

区政府的办事员跟工人承诺说：“现在区里给你们搭个平台，明天九点你们几个人到镇里，跟政府、公司的人一起，三方协商。”工人立刻回答：“不用去镇那里谈了，社保的问题谈了那么多次都没有实质的效果。我们觉得镇政府跟厂方是一个鼻孔出气，偏袒厂方。既然我们来到这里请求你们的帮助，你们就要马上处理，不要推来推去。”办事员说：“你们来到这里就应该相信政府，现在区给你们搭了个平台去沟通，为何不去？如果谈成了不就好办事了？如果按信访条例来给你们办，程序比较麻烦，也没那么快有结果，只会拖得更慢。”经过多番的交涉，工人只好答应决定还是回到镇政府那边谈。

在外面等候结果多时的工人们，听到这个结果，期望着明天在区政府的压力下，政府和老板也许就不会那么嚣张了。看时间还早，工人们又去社保局走了一趟。监察科的主任没有在。约了明早

八点再去谈社保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五个代表在镇政府那边谈放假的问题，另一批代表去找社保局监察科。两边的协商同时进行。

在镇政府的会议开始前，信访中心的主任说：“如果你们相信政府，有诚意谈的话，那就不要录音。会议要在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进行。”工人照做了。政府按照工人向区信访办提的三个问题来提问，先就工人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有针对性放假，要求厂方答复。厂方代表（厂长）说：“不是，以往公司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放一批人的假，今年也是这样，会轮流放的。”工人反问：“为什么只放我们追社保的人？如果到了通知书上的日期回去上班，还会不会继续被放假？”厂方代表说：“按厂方订单而定，如果公司接不到订单，货量减少，你们这批人有可能继续放假。”工人说：“那不就是无限期的放假，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复工了？如果我们工作的岗位是同一工种，为什么旁边的工友还在加班，却说我们没货做？我们放了一次假，也应该轮到其他的工友，为什么放来放去总是我们这一批的人？这样不是有针对性地、打击报复我们这一批工友又是什么？”

政府的人听完辩论也觉得厂方是有针对性的。厂方的人说不是针对，放假是轮流的。中心主任就抓住厂方说的“轮流”说出了一个具体的轮流放假方案。他说：“如果这一组有十个人，这一次放了三个，下一批放假就不能放这三个，而是在另外七个里面选。”厂方代表说：“这个我们说了不算，要请示董事才能下定论。”政府的人就给出了两天的时间要厂方给答复，重点说明如何轮流放假。事实上，如果是因为没有货做要轮流放假，部门师傅就可以安排，哪里用请示公司“董事”？这种答复不过是公司的缓兵之计。

第二个是产假的问题。工人要求厂方回答：为什么休完三个月的产假回来，却要求员工离职，然后马上重新入职，导致员工的工龄归零？而且产假的工资也没按照劳动法来支付。厂方就说：“这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你们讲的不知道是否真实。回去查清楚之后才可

以有答复。”政府要求厂方在下个星期四有书面的答复。劳动局的人也向工人介绍了产假的劳动法规。

第三个问题是工人要求复工。厂方说：“现在公司都没活做了，你们回去干什么？”工人说：“公司有货外发，为什么就没货给员工做？公司每天都在加班。”厂方说：“你们的岗位没货可做，如果有货做还放你们假干嘛？你们现在放假是按法律法规支付给你们。”政府人员也没有支持工人的要求，看起来工人复工无望了。

最后谈到社保方面，政府的人要求厂方作出一个回应。厂方代表很不高兴地说了一句：“厂方提议了由 2004 年 9 月开始补缴。”工人立刻拒绝：“不行，做了十年的员工还差了几年，要补就要从 1999 年 1 月开始买。”厂方代表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说，假装听电话便离开了会议室。信访办的主任这时候出来帮着厂方说话，跟工人讲：“现在已经解决了一大部分人的社保问题，只是在零四年之前入职员工的社保问题还有争议。”这样看来政府也要把时间定在 2004 年。

再看社保局这边的会议，监察科一直踢皮球。本来这边是去谈社保问题，他们却推给政府那边谈，说了一大堆废话。问到放假的问题，又说放假第一个月有基本工资，第二个月只有最低工资的 80%。

虽然没有得到理想结果，工人代表还是觉得有所收获，不算白谈。至少，有了区一级的压力，不再像以前镇政府的会议那样总是没什么结果都没有。至少产假一类的问题，厂方在规定的时间内要给出书面答复。只是最重要的社保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1 月 18 日，厂方贴出了通知：
“由于今年受各方面环境因素的



影响，现在各部门货源减少，公司经营困难，公司为了大家能够享有最低保障，因此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开始计划一批员工放假，届时公司将组织各部门师傅及组长将会讨论如何安排员工放假问题，放假 1 至 6 个月不等。放假期间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支付停工待料工资。停工期间工资发放方法：第一个月周期工资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以后的生活补助金在每月的 20 号至 25 号以现金方式支付。”放假的员工看到这份通知后都人心惶惶，要放那么长时间的假，补助金还要以现金的方式来发放。不知道公司在打什么算盘。

放假问题悬而未果，工人向各方求助

11 月 19 日，应机构邀请，某律师所派人过来跟工人讲解放假的问题。律师解释说公司的行为不是“放假”，是“停工待料”。不过法律关于停工的规定并不明确，停工待料不犯法，如果走法律诉讼程序会很不乐观，只能通过和公司谈判。工人的诉求从法律层面上讲比较勉强，工人可以尝试驳斥公司放假的理由，证明公司不是真的没订单可做。但同时，公司也可能以原材料价格上涨，经营有困难等理由逃避问题。

于是怎样给老板压力，成了目前工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专业人士讲解道，放假不是老板一个人便可以说了算。放这么多人的假，需要得到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认可。公司是有权停工待料，但不妥当。工人们可以写意见书，将不同意公司放假安排的意见反映给各级政府部门，向政府相关部门指出，公司这样将工人推出工厂外，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借此通过政府部门给公司施加压力。

11 月 21 日，经过集体讨论，工人们写了“关于 HB 公司 2011 年 11 月 17 日《放假通知》的异议书”（附件三），向各省、市、区、镇工会和劳动部门相关领导反映。工人的要求很简单：社保和复工。

同时写道，希望工人提出的诉求得到各部门的支持。如果工人的合理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会采取自主的方式解决。

除了找政府，工人们希望能通过媒体扩大事件影响，得到舆论支持，引起政府更大的重视。通过多方协助，终于联系到了《南方工报》的记者。这是 HB 工人第一次联系到了媒体记者进行正式报道。不过，当几天后工人读到报纸的时候，报道的内容却让他们大失所望。本来是工人们被公司放假停工，结果报道却写成了工人们主动停工要求补社保。工人们搞不清记者这样写的用意，但因为报道本身也没有引起什么影响，没多久便被大家遗忘到角落里了。

11 月 24 日，工人代表去镇政府拿了公司交给政府部门关于产假和放假问题的回复。回复中说：“产假会按照相关的法律补回，过两天就可以回公司拿产假的工资。有关员工放假的问题，公司不需要向员工交代理理由，不需要解释。”政府的人说公司有权利这样做，他们也没办法。工人们又一次被公司蛮横的态度刺激了。

11 月 28 日，今天 155 人又来到区信访办申诉，有些人在路上已被镇政府的公安跟踪。还没到区信访办，那里已经有人守候着。但他们没有对工人怎样，工人也假装他们不存在。工人拿着《诉求书》向信访办的主任申诉：第一，强烈要求政府部门立即给出工人有关追讨社会保险事项具体的书面处理意见；第二，要求立即查处 HB 公司以停工放假的方式打压 184 名依法主张正当权益的工人的严重违法用工行为；第三，184 名工人强烈要求立即复工。

主任听了工人的要求，但又是那句：“当地的问题当地解决。这里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工人说：“如果当地真的能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不用这么多人再次上访了。”

随即社保局的主任、监察大队的队长带着厂方《关于员工要求补交社保事宜的处理方案》来了。工人们一看处理方案，里面很多说法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一，在职期间应参保但未参保的时段如何确定；二，员工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如何确定；三，

公告后的 7 天内各员工若不向公司缴交的就视为自动放弃追讨的权利。

社保局的主任就工人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来解释。他说，“在职期间”是进厂工作一个月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职时间，发工资的第一个月就是确定劳动关系的时间。但说到“7 天内补缴社保”时，工人最大的疑问是，如果社保局公布了这个解决方案，厂方和工人在前两个补缴时间段和入职时间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7 天内解决不了怎么办？

社保局让工人去问镇政府。工人们说回镇里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之后社保局便不理睬了，任由工人在外面干等。

工人代表出去跟其他工友说信访办又要他们回镇政府谈。工人们都说：“不行。要在这里解决问题，不解决就不走。”一百多人就这样漫长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但等到他们下班的时间还是这样的结果。工人们开始有分歧了，有些说等了一天都没有结果，不如回镇那边谈一谈看情况。另外一些工人又说回到镇上去谈的结果都不用问，反正最后就没结果。区信访办的人催促工人：“这里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现在给了你们去沟通的平台，是你们放弃了争取的权利。反正如果你想谈，我们可以跟镇那边打招呼，他们就算加班也会跟你们解决问题的。”工人们等了一天都没结果，也不耐烦了，就想不如就去镇那边谈一谈，看他们耍什么花样。

社保问题突然“解决”，工人代表提起警惕

到了晚上 7 点钟，工人们再次来到镇政府的信访维稳中心，马上感到被骗了：说好有区社保局、监察队的人过来四方谈判，但最后却说不来了。工人们强烈地抗议：不要谈了！没有区那边的人来，谈的意义不大。后来，在工人們的强烈要求下，社保局和监察队的

人终于来了。厂方是人事主任、律师顾问还有新来的人事经理。新人事经理看起来很嚣张，一副了不起的样子。镇那边有副镇长，中心的主任。工人们还是提出以上的问题，对方的说法还是像今天在区那边说的一样，最早从 1998 年 7 月帮我们补缴，也希望工人在收到公告的 7 天内向公司补缴，人事经理还要工人代表在那份《方案》上签名，表示工人收到了通知。工人不同意，不愿意在上面签名——法律规定没有要求工人必须在这种通知上签名。工人对他们定的这个 7 天的限期充满了疑问。工人说：“你们说的每一样都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做，为什么这 7 天时间不按法律法规来做，这 7 天当中会不会有蹊跷？”

对方嘲笑工人，之前那么迫不及待地想拿回社保，现在可以拿到却又说 7 天太快，是自打嘴巴。工人也理直气壮地讲：“如果厂方给出的补缴方案是我们满意的结果，7 天补缴肯定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话，这 7 天就变成大问题。”他说：“你们结果都没拿到手，怎样知道结果合不合意呢？”最后，厂方要求工人 30 号下午两点半到厂方拿结果，镇政府也会去现场，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就当场登记，然后再作处理。没异议的就赶快签名交钱。工人代表当时也相信了镇政府，但很怀疑公司会顺顺利利地给出一个真的能让工人满意的方案。谈到晚上十点多，工人代表出去把消息告诉其他员工，大家都很兴奋、开心。一个工人代表回忆说，大家听了以后全部都拍着手走了，以为这次谈判成功了，可以拿到社保了。不过，和公司、政府官员打了多次交道的代表们还是保持了警惕性，认为厂方没那么容易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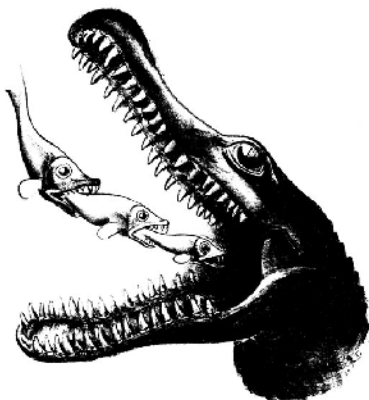
11 月 29 日，几个工人代表开了个小会议，针对昨天厂方和政府的表态。大家都认为厂方肯定是从 2004 年补起，不可能从 1999 年。这样有 21 个工友符合他们的条件，将其余的人推到仲裁。这样一来，社保局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也就可以交差了。如果走到仲裁这一步，就会将案件分成一个一个的来处理，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解决。大家决定要想办法说服那 21 个人，不要有个人的想法和行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解决的时候也应该大家一起解决，不要给厂方分化瓦解工人的机会。

11 月 30 日，下午两点半，大家准时到达了公司。到了公司门口，却不给一百三十多工人进门，一直等到四点多钟，人事部、镇政府的人才到位。人事部的新主任拿着大喇叭跟工人讲话，要求工人 4 人一组，每组按顺序到办公楼，先在签到表上签字，然后再给个人发放关于补缴社会保险的通知书。虽然看起来厂方安排得头头是道，但是工人代表对这个程序充满疑问，担心签完字就表示认可方案，再提出异议就晚了。于是代表在人群中大声要求人事主任先发补缴通知书，看了之后再决定是否签字。其他工人也都表态支持。

公司见压不住工人的要求，只好把早已准备好的通知书拿了出来。工人们对照各自通知书的内容，感到全都被公司耍了。工人收到的通知书里最早的从 2004 年补起，而有些做了十多年的却仅从 2008 年、2009 年补起，不知道公司是依据什么写的通知书，真是好大的一个骗局。厂方实在够阴险，这下工人算是看清楚他们丑恶的嘴脸了。工人们在愤怒中拒收了那张通知书。镇政府的人还在旁边劝说：“你们有异议的就来这边登记，没异议的赶快签名拿通知走。”工人代表提醒大家，如果去登记了，就等于把自己推到“仲裁”诉讼

这个深深的陷阱里了。工人们醒悟过来，这是公司和政府联合起来设计的圈套，就等着工人往里面钻，幸亏几个工人代表清醒，不然的话，就上了那些人的当了。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做法激起了工人人们的极大不满。工人们带着愤怒和失望离开。



聚集市府请愿，工人终得承诺

经过反复讨论、商量，大家决定要向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反应诉求，找市政府请愿，市里不行找省里，总之社保一定要争到底。12月5日一早，工人们从自己的家里出发，或坐地铁，或坐公交，一起到了市政府门前。工人打出了准备好的横幅“我们要社保，我们要复工”。维稳的警察赶到现场，让工人将横幅摘下。工人们站在市政府门前站着不肯离去，后来信访办允许五个人进去谈话。他们还在里面谈着，区政府的领导便赶到了市府，领头的一个是区政法委的领导。这个领导了解了工人的诉求，当即表态会解决工人的问题，还留了他的手机号。他劝工人回到镇上。工人们回忆说，当时并没有想为什么政法委要出面管这件事。那个领导看起来一身正气，说话也有分量，和以前那些只想拖延时间、推卸责任的官员好像不一样。工人商量之后，决定回去跟他们谈。

没多久工人便发现，这位看起来说话算数的政法委书记也只是政府部门用于缓兵之计的，社保问题仍然处于僵局。几位工人代表商量：既然现在有专人答应负责，我们就咬定这个专人。十几个代表开始轮流给这个书记打电话，你上午打，我下午打，每天都有人找他催问社保补缴的进展。书记被催得不耐烦了，斥责工人骚扰他。工人回敬道：“我在你工作时间，问你工作的事情，怎么叫骚扰？当初可是你答应给我们负责到底的啊！不找你找谁？”

12月9日，对这一百多位工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公司终于发出书面通知，同意给141位工人补缴从入职之月起的社保了！可公司还留了一手，要工人三天之内把自己需要补缴的社保钱交到公司，过期不办！因为大多数人都要补十年左右的社保费用，一个人少说也是几万块钱，平时生活并不富裕的工人们，怎么可能三天之内凑得齐这些钱？这分明是刁难！工人们对此意见很大，工人代表们去找厂方交涉，最后公司让步，答应工人12月

20 号到 30 号之间把钱交齐即可。

第一批工人把钱和社保局要求的个人资料如数按时交给了厂方。公司的其他工人看到补缴社保真的有了结果，也去找人事部门要求补缴。公司答应他们，第一批的社保办完以后，就给他们办。不过由于第二批工友并没有自动享受到第一批工友争取来的结果。他们的合同厂方仍然未给，只是让他们慢慢等待。大家的钱已经交上去了，为了尽快有个结果，工人代表们一直在几个部门之间追问，催促。但这段时间，公司仍然没有安排这些员工回去上班，大部分工人去做临时工贴补家用，只剩几位工人代表一直坚持着为大家的事忙东忙西。

补缴频生变数，工人聚集讨说法

过完春节，大家陆续从老家回来。工人补缴社保的钱已经交上去两个多月，可社保还是没有着落。各部门之间还在扯皮：社保局说地税的资料不全，地税又说社保局的资料不全，还说原来厂名叫 HY，这个厂已经注销了，2004 年之后改名叫 HB，所以社保只能补缴到 2004 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很生气：钱都已经交上去了，公司也答应从 1999 年补了，竟然又拿这种理由来拖延！但要堵住相关部门的嘴，工人们还是要搜集各种证据，证明 HY 和 HB 是一个厂，让他们没有理由再拖！

终于，厂名的问题解决了。3 月 27 日，按照社保局要求，工人们把补充资料交给公司人事部，但是公司却对工人的材料置之不理。公司借口没有货做，给追社保的工人放了快六个月的假了，每个月只发几百块的停工待料工资。工人平时只能自己找些零工做，不然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没法过。可没放假的工人们却还在加班。工人们感到不能再被公司这样拖延耍弄，必须要一个明确的书面答复！

4月1号，工人们先到地税局回复社保问题的进展。地税局答复说，4月30号员工资料会全部录入电脑。会责令公司4月5号-30号交钱，不交钱就会把这件事移交法院。

有了地税的答复，4月2号，一百多名工人上午8点半聚集到公司人事部，提出3个要求，不给书面答复就不离开办公楼：一，由厂方缴纳的那部分第一批工人的社保钱，什么时候交到地税；二，第二批工人的资料什么时候交到地税局；三，要求把第一批工人补交的资料马上发到地税局，不能再拖延。

有工人看到，HB老板也来到厂里。不过老板根本不敢走近办公楼，而是躲到他的宿舍里不敢出来，和人事主管打电话指挥。有些人想去老板的宿舍去直接找他问回复，但有的代表认为，那里毕竟是老板私人的地方，还是在办公楼等着比较好。

而公司第一反应仍然是报警。警察和辅警们马上到齐，镇里维稳办也到场，但因为工人们除了不断联系媒体之外，便是在公司大堂等待，而且人数众多，警察也没把工人怎样。

这期间工人们一直在给各路媒体打电话。晚上9点多，有记者来了，采访完走了。夜里12点多，社保局和地税局的人也来了，问完情况也走了。

一切毫无结果。辅警们看着工人在公司待了一夜。

期间，走不出办公楼大门的人事主管在办公室和几位工人代表聊天，诉说自己夹在老板、政府、工人三者之间的难处，想争取同情理解。这时候，代表才知道，原来公司拖着不去补缴社保，并非只是公司的原因，原来还有地方政府在控制进展，不愿处理此事。毕竟，HB工人长期不间断的行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仅在LH镇，周边的几个工厂工人都在关注HB工人的结果，甚至连镇政府附近卖菜的摊贩都知道HB工人补缴社保的事情。他们一旦补缴成功，必将刺激更多的工人提出类似的要求。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的支出将是一笔难以估量的庞大数字。

工人代表意识到，原来补缴社保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公司，而是来自政府。可事已至此，无论对手再强大，也得要一个结果才行。（详情参见“首席代表”MJ 访谈）

事成之时出意外，工人援救代表

4月3号，下午3点，很多工人已经守了两天一夜，大家决定轮流回去休息，和公司耗到底。下午5点，公司终于松动了，答应给书面通知，要工人们散去。工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厂方答应6号把工人们的资料都交到地税，4月30号以前公司把钱交齐，第二批的资料交到地税。为了保险起见，工人们要公司出具一张每个员工的入职时间表。

在人事主管答应了这些要求，给工人书面通知的时候，盖的章是HB的。但因为之前公司曾想赖账，只从2004年以后补缴，所以有工人就要求把HY的名字也写上。因为这件事，工人和人事部经理发生了争执。人事部经理和保安出手打人，把一个女工推倒在地。

这次工人们报了警，警察来以后把被打的工人和人事部经理都带到了派出所，说是要录口供。被打的工人明明是受害者，警察对她的态度却很恶劣。后来派出所的人出来把两个代表叫进去，说是要他们口供。工人见到老板也进到派出所。大家都在派出所外面守着，但是没有等到代表们出来，人事部经理却被放了出来。最后被打的工友也放出来了。她说她已经不追究人事部经理。可是两位工人代表仍然没出来，问



警察，只答复说要录口供不能走。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着急，都已经不追究公司打人了，还要什么口供？这其中必有蹊跷。为了表示对工人代表们的支持，也为了知道工人代表们什么时候能够放出来，十多个工人轮流在派出所门口守着，一直到第二天。

4月4号，晚上7点多，有工人看到两个代表被押上警车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媒体的记者来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过来。后来听说是老板要起诉两个代表“非法禁锢”，所以代表们被关到拘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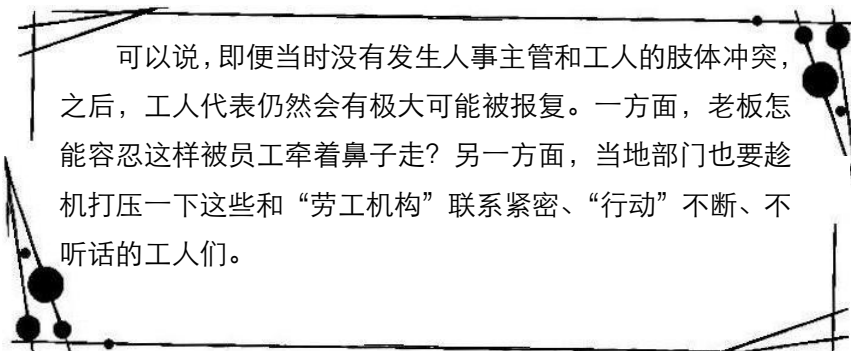
工人们慌了。本来一切都还算顺利，公司的答复也已拿到手，可工人代表现在却成了“嫌犯”。剩下的几位代表赶忙联系劳工机构，看看能有什么办法帮两位工人代表尽快回家。同时通知代表的家人，让他们知情，避免过分担心。

劳工机构迅速联系了两位律师，代理两位代表的案件并准备提供刑事辩护，也找了相关人士提供法律建议。当工人们听到说他们补缴社保的事情有可能因为代表罪名的成立而变成非法，而最终拿不到社保的时候，倍受打击。要用什么办法挽救现状呢？几位工人代表深知现在绝不能放弃。他们马上联络当天参与行动的工人，搜集所有人的照片、视频，可以用来证明工人没有“非法禁锢”人事经理，两位代表没有带头闹事，没有对人事经理进行攻击的证据。同时写请愿书，发动所有工人签字，证明工人代表无罪，要求释放工人代表。

事后，工人代表回忆说，这次行动，工人的准备还是太不充分了，只是简单计划着围在办公楼，不给答复就不走。怎样轮班，怎样应对突发状况，并没有仔细讨论。这也和前几次行动相对平稳有关。工人们以为只要自己不主动发生冲突，不损坏公司物品，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并且，之前了解到其他地方的工人有过类似的行为，大家认为自己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問題。

公司方的反应却很快。见到工人聚集，公司保安马上到位，报

警，上报相关部门，一切按部就班进行。至于后来工人代表被抓，极有可能是工人聚集之后，公司便和当地派出所沟通协调好的事情。因为当时，人事主管几次尝试走出办公大楼，同时安排保安摄像取证，想要录下工人拦截他的证据；并且多次用言语挑衅工人代表，要他们说出“你不给答复就不能走”、“我就拦住不让你走”一类的话，用作“非法禁锢”罪的证明。



可以说，即便当时没有发生人事主管和工人的肢体冲突，之后，工人代表仍然会有极大可能被报复。一方面，老板怎能容忍这样被员工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当地部门也要趁机打压一下这些和“劳工机构”联系紧密、“行动”不断、不听话的工人们。

公司反攻不断，工人终得结果

两位代表被抓之后，公司立即开除了他们，并且没有停止报复，甚至想报复想得太急了，还闹了笑话。有一个代表明明是公司发了通知书让他放假，两天后却以“旷工”为由开了辞退书，拒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还好有人拿到了这个代表的放假通知书，可以作为证据申请劳动仲裁。听说公司人事部的职员因此被骂得狗血淋头——连是不是旷工都没搞清楚！

4月20号，公司又想出新的办法整治那天参与行动的工人。4月2号、3号，有部分工人没有放假，他们打卡但没去上班，而是一起到人事部讨说法。公司于是说他们是旷工，而且原本公司是连续旷工3天算作自离，临时改成2天，目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些工人。

虽然算作旷工的工人人数不多，可是对于急红眼的公司来说，能咬掉一个是一个。

由于工人代表被抓给工人们带来很大冲击，大家此时已经没有足够力量再进行集体行动。面对公司的反攻，也只是通过打官司等个人途径去抵抗。还好，补缴社保的大局已定，公司也只能靠着在这方面惩治工人来出气。

4月26日，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两位工人代表终于获释回家。他们的社保没有受到影响，已经和其他人一起补缴了。

至此，HB工人争取补缴社保的行动告一段落。



附录：工人请愿书

〔附录一〕工人的书面要求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

我们 38 位工人，于不同的时间段进入公司的起版、倒模、验金房部门工作。

公司存在以下违法用工行为：我们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公司至今没有给回我们；从入职以来公司迟迟未帮我们购买社保，直到 2010 年 7 月，经公司起版部门全体员工的努力争取，公司才肯为我们员工购买从 2010 年 9 月至今的社保；没有依法给与我们法定的年休假待遇和高温津贴。

现我们 38 位工人共同向公司提出四项基本要求：

第一、公司分别追缴我们 38 位工人从入职之日起至 2010 年 8 月的社会养老保险。依据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在我们 38 位工人愿意承担个人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

第二、依法给予我们 38 位工人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年休假。我们 38 个工人当中，就有 20 个人累计在公司工作已满 10 年以上，最少的也有 5 年。依据《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且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不得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第三、依法给予我们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内的高温津贴。依据《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劳

社〔2007〕103 号）中明确规定：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50 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00 元。经济欠发达地区确需降低标准的，可由地级市人民政府在下浮 20% 的范围内确定，并报省劳动保障厅备案。高温津贴标准在每年 6 月、7 月、8 月、9 月、10 月发放，在企业成本费列支。用人单位在其他时间安排劳动者从事高温工作的，除应按行业规定向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用品外，也应不低于上述标准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第四、拿回我们的劳动合同。我们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公司就把我们的劳动合同全部收回，至今未给回我们。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以上是我们 38 位工人的共同要求，我们 38 位工人要求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前给予我们正式的回复。在此期间公司不得对员工作出无理解雇放假调动职位等情况。

特此书面要求！

2011 年 5 月 26 日

签名（略）

〔附录二〕 请求书

广东省总工会：

GZ 市总工会：

GZ 市 PY 区总工会：

我们 128 位工人，是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员工，于不同的时间段进入公司的起版、倒模、执模、镶石、配石等部门工作。我们中的员工工龄最长的为 19 年，最短的有 5 年，超过 10 年工龄的员工有 70 人。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法用工行为：

1、我们与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至今没有给回我们；

2、从入职以来，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迟迟未帮我们购买社保，直到 2010 年 7 月，经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起版部门全体员工的努力争取，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才肯为我们员工购买从 2010 年 9 月至今的社保；

3、没有依法给与我们法定的年休假待遇和高温津贴；

4、没有依法发回劳动合同文本给劳动者。

2011 年 5 月 25 日，我们中的 38 名工人向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2011 年 6 月 8 日，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在我们 38 名员工的主动交涉下口头答复为：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没有为员工购买社保，政府、公司和员工都有责任，之前，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一直都是按照政府给与的配额购买社保的。如员工对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的行为有意见，建议员工按照法律途径处理，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遵从政府或法院的处理意见。

2011 年 6 月 10 日，我们中的另外 51 名工人向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2011 年 6 月 14 日，我们中的另外 28 名工人向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都是作出如上的答复。

经过我们讨论，确定我们 128 位工人四项基本要求，具体如下：

第一、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分别追缴我们 128 位工人从入职之日起至 2010 年 8 月的社会养老保险。依据我国《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在我们 122 位工人愿意承担个人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其中，我们中的黄丽凤、邱素珍、冯卫娣、练琼、陈笑媚、钟利祥等六位工友从入职以来至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我们要求公司立即为这六位工友缴纳社会保险。

第二、依法给予我们 128 位工人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年休假待遇。我们 128 个工人当中，就有 70 个人累计在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工作已满 10 年以上，最少的也有 5 年。依据《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且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得计入年休假的假期。因此，我们工人要求享受年休假待遇。

第三、依法给予我们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内的高温津贴。依据《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粤劳社〔2007〕103 号）中明确规定：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50 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00 元。经济欠发达地区确需降低标准的，可由地级市人民政府在下浮 20% 的范围内确定，并报省劳动保障厅备案。高温津贴标准在每年 6 月、7 月、8 月、9 月、10 月发放，在企业成本费列支。用人单位在其他时间安排劳动者从事高温工作的，除应按行业规定向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用品外，也应不低于上述标准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第四、拿回我们的劳动合同。我们与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就把我们的劳动合同全部收回，至今未给我们。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以上是我们 128 位工人的共同要求，我们 128 位工人要求 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0 日前给予我们正式的回复，

否则，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集体行动。在此期间，GZ 市 PYHB 饰物有限公司不得对员工作出无理解雇、放假、调动职位等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 6 条、第 22 条、第 25 条规定，我们 128 名工人特向广东省总工会、GZ 市总工会、GZ 市 PY 区总工会求助，请求工会组织维护我们工人的正当权益。

特此书面请求！

2011 年 6 月 21 日

〔附录三〕关于 HB 公司 2011 年 11 月 17 日《放假通知》的异议书

广东省总工会：

GZ 市总工会：

GZ 市 PY 区总工会：

LH 镇总工会：

GZ 省劳动部门相关领导：

GZ 市劳动部门相关领导：

GZ 市 PY 区劳动部门相关领导：

LH 镇劳动部门相关领导：

我们是 GZPYHB 饰物有限公司的工人，经过工友们的集体讨论，我们一致反对 HB 公司单方面的放假通知。我们一致认为 HB 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1. 员工自 2011 年 5 月 25 日开始，向厂方提出补缴入职之日起至 2010 年 8 月的社会养老保险的要求，但厂方至今未予缴纳。

2.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单方面贴出长期放假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现在公司单方面进行放假，并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且我们工人反对目前公司放假通知中的内容。因此公司的放假安排是不合法法律程序的，是无效的。

3. 目前第一批放假员工中，84.3%都是要求厂方补缴社保的工人。我们认为厂方涉嫌对这部分工人进行打击报复。公司将这批工人放假，赶出厂门，引起了工人们的极大不满，造成工人情绪激动。我们认为公司这样做等于是把本应该在公司内部解决的问题，推向了社会。很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公司这种行为是对工人、社会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向各部门说明以上情况，并提出如下诉求，希望得到支持。

1. 要求 HB 公司对已提出社保补缴申请的员工自入职之日起到 2010 年 8 月期间的社会养老保险进行补缴。

2. 在厂方没有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的情况下，工人不允许公司单方面做出长期放假安排。在厂方和工人协商出具体的放假方案以前，已放假的工人要求复工。

如果工人的诉求无法得到及时的回应和恰当的处理，我们不排除会采取其他方式解决。

2011 年 11 月 21 日

HB 公司工人代表：



大事记

2010 年

7 月，起版部的部分工人集体签名向厂方提出购买社保的要求。

8 月，公司公告，同意为自愿申请购买社保的员工购买社保。

12 月，起版部 7 名工人被厂方以合同到期为由辞退，仅获部分补偿金。工人们找当地劳工机构咨询，决定起诉，追讨补偿金并要求厂方补缴入职以来欠缴的社保。判决结果只支持了补偿金部分。

2011 年

5 月 25 日，受 7 人诉讼事件的影响，该厂 38 名工人向公司提出了《工人的书面要求》，要求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年休假和高温津贴，并要求拿回劳动合同副本。

6月，陆续又有79名工人向公司提出《工人的书面要求》。公司态度强硬：工人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社保问题；年休假、高温津贴是公司福利，并非法律强制规定；劳动合同副本可以发还工人。

6月23日，128名工人向省工会、市工会、区工会提出书面的《工人请求书》。工会接到诉求几天后到公司调查。

6月27日，工人选出13位工人代表，集资13000元用于维权。

7月4日，镇工会组织工人代表座谈，无果。

7月13日，镇工会又一次举行座谈，答应帮助工人要回合同。支持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补足年假。不支持工人高温津贴的要求。有关追缴社保的问题，建议工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7月26日，131位工人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了《劳动监察投诉书》。

7月29日，镶石部某员工辞工时要求补回带薪年假遭拒。十多位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直接找老板协商年休假问题。公司于一周内贴出通知，公布了十年以上工龄员工享受年休假的具体方案。

8月15日，5位工人代表先后到区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劳动局就补缴社保的问题上访。

9月7日，工人拿到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书面回复。公司称将在10月前按《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为相关员工补缴。

10月13日，135名工人一起到公司人事部追问补缴社保的进展。

10月19日，135名工人有2人被公司解雇。工人代表和一些工人找人事部讨说法。

10月20日，上午，公司和135名工人开会，提出分期补缴社保。工人拒绝。下午，一名工人被公司以无货可做为由放假18天。工人集体写了声明书，要求公司不得无故放假，遭人事部回绝。

10月28日，工人代表再一次向厂方提出社保、放假问题的相关要求，人事部拒绝签字。

11月1日，镇政府约一位工人代表去谈话，在工人的坚持下，

最后有 3 人一起去谈话，但无结果。

11 月 3 日，第二批追缴社保的工人到社保局立案。

11 月 4 日，一位工作了 11 年的追缴社保工人被工厂辞退，离职时，公司只支付了 2000 元的离职补偿金。

11 月 7 日，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公司、工人代表三方会谈，无果。工人决定不再和政府部门进行无效果的谈话。

11 月 11 日，社保局表示补缴社保要按程序走，让工人们继续等待，并且第一、二批的要一并进行，时间会比预期的更长。

11 月 14 日，厂内下班前共有 89 名员工收到放假通知书，其中绝大多数为追缴社保的工人。工人们滞留在公司大堂向厂方讨说法。厂方报警。劳动局主任出面调停，偏袒厂方，无果。工人多次拨打各媒体爆料电话，无人回应。

11 月 15 日，被放假的工人到区政府上访。16 日，区政府派人到镇政府和工人代表、厂方就放假问题进行协商。另外一批工人代表赴社保局询问进展。公司提出从 2004 年开始补缴社保。工人拒绝。

11 月 21 日，工人向省、市、区、镇工会和劳动部门发送了《关于 HB 公司 2011 年 11 月 17 日〈放假通知〉的异议书》。机构联系了媒体进行报道。

11 月 28 日，135 名工人又到区信访办申诉，后返回镇政府的信访维稳中心。最后厂方口头答应工人最早从 1998 年 7 月补缴，要求工人 30 号下午两点半到厂方拿补缴通知书。

11 月 30 日，下午两点半，工人们到达公司拿通知，发现被骗，厂方最早只从 2004 年补起。工人全体拒绝签字。

12 月 5 日，工人们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区政法委书记出面承诺解决工人问题，将工人劝返。

12 月 9 日，厂里同意给 141 位（包括 2010 年 12 月被解雇的）工人补缴从入职之月起的社保，但要求工人必须在 3 天内将个人缴纳部分交给厂里。工人力争后改为 30 号前。放假问题仍未解决。

2012 年

2 月，原本承诺春节前解决的社保问题一直拖延到年后，地税和社保局相互推诿，地税又回复说 2004 年之后 HY 公司注销，改名叫 HB，社保只能从 2004 年补起。工人重又搜集证据。

4 月 1 日，工人按照社保局的要求于 3 月 27 号将补充材料交给厂里，但厂方一直没有上交给地税。

4 月 2 日，一百多名工人要求厂方给出补缴社保的具体日期，否则不离开工厂，接下来和人事部经理在办公楼僵持了两天一夜。

4 月 3 日，下午 5 点，厂方终于答应做出正式的书面回复。但是在工厂名称问题上，双方发生争执。人事部经理和保安出手打人，工人报警。两位工人代表却以“非法禁锢”的罪名被拘留。

4 月 25 日，除个别工人，第一批工人的社保已经补齐。

4 月 28 日，在工人们的争取下，两位代表办理取保候审后释放。随后，第二批，第三批追缴社保的工人也陆续补齐。



工人代表及工人访谈

通过和 HB 工人代表以及普通参与者的访谈，可以了解他们抗争过程中很多细节，个人情绪的发展变化。

“首席代表” MJ（起版部）

MJ 印象

MJ 是 PY 本地人。在一般人印象里，这些本地人靠村里的地租分红、出租屋租金就能过得很宽裕。事实并非全部如此。他所在的村子 C 村人口和邻村差不多，但是土地要少很多。MJ 家兄弟 4 人，算上父母一共才有一亩多点地，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宅基地，结婚后一直住在丈母娘家。而邻村一个人平均有一亩多。C 村到现在只有一些零散的机械厂，工厂规模远远比不上邻村。每年 C 村村民出租地皮的分红每人两三千块，而邻村 2000 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一万多，到 2011 年每个月发到 1350 元。当时 PY 工人的最低工资每月只有 1100 元。

MJ 原本性格比较内向，每天两点一线上班下班，和朋友熟人说话还多一些，和陌生人在一起时比较腼腆很少说话。自认为口才不好，很多东西能理解，但是讲不出来。如果不是这次维权，他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还有做“首席代表”的能力。做代表、当众演讲一类

的，这在追社保之前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MJ 虽然不属于能说会道、叱咤风云型的代表，但却是善于思考、很有韧性、能够坚持到底的人。这也是 HB 工人代表的总体特征。所以工人们每次重大决定，并不是某个人拍板，而是经过大家比较充分的讨论。

MJ 刚开始时并不是最积极追缴社保的工人，是在起版部其他几位工人带动下才参与到追缴社保的行列中。MJ 发生转变是在 2011 年 7 月，劳工机构召集工人去香港参加一个有关集体协商的研讨会。当时其他工人要么没有港澳通行证，要么不敢去。他有通行证。劳工机构说食宿全包。出于一点贪小便宜的心理，他想那就去吧，权当是旅游了。这次会议让他开了眼界，见了很多教授、专家、外国人，还第一次参观大学。至于会议具体内容 MJ 已经不记得了，只是留下一个感受——会议上教授、学者还有国外的工会干部讲集体谈判的技巧和经验等等，给了他一种信心和力量。让他感到还有很多人在关注、支持工人的这些事情。而且那些教授、专家听了他们厂工人正在追缴社保的事情以后，都一致认为他们能够成功。因为，一是他们 100 多人一起争取社保，人多；二是都是合法的要求。这些说法也给了他信心。所以，当工人们准备选出工人代表来和厂方谈判的时候，他靠着从香港会议带回的信心和勇气，站出来当了首席代表。回忆当时的精神状态时，MJ 笑着说：“那会我们很信机构。有政府的人和我们说机构有问题啊，那个主任有问题的，我们都不信。因为他们一分钱没要我们，还帮我们。我们在那里学法律，和其他有经验的人学，怎样和政府打交道，怎样和他们说话……从香港开会回来的那个时候要我去哪里做什么，都有胆去做，什么都不怕。”

但专家教授名头再大、鼓励再多，要面对维权过程中的各种琐事、压力的，还是工人代表自己：要持续不断地在工人间进行宣传；遇到问题要及时开会商量；大家的材料要收集；要请假向各级政府部门递交材料，并不断地催促；还要参加机构的文娱活动。这些都

要牺牲大量个人的时间。除了机构人员的一些零星建议以外，怎么做组织工作都要代表们自己去摸索。做工人代表的烦恼是 MJ 和其他很多代表始料未及的。

在和 MJ 接触的几年内，访谈过很多次，访谈的内容也见证了他做首席代表时、被抓前、释放后，再到后来回归正常生活的思想历程。这些经历，使他比一般参与的工人得到更多的历练，也因为他较为沉稳、谨慎的性格和喜欢思考问题的习惯，使他获得比普通参与者更多的收获。

打工经历

我是 PY 本地人，1991 年 15 岁的时候开始打工。那时 PY 的工业刚开始发展，有电子厂，制衣厂，还可以做建筑工。也有人去做生意。

那时工厂的福利待遇都差不多。我没有特别想进的厂，别人帮我介绍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先在建筑工地做了几个月泥水工，工资一天 10 块，一个月 300 块，不多也不少。那时一顿饭花三四块钱已经吃得很好了。

第一家首饰厂的工作， 本地人的工作态度

后来亲戚介绍我进了一家做黄金的首饰厂，100 多人，当时算是蛮大的厂了，也是我进的第一家厂。当时进厂挺容易的，很



多人借别人的身份证进厂，或者弄一个假的身份证，把年龄改大了进去。我记得我进厂的时候没有收押金。每月底薪 200，加班费 1.5 元一小时，岗位是执模。

我们厂淡旺季分得不是很明显，一般都会加班，有时候一个月加班 30 多个小时，有时候 100 多个小时。一年最多有 3 个月不加班。一般没货做的时候会放假。

我在这家厂做了 3 年，后来觉得管理太严格，就转行和同学去做装修。

装修是做铝合金门窗，一个月三四百块，跟在首饰厂工资差不多。做了 1 年，觉得辛苦，没兴趣了，就不干了。

那时候都是休息一年半载再找别的工作，年轻人都是这样嘛。

1995 年，我进了另一家首饰厂。因为是熟手，一个月工资有 600 多了，这叫鱼不过塘不肥嘛。那时我听说我进的第一家首饰厂已经倒闭了，因为管理太差，工厂里很多人偷它的金子。

90 年代初首饰行业刚起步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值钱。我们刚进厂的时候，还拿那些金货扔来扔去。后来都知道金子值钱了，而且工厂外边也有人开始收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想办法偷。够胆偷的可以蛮快发财。我没有去偷，没胆。

现在很多厂都有安检，但是公司再怎么查，也有人想办法偷出去。难道要脱光衣服查吗？

1991 年我进厂打工的时候，PY 打工的有 3 成是本地人，7 成是外地人。

1995 年以后，经济发展了。很多人是做一年歇一年，我 20 岁以前都是这样过的，对工作态度很随便，有点不顺就会辞职走人，不会担心找不到工作。

现在本地人连一成都没有了，随着那个经济发展，很多本地人就不愿意做事了，有家，可以吃可以睡。

我做了这么久，没存下多少钱来。玩的地方挺多，我没结婚以

前经常去吃宵夜、唱卡拉 OK，每月 600 元很容易就花光了。

PY 这边的治安比起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好了点。犯罪形式不同的。像以前我们出去在舞厅打打闹闹很平常了，现在就没有了。但那个赌博就多了。以前是乱，广东那些现在还不是很发达的地方就是我刚出来的时候 PY 的现象。现在 PY 有钱了，赌钱和吸毒变多了。我了解的情况最多的出来混的那些，就是叫年轻人吸毒，很好赚钱的，还有绑架。不过绑架是对那些有钱的老板来说的。一般对于工人最大的伤害就是赌钱和吸毒。吸毒以前是本地人多，现在本地人少了，外地人多了。

我们 PY 本地人呢，有一部分当老板，有部分是开士多店，有部分比我赚的还少，就是在村里做治安，一个月 2000 块工资。村民有分红，所以钱也够花。分红多少要看家里的地理位置。就像 PY 公安局隔壁的那个村，是这一块发展最早的村，早都城市化了。像我们怎么比呢？像我丈母娘那里，早几年就是和我们村一样，一个人一年分 2000 块，没有什么工业的。有一些路边的铺位出租，还有地租给别人耕，自己不耕。后来旁边大夫山一下子开发了，路搞好了，一下子一年就分 3 万了。有些人十几年前一次就分 5 万 10 万块，所以就看发不发展到你们村了。如果当时是征我们那个村，我们也可以 10 万块一年了。就看找不找的到老板来买地了。还有路，一通路，也可以等着收钱了。很靠运气的。

首饰厂买码的人普遍很多。我很少买。因为我不喜欢赌钱。以前刚刚开始有码的时候，一些人可以把整个月的钱都买码，现在就好像吸烟一样，可能有瘾，但我不会用全部钱来买，就是玩一下，不会像以前那么盲目。因为是本地的，我认识一些坐庄的人，所以我以前在厂里都收过很多次码，打世界杯啊一类的，我抽 10% 的水，但自己也买亏了不少，所以现在也不做了。现在很多人买码，但买的不大。不像以前下 3 千块的单，十来个客户就够了。现在差不多要找 100 多个客户才能凑到 3 千。普遍的都买小了，所以收起来就

麻烦了，我就不做。只要找到客户下单，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庄家接的。所以有些外地人也收码。而且外地的在外面租房，附近住的认识的人多，直接就收码了，我还要回家，就没那么方便收码了。

村里因为征地的纠纷也有，但是搞不起来。听说过很多，村民围路啊，但一下子就有公安去阻止。十年前就有这些事了。大都是因为分得不平均，贪污的，但很少有闹得起来的。我们村也有。但地已经卖出去了，合同搞定了就退不回那个钱，最后大不了就是把那个村长搞进去坐牢。所以这个就搞不起来。不像我们买社保，还有一点作用。

我在看守所的时候，遇到一个干部贪污被抓，他跟我们说自己是冤枉的，他没拿村民的钱，拿了就是王八蛋。他说的很漂亮了，但人家给他钱他不要的吗？卖地的时候，他说的很光明正大的，卖地是4千万，但价格已经被压低了，开发商给他多少钱是人家自愿的。现在选村长，全部人的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选举的时候，都会请吃饭，有些吃得好的要30块一个人。选村长要请，副村长要请，选治安队队长也要请。全部村民至少一个星期不用煮饭的了。说是不吃白不吃，那顿饭难道不知道是谁给的吗？请客的钱是选举的人白花的吗？你去吃那顿饭，还不是你自己请自己的吗？最后出了什么事追究下来，所有那些村长都会说自己冤。其实吃饭的时候村民就该就知道了，——跟你拉票的时候难道你不知道我要贪污的吗？这是行规啊。

执模和起版

我开始是做执模，工资六七百。我没有去做起版，因为要做起版，先要当学徒，工资只有两三百，我不愿意。

执模是把粗糙的首饰打磨光滑。起版是按照图纸做出样品。

执模学一个月就可以出师。起版做一年才可以通一点点，要做得精最少 3 年，什么都会做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打个比方，看到一个首饰的样子就能做出来，没有 5 年的经验是不可能的。

对于起版来说，执模就像是小学生水平。

首饰行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生手不管进那个部门，每月都是 200 块的工资。刚进厂的时候执模的工资比起版还好一点，因为有打磨下来的金可以赚。而起版是用银来做，只能挣死工资。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工资差别就看出来了。

2000 年以后，执模工资 1000 多，起版就已经有 3000 多了。起版是真正的技术活，那时做起版的人少，所以工资涨得很快，很多人都转去做起版了。有时金价不好，执模就赚得更少了。

我也从 2000 年开始慢慢转去做起版的，到现在做了 10 年了。那时有些首饰的某个部位需要我先用起版的方式做出样板才行，这样我就从执模转去做起版的。但现在起版工资就不行了，做的人太多了。

执模工人的工资差别很大，因为有的可以赚到金，有的赚不到。起版工人的工资就差不了多少。

2000 年的时候首饰厂计件工资不多，后来首饰厂越来越多，才开始有计件工资。收押金也是首饰行业发展几年之后才开始的。开始的时候离职都会退押金，后来也有不退押金的情况。

HB 厂

HB 厂的工人很稳定，没人离职，很少招人。后来因为有两个工人离职了，经朋友介绍我才进厂的。一般好的工厂，很少有工人离职。

当时，HB 厂的工资待遇在首饰行业里算是中上等的。与别的厂

相比，所有部门都是中上等的。所以，虽然 HB 离我家有些远，我还是去了。

还有比 HB 厂更好的厂，要有关系才能进去，比如元艺厂。以前，我们这里的首饰行业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没有技术，没有能力拿到 3500 的工资，就不要想进元艺。

我以前一直想进元艺，但是不敢进，怕通不过面试。元艺招人要求技术要很好才行。



现在元艺厂的工资待遇比我们厂还低。因为现在很多技术工作可以用电脑来做，不需要工人的技术了，工人的工资就降低了。比如，起版的工作，现在用电脑做，叫做制版。元艺厂，现在找 2500 的工作，随便进，要想在元艺找超过 3000 的工作，就要靠朋友和运气。

我老婆在首饰厂里是做镶石的。工厂在大罗塘那边，不大不小的厂，一百多人。工资有 2300 到 2400。他们收入最好的时候是在 1997、98 年。我老婆刚刚学镶石，她不加班工资就三千多，都不用怎么做事。镶石最多的就是计件的。现在就不行了，这个很怪的，那个工资很好，就很多人去做，工资就下来了。还有技术难度也下来了。以前手镶，后来蜡镶。很多部门都是这样的了。首饰行业式微了。

亲历首饰行业的发展变迁

最早就是元艺 HY 莱利东宝那几个厂，原来新大新那里都是首饰厂，1991 年的工厂可能不到 50 个，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了，应该

很多了。以前一百人的厂发展到现在可能有一千多人了。2000 年工厂开始明显多了。有些厂是做大了以后，把部门分开，分成一间间独立的小厂；有一些厂是两三个老板合起来开，发展起来后，又各自分家；也有一些是原来厂里香港的师傅、管理人员拿到订单自己出去单干了。我知道的有很多小厂，十几个、一百人以下的，老板都是以前做组长、师傅、主管起来的。没多少家人数特别多的大厂。

个人开厂的话，需要和上面的人打交道，要认识客户，要会说话会做事。这些对于像我们普通打工的人，脾气比较直的人就难一点了，没那个资本，也不认识那么多人。平时想的是怎么把工作做好，升高一点的工资。

到现在首饰加工发展得饱和了。有些小厂被别人抢了客户倒闭了。因为他们就只是靠一两个大客户来维持。客户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收钱更少的厂，就不给他做了。开小厂的老板认识的大客户不多，有一个大客户就出来搏一下，所以死得也快。我第一次进的工厂是例外，是因为管理得太乱被偷倒闭的。

一开始有首饰行业，就有珠宝行业协会了。那里面的领导就是开始那些首饰厂做大了以后的老板。

我做过的厂，产品有一些是做美国的订单，也有做欧洲、日本的。大都是香港老板，台湾、日本很少。如果是日本、台湾的厂也都会与香港那边有点关系。

刚开始厂里全部师傅都是香港的。后来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学会了，工厂就开始用大陆人。有的香港师傅被淘汰，有的香港师傅出来开厂。以前认识的师傅有一半后来都做了老板开了厂。

全部香港人都讲粗口，是他们习惯那样说话，不是针对大陆人，只是看你做的产品好不好，做得不好就骂。他们地位高一点是肯定的，毕竟技术高。有个别态度极端的，看不起大陆人。我没有遇到过每说一句就你们大陆人怎么样的那种。

我是 2004 年进 HB。HB 厂里老板的同乡是我见过的厂里最多

的，没见过它这样的厂。其他厂老板在自己厂里可能有个表弟啊，一个两个亲戚啊，在里面照顾一下。

首饰厂开始招人的时候，打个比方，广西一个什么镇，当地政府和这边联系好，学生毕业的时候整车拉过来，在这里干起来，做熟了，再回乡下找人来做熟。还有一些人做到管理，然后介绍家乡的人，可能半个厂的工人都是他介绍的。做管理的，都希望自己的人多一点，在厂里站得住脚，好管理一些。经常会形成哪个部门是广东派，哪个是广西派，哪个是潮州的，哪个是四惠的。

我进厂很多都是靠人介绍。每个厂福利待遇不一样。遇到好的就有年终奖。年尾可以吃饭，有些就没有。有些厂是计件的，有些是不计件的。这些规矩进厂的时候就知道了，能接受就没问题了。他是计件的还是按月的都会说清楚。有没有年终奖都会说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的工资合不合理。我就是看他给我多少，然后我自己再决定去不去。打个比方，这个厂没有年终奖，但是每个月比别的厂多两百工资，那就等于是年终奖了嘛。或者没有伙食费，但是比别的厂每个月多一百块工资，也相当于伙食费了。这个账是自己算的。自己要多少心里有个底。很多都是介绍的，都知道里面的待遇。好比我知道没有年终奖，我就写 3500，他同意就来不同意就算。他有年终奖的我就写 3300。HY 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厂。我是算过的，把上下班车费算进去，我在那里可以拿 3000，在市桥这边只能有 2500，我就还是过去 HY 做了。

以前很少听说过什么罢工。我感觉大家对这些知道的少。要让大家都知道的罢工，也要有一定规模吧。我听说过的维权，有一个两个，像三和首饰厂把人事经理杀了的那个，都是个案了。大规模的人数多的都是这几年才有的了。金融风暴之前，人的意识都没那么高。拿什么维权呢，劳动合同法都没有出。以前也就听说 2009 年旧水坑卡西欧罢工，还是听我们厂在旧水坑那的一个本地人说的，这类事情很少听到的了。

我就跟我们部门的人打麻将，去吃饭什么的。以前有人让我做组长，但是（我）不想做。我不熟悉，又觉得组长是不同的，是管理那一块的了，夹在中间被上面还有下面的人骂，我的态度就是不如还做员工不被别人骂。我又不是那么凶，也怕管不来。我的心态就是不想上，就是不够胆吧。在每一家厂的心态，我做的事情就是不比人差，也不用比别人好很多，都是不上不下就行。

我没进过管理很严格的厂。我自己有挑拣。因为严的福利都不太好。我进社保之前，有个朋友在元艺，要介绍我进去，那里比我们工资低很多，但是严很多，不让带手机。我就避免进那些厂了。

90年代开始我们车间就有空调，一直以来都有，每间厂都是有空调的。这和工种有关系。金粉是钱，吹风扇的话会把金粉吹走，我要收集那些粉才有的赚。就算是一个人走过那个风就把我的钱带走了啊。

现在工人做事的方法都不同呢。以前就是随便搞出来，还拿检出来的产品你扔我我扔你闹着玩。现在就不同了，先把那个湿布放里面，做完一个就把手擦干了再去做别的。现在每人一台抽风机，里面有条布沾着油，把那个金粉沾上去。这样金耗就低了。以前我们就懒得理，搞快一点就行了。现在不仅要快还要细。要赚得多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加工首饰的技术改进了很多。刚开始起版全是手做，给一些图，给一些银，自己打出来。后来改进了，先用蜡雕出来。现在就是电脑起版了。还有镶石，以前都是很死板的用钳，现在变化很多的，什么围镶啊无边镶的，以前都没有的，只是爪镶。蜡镶也比以前快很多，但是质量越来越差，越来越快。执模的工具上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不比电子厂，我们手工很多，就是方法改进一点。

现在工人之间的关系呢，感觉是有一点不如以前的亲密。这个可能关系到社会的问题了，可能以前刚出来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容易交朋友。现在的人精一些，交心的比较少。也不只是首饰行业工

人的问题，我觉得是社会在变的问题。另外，岁数大了，结婚以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交流也没那么深的。我们一起做的同事，都说遇到什么问题了说一说，但是给什么实际的帮助就是没有的嘛。你打个电话给认识的人帮介绍工作，这个是有的。但是有什么困难要借钱，除非是老乡或者很熟的人，工友之间就没有帮的了。

访谈时间：2011 年 11 月

访谈背景：在 MJ 和其他工人被厂方全部放假后，MJ 和其他各位代表找各种途径想办法应对。我们在参加完机构组织的会议后，讨论改组工会的可能性，以及中秋活动风波。

改组工会

问：你们有没有想过补缴社保之后怎么办？

MJ：做完这件事肯定会被炒鱿鱼了，也要找一个退路，但是下一步做什么还不知道。

问：如果要不想被炒鱿鱼的话，把厂里现在的工会变成工人自己的，通过工会继续在厂里坚持，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MJ：这个我也有想过，但这是很长远的事情了。比如说追完社保，这个厂会不会倒闭？因为老板已经在外地建厂了。如果工会搞成了，这个厂关了，有多大意义呢？如果只是一个很小的厂里，建一个工会又有什么作用呢？都是很难说的哦……

而且从香港开会回来我就提议改组工会。他们（教授专家）也说改组工会能有很大帮助，就可以用工会名义来搞，不用什么工人代表，但我提了这个意见，大家没人支持。

问：其他人没这个想法？

MJ：是呀。我在香港听到的那些话感觉有道理，但是做起来就不同了。像我跟其他人说建立工会，他们感到工会这个事好像很遥远的，没有兴趣做，他们也就忘记了。这样的话我又能怎么做哪？没有其他人响应，整天提议也没有用。

大家就看工会对我有没有利益。看起来没利益嘛，那改组工会谁来做？追社保，我们不是有代表了吗？再搞工会，有什么用？比如我们现在搞职业病、加班费，这些对大家还算有实际利益的事情，都有人不想搞。搞工会没有直接利益，当然更没人同意。

这样说吧。我都跟大家说了，如果要改组工会，我有那个气概站出来说，你们去追社保，我申请改组工会，来做工会主席。我就有这个工会主席的名义跟机构学习，我会更有动力。但其他人没有什么响应的。我知道现在以首席代表的名义做事是有风险的，像那个时候厂里说，抓就抓你们带头搞事的。但是工会改组之后呢，我是工会主席，我为工人做事天经地义，你抓我干什么？没有理由抓我。这就是很实际的东西了嘛。我从香港回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了，但是他们不明白。

还有，那会我们第一次和区政府谈，我们提改组工会的事情。区工会的人说：“你改组工会干什么？现在你们厂有工会。你知不知道要交会费的？厂里现在没收你们的会费，都是老板给的。老板的人做工会主席那不是很正常的？”那时候他们其他代表就愣在那里了，这才知道，改组工会要钱的，那就更没动力改组了嘛。

那个区工会主席就说要交会费的，他不说改组要怎么办，他只说你们愿不愿意掏那笔钱，是工资的百分之几的。这样就间接告诉你你要改组工会，你的工资就低了。但是工会，说真的，工会有什么意义呢？工人不知道，改组它干什么？而且改组还要钱。现在不是有工会了吗，但是工会帮我做什么了呢？改组了就一定有用吗？我交钱可以帮到我，我就搞，但要是交钱都不能帮到我，我不是自找

麻烦了？所以这个心态我们也搞不成了。我那个时候都提到了，但那个时候他们就说要花钱什么的，我就不敢再提改组工会了。

中秋活动风波

问：听说你们要做活动被镇政府的人威胁了？

MJ：那会我们让 Y（劳工机构职员）帮我们申请中秋节在镇广场搞联欢活动的事，一直没有批下来。有一个工友的房东在镇政府里做事，那个房东给他们出主意说，让他们给镇长发短信问这个事。HJ 发了短信，大意说“我是某某厂工人，我们某某时间想在广场搞联欢，为什么不给我们审批？”结果镇长怪罪下来，负责这件事的人就找到了 HJ 他们，说：“你们不要乱发短信。怎么能说我们不批呢？我没有说不批你，活动要经过很多部门审批，文化部门、维稳办……你们这样说我就是诬告。”后来，又安抚他们说：“我们大家是老乡，这件事就算了，我不想搞那么多东西，希望你们也不要搞。但是以后你们以后做事呢小心一点，不要搞那么大的动作。你们怎么争取社保我是支持的，但是不要太过激。”



问：HJ 那边是不是压力很大？

答：我们也没感觉到压力，是和她谈话了，但也没有调查到公司里去啊。那个负责人问她什么工作。他说你们不要搞那么多事。镇政府里的那个谁跟你们很熟的，替你们求情，也不知道是真话假话。

问：除了你和 HJ，还有几个代

表是本地的？

答：还有几个是 LH 镇的。其实我们代表真的做事的，没多少个。很多人的身份是在代表和联络员之间。他们是代表的身份，却只做了联络员的事。联络大家他们是会做，但是实际行动呢就不行了。没有真正起到代表的作用。

访谈时间：2012 年 3 月

访谈背景：HB 工人在 2011 年 11 月份去 GZ 市政府上访后，PY 区领导出面承诺将会负责他们社保补缴。工人在 2011 年 12 月底陆续上交了相关证明和费用，但公司方的费用却一直没有上交。MJ 谈了从行动开始到现在遇到的诸多问题。

追缴社保的起源

问：最早是怎样发起追社保这个事情的呢？

MJ：我从头跟你说。大概是在 2009 年，我们起版部有一个主管，好像是海关的人介绍过来的，有一些背景。他不用做什么事，拿好几千块一个月的工资。他做了四五年，后来金融风暴的时候，公司把他炒掉。那人请了律师告公司，拿回来十万左右。我觉得这个就是导火线了。后来呢，他一个表弟，也是我们部门的，讲他怎么怎么厉害，让公司赔了钱，里面包括社保的钱（公司欠缴的社保，折算成现金赔付给他）。我们一听，哎呀，社保还有的赔？我们到现在都没社保，这不是太亏了吗？我们就气恼啊，就这样在我们部门搞了个集体签名，去找人事部买社保。那时人事部也不愿意买，还

吵了一架，但公司应该也知道不买不行了。后来发了个全厂公告，说谁愿意买就给买。

那时候刚刚是八月份。我们每年八月份涨工资。公司让我们自己选买或者不买社保，不买工资就涨 100 元，买就涨 20 或 30 元。所以我们要买社保的人涨的工资就变少了。后来到年底那个经济一直不好，订单没有那么多，公司就裁减起版部的人，让师傅挑出那些做不出要求产量的那些人，炒掉。被炒掉的几个大都不是带头要社保的。所以在我看来不是针对社保带头的人。其实带头的 HJ 呀，SY 呀，他们都没炒。

后来，被炒掉的那些人里面有人通过老乡认识 H 哥，又听说有个什么机构，说如果被炒掉了不合理，可以要赔偿。就有几个人去机构问，又发觉不止追社保，还可以要年终奖什么的。再后来被炒掉的几个人的仲裁书下来了，我们看到上面还写以前的社保要怎么处理。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要求买社保成功了，有些勇气了，我们就立刻像上次一样整个部门都签了名，签了名就给到人事部。但是呢，工厂没有理会我们，意思就没当我们什么。后来呢，我们问了劳工机构，教我们联络更多一点工友才可以啊，我们就回去跟别的部门的人说。当时其他部门其实也有炒人的，但那些人没有去追呀。

问：其他部门的人知道七人仲裁书这个事情吗？

MJ：他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部门的人有联络才知道的嘛。就像那炒了的那个主管，他表弟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啦。原来都是我们一个部门签下去，仲裁啦，也没有组织别的部门一起来搞啊。后来呢，大家感觉厂方没有什么动静，我们成不了威胁，后来就发起多一点人，就 100 多人啦。

问：你们是怎么联系到其他部门人的？

MJ：打个比方，我是你表哥，你是我表姐，或者老乡呀，同学

什么的，进厂你分配到这个部门，我分配到那个这样的，彼此之间有联系。

问：从你们一个部门到其他部门都知道，用了多久？

MJ：2010 年 8 月份我们要求买社保，11、12 月的时候就炒掉我们起版部的人。差不多 2011 年 4、5 月，被炒的几个人收到了仲裁书，我们 5 月份就要厂方补我们的社保。拉锯了两个月，到 7 月份左右了，我们就又联络了 100 多个人这样子。

有关代表选举

MJ：那时候也不说什么代表，起码每个部门就要有一个联络员，做了联络员，就算是代表了。我们的代表都是从联络员（做起）。宣传社保的事情，还有就是从劳工机构那里知道的事情，转告给本部门的同事们去说一下。

问：开始选代表是劳工机构建议的还是工人自己觉得应该选呀？

MJ：其实那时是因为工厂有一系列动作，要把我们两个员工炒掉呀，开始准备放假呀。我们看见厂方可能要行动了，那时自己也明白应该要选代表了。毕竟我们几十，一百多人，没有代表的话就很难做，很难搞下去。那时候劳工机构建议把我们的代表名单（公布出来）。之前谁是代表，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只是没有说出来。劳工机构讲，我们代表表明身份以后，如果工厂对我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就不能像对待普通员工那样，法律上会给代表一个保障。我们去政府或者工厂谈，亮明我们代表的身份，谈的时候也可以也知道是哪几个，也好说一点。以前工厂只知道这十几个人比较踊跃，比较难弄，但是不知道到底该跟谁说。后来我们去政府那边信访什么

的，政府要求我们五个人进去谈，我们就意识到明确哪几个人是代表会更好一点。

问：首席工人代表，跟其他工人代表有什么区别？

MJ：其实这个工人首席代表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是感觉到选出来一个比较有号召力的人吧。首席代表这一类的称呼都是劳工机构那边帮我们起草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勇敢，尽最大力量去做事，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看我最勇敢，就让我填到首席代表里，我就填一下而已。

我原本都不是代表，就是后来呢，劳工机构服务部那边说要去香港，参加学习呀什么的。那时候我去了，去了以后，看见那么多人帮助，那些律师呀工会的人呀，学习那个经验什么的，那时感觉了解到了很多东西，打起了我的勇气。

去了香港，其实只是一个引子而已，也不是马上得到了什么。主要是回来的时候学的多。像H哥他们就是给我们讲解怎么样做，说话大声一点，策略什么的。

问：你们厂第一批的128个工人都去过劳工机构吗？

MJ：没有，一直都是代表、联络员那十几个人经常过去机构。其实很大部份人都是在等待，认为他们签了名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想法。

问：代表里有没有班组长之类的管理？

MJ：没有。只有一个联络员是组长，让他亮明代表身份时他就不亮明。后来他被厂里撤职了，所以后来一些组长只敢签名不敢出面了。



做代表受到的威胁

MJ: 其实出面跟不出面，还是有一点分别的。你只是签个名，没做多少事，也没那么显眼。你出面了，厂里就知道谁在搞小动作。

像我，怎么说呢，过年的时候，工厂叫了我们村黑道上的一个人，那人也是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次，叫我不要搞了一类的话。其实我的那个同学也不是说有多大能力，他背后的那个人才是个头目。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带头做点什么，还是不做。如果我不继续带头呢，他们也不会对我做什么。如果再带头呢，就有一点可能会搞我。

其实我是外地人还好，不怕事嘛，如果有什么麻烦我离开这里就行了。但我家人都在这……其实现在我也不敢跟工友们说。如果说了，做得不那么积极了，就怕他们会说我怕了。但是如果我做下去呢，我也了解过现在黑社会（的运作）。黑老大是本地的，下面养一些外地的打手。黑老大跟几个老板，给他们当保镖。老板给他 50 万，让他搞定什么人，他就给 10 万给那些外地的打手搞，打手做完事走掉就行。本地的那个黑老大没事，雇凶的老板也没事。我就怕这个。

问：之前黑社会做什么？

MJ: 以前的黑社会呢，就是开一个赌场，开一个舞厅，吸毒，喝酒，还有赌钱，在里面赚钱、打架也最多。现在就没有那些吸毒的，吃摇头丸的了。

问：其他本地工人有没有遇到威胁？

MJ: 没有听说。我感觉因为我是总代表嘛。

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不做代表了，第二批可能就难一点了，因为第二批的人那些人还没有选出代表，还没组成一层一层的那个架

构，还没有那种团结力。他们都是直接打电话问我，怎么搞啊，怎么还没有动静呀，什么什么的。所以呢，现在，我就着急，感觉到第二批的人还不算团结。看上去就好像他们就是看着我，只要我勇敢一点，他们跟着冲。如果我不带头呢，他们就不敢冲了。我就怕这个。

第一批的人思想就比较积极一点，因为其他代表知道的也蛮多的，就算我下来不做代表了，如果按正常程序的话，他们应该也可以做得到。但我也看到，他们也不想搞那么多事情了。现在好像是被逼着干代表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做了代表呀，就有那个责任感。好像劳工机构有什么要大家去商量的，就算你有事也要去一趟，尽那个职责。如果你是代表，每次都不到场的话，说不过去，对不起那个责任。但如果没做代表什么的，有那个时间就可以去，没那个时间就可以推掉，但是既然做了代表，就尽力把第一批的完成，但是可能就不管第二批那么多了。

看见他第二批的人还像一盘散沙一样，如果要我带起来也是很费力的。

问：第二批人一盘散沙表现在哪里呀？

MJ：要叫他们做代表呀，要多做一点事，这个可能就难，他们的心就难催一点了，就像我们去走这个部门走那个部门投诉那样，他们就很不愿意，就有很多人说不想去，不知道怎么和政府的人说话一类的。

问：你开始做代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以后会被威胁呀？

MJ：有。其实很早以前呢，H哥、劳工机构那些人也说了，厂里可能会运用政府呀，或者什么势力来搞我们，但那时没经历过这些。我一来机构学习，就是跟他们去开会呀什么的。我那时候兴奋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

我去了香港，有些人说我就好像是被传销洗了脑那样（笑）。其

实有一点，我想了想，我那时听到他们说，我们做这些是维护自己权益呀，还有什么什么的法律规定，就勇敢很多。可是后来呢，我那个黑道的同学他最开始不是直接找我，而是找我兄弟呀什么的。他跟我兄弟说：你的这个弟弟，现在出事了，得罪了一个老板，下了江湖格杀令了什么的。就说这些，弄得我全部家人都知道了。我哥哥听了以后打电话给我，叫我跟那个黑道同学联络。我去谈了，我也讲明了我的态度。但是我的哥哥呀还有我的什么人呀，关心我的事情，他们就劝我不要搞了。他们的意思就好像我去劳工机构，是上了传销的课。他们不了解我的情况呀什么的，就知道我得罪了人。这样说吧，如果那些麻烦只是我个人的，我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我继续下去，我的亲人呀也劝我。这边让我进，那边让我退，两边声音一起来我就很烦了嘛。

问：你怎么回复那个黑道同学的？

MJ：老板跟他说，你们那边的那个人很麻烦了，意思要搞我啊什么的。他也跟我说：你好好的一个本地人，为什么这样搞呢？我也知道你是在厂里打工的，不是出来混的，也没有在黑道上去搞什么麻烦。我就跟他说了：事情是厂里的搞得，是厂里不合法啊，还有就是他的管理问题，他没有把我们社保的事放在眼里，我们才会做这个事。我跟他说：就是我不做代表了，搞定我，也有人上来。还有我们的工资那么低，我们怎么吃饭呢？我就跟他说这些了。他说他去跟老板聊，后来就没找我了。现在我就不怕了，但是又不知道还带不带头，如果带头了，说不定又找我了。

那天我也跟H说了这件事。他也是说，我们不是去搞什么事去威胁谁，我们只是要回我们自己的东西，老板是违法的一类的。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如果没有了我，我们的追社保呀什么的，还可以达到，只是时间可能比较长了。因为我现在做总代表的话，我感觉我说的很多话，工人都听得进去，如果别的人说就不一定。我看到这个现象了，就看到我的作用比较大了。就好像去区政府开

始，我亮明了总代表，别的工人看见我签了名，做总代表，就看着你怎么做。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怕，说真的，就像迷了魂了，什么也不怕。我也带头去区政府，市政府什么的，每次谈判我也去。就好像搞革命，我站在那里喊话呀，通报什么事情下去。就好像以前搞革命站在台中间，你站过几次了，他们就知道谁重要了嘛，就看着我的头了，另外的人站上去就不同了。

去市政府以前，我们在 LH 镇那边的球场号召人，先开一个会说我们明天去。那时候我也在那里讲了我们明天去哪里呀，什么的。我就站在那里，那个名就出来了，那个领导能力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说了，他们就响应了。看见他们响应了，我的心……我就想做更好啊，就这样。大家也支持我，我也更大胆了。我更大胆了，他们就更加信我了。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其实改组工会是很重要的。改组了工会，如果身为工会委员，我发一下言、跟他谈判什么的是正常的，做少很多事情的，我就明白这个道理。现在就好像每一次都是农民起义一样。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就给威胁了。

追社保的这些人，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去过劳工机构服务部，其他都没去过。他们不知道改组工会这个作用的。（劝他们）追社保我们回去都要花费很多口水，改组工会就更难了。职业病我们也了解过，跟他们说，他们也不了解，吊不起他们胃口，别说改组工会了。他们会说改组工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改组工会，真的，对我们做代表有用，对他们，其实，作用大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就算我说服了你，说服不了别人，很难搞。所以我很想他们去学习，去学习了就明白了，这个才可以改变我们工人的那个思想的。就算经过我们这一次追社保，做过代表，如果以后有什么经历，去别的厂有什么维权的，那 200 个人，我想以后如果再被欺负，就算他们知道怎么做，也许还是不敢去追。但是我们这些代表，经过了这些东西，以后打工啊，或者以后出来给人欺负啊，可能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己。所以我感觉到，如果你没有去学习，就算你追过，也好像对你以后没有什么用。

和工厂、政府的交涉

问：厂里那时出了个方案，说从 2004 年补起，是想分化工人吗？其他人有没有担心你的符合条件了，就不做代表了啊？

MJ：我感觉那也不是分化。厂里说 04 年，就是想减轻它的负担。其实那时候，100 多个人，只有 20 多个人符合，代表里就我符合条件。就算我肯，其他人也不肯。怎么说呢，就算我想答应，100 多双眼睛看着你，也不敢答应，做了叛徒了。那天去拿结果的时候，政府那个人知道我符合要求，他说：你就符合了，你的心就定下来了吧。那时候我肯定很开心了。后来回去，其他代表还有一点意见，说我开心也不要表露出来啊。虽然我不能同意这个方案，但是还是会高兴一下子啊。

问：厂里和政府的人都和你谈过吗？

MJ：厂里没有跟我们直接谈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跟厂里谈。厂里刚换了人事部主任时，他暗示我，跟我说可以和他私聊啊，可以和工厂谈。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那时候我的心很红啊，真的，我的心没想过为了自己。

政府的人不正式地跟我们谈过一次。我们后来都不跟政府谈了。因为政府每次谈，都是要我们放弃一点东西的。我们的要求就是全部按照工龄买，政府就是谈 2004 年才买。他只是劝，他不让步，我们也不让步，就不谈。

现在想起来第一次去劳动所和他们谈的时候，觉得很搞笑了。他问：“你们追以前的社保，你们知道是怎么算的吗？按哪个规矩？

哪一条？你们知不知道？”就这样跟我们说。我们当然知道了，我们那时只去学习过一两次，只听劳工机构说可以追以前的。按哪一条啊，怎么算的，哪个部门管，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当时回复他说我们当然知道了，法律规定有的，难道法律不给的吗？我们就是说这几句了，然后他就说：“是，你们是不是看了新闻上，很多人可以追怎么追一类的？我是劳动部门的，我跟你说啊，你看新闻的，你知不知道他们符合什么要求？你们也想追？但要符合条件啊。就算你们符合条件，还要经过地税局啊，社保局啊，一步一步来。不然还要找律师啊，打官司啊。现在社保这方面，我跟你说白了，就算是你告到去 GZ 市政府，现在哪一个部门给钱，哪一个部门管社保，现在政府也才刚刚有人在处理这个事情，具体哪个部门也没定下来。就算你们去闹，这个事情也是被放在一边的，不会处理的。现在法律条文什么的都是刚刚出来，刚刚起草，你们符不符合的还不好说。这个事一时归社保局管，一时归地税局管，上面区政府也不知道是哪里管，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的。前面是政府管的，后来又去税务了，权利文件还没有转交。以前你们那人追了这么久是政府管的，政府要给多少钱，现在是地税了，又给多少钱。这个比例呀什么的，上面还没开会商量。上面的还不知道怎么算这个数。”

问：那你现在怎么理解他说的这些话？

MJ：现在就知道怎么算了。那时候他们也知道我们没了解多少。原来政府跟我们谈，后来又是派出所教导员什么的跟我们谈。派出所的就跟我们说：“你们搞这个社保每次是不是都开什么会啊？你们知不知道这是非法集会啊。还有什么宣传的，你们说的话要负责责任的，如果说错了，你们就麻烦了，我们就不客气了。”吓唬我们。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追社保不合法跟别人说是合法的话，你是带头的，就要负责任，就要抓你的。

问：当时他们这么连哄带骗的，会不会对你们那会行动上有所影

响？

MJ：是。刚听他们这么说的时侯，是有点怕的。有一次我们 3 个人去镇政府谈了。政府的谈完，派出所的人就进来，就留下我一个，跟我私下说：“你是本地的，搞那么多干什么。说好听点是老乡，说不好听，老乡都没有面子给的。我知道是谁帮助你们的，是不是 Z 他们啊。你知不知道他们帮你们有什么目的，知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我现在是跟踪他们的。你想一想，他们为什么那样帮你们，没有目的地帮你们。你想谁会这样做。现在你们搞得好还好，搞不好麻烦的是你们啊。我们是老乡，劝你们一句，你知道他是律师，他明白的，他教唆你们，你们去搞什么了，抓的是抓你们。我们也不好意思抓老乡啊，但是你们这样搞，就算是老乡也没有面给。有一次有个领导还和我们说，占领华尔街什么的，这些都是搞煽动的，是不是有人瞄上我们中国，教唆你们搞事什么的。”

问：那他说完你们当时心里会不会想真的会是这样啊之类的，机构利用你们做不好的事情？

MJ：没有啊，很奇怪啊，很信劳工机构的。那个信任真的好像撞了邪一样。因为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个重要的，他们没要过我们一分钱。还有开会的时候也真的学到了东西，主要讲的都是法律一类的。都是说维权了，也没有别的啊。看到别的个案都是维权了，也没什么，就很信机构了。

问：那你们这些跟镇政府的谈话，有没有和其他工友说过？

MJ：实际的情况没有详细说过，就说他们想吓唬我们，我们不怕。因为感觉也没什么可说。每次去谈都是那几句话，说来说去都是那样。实际谈什么我们难道还每一句都翻译吗。后来 YY 她们就说：他们经常叫我们 3 个人去谈，会不会耍什么花招？会不会中他们的计？每次去谈也没有实际的东西，到时候再让工友说我们被收买了什么的，不如不去。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谈了。其实他们每次都

是谈那几样东西，让我们收手什么的。我们每次都是说不答应，

第一次政府叫我们的时候，我们肯定去的了，因为我们的想法是政府让我们去我们敢不去吗。后来主任说叫你们去你们就去吗，可以不去啊。第二次再叫我们，我们就说不去了，要谈就来厂里谈。然后他强硬一点，就大声一点说，现在你们追社保啊，不是要谈的吗，不谈可以的吗。我们就又去了。后来第三次我们都不想去，他又叫派出所的打电话给我，很严厉地跟我说：“你来不来啊，我们十几个人等着你们三个，我们那么多工作不做，等着你们过来，谈论你们这些事情，你们说不来就不来的吗？有什么事你们负责啊。”这样我们就又去了。机构建议我们：以后没有实际的东西，没有给明确的议题，不管什么领导啊区长啊，要他们给一个公告，有话题的才去。没有实际的东西我们就不去了。要让我们想一下可不可以谈，我们才去。因为每次都是厂里通知我们去谈，我们就跟厂方说了这个意思，后来政府的人就不再叫了。

问：你们每次去和政府谈，有没有厂方的代表？

MJ：没有啊。我们问过，为什么不找厂里一起谈？他就说他们是中间人做协调，今天听我们的，然后再跟厂里说，厂里有什么答复再和我们说。不然，双方坐在一起谈，有不同意见的肯定闹起来



了，那还怎么谈呢？所以开始，我们都没跟厂里谈过的。后来去了区政府以后，才有厂里出席。但是谈来谈去，都是我们一方对他们两方，都是这样。厂里说一句，政府的都帮他们说好话的。

问：跟他们政府的人谈的时候有没有录音？

MJ：以前没有，不敢，后来才有。

劳工机构的作用

问：有个工友说过，要是没有劳工机构，你们早散了。你怎么评价机构的作用？

MJ：这行动是我们的行动。就好像是打仗一样，机构好像是参谋部一样的。很多东西我们想不到的嘛。打个比方，好像我们以前去劳动局，他就让我们去调解啊什么的，就没有下文了。我们向区政府提出的要求，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没有答案，现在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啊，怎么谈啊，我们的底线在哪里。这些都是要咨询他们的，我们不知道的。后来我们去政府之前就先到劳工机构那边开一个会，问一问，我们进去谈判底线是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们，至少要政府给个受理的报告给我们，要写明期限，一个月后或者一个星期后给我们答复。如果回复说正在调查啊，等消息啊什么的，这类回复就不要了，没有用。这样就比你自己去 10 次都好。他们就是给我们出主意。不然没有机构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去找政府，肯定是踢皮球的。

我去了香港以后，每个星期都去劳工机构一次。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很多，学法律啊，学别人去追社保的例子，别人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就选取可行的那套方案。我的作用就是去打仗不怕死，够胆去。机构教会了我们，我们自己去冲。

如果没有去学习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没去听课，那个思想出不来，就不够胆。我激动起来才够胆的。如果我没去过的话，你叫我走在前边我不敢，说真的不够胆。去听了，特别是听到别人是怎么做的，心里就有底。就好像第一次派出所找我们去谈话，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怕的啦，都是一步一步（转变）的。

我第一次去镇政府，也不会说话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说，打结的，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都是一步一步来。第一批人，很多人都

是身经百战的，也可以够胆去要求什么的。但第二批没有这样的人，还没有去打过仗。

像劳工机构这样的，我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对我们工人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去学习。为什么我进步那么大呢？我跟劳工机构去了两次香港，去了一次深圳，见识很多人。如果不出去的话，就看不到那么多东西。我感觉很多工人的意识都上不去。像我去多了，看多了，就好像明白多一点，其实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去劳工机构，也是学习，去香港去深圳就更好，因为那边都是大律师，大学的教授。

问：你是觉得他们说的话更有权威，还是更在理？

MJ：很奇怪，我感觉到他们没什么用。每个都是什么大学的，法学教授啊，什么工会的主席。但是他们说的话好像跟我们没关系（笑）。那些人说的话太高层次了，他们说体制内，体制外。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体制内体制外，我只知道我们工人有什么可以追，有什么不可以追。但他们说的那个学术论文，什么马克思的什么思想啊，还有法国的什么名字的，说的什么话啊。他是谁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他说过什么。他们说的太外了，说的那个是大道理，就好像我们只知道自己的东西。说白了，他们就是不了解基层的东西，我一说我们的事情，他们好像很惊讶的，每个人都问我，你们多少人追，怎么追呀。他们只知道什么国营的，什么养老金的，已经搞得那么好，搞的那么普遍，难道你们都没有？广东人不是很有钱吗？不是先富起来吗？

法学教授，律师什么的。如果说怎么谈判啦，他们也教不了我们。好像断了层。如果我们直接跟劳工机构联络，劳工机构跟那些人联络，这样可能就好。我感觉到他们也帮不了我。他们不知道怎么争取的。还有一个法学教授还跟我说，这个根本是你们政府的无能。我当然知道政府的无能了，问题是我怎么能买到社保啊。

虽然和他们谈不来，但是我知道他们想帮人，但是他们找不到

人。如果自己（指工人）做多一点，做的轰动一点，他们可能就知道了。

但是那个眼界是开阔了，这个是真的。如果我跟劳工机构学多一点，可能就明白怎么跟他们沟通了。有一些人我也知道他是真心的，也想了解我们基层的情况，可能他也找不到人问。就好像他在政府的屋子里，什么统计局啊，别人给他数据，他看那个数据，签一个名而已。就好像一个皇帝没有下过来看过民情一样，总是什么人给奏折他看。那里有一个律师说的一句很好，就是大家一起旅行，如果在沙漠里面，死的最晚的就是那些统计局的人，因为他们水分最多啊。就好像我们下边没有社保的事情，搞到区政府那里抹去一点，到市政府那里再抹去一点，到省长那里，谁知道没有社保吗。

像我去香港呀，我不明白那些法学教授呀，还有什么领导呀在说什么。但知道他们是想帮我们的。我们这样走下去是有人帮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学到什么法律。我们追社保是按照第几条呀，但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年龄呀才可以追，社保呀这个五险一金什么的，哪部法律里有加工资呀，第几条呀这个详细我们真的不去研究，最重要的是那个勇气找回来，所以去学不是学别的东西，就是去打气，看到别人都是怎样做的。

但是很怪的，像我去劳工机构学习，知道法律规定是什么，但就算我回来给别人说几天都没用的，没人听我的。我只要说什么律师，什么人物，说可以追（社保）了，说是合法的，大家就信。

我们信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详细的東西，而是我们觉得他们说的什么是对的，对我们是有用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去听了那个勇气就出来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前为什么那么勇敢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了劳工机构，打官司不要钱，我们怎样都不会亏钱。

之前很多工友包括代表都把劳工机构当成是工会呀、律师事务所来看的，其实很混乱的。那会机构的人也说了很多次他们不是工

会，不是律师，只是一个 NGO 啊什么的。但我们都不知道 ABC 的事，你说 NGO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

就说 H 哥，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敬重他。他知道怎么追呀什么的，敢出头，就这样。我们就佩服他，就相信他啦。在我们的心目中呢，H 哥的地位可能比主任的地位还高一些，因为 H 哥也是珠宝工人，贴近我们嘛。

主任就没有那么敢做。我想，也可能是地位的不同呀，主任他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H 哥就不是呀，他怎么冲也不会连累那么多人。H 哥，他每次都是叫我们勇敢一点，说话狠一点。主任就说相信政府呀。可能主任经历那么多，可能有些顾虑，也说不定。

问：开始时给厂里写要求都是工人自己写的，后来就改成机构的人写了？

MJ：是的。原本我们就我们写的，以前就写我们要买从入职的社保呀，但是如果看到文件里要写年月日呀按照什么法律第几条呀，我们就不会写。

我们一步一步谈判下去就怕写错什么，给他有了把柄呀。但是如果我写的正规一点，感觉就有法律效力一样的。我们乱写呢，就怕他们会不理。还有，后来要写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们就感觉到写那个东西要包含很多法律的词语，不知道怎么写。

后来我们有些依赖机构的人了。机构的人可能也意识到了，就又叫我们自己写。我就叫你帮忙一下，要是写大白话，我们自己会写，那些规范的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问：你们之前有没有因为自己写的不规范被对方真的抓住把柄？

MJ：也没有啊。可能就是我们的态度，机构的人写的好。就好像那个是高级的人写的。

问：你们有没有和律师直接联系过？

MJ：从来没有联络过律师，只是我去开会，去香港呀去深圳呀，接触那些律师才是真正的律师。主任叫过一次本地律师来给我们讲解。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法律的问题劳工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他们才叫那些律师。还有一次，L 所的律师给我们讲解的一次，你也在场的那次。

第二批人的问题

MJ：我说白了，放了假，很多人都找别的工作，赚外快。只是我和另外一个代表在跑这些事情，想多找另外一个人都没有，这样很泄气的。如果我们第一批搞定了，第二批的还没有冲锋过，还要带着他们做事，很累的。我们的心情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搞定，一半为自己，一半带着别人，所以还在做代表。可以这样说，我搞定了，我还带别人干什么？那个劲头都没有。看见别人还在赚钱，我自己还在跑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正义感啊什么的，其实我也是要吃饭啊。

如果要我们尽力帮他们的话，下边的也要给我们表现出来啊。他们够胆了，他们已经谈过了，也不要我那么费劲了，我才做的啊，人都是这样（笑）。劳工机构其实也是这样的，一边教我们怎么冲，冲好几次，我们就知道冲也不怕。原本我们都是怕的。如果我去了劳工机构，叫他打官司，把全部事情都交给他们做，他们也不想做，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他们都想把事情交给我：你 MJ 肯定会搞定的嘛。一说让他做代表，做多一点，联络啊什么的，他们就说“我都没试过，你要我怎么做呢？又没有口才”。我就说，你对我说的话，对政府啊，对工厂照说一遍，问他们什么时候搞定就行了。

还有第二批很多人打过电话给我，问我不是说两批一起的吗，你们说的不算的吗？

问：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给第二批承诺过，会和第一批一起？

MJ：当时我们承诺就是我们会帮他的。他们就以为，什么都帮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代表出来。其实我们第一批的代表都想做第二批的顾问，不用去冲，少很多事。我可以什么都告诉你，你叫我去（替你）冲，那个就累很多了。大家就是这样。做了那么久，我就明白是分几层的嘛。第二批就脱了架，没有代表。就好像一个班，有组长、班长啊，我们第一批的战斗力就是这样形成的。我是组长，劳工机构是老师，其实架构是这样就行了。第二批的人，第一是怕，第二是不想动。第二批没人去过劳工机构学习。最主要是多去几次，去过一次两次，第三次你就不怕政府了，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只要那个经验就行了。

过完年，现在我的心态有一点转变了，也不要那么冲动了。第一批基本上是搞定了。有工人也劝我，不要太过突出了，要不会麻烦的。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其实第一批的如果出头了，就适可而止。如果你什么也管，管了第二批也要管第三批，就好像你一个人，你是总代表，你什么也要管，老板肯定针对你的。我那个工友的想法很好的，厂里那么多人，我就佩服他，他就好，他就不出面。其实他不出面也有他的好处，就是这样。这样生存得久一些。如果太出头了，肯定死的。劳工机构还说加班费呀，职业病什么的也可争取，但是其实很难做工作。我们社保搞的有声有色，还搞不到第二批的人过来接力，别说加班费，职业病啊。

问：是不是很多人拿到社保了就不想再争了？

MJ：很多人是这个想法。我都担心，第一批搞完了，第二批没人上，何况是第三批。现在追社保，没人再起来，我们的士气也一步一步退下去了，我们有些代表就想搞完社保算了。就好像我们以前追社保都跑那么久，代价那么大，如果加班费、职业病这些事还是像以前一样，代表没有什么回报，还是只给一点车费啊什么的，

工作量又大，没人敢提，谁提出来肯定谁要多做事。

问：你们附近有个 FY 厂，那些人也想找你们学习怎么追社保呢。

MJ：我也看到很多人想追。其实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想帮那些想追的人，我跟他说怎么做，但不用我带头，这个很好做，也有意义。像带我们的厂，第二批的，如果他们愿意做，我带他们也可以。但是第三批，都没有人问，我也不想做那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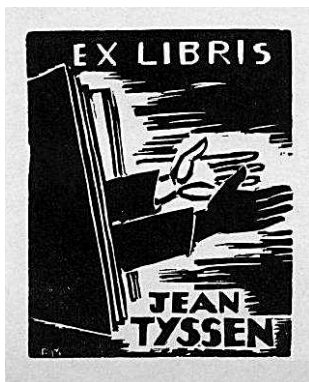
HJ 被放假后，她在外面打零工的时候又给工作中的同事宣传社保的事。然后那些人也去机构学习，就像我们以前一样。

其实就是这样的，很奇怪的，没有看到成功的例子，你怎么劝也很难跟他说。你跟他说我现在拿到了多少钱了，他才动那个劲呢。

现在我感觉很多厂的维权的意识也增加了，电视宣传啊，工人之间宣传啊，意识是强了。

这一路走来，像以前我们没追社保不知道的，不是不敢。我们每个人都没买，也没所谓啊。以前有些人能买，比如领导的弟弟啊，他给那个名额，他肯定能买了。我们去问的时候，他说没那个名额，我们也就走了。那个心态就好像现在第二批的人不想再进一步一样，怕他其他地方为难你，不想搞那么多事。每个人的心都是这样。

我们打个比方，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签名时，那张纸最上面写的是要求，挨着要求下面是签名。他们带头的就签在上面，有一个胆小的就签在下面，然后再有人签名也就签在下面，中间空着一块没人签的。就分两批的，很明显的。这就是人的心态的问题了。如果没人在最下面签呢，他就跟着在上面签。如果有人下面签呢，他就跟着在下面签呢。



代表的工作和分工

问：代表之间有没有分工？比如谁做宣传？谁管财务？

MJ：财务有个专人做。其实钱我们是有的，加上第二批，总共有 20000 块了，现在就花了 6000 多，不敢花。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结果。现在没有给代表钱，只是报销车费。一直以来，就给了我 100 块电话费，我一个月就花完了，真的亏很多啦。我自己有车，有时候自己去问一下情况，也不好意思去报销油钱什么的。

你给钱，人家才有动力嘛。没有钱收，你叫我去跑，我跑一天两天没事，跑多了，你们每个人都在做事挣钱，我又没有钱收，就亏了，就不想了。有人提议过，除了报销车费，再给钱。打个比方，今天我们代表要去政府问情况，就报销车费，再给 50 块。因为别的工友都在另外的厂在做工啊。就算我没事做，每天在家里睡觉也不用出门跑这些事啊。这个事情大家轻轻的讨论过几次，有一部分人就说要补，像我们就说要补，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啊。有一部分人就说，如果要补，这个钱很快就用完了，就不补就算了，也没实际探讨下去。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怕就是社保还没追来，钱已经花完了，怎么叫他们再给啊。所以也不敢花。

问：开始捐钱的时候还是挺顺利的是吧？谁提出来要集资的？工人吗？

MJ：顺利。那时候我还没有做代表，可能是主任提的吧。因为那时候是主任叫我们找多一点人，找多一点部门。然后该怎么办，我们就问劳工机构的了，都是他们教的了。

问：你们有没有公布过账目？其他人有没有质疑过你们有没有乱花过？

MJ：这个数我们也不是太多公布，会记账。我们公布过一次，

花了多少还剩多少，但是每一笔账我们不公布。他们也不会质疑，其实 100 块对他们来说，也不太会质疑。他们也不会问你具体怎么花，没有人问过的。

如果钱花完了搞到社保了还是值得的，但是要是钱花完了社保还没要到，再让大家给钱的话，很大一部分人会给，但是肯定有人不给的，那样就不公平了，就怕这个。但我们花得也太小心了。我做到现在就报销了 300，但其实我真的再亏 300 进去也是有的。我打电话打了 300 多都不止了，才充了 100 块。放假的时候，YH 他们提过几次，但其他代表就是不给。长远看来，又没工作，一边还要自己掏钱，掏时间，我现在……好像……想做事是想做，现在学了那么多，要是像劳工机构那样给别人一点意见，最轻松就是这样的，我很乐意的，这个是真的。上了那么多课，学了那么多东西，做了代表那么久，这个（给别人帮忙出主意的）心是有的。

问：我看你们一直说自己是 HB 啊，但是厂服上面是 HY，是改过公司名？

MJ：是。可能是因为，那时刚刚引资建厂，税呀什么的比较低。几年以后，没有免税资格了，2004 年又改个公司名，那个税又可以优惠多少年，就是这个意思。

问：你们提要求的时候，提的是 HB 还是 HY 呀？

MJ：我们就说 HB 公司，但后来公司说也不全是 HB 的责任。那天 YH 他们被放假，去问人事社保的情况，厂里就贴了两张出来，一张是 130 多个人是 HY 的，有 108 个工友是 HB 的，反正就是分两段了，前一段 HY 负责，后一段 HB 负责。厂里就要赖皮，叫我们出证据（证明 HB、HY 实际上是同一家公司）呢。这个打官司要费很多力气。

其实政府已经表态了，要买社保。但公司现在就是拖，能少交一个是一个。因为公司统计说，如果全厂全都补了社保要一千多万。

唉，所以我就看后面那些人都不报名，他们报名我们当然帮他追的，但是发动不了他们，如果他们自己不做多一点，后来可能又怪我们。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问：平时跟政府或跟厂里谈的结果，怎么跟大家通报？

MJ：现在我们很松散的，没有什么通不通报。有什么事都是我们几个代表研究一样。重大的结果会宣布。打个比方，我们去市政府是要求全部人去的，当然全部人就知道了。后来那几次谈判，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我们就按照那个答复，约大家到广场，一般都是我来宣布现在的结果，说说下一步怎么走。

士气最高的时候就是厂里放我们假的时候，我们那个火就来了。那个时候每次去区政府是 100 多人，去市政府也是 100 多人，后来他给答复的日子，我们也带 100 多人去广场（镇政府旁）。我们在里面谈，要大家在那里等。我们收到消息立即过去通知大家，那时候的士气就行。后来政府给了答复，我们也把（个人补缴）钱给了工厂。那时候那个士气就开始沉了，（大家认为）钱都交了，就等消息了。如果问最新的消息，一般的工友就好像认为也不一定要他去啊，代表去就行了。这个说没时间，那个说没时间。就是这样的，（士气）上的快，下的快。

后来过年我们要求厂里把资料交给政府啊，很多人都说叫我去，我又没有时间，后来我就找了两个有时间的去问了一下。我想叫多一点人去，很多人就说没时间，我就很没心情。所以就在我们的 Q 群那里说一下就算了。

问：有没有代表中间退出的？开始很积极后来就因为什么不想做代表了？

MJ：有一个代表的老公在家里养猪，让她回去一起搞，她就辞职了。怎么说呢，有的代表一直以来都是不温不火，他也想做代表呀，但他是不想做那么多。以前很积极的，但是后来不积极的代表，

就没有。他原本不积极的到现在也是不积极，就是比别的人好一点，很多都是这样的啊。以前不积极现在积极的就有。

访谈时间：2012 年 5 月 2 号

访谈背景：MJ 刚刚被释放后，我们联系到他，了解 4 月份集体行动的前因后果，工人和人事主管冲突的经过，以及他后来被审讯、关到看守所的经历。

工人们决定去找厂方讨说法

工人补缴社保的钱交上去之后，公司方迟迟未动。我们想了一些方案。第一步是催陈书记。因为过年前是他拍板决定我们的事。所以先给他压力，让他拿主意。

我们几个工人轮流给他打电话。他被打烦了，说我们骚扰他。YH 对他说：“我在你工作时间给你打工作电话谈工作的事情，怎么能说是骚扰呢？”他被我们问得不耐烦了，又没理由拒绝，就跟一个工友说把资料给他。我们就邮寄了每个人交了钱的收据、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给他。

他收了材料还是没消息。我又打给他，他一会说去湖南公干，还要等几天，一会又说去北京开会。后来他又推脱说你们的钱是给了工厂，有什么问题去找工厂。我们找政府也总是没结果，就想到还是去工厂。毕竟要上交钱的是工厂。可能真的是工厂不愿意给它的那一部分呢？

我们那会还有一个提议，就去更高级的省级地方。但是想到冤有头债有主，给钱的还是老板，还是要找工厂。以前也是找上面上访，最后还是要下面的政府来办事。再找也是现在这个陈书记负责，

所以只有去厂里了。

后来我们就到劳工机构那里商量，怎么做，达到怎样的目标，怎样做到合法，怎样让公司写那个回执，不写就不让他走。还要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把我们所要的给出来，同时还不能太冒险。当时没有想过会在公司待那么久，只想着公司给了回执我们才走，所以太详细安排的没想过。

当时 YY 已经走了，有事找主任又不是经常在。毕竟我们的行动要有一个人商量什么的，就靠 H 哥，但 H 哥也要工作。那天他是请假跟我们谈的，就谈了一个下午，也没有谈那么详细。如果多一个人参与，记录下来可能就好一点。就好像我们开会没有一个秘书长什么的，就没那么好的效果。我们那次说了这个想法给 H 哥，问他行不行得通。其实 H 哥对法律的了解也不是很多的，就是比我们敢作敢为一些。主任啊他们可能就理性一点，有些工友就觉得他是怕死。但其实他理性有他的好处。如果我们就只是靠冲动呢，做下错事也不一定。

我们只谈了一个中午，大概聊了一下框架，底线、要求一类的。我们商量的时候就说的女的在前面，不要动手，因为一般他们也不敢冲女工友。其实这个有点难度。经过那天晚上，我看到经理、保安动手，工人也有动手。实际操作起来有些人就控制不了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有些不对，这个是真的。

原先讨论的时候，没想到会持续这么长。后来因为我们在那里已经过了一个通宵，还是看不到有结果，如果全部人在里面，一直不休息，我们可能也熬不住，才想到轮班。为了轮班第二天意见已经有不合，有的想白天在这里晚上回家睡会觉。不过还是许多工人一直在坚持。因为马上是清明节，我们也打算坚持。

照相录像这方面安排得也不够好。只是给大家说，记住拍照，谁有空就拍。没有具体安排到位。

我们最开始提了三个要求，第一让工厂保证地税局通知他交钱

的时候，他们在几天之内交钱，给我们一个实际的日期。第二是第二批工人的资料送去地税局核实，让他交钱，跟第一批一样。还有一个，把第一批工人补交的资料马上发到地税局，不能再拖延。第一天我们看到何经理没走成，就觉得势头在我们那边，就提多一个要求：这两天都要算我们上班要发工资。我们提这个要求，也是为了让那些还在厂里上班，担心会被算旷工的人都下来办公楼。但何经理对出粮（发工资）的要求理也不理。不过前两个他不能不回。

因为有的工人还在上班，我们就要求他们下来，和我们一起。师傅就要求他们上去，否则当做旷工。我们就说，他们虽然在上班，但是也有知情权，我们搞的这个也跟他们有关。我们说，你给答复就立刻上班嘛，是你故意拖延才上不了班嘛。师傅就让工友把手头的货退了，说你们下去就下去，别影响这里工作。像蒙×那个部门的师傅是比较松的，他先提出来说我们部门不能当旷工啊，然后就每个部门都没有事了。

当时没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是否会被工厂报复。只想到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几个人去呢没作用，只有一大群人一起去，才有效。有的工人也想到，社保是最主要的，就算又被工厂放假或者开除了，只是牵扯到几千块，社保更重要。那时候就觉得肯定可以拿到社保，我们代表的心中就觉得是合理的。因为以前我们做错的地方就是没拿到厂里的凭据。厂里那会也口头答应什么的，但都没兑现，我们这次就要求是书面的盖公章的回复。



去厂里要书面回复的经过

开始何经理很坚决地说没，有义务告诉我们，给我们回执，他们一切会按照法律去做，让我们去找政府部门解决。我们一去何就报警了，劳动所、镇政府也有一些人到场，但是警察没动手，他们像保安一样只是站在那里。我们心就定了。我们就感觉到没事，我们这么做是行得通的，那个时候就更加有底气了，所以又提多一个要求出粮（发工资），保证我们工人能齐心。

我们没跟何经理说我们已经找了地税局，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录入完我们的材料。我们只是告诉他说，你们老板、政府没时间跑手续，只要你们答应了我们就帮你们跑。我们这样讲，搞得劳动部门的人也没话说。后来劳动部门的人跟何经理说：“写给他们工人一个回复也没关系。”何经理说：“不写，我没这个义务，要找你们解决。”

后来何经理就叫我们几个代表进去，亮了一张证明（地税局交资料的回执），说“不是我们不买，我们把资料给了地税局，他们没核实清楚，是他们的的问题，不是我们的事。我尽了我的义务，资料都交过去了，他们不核实。”他的意思是地税拖我们，我们什么都交过去了，地税还没算完。

我们说：“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回执是给你的，不是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那个回执。”

后来他又亮出来一个东西，说本来是不想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是工厂给政府的一个东西，内容是问地税局、劳动局，工人需要交多少，厂里要交多少。他说政府不敢接这个东西。我们说：“那你可不可以写给我们，我们可以替你去政府里问？”他想了一下，那个东西可能是挺机密的，就写了一个东西，签了名。我们就让他盖章，后来他又改了主意，不给了。我们又陷入僵持，就什么也没谈了。

第一天上午就是这些。下午也没谈什么。何经理开始搜集一些证据，偶尔走出来，叫保安拿着相机跟着他。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他

是要搜集证据，我就有一些拿不准了，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违法了。不过我没和工友们说。他一出来工友们就那样堵住门口不给他出。他就诱导工人说话，问工人“是不是不让我走”。我怕工人说错过，就说：“不是不让你走，是要你快点给一个答复，大家一起下班。”我就怕一些工友会说，不让你走，我们要把你怎样怎样一类的话。

之前没想到要提醒工友不说这类话。只是自己心里有数，但是没通知下去。后来才意识到，我当代表的是没说错话，但是有一两个说错过就麻烦了嘛。谢××就说了。她说话就尖锐一点，还骂了何经理，说他是“公公”、“走狗”，喊口号。我知道不行，但是如果当时制止工人，又说不过去，怕搞得好像我站在厂方一边了。后来说的尖锐的东西多了，有人喊口号，惹火他了，他就出来搜集证据。他就有意地问了，直接找谢××走过去“是不是不让我走？”谢玉梅还大声说“不给（走）就不给”。我就心里怕，就说：“不是不给你走。让你给一份答复。”

何经理后来心态也平和了。后来就熬着。大家的心态就是你等我也等。他就故意去抽烟，去引导，故意在门口停留一下，让工人去堵门口什么的，他也没真想走掉。那段时间是最放松的。还有工人在一旁说说笑笑。

这期间我们一直打电话找媒体，中午就打了，给今日关注啊，DV 现场啊，一直没人来。《南方工报》没打，觉得他没影响力没作用。夜里媒体来了。工友的心态就是，出镜上电视的话影响会大一点，报纸没人看。我一直没报太大的希望，就是莫××一直说要打。后来是 DV 现场记者过来的。记者问我们是什么事，他要请示领导啊，后来又说没空了，车坏了。小梅说你来吧，我们帮你报销车费。到了天黑，记者才来，我们给记者报了车费。记者先在在大门口，拍了一下。但是保安不让进，我们让记者从侧门进来，这样采访了一阵。我们很多人莫×蒙×都去了。我们对记者把该说的都说了。

原本那些记者说要去厂里采访的，何经理不批。后来保安又通

知说何经理让进了，记者就去采访何经理了。何经理把资料已经交地税局的回执，给记者看了。何经理说没买社保是一个历史问题，很难解释，不是厂里拖。他几句话就把社保问题推给政府了。我们外面刚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公安，用对讲机说话，可能是他们通知的镇领导，后来来了一大堆镇领导，刚刚好和记者碰在一起了。我们想，坏事了，搞住我们的新闻不让放。白天是镇级的人跟我们交涉，夜里就是区级的人和我们交涉。不过还是播出来了，4月3号播出的，

后来，过了一个多小时，何经理放出风声，说12点以前有人接他。12点真有人来了。区级的领导进去跟我们说，打圆场，让我们快点走。我们当然不走。只要我们几个代表进去和他们谈，何经理让保安摄像，我们用手机拍，领导说他们是职能部门，不许拍。大家就没有拍。

后来何经理就拿出来那张他说政府不收的那个材料，对那些领导说，“现在不说也不行了，你们也不做事”。说：“不是我们厂方的责任，我们已经要求买了，我给你们政府部门，你们没有接。”他当着那些领导的面说的，那些人立刻就黑面孔了。有一些人就说：“你有交上来吗？”何公公说：“我是要交的，是你们不敢接，不然问一下梅姐，她也看过这张东西。”梅姐是副镇长。然后梅姐就说：“可以呀，怎么不可以交呢？”何公公说，“那我交给你了”。政府的人又说，“现在不是上班时间，怎么收你的材料啊？”后来那些领导有人就说要小便，后来其他人没说一声也就走了。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政府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以前一些工友包括我自己一直觉得是工厂在拖欠，搞鬼，不愿意交钱。怀疑政府工厂他们之间互相帮，这个肯定有怀疑的。但是我看到何经理拿出那张东西，就看到他挺有力的抓住政府的把柄。意思就是你让我死，大家一起死，拉着政府一起。

那个时候我看出来是和政府态度有关。但是社保问题我们肯定

要解决的。所以我当时的态度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追社保，你们之间的事情自己搞定，给我买就是了。”但当时只是几个代表进去，外面的工人不知道那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感到这个事有一点麻烦了。

我以前的观点，也认为是公司不愿意交钱。但当他拿出那张纸，我看到涉及到政府的态度，我就有一点怕了。我那时候就想会不会出事啊？因为很多人说，跟共产党作对，没好下场。那时候，我就怕我会承担责任。但政府现在既不帮我们，也不帮厂里。那我们大家耗着，就继续堵下去，是没问题的。

后来到夜里三点，我们就跟何经理谈了一些事情。何经理知道没人救他。早先还说有人救他出去，但还是救不了他。他报案报了几次，区级的政府也帮不到他。他开始和我们谈心，当然很大一部分还是废话，说大家都是打工什么的。

何经理说：“大家都在这里，我们都是受害者。政府不管，老板不管。老板也不救我出来。他们还在外面风流快活。”他还说共产党黑暗，他过去在政府里做什么职位的。他还说：“我是做了十多年劳资问题的，读了那么多书，劳动法研究了那么久，我做的事情都是按照法律做的，也没犯法。我吃老板的这碗饭，我就该这么做。如果你们追不了，也是法律不支持你们，我也是根据法律说的。”这些话以前也听他说过，那时候我们当他是屁话的，都没放在心上。

也可能是他在做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想让我们同情他一点，大家把他早点放出去。反正他报警也不把他搞出去。何经理是个很狡猾的人，他想的点子很多。很多对付工人的办法都是他想出来的。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没有那么难搞了。

再后来我们也困了。他睡醒了还用手机放歌吵醒我们。那时候是最和谐的，大家彼此还有说有笑。他也知道出不去。我们也知道老板没下那个命令，让他写给我们回执。那我们没办法。他一直不给，就一直耗下去。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老板开车进来。他一见到我们这么多人在办公楼，他就直接去他自己的宿舍了。我们也想过要不要去围老板。但是考虑到宿舍是私人的地方，因为我们找这个公事，去他私人地方找他合不合理呢？如果万一他说私人地方什么的不可以去，违法了，我们行动就失败了。所以他不来厂我们也不敢去搞他。



与人事主管发生冲突

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多，他给了一个消息出来，可以写回执给我们。他说老板去政府那边谈的，可以写的了。老板让司机带那个回复给我们。但老板写的没那么详细，有一些字眼问题，我们要求改。何经理有些生气，说：“海×，你那么多意见，你自己写，写给我。”。但是我们一写上去又不太流利，就又改。改来改去，何经理就有一点愤怒。其实想一下，他被关了那么久，有一点愤怒也是应该。30多个小时没睡觉，他声音也沙哑了。大家的精神都有一点问题，脾气都比较暴躁。改到后来何经理真的发火了，不改了。主要要改的是那个回复上写着“我公司”，没写 HY 还是 HB，大家为了那个东西吵了一个多小时，让我去问。我不问也不行，就问。何经理就不改。那时候我觉得我再要求也没用，就没说话。难道要为此“我公司”打起来吗？我知道他写清楚当然好的了，但当时我就觉得 90%他不会写的，而且感觉不写应该也不会再有什么变数了。

但是大部分工友不明白，认为一定要写上。那个时候，因为工厂答应写回复了，有些工友就觉得自己占上风了，只要大家齐心，让何经理怎么写都行了。但是怎么按住其他人的这种想法呢？我也

不知道怎么做，我要是坚持说不用写，可能会有工友说我是帮厂里还是帮工友呢？就好像对不起大家，我也不敢说。有个工友叫我不
要问了，我就不想问了，站在其他人后面。

现在说起来，有的工友该执着的时候不执着。一些事情之前表现的不是很团结，好像我们凑钱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找那些人集资。到了争这个 HY、HB 的问题上，不用他团结的时候又抓住不放，就那么容易团结了。

后来何经理要冲出去了，打了我们工友。起冲突之后两边都报警了。现在看来，打架的事情肯定有一点预谋了。

其实他半夜和我们说过，要我们不要中计，如果他冲出去，一报案，我们告他他也告我们，被政府利用起来，对大家也不好。其实他也不敢负那个责任。如果我们告他打人，他也告我们拘禁，都伤不起。他也不想陪我们玩，他自己出去也可以，就怕一不小心触到那个爆发点，他自己也卷进去。

我知道一打架就麻烦了。毕竟我是总代表，心里有一点慌，想着会不会捉到我。我当时就什么都没做，又没阻止他们打架又没打人，不想被抓把柄。我以为这样自己就没事了。

他们打架的时候那个回复被撕碎了。之前何经理把回复给了我，很多工友都拿去看，就好像是拿了战利品。每个人都要看，不知道传给谁去了。打架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找那个回复在哪里。厂里的人看到那张回复就撕掉了，一了百了，不然打了架还给我们？海×他们也知道这样要有麻烦了。海×那边就跟何经理说：“这样了，大家也没什么，虽然是一点冲突，大家也知道是都有火气，私了就算了。”他们谈了，何经理也肯把那个回复重新写出来。我就又进去，拿了那张纸，我当时的心态也是私了。但是莫×蒙×他们就抱着那个态度一定要追究到底，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不在场又不好，我拿着那张就交给别的工友让他先拿走，过两天再找他。后来蒙×莫×说报警了，告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有点没底了：“你告他，

他不会告你吗？”

那个时候工人分两派，一批人说告一批人不想告。有人说，不要再争了，何经理写了回复就算了。当时事态其实是要告的人占了上风，人多一些。被打的谢×鲜××要告，我们要是说不告又好像说不过去。后来我们打电话给 H 哥，他也支持我们告，说告了也没事。

要告与要和解，所说的话肯定不一样了。如果是要告他的话，肯定是针对他去说的了，如果打算和解我还针对他的话，就要搞我了。

工人们被带到派出所录口供

后来派出所来人，带柳×上车。我们原本都跟到派出所，想进去作证，派出所门卫不给我们进，要我们先把人给撤了，不要围那么多人在派出所。

后来没多久就传信我进去，就说哪个是 MJ，里面的人叫你进去录口供。我那时候还很威风，很高兴进去，想着是要告他。但是一进去，我就见到谢××那间房子，当时她录口供已经录的差不多了，已经到了后期了。那时候，录完口供了就再读一遍让她签字，口供内容是不是属实。你们是不是打架，有没有受伤，要不要控告他。那时候我就看到谢××说算了不告了。我想那就算了。这样的话，那个口供就不能太针对何经理了，太针对了不好。他们动手的时候，我一直在后面，我可以说看到了，也可以说看不到，所以告或不告本来是可以任我发挥的。

当警察问到我，困了他多久，有没有说过不让他（人事经理）走之类的话的时候，我当然回答：“我没说，也不知道谁说了。”他说有没有听（别人）说过，我没回答他，只说我没有说。他又问我

在里面多久，我回答由头到尾 30 多个小时都在。问我有没有进去问过何经理。我说有啊，我进去问过他，他也叫我进去商量，因为我是代表。原本是问这些的。最重要的是问到有没有看见打人了，我就推说我在后面，很多人挡着没看到，我也没在那里谈判。我说我知道他们为了 HY、HB 发冲突的，但是谁先动手谁打谁我就知道了。打完了一散开，我就看到谢××倒在地上，被人抓头发被人打。他问我站在后面怎么看见呢？我说看到她倒在地上了。第一份口供就是这样录的。如果那会我听见谢××说要告，我肯定说是何经理打人了什么的。

谢××先在外面坐，我们也就在外面坐。我看见她说算了，以为和解了。我还安慰她，说没事了。我们说的话也没什么，都是正常的，应该会放走了。后来坐了很久，还没放人。心里就觉得麻烦了。

第一次进派出所录口供，心里有点怕，毕竟跟以前政府书记谈话不同的嘛。派出所这种地方，我们有句话是“生不进官门，死不进地狱”。你说去区政府什么的我也不怕，每个人都是最怕进派出所，因为牵涉到坐牢。就好像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都有一点怕了，整天晚上都睡不着。现在经历过也就不怕了。

后来又传第二次录口供，他先传谢××，我就听到里面大声骂她。可能就是威胁她，说真话，什么的。录完了出来，一下子就放她走了。那时候我还见到何经理，我问他是不是和解啊， he 说是和解。我还发信息给莫××说没事，和解。第二次录口供，我看到他骂谢××，要威胁她，就知道有点麻烦。又叫我进去录，但是我说的话还是跟第一次一样，可能第一次有点怕，话还要多一些，但是也没说错什么。我第二次坚定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录了之后就在那间房子里，有保安和辅警看着我，在那里等等等。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出去啊，怎么关我那么久。他们说他们也做不了主啊，上头下命令才可以放啊。那时候我就有一点觉得工厂要反告我们的意

思。那时候我就心里打鼓，怕谢××鲜××她们说错了什么，是不是说我组织啊，是带头人之类的啊。

一共给我录了三次口供。第一次是晚上8点多进去录口供的，关到第二天凌晨3、4点又录一个口供。扣留我到上午10点多，录第三次口供。那时候就更麻烦了，我看见那个警察带着一张纸写着问什么问题，我心里觉得麻烦了。因为白天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放啊，上了班几个小时，可能他们心里有底了，研究好了要问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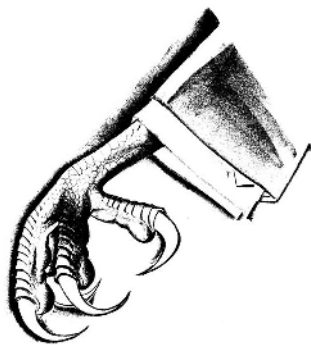
他们问我谁是主谋，组织者是谁，是不是我啊。我当然不认啊。又问我怎么去的厂里，没有人组织怎么会100多个人呢？我就答他，大家都是一传十传百，你让我说谁是组织者，我真的不知道。他们问谁通知的我，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有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星期一到工厂去找问一下社保的事情怎么解决啊。我担心我不去的话，人家都搞定了就我搞不定，所以才跟去的。但是要说谁是组织者，那我难道要说他吗，如果他也是听另外一个人说的呢，那我是不是冤枉人了吗，我不肯定的事情肯定不能说了。所以3次口供都差不多，都是说我们的经过。后来就说多了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那天要去，说多了这个细节。

我觉得他们最想要的口供是，问我们有没有说过不让何经理走。这个事我不承认又不行，毕竟有人说过，但我自己肯定没说这个话了。如果说我没听到，又怕这个算不了真。

工人代表被关看守所

到了下午5点多有个人带我出去，搞那个手续。我问一个保安，他说我们可能是要放出去了，其实是进去给我搞那个看守所的手续。那我手机没电了，莫×还打电话给海×，跟海×说，应该放了，可以出去了。手机没有没收，只让关机。其实也可以跟外面通讯，

他不管那么多，只是有一个辅警看着你。除非是罪名很严重的抢劫什么的。我们又没有罪，他们也感到我们是冤枉的。但是问他打电话就不行，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我说了很多。所以后来给我们办了手续之后，又要验指纹了，又弄棉签验我们口水，我就觉得麻烦了。如果是放我们出去的话，说一下



什么的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们做了很多功夫，又叫我们去派出所的牢房了。我就知道麻烦了。以前我们不是进牢房的，是在询问室。那个牢房就不同了，有铁窗的。把我们东西都放在台面上。有一个人专门看着。那时候就不可以联系外界了。做完那个按指模什么的，过了一个小时，就给我们一张拘捕证，写着涉嫌非法拘禁，以及我们有什么权利，要不要请律师，让我们签字。

没多久就把我们带到看守所了，就更严了。所有东西他包住，衣服什么的放在一起，走的时候再还。然后发给囚服，还有日常要用的也发给你。所以如果有些人突然被抓，在里面断了联络，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在看守所第一天，最大的想法就是让家里人知道不用担心。

到了看守所，又问我们请不请律师，我们就说请了。既然都进到看守所了，我们还能不请嘛。

一进去看守所，里面的犯人都问我犯什么事情进来的，然后就研究会判多久啊。因为大家在里面没别的话好说，都是问案件的问题。他们都说没事啊，因为他们好多都是抢劫打架进去的，会判到哪一步他们心里都有底。问我很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打人，给他饭吃？我说没有打人，也给他饭吃。然后他们就说1个月。给他有吃有喝，我构不成非法禁锢。就算是构成禁锢，我们请了律师，我们以前是良民，还可以说我们无知了什么的，打完官司还是会放出去，

最多就是3个月。

我也知道肯定是政府打击，给我一点教训，我十多天以后才见到L律师，心里也没有太慌。在里面他们（犯人们）都给我算好了。最坏的就是九十几天。因为案子也不大，肯定会缓刑的。所以我在里面的时候第一天可能想多一点，后来就没什么了。我自己都知道好的话就是一个月。有的人还问我，看你来这里好像没事一样，很轻松。我就跟他说，那有什么呢，天天哭也是一样的，要坐多久也不是我说了算，就看外面的人怎么搞，都是等外面的消息。吃睡都没问题，就是苦一点。在里面最大的就是挂念家里人。里面的人都是，就算是小偷也是，想家里的老婆孩子老人。因为家里人不知道，就是互相担心。每个人都有同感，不管犯了什么案，第一时间就是想家人，哪怕是带一个口信出去，最重要的是带一个口信，我在里面没事怎么样。

吃饭当然不是很好了，吃白饭就能饱，菜是没盐没油的。吃起来就是没菜也要吃饱饭。一天两餐，十点钟一餐，四点钟一餐。四点钟吃不完就是自己挨饿，没东西买。新兵餐，一个星期买一次。我进去的时候有钱。里面的人很好的。有一个是销赃的，他有钱，他买了一辆赃车，他有3万多在那里，他可以买了请你们吃。但是他有钱也买不到。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买的话，他可以出钱给你买。他也很大方的。他一个月才买一些。就是面包饼干榨菜那些副食品。还有当值，两个人值班，怕里面搞事什么的。如果有人搞事就按警报，还要操练，学习。

外面看那些人当然是坏的了，在里面其实一些人本质也不是很坏。像我们同窗的一些绑架勒索也有，进去以后和我们一样有说有笑。他绑架勒索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出来混的，他做那行，就看见你是老板什么的想做你，他不做你的时候当你是朋友，跟你说话的时候一样的。说得难听一点，谁让他是干这行，绑架找钱的，你又让他看到你这么多钱，只是对那个人来说是坏人，对社会是个威

胁，在里面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进去以后也是担心家里人、后悔什么的，都是跟我们想法一样的。他会不会再干这个也不敢保证，但是在里面他肯定是盼出来了。在里面有大哥，原来是做老板销赃什么的，他们有的是钱，他们买东西吃，大家也可以吃。但是没有好的东西，就是饼干一类的，我们原本刚进去没有东西吃的，方便面沙琪玛在里面都是好东西。他们买了，我们随便吃。有一些因为受贿被关的村长镇长，出去以后还是大把的钱。有的人说你花完那个钱再出去，他还骂你说要我关到什么时候，没有好东西买，一次只能买几百块。外面一顿饭要几千块，他可以吃一年了。没有开水，泡面就用早上的白粥。或者泡点凉开水，第二天一早吃。

里面有管仓的，自己人管自己人的，就好像一个班的有个班长，要带我们，教我们纪律。他也有一定的话语权的。打比方有人操作得不好，那人就骂他。但我是本地人，对我稍好点。

在里面很多人都说我很蠢的，做什么带头人，为了一百多人，枪打出头鸟，人家还在外面风流快活。我没怪过别人，反正进就进了，怪谁也没用。但是我自己心里有一点不舒服，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为了这个事是不是牺牲了太多呢？我一直做代表家里也不是很支持。我老婆知道我是什么人，她肯定支持我。但是我哥，老爸都反对。其实过完年，我老爸问我有没有搞定啊，我就说搞定了。问我有没有上班，我就撒谎说上班了。那时候进去了没有怪谁，就是怕家里人听说了会骂我。我最怕的是，政府和工厂已经站在一边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继续做代表，肯定就有麻烦的了。如果对手是工厂的话，我可以，但是我要和政府（作对），我就怀疑我的能力。再搞下去我有没有麻烦啊。在牢里面那些人枪打出头鸟，和共产党作对没好结果。以前我也知道这些，但是没放在心上，但进去了，就不得不想了，还会有下次呢，我心里也说不清。

我出来前两天，有人跟我谈话，应该是一些公安，问我的态度。其实我心里也有底，我的表态就是继续追。他说：“大家都是本地的，

我也知道你很为难，现在问一下你坐了那么久，有没有想到什么，什么态度。”我说：“反正大家都是本地人，我知道为什么抓我进来，我错的一点就是做了带头人。出去了我可以跟你说我不会带头的了。”他就说：“就这样吗？我也想早点放你出去，但是你就这个表态叫我怎么答复呢，我也要向上面交待嘛，我怎么说得过去呢？如果我放了你出去，你还在外面搞事，那我不是要给上司打嘴巴了？”我经历过审讯了，就知道他说这个是诱导我的，这个肯定是假的。他还说：“你出去了有什么困难，就不要再做这些了。如果你有困难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帮你找工作什么的。你那个买社保呢，我去看一下看可不可以帮你买了，你就不要搞了。”他是穿便衣的。他不是领导，都是小人物。领导不敢跟我说这些话的，因为领导表态要承担责任，他也怕我后面报他名字出来嘛。只是让一个小卒跟我说，他答应的事情可以不算，这样领导好开脱嘛。就好像当初陈书记过来，他说的话实现不了，我找他，他就麻烦了。

他说还有别的会不会举报那些，我也不睬他了。他还跟我说你：“给我一些表现。”我说：“什么表现？我该说的，我想到的该怎么做的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他说：“你们那天不是你去叫他们，那是什么人叫他们去的？其实你知我知大家都知，你去的那个开会的地方（指劳工机构），你说他那里有没有经营的牌照，如果他们有的话怎么会不挂出来，他们有那么好心帮助你们吗？其实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你说出来也没关系。”我就没答他了。如果上他当的话，就点头说是啊，你说的也是啊，那就惨了嘛。我也知道，如果我在里面说错话，妈的，我如果答应他，说是Z主任啊H哥让我们去的啊，让我再坦白一次，再怎样一说一说，告他们是主犯，我是从犯，承认我组织工人，我不是要关上一年半载，而且立即就把H哥Z主任扣上了，就搞死他们了。

这些（怎么应对审讯）劳工机构没有教过我们的。如果我报了别人出来，那他也麻烦我也麻烦，这个我也懂的。我们培训也不是

很多，就是我们可以争取什么。但是涉及到法律太多深的地方，我们还学不到。我在里面就怕他们（其他工人）说错话，说是我组织他们的。因为是我提出来像深圳那样搞，说深圳 L 所他们这样做过，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做。我就怕他去问海×，去问别的工友。因为在里面学的法律就是 3 个人同时指证你，就可以定罪了。如果没事最



多我就是 3 个月，比方说，如果再下一步，问的人多一些我们就麻烦了，有些人不知道说错话，那些警察很会引导你的。

不该说的就说不知道，警察不会打。比方说我就怕谢××她意志不坚定。像警察要是说“没关系的，我们只是问他（工人）有没有说过，他说过了你怕什么，你再说一下就行了。”但是你真说了，那不是他也麻烦你也麻烦？再搞下去呢，我就怕承受不了那个压力。其实我当时心里想到了，在那些工人之中，如果像蒙×进去可能会说错话的，那就麻烦了。

走出看守所之后

毕竟到现在都进去了，多少有点阴影，知道我的对手更强大了。以前我都是相信他们 L 所那些律师才会这样走过来。我以前不理别人反对，家里人反对也不理。但是和政府对手的话，他保不保的了我呢？我有一点怕了，做起事来也就没有那么勇敢了。

我不太担心工人会因为我们被抓而散掉。我在派出所的时候，虽然不是全部的人，但是至少有一些工友一直在外面等。我去厕所的时候，都看得到。那些保安也说，你们的人还没走。其他工友在

门口守着，我知道我有什么事他们肯定会告诉我家里人。

我从来没害怕什么。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是听太多反对声音了，我心里就没底了。我老婆以前是支持我的，我现在被抓进去了，就变成不支持了。我在里面的时候，家人也一直和段律师在联络。我出来的时候，我堂哥去接我。他第一句就跟我说，不要那么快答应段律师帮我追国家补偿一类的事情。他是我的亲人，肯定是为我想，他们也知道再追下去可能没什么好处。这次被抓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下次更严重的东西。那天晚上我出来的时候和段律师他们吃饭，我听到他们说国家补偿什么的，挺想再告的，因为一听他们说的，就好像是给我上了课一样。但是因为家里人也担心，每一个人都叫我不要再告了。所以我这两天都在想，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支持我，我可以做到哪个程度。如果可以做得很大，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没人敢动我。如果我事情大了，他动我一下子很多人知道。如果没什么人知道，没什么影响力，就完了，让我消失也很小的事情了。

这边不少工人要求公司给买社保，但很少人追以前的社保。所以我们是标杆，追到了是个英雄。如果我们成功了，很多人去追，政府会有很大压力。这样我越想越怕了，我们被抓，有可能是厂方和政府行贿受贿啊，也可能是牵扯到整个行业的话，我就是跟整个行业的老板作对了，而不只是 HY 的老板。那就更麻烦了。我们那个人事经理多少有一点暗示给我，他跟我老婆说我后期不是带头的，也不是起那么大的作用。还说“我不是要搞你老公的，是别的因素让你老公进去的”。不知道他是说真话还是给自己开脱了。他说的也可能是真的。他整我不怕我找人打他吗？

之前劳工机构说，做首席代表是保护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就以为动了代表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做代表就没人敢动。但事实上现在工厂动了我们，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后果啊。

海×跟我讲，我进去的时候，海×就让那些工友一人再出两百

律师费，他问 L 律师是有 6 千块交给他的律师事务所。上庭的话还要 8 千，我们两个人就是 2 万 8 了。因为之前募集的那些钱还有上万元在我手上，但我出不来就没法用。海×让他们再集资，有些人就不愿意再集了。我听了这个，心里很不舒服。我出来做代表本来很大压力的。我牺牲了这么多，5 月份开始做这个代表，真的亏了很多的，包括我的工作没有回报啊，就是一些路费电话费。但是他们还不愿意集资，当然也只是小部分人。后期我们的花销很大，那两天在厂里，我们的工友包吃，花了 3000 多。这个工友也不理解。我们只有哑口吃黄连了。

其实现在我谁也不相信，包括段律师说他一出马，我很快出来了什么的。我知道的原因是我的案子太小。像我堂哥说：“段律师说的那么大，要追究共产党政府什么的那个责任。就算告赢了，政府说你没罪，赔你因为冤枉坐牢的那个国家补偿也不过几千块。去告政府，像段律师说的那样，还你的清白，什么都可以还得到。问题是你要不要得起？”

我既然做到现在了，我的贡献也可以说帮助了不少人。到现在停下了也不是什么坏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维权这么久，正义心有，我也蛮想做一些义工。毕竟帮助过别人，那个心态是很好的。助人为乐，有一点成就感。这个我可以肯定，不然我不会做那么久代表。这次被抓进也是一个磨练，我也没怪谁。

像 YH 他也在背后支持，但是他和那些代表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些代表会在谈判的时候出面。

我们代表做的事可能引导方面有一些差错也有。团结方面，像我们组织第二批也有很多怨言的。主要的还是骨干太少。他们很多都抱怨什么事都是几个代表在做。如果有 10 个人，像我和海×这样，就可能事情不会搞到这样。工厂知道我们只是几个人，搞定我们这几个人就完蛋了。我今天和海×聊了，我进去的时候我们工友在外面是怎么样。他就说只是他和蒙×在跑，其他的人很多就是精神

上支持。这个我在里面也想得到的。过年前我都跟你抱怨过了，只是我和海×去 GZ，其他人起作用的还是少。如果他把海×也捉去了，可能今天我们就散了。YH 可以出主意，但是他没有出面，他那个凝聚力就不大。所以我觉得我在工友心中的重量，最少要三分之一。我退了，他们的力量最少要少三分之一。如果海×蒙×也退了，完全就没有一半力量了我们。

我今天和何经理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呢，厂里说我旷工，把我炒掉了。他就跟我暗示是外力，政府还是什么的原因。说这方面他也没做什么，不是他的原因。我也想得到是有外力搞。因为在何经理心目中最针对的就是谢××和海×。他们骂他的那些脏话我都不说的，我跟他从来不吵。他也跟我说：“你坐这个位，我坐这个位，谈判起来是对立的，有什么问题，私下里说什么也行。”我感觉跟他，除了在这种事情上以外，没有个人恩怨。我在牢里想，肯定是老板要搞我。我是首席代表，让他亏了那么多钱，不是何经理。

是吃一堑长一智。对我来说，经历了这么多，处理问题的经验肯定有提高的。以前就是打工什么的，想问题单一一点，有一些东西不去想的。比方说，我看一个问题比以前准了，直觉上就知道这个是对是错，比以前聪明了一点。那天我们和何经理聊天的时候，他说在我们工友里面我的悟性高。何经理说的那些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他做官不做了，是看到做官的黑暗。他出来做生意，做亏了也是当官的黑暗搞到他亏的。那些人就笑他，你为人做了坏事当然受到惩罚了。其实他说的是真的嘛，政府是真的黑暗，只是他没有说得没那么明白而已。海×他们就知道挖苦他。他那天晚上说的也有一些道理，他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各顾各的，你别怪我我也不怪你。大家在这里谈心，你被出卖我也被出卖，都是一样的，大家谅解。你没有多想的话，大部分工友都说是他搞出来的事。但是你想多一点，要是我们不搞这些，怎么会搞出（事来）。因为大家也有，谁对谁错很难分辨。他说的也有道理，大家分开，站在我们的

立场当然是要自己的东西了，但有的事就觉得不要做得太绝。

矛盾出来了，就是大家针锋相对。我们去香港学习，那些老师也提过，我看了那个达格南制造，其实他们提过，那个协商不一定是以某一方面的胜利来解决的，协商也是一个让步的，你让一步他让一步，事情解决得更快一些。就像电影里他开价要升 100%，后来是 80 几 90 几。就好像我们在 HY、HB 那方面，做事按照大方向就行了，不要按照一点点的百分之几，那个字眼，就为了那个。后来想那个就为了那个 HB 还是 HY 谈不来。

所以我那会和便衣警察说，我不带头，但是社保肯定要买，要是追别的我也会跟着后面。你说要带头我不会带头，我也怕会有第二次（再被抓）。

其他代表被骚扰的情况

我今天和海×见面谈了下。海×他被那些人找过，但是他不在家，就是以查户口查计生的名义到他住的出租屋那里查。以那些名堂，直接抓人也不行了的了。那几天都很多人过去找他。其他的工友就不知道，海×只和我说过。

海×跟我一样，两夫妻要养小孩，他跟我一样都是为了那个心做出来。看他走了那么多，我也跟他说了一点点，暗示他不要带那个头。我们做的最不好的，就是以前我们想法就是你不做我不做，（追社保）这个事完了，然后自己做了别人那份（其他代表该做的工作）。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把自己推高了，所以他就针对我们这几个人就行了。如果我们把代表的责任分散了，外面的人肯定没有那么容易搞到我们。打个比方，不要像我一样一个人，一个总代表做事，他抓你一个总代表就行了。如果你分散责任了，就分散风险了。我没有对海×说的很明白，我只说：你现在走的那么辛苦，也让别人

分担一下，也不要全部自己做。我看 CB 她们的情况，就算前面带头人走了，后面还有人来接替嘛³。现在如果他退，我也走了，会不会散了呢？所以如果大家分担了那个责任，我也可以再继续做下去，不然，不扛那个责任又不好，自己一个人扛又扛不起。

但是现在召集他们开一次会也蛮困难的。为什么开那么少的会，因为毕竟，我也怕，过了年其实我出面不是很多，我都是在背后。其实年后我的态度都退了很多的了，在工厂里就是谢××带头闹。我在工厂里不跟管理们争，在外面起个带头作用。我想如果老板恨我，可能就是说我带头（做首席代表）让他吃亏，如果政府整我，就是那个便衣往上面报告的。因为毕竟放假以后开什么会，都是我来总结，我来说，开会太张扬了一点。我就想如果我不太张扬，就不会这样搞我了吧。

访谈时间：2012 年 5 月 8 日

访谈背景：我们在结束对 HB 工人的大量访谈之后，来到 MJ 家补充一些相关的文字、照片和视频材料，又问了一些以前聊过的话题。

再谈第二批工人的问题

问：有些第二批的人在想第三批的人能不能跟上？

MJ：我想就没有了，你们想第二



³ 指的是广东某市另一家工厂的维权女工的状况。

批的人都起不来，还第三批的人？除非有人教，有人带，那谁来带呢？其实第二批的那时候我们很冒险带他们出来的，那时都是我一个一个人发信息问他们来不来学习呀，现在谁会做这个呢？

那时候第二批的会去追社保，主要因为那时候陈书记见了我们吧，交了个人补缴的钱给工厂。他们就感觉到有机会了，就立刻去人事部那里，签名要求。人事部就跟他们说：他们（第一批的人）搞定了，你们肯定有了，不用急，到时候厂里会安排的。

那时候我们才发那个信息问他们想不想要追社保，要就教他们怎么做。我们让他们先把劳动合同要回来，他们不敢的，还要我们和他们开个会，打完气他们才敢去一步步做的。不然他们第二批也站不起啦。有一些虽然让他去拿合同，但还是不敢的。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先去社保局给他们报了个名，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写了个补缴社保申请书，把所有的人名报上去，把工资单、厂牌自己手里有的东西先拿过去。这样之后我们跟他们说，劳动合同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前面就白费了，但后来还是有些人不敢去拿。所以原本报名是九十多个人，实际真正拿资料全部交齐全的只有五十多个人，有一些人一直不敢去拿合同。

问：当时劳工机构那边有没有建议你们怎么带第二批呀？

MJ：像我们如果开会呀，就尽量叫他们过去多学一些。那时候他们就想报名就跟着来，我们就让他们选代表。其实我们找那个代表已经找了好久了，我们一直在找谁有做代表的那个能力，找到后来才找到几个。（劳工机构建议他们过来学习，他们很多人也不过来。）

问：那些人不愿意出头你估计是什么原因？

MJ：很多原因的。怕被厂里炒，怕麻烦。怕麻烦是最重要的，他们知道第一批的代表做了多少事，打个比方，每个星期都要去劳工机构学习、参加活动，自己的私人时间就少了。像谢××曾经说

的那个话，很多都是代表心里的话：我这个月都去了几次了，平时每晚加班，回去小孩都睡了，星期六、天如果不加班，她就想跟我请假说这星期不去了，要带一下我的小孩。谢××做得好的就是开始每一次都去。如果真的坚持每一次都去，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得到的。去做代表呀，要开会，没有私人时间的了。其实他们也看到我们这样做，也可能也怕这个。

再谈工人代表

当时第一批里面，签字表态做代表的十几个人，好像这个向×去年就辞职回家了吧，其余的人里，朱××、伍××后来找工作很少露面了，莫××与郑××可以说已经退出了代表行列，黎××从头到尾也是挂名的。谢××跟蒙×一样，做的比较好，但是她和蒙×不会提意见，想不出主意，有什么事让他们做，很乐意去做。所以这边蒙×跟阿强是主力，还有甘××、李××。

原本第二批的我们找到几个人了，谭××与胡××，但是现在他们又怕了，所以说这个就难做了。我们现在，比最开始刚刚十几个人那会，虽然学多了一点知识和经验，但是那个我们在人上面吃亏了嘛（指自己和另一个代表被抓）。现在再找十个代表出来，也不知道找不找得到。我们4月份去厂找人事部的那时候，第二批的冒出几个，那时候我真的看到希望了，团结了。但是现在可是说是我们失败了吧，信心也被打了一点。虽然拿到了社保，就是自信上面有点受挫。如果再搞，再联络，再安排，人气可以再补一补。

所以我看不足就是，代表的人数我们也不比CB的人数少，但人家每个代表都发挥作用到位，比我们还要好。其实方法做法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行动成功和失败就差一点点了。我们做的跟她们很多都是相同的，做法呀什么的，也有罢工呀。我想她们谈

判的能力可能要比我们强，虽然我们也经过那么多的部门去谈判，但是得到的结果不是很好。其实我们够胆冲的有很多，但是谈判代表只是那几个，要多两个的话也选不出，可能我们比 CB 不好的就是这个。

另外也有男女的分别。那些女的，谢××她们为什么那么勇敢呢？如果要是我我就做不到。女的认定你是坏的，什么也敢做。那些男的也是有点怕的，但是理智方面，男的做事就是比较理智，想的就多一点，女人其实勇敢起来呢做事要比男人还要好，男女均衡就是最好的了。女的就像莫××呀想的方法都是激进的，其实她们想的真的没有我们那么深入，那么理智的，想的那么多的。但是我们不敢做的，那些女的就敢做。

比如我们说这样的办法可以做，她信你的话，那个执行力度肯定比男的好。就像那个母爱一样，如果你儿子受欺负，那个做母亲的行为肯定比父亲做的过激。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她们想的不太多，就需要跟她们说清楚，比如我们商量好，围何经理的时候如果打起架不要还手，你倒下来就行，那时候她们就坚决执行了。

这次她们被打倒下来，如果报警之后，和解了，没人去派出所，可能就没有后面这些事了。所以我就想，事前〔应当〕多想一点，组织好一点。

像那些环卫工人就和以前的我们一样了，申请表寄去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答复，他们不知道要不要去问呀。海×说去问呀，第二天就去问。我们其他人建议说应该想清楚怎么个问法，想好了才去问不是更好吗？给他们先培训好，打好底，再去谈也好一点呀。但工人方面很着急的，先去问，行就行，不行回来再说。所以大部分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那个话事权，就很难说服他们的。就好像有一个人说明天去吧，可能那些环卫工人就说那就去吧。如果我说等一下，想清楚之后再去，没人听的。

那个从众的心态也有一点。我研究炒股，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个羊群的心态嘛，很多人说好的事情，虽然你原本说他不好，但大多数人说他好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呢。就像你看到那个股票，可能会升的，但每个人不要她，你还敢要它吗，就停在那里了，不敢去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的。

还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有一些提议提出来，谁提出来就要谁执行。我们现在就是谁提出来就是总指挥。别人不明白，就是你来解释。

就好像我也说以前 YH 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很激进的，他够胆提嘛，但如果换个位置呢，我就不一定够胆提。万一我指挥了，你倒霉了，或者出问题了，我就要承担那个责任。YH 的提议都是好的，我可以肯定，但是到现在，有些人对 YH 有意见，别人可能觉得，你提议很激进呀，但是到时候出了事，你又不负责，你在一边看着。知道你提议是好的，但是说多了，光说不做。

现在我就担心他们第二批不够胆，可能他们争到了，还会有第三批。但是像他们的心态有一些就是快一点，我现在提的意见就是想好一点才做，对他们来说就是保守了。

其实第二批肯定比我们容易，跟何经理说或者跟政府说，跟着第一批走，但我了解的情况就是，第二批的代表很多人看见我被抓进去了，有些人就退了。第二批的人想让我们第一批的人表一个态，还要坚持帮他们。

那我们怎么表态呢？难道我好不容易出来了，还要搞你们的社保？我就不想表这个态了。我的意见就是，他们第二批怎么组织，如果来问我，我会教他们一步一步怎么走，但是起码他们要找出几个骨干出来，他们没人够胆做代表，难道我够胆吗？

我经历过这些事，我肯定会给一些提议，是可行的。但是我已经离厂了，你还要我干什么，我就有一点为难的。我的心态就是我知道什么就尽量跟你们说，叫你们尽自己的力，这个我肯定做得到。

但他们要先把自已组织好。

结果那一次大家讨论的结果，就不用选谁是第二批的总代表了，有问题大家一起问，大家都不说谁是代表就行了。



再谈和劳工机构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有时候出去也不是谈我们的事情，也让我们介绍给别的工友，工友让我们介绍一下。但主任让我联络，今天找一些人来开研讨会呀。我们代表去的那个心情，就是去学东西，怎样解决我们的事情。去到了，就有很多个工厂的人在那里，有些做的比我们还要迟的，说起来还要我们教他们，倒是我们的问题就没有谈多少。我们去开会有一半都要跟别人交流我们的经验。其实我们去的都是想学东西的嘛。去劳工机构还有一半时间是做别的活动，要我们男的穿高跟鞋走路呀，时间是白费的，给劳工机构撑场面。

不只是我，他们其他代表对这些也有意见，好像每次来都没有谈多少自己的事情一样，很多东西还不知道怎么做。

我就肯定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但其他人就有意见嘛：我们是过来问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还要我们教别人怎么解决。都想赶紧把机构的会开完，让我们腾一个小时讨论我们的问题，其实后期都是海×呀，YH 呀，还去服务部那边嘛。原本我们每次都可以号召十个人去机构，到后来就只有五六个。除非我们真的有什么行动了，要研究什么，开讨论会什么的，人才会多一些。

像五一节，要我们那么远跑过去看一个表演，其实有些人是有意见的，又不是谈我们社保的事情。那个文化街区呀什么的，哪里

有人去搞文化街区？我们都是没文化的，找一些有文化的人去嘛。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维权，跟自己利益有关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想。其实他们开的那个文化街区呀，什么志愿者呀，可能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那时候才有心情参加。其实我是很累的，但是不去又觉得不好。

再谈地方政府官员

我们去市政府上访的时候，区政法委书记和我们谈，那时候感觉他还是一个好官呀，觉得他说话也蛮有力。毕竟他说他是政法委的，说话什么的当然严厉。并且他那时候还说：“我现在来了，有什么事找我呀，给电话我，搞的定搞不定就是我一句话。”这个肯定对他有一点信心的啦。那时候感觉他很干练，但是后来，他就没有再出面了，都是和他打电话，问他什么事情都是推脱的。后来，我们给厂里交了自己补缴社保的那份钱，他让我们一起去吃饭。那时他就暗示了我一句，去市里上访，一次就够了。他还说，一个什么村的人，去上访了好多次就没有结果，也把他們搞事的关起来了。我们去 GZ 上访呀，搞的那么大。这个事现在已定死了，一次就够了，不要再有第二次了。我当时也顶了他一句，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反正我们现在钱都交了，也已经搞定了，哪里还会有第二次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但是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可能那时候他就知道要拖我们的了，现在想起来他的意思其实是有下文的。他可能就是请我们吃一顿饭，有一个底，但那时我们还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等到三月一号，然后不停打电话给他，他就开始推脱了。可能他以为我们不会有第二次了。

再谈律师

现在是 L 律师（一个 PY 本地律师，和劳工机构有合作）做我这个案子，其实 L 律师他也不敢接，这种要跟公安局打交道，接都不敢接。

之前，有一次主任带我们带华师大去跟学生讲课，介绍我们的经历什么的，L 律师也去了。那时候我们没见过 L 律师嘛，我们有个工人坐在他旁边，就问他有名片，他说没有带。后来呢，有别的人问他要名片，他就给了人家。那个工人就跟我说了这事。我猜那时候他的心里都有一点怕我们，应该不是怕我们出什么事情，就是怕我们老板。他也给很多公司做代理，不敢得罪很多工厂老板的。个人的劳资纠纷，他可能敢接，他看到我们一百多人，还是一个这么大的厂，他可能就不敢接了。



工人代表 WSY（起版部）

我 97 年第一次出来打工，因为年龄不够，才 16、7 岁，所以没进到工厂里。那时刚读完书，出来学点手艺，就跟人学了首饰起版。真正进厂是 98 年了，一进去就算是熟手啦，当时工厂在 PY，就在这里隔壁，以前是东宝。我是自己找的厂，当时大概有 200-300 人，是东宝的一个分厂，算作挂靠的，就像现在挂靠莲花山一样，但其实也是独立的老板，因为市场经济的许可问题。

在东宝厂

刚进去是底薪是 750，加班很厉害，而且加班费还低，7、8 两个月，连续加班到 12 点。星期天都很少休息，那两个月也只是 1000 多块，我们几个老工人已经拿到三四千了。加班费应该是七八块，750 按 26 天算，再乘以 1.5，周末也是 1.5 倍，平时正常上班时 8 小时。



刚开始有食堂，是收钱的，后来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只做了不到半年就走了。刚开始住宿舍，没钱嘛，好像是要扣钱的，几个人一间宿舍，挺杂的。我直接辞工走的，退了押金，但是领不到工资，工资有 800 多，比押金多。

东宝老板是香港人，跟 HY 老板是老朋友。那时候东宝的厂已经倒闭了，因为怠工，没有订单。他们原来是大陆的，移民香港，现在要移民去加拿大，大老板都移民去了美国。

与 HY 相比，管理还算可以，聊天说话可以，上厕所也没问题。我们农村出来的，吃苦惯了，觉得加班到 12 点其实也还好，比做农活轻松一些，而且收入比别人还高一些。

我刚进厂的时候就能按照图把版做出来，大概 03 年发展成电脑起版，不过当时电脑技术不成熟，现在电脑绘图容易上手，都是学电脑的了，手工起版很少了，没有新人加入了。不过有一些复杂的不规则的，比如动物呀花草呀，就替代不了。电脑起版和手工起版成本差不多，工资也差不多，但是他们要快一些，画完图后用机器去做模型，直接喷蜡。

在 HY 厂

我出了东宝之后，我自己去了 HY。那天是无聊到处走，看到 HY，他们没有贴招工表，但我还是去问了问，他让我上去问厂里部门的师傅。师傅说收人，我就去试工了，试了一天，就进去了。当时我身上没钱，也怕被炒鱿鱼，还好那些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进去的工人也不会排斥我们这种自己进去的，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因为是自己找到的工作就有优越感。那时底薪是 1600 元，99 年的时候。比在东莞高了一倍。表面上看我们部门比其他部门的底薪高了很多，实际上，其他部门也会赚很多钱，因为我们只有工资，没有其他的，像制模，有损耗，如果损耗少，自己就会赚多一些。

起版这个技术在首饰行业算比较关键的一步，但我就是感觉自己挣不到钱。99 年 7、8 月份加了工资，加到 2500，当时拿 2000 多的做得都没有我好，我就跟老板谈。虽然工资是保密的，但是大家熟了就都知道了。01、02 年的时候，搬了厂以后加班多一些，底薪是 3000 多，旺季的时候加上加班最多能拿到 4000 多，从来没超过 5000。我还是觉得不够花，平时也没怎么出去玩，主要是家庭生活中的开支。01 年的时候在老家盖房子，我是最小的，谁有钱谁出，大家都是兄弟嘛。我哥哥们之前做水电的，工资非常低，我刚开始进厂时，找试工需要 400 块押金，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在佛山，他们都没钱借我，最后还是问平常住的地方的老板借了 400，后来，我一出粮就把钱还给他了。我有到珠海那边找过其他厂，不过他们发不起工资，如果给得起我就去了，那边说是有 3000-4000 左右。那时候建房子借了钱，需要还钱。05 年建了房子，结婚，08 年在肇庆那边买房子，大概是 20 万，贷款 15 万。所以觉得没什么时候是有钱的。我和老婆一个月要还贷款一千多，08 年的时候也不算太贵，

现在贵一点了。孩子在那边读书，每个月也需要学费生活费，一租房，什么钱都没了。

HY 加班不算太多，最多有过 90 多小时，以前在东宝有过 100 多小时的加班。在 HY 最后的底薪有 3500-3600，金融危机的时候有降低工资，我们部门是损失最大的，因为我们开始时底薪很高，一下降到 1000 多，之后，我就不再加班了，不喜欢加班了，自己接一些零活做，老板也没意见，习惯了，而且很多活也用电脑代替了。年轻人在家学两三个月就进厂，进厂几个月就能拿几千块。我们珠宝大部分都是手工的工人来追讨社保，起版的大部分都不敢站出来，只有我们几个，到现在都是这样，怕丢工作然后找不到了，都要养家糊口。也不是说那么难找，珠宝厂很多的，只是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出去就会觉得很危险，怕变动，要搬家，要找工作，很辛苦的。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干了 5 年以上的老员工。

02 年的时候已经有人要求厂里买社保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发言权，也没轮到。那时候都是厂里说了算，他说没有就没有。那时候买社保才几百块一个月，也不划算，很多人都不愿意买，把名额让给别人。

04 年又补了一次社保，也是限量的，有名额的，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名额。

厂方有组织一些篮球赛、羽毛球赛、足球赛，在厂外的场馆去打，不过没有固定的队伍，都是临时挑一些人参加。还有举办过联欢会。

做我们这一行的，去很多厂都有老乡，肇庆呀广陵呀，这个手艺主要是熟人传递，比如我回了，然后教我兄弟，一两个月就能进厂了，花费不是很多，在外面看来，工资还比较好，所以主要都教熟人，可能一家人、一村子的都做这个。做起版的就肇庆的多些，其他地方的可能不太喜欢，或者找不到人教。

我们部门跟其他部门是一样的，工资待遇日常福利全是靠进厂

的时候跟老板谈，后面就不会再增加了。跟老板讨价还价的底气也是看个人的。做的人太多了，就算你不干了，厂里能马上找到替换的人，不过真正能做到事的也不算太多。

选代表时的要求是只要愿意出来说话就可以了，能力可以慢慢培养，我也是什么都不懂，慢慢总结出来的。做错了没关系的，要包容嘛。

我对陈书记的印象就是他说啥事都帮你搞定，后来却啥事都搞不定，其他工友都感觉他说话算话。政法委书记是管治安方面的，带头监督厂方跟我们。当时已经去了人大了，没有人站出来带头，我们是想解决问题的，既然有人带头解决事情，那我们也要信他。他也口口声声说副局帮我们搞这个事情，我们早上去市人大，下午去兰河那边协商，十一点多还在人大那里协商，陈书记带头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一百多人，全部知道他电话，他说有什么事直接给他打电话。所以我们也不怕他糊弄我们，自己又回来了。

陈书记跟其他官员相比，正气一点，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说要负责就一定会搞好。其他官员都是耍太极，说什么你们不要闹了，回去，我们会帮你们调解的。陈书记不说这样的话，他说一定会帮我们处理，一定帮我们拿到，后来还请我们吃饭，当时还觉得他是真的在做事，吃饭的时候也是开心的聊家常，没有聊这方面的事情，说话客客气气的，还有点尊重我们。毕竟刚开始的时候社保卡也有一万多嘛，收了我的钱，不可能把我的钱吞了吧，如果吞了就更有理由去找他了。

人事部经理，她跟我们员工就是完全对立的，拿厂方做势力，很嚣张，好像自己的话就是代表了厂方的话，她说不给就是不给，完全不近人情，不讲情理。一开始厂方口头宣布去领补交工资，是我去领的，何公公在台阶上谈的。一开始他是笑眯眯的，上次三号我回去厂里补缴社保，他不收我的，说财务忙。我就打电话给劳动所，劳动所又打电话问厂方，厂方说最早要四号，到四号早上就收

了。之前明明通知的三号回去交钱，不过这都随他啦，最终四号还是收了，有一个最少的一千三百多的没交。现在应该差不多都补交了。现在很多工友要去地税那里追，如果厂方全部补交，就要追去地税那里了。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感觉第一批已经没有问题了，第二批的人就是怕，想追又不敢追的样子。我觉得第二批是没问题的，如果第一批都能拿到了，就不用追厂里了，直接拿第一批的人当例子问社保局跟地税局，为什么第一批的可以拿到，我们为什么不行，如果拿不到，我们就去告。就没问题了呀。

我个人觉得有人怕是正常的，不可能所有人都不怕，有的人可能怕人太多，花钱太多，不好团结，厂方负担不起呀各种，我就不担心厂方的经济能力，几百万对老板也不算什么，主要看我们工友团部团结，我反而比较担心这个。人心是最难控制，最难统一的。所以我出来之后，阿顺也出来了，接着蔡满吉和玉梅被抓，第二批工友就更加害怕了。我那天就跟他们说了，如果你们是这样想的，那我们就约着一起出来吃饭，解释一下，会不会受到厂方的影响。我是想让他们不要太担心这个事情，放心出来搞，别怕，拿出自己的能力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我被解雇了其实是好事，对我不算太大损失，反而不解股才是损失，但其他人就觉得我们被整了，觉得害怕，其实我就是想解释这一层关系，我不是受到厂方的压力出来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官司。工友们怕厂方炒鱿鱼，但是我不怕的，我没有太多的心情在那里做了，而且如果认定他要赔的话，对工人也是一个鼓舞，这个官司我希望能赢，赢了可以给工友一个榜样嘛，而且我还要赢得漂亮，不然很多工友就会害怕。厂方也希望跟我打下去，因为可以影响到后来的工友嘛，今天早上他就是想方设法弄我的入职问题，说我旷工两天，满两天就说我自动离职了。原本是旷工三天算作离职，自从我四月二十四号申请仲裁，那之后就变成旷工两天算作自动离职了。很多工友二号、三号在人事部，他们都是按旷工两天算的。我没有旷工三天，他们要找个出处说我

自动离职，我有提供病历，证明我是病假，不是无故旷工的。问题是他不批，厂方不批我也要走呀，你又不接受我的病假。他后来又说我没有跟他说，我是5、6号旷工，回去上班的时候，他已经炒了我鱿鱼了。现在要等结果出来。去年就是11年的9月20号，那时候就说明了是旷工两天，一直以来放假通知单上都是2天以上满3天的，厂方变来变去的，自己都矛盾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厂方又很多动作是针对我们的，我已经预料到了，只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招数，我想这大不了就是炒我鱿鱼呗，最厉害的就只有这个了。我感觉满级跟玉梅都是因祸得福，如果不是这次无缘无故被拘留了20多天，厂方可能就是一直给你放假，放到你自己走了。现在还可以追讨一些补偿金，毕竟我这样的算下来也有几万块钱呢，他们的情况跟我的一样嘛。我跟厂里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即使不签合同，被解雇，也应该是双倍赔偿。不过他们的可能比我的麻烦一些，毕竟是刑事案件。最多就是拖时间咯，不过时间不是问题，这几个月可以找工作，几个月之后再回来，都没关系的，不用太担心，担心也没用，我现在就是打散工，还是要生活的。一年多了，玉梅满级是代表，特别是满级，是带头代表，跟玉梅他们经常一起出主意，毕竟一年多的训练，出来都没问题的。他们都是福气人，现在不仅又经济赔偿，还有工友的支持，最关键的是工友会站在你这边。你有能力，进去拘留也是福气。如果那时我在厂里，估计也会被缉拿，那时候我进不去厂里，正好回家了，当时有工友给我打电话，这个行动我是知道的，一开始都让工友保持克制，因为如果上马路马上就会被拘留的，但是在厂内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是劳资双方问题嘛，自己解决。当时二号晚上我也有看新闻，看到了基本情况。

之前我在这里的时候都有商量过，就说各方面都考虑一下，但是始终有些思想比较难统一，积极思想很难控制，人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商量的时候可能还能统一，现场就很难控制了，有些人听

不到你说的话。厂方又用了一些手段吓工友，满级他们出来的那天，我也过去了，我一开始就觉得定不了罪，因为当时有报案，厂方报案了，现场有警察，有地税人员，有辅警，有政府人员，都在，怎么禁锢你呢，如果禁锢你了，现场的警察早把我们抓了。

我仲裁的那个案子，有牵扯到的部分的回复写的是，四月三号的就是说强迫厂方写的。

十多年前没有觉悟，现在去追的已经有一点觉悟了，就怕有一些知道了还是不去追。上次我回去领工资的时候，还有一个工龄十几年的，问我怎么追，我都被搞懵了，他好像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电金部门的，电金部门整个部门都没有追社保，他们部门人不多，师傅压得严，但是都一年多了，都是老员工，他们好像就是怕被炒，天天加班，从年头加到年尾，我都不知道他们怕什么，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也在加班，他们可能更在乎工作，更在乎加班费吧，我估计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如果采取激烈一点的行动更容易成功，毕竟他们那个部门总是加班，那个部门请不到人的，有一些工位是有毒的，比较危险。刚开始，第二批也有人让他们加入，他们没有人加入，我很佩服他们能对自己那么残忍，对老板那么好。



工人代表 HJ（起版部）

HJ 是起版部门的代表，是 PY 本地人，也是社保维权的最初发起人。她热情积极地参与了前期的维权活动，也常去劳工机构学习。直到被公司放假后，她到一个商店打零工，还和新同事宣传社保的事情，并带他们到机构学习。

选代表、筹款和经费管理

问：“从这件事情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多了，开始你想到过自己会做代表吗？”

答：那时候我想过我自己肯定是要冲在前面了，因为追社保的主意是我提出来的，那些人也都是我去找的。如果我不做的话，你叫别人，别人肯定不愿意站出来了。就是这样的。

问：那咱们之前选这个代表，其实也不算选，就是自己站出来去做代表，对吧？

答：对啊，就是通常比较积极那些，会说话那些。其实好像就是被逼出来的，也不是被选出来的。

问：是机构那边建议的要有代表才出来做代表的，还是咱们大家自己觉得该有几个代表？

答：是那边给意见了，我们再选了。就是平时比较积极啊，做事比较多的，就问他愿不愿意。

问：那如果机构那边不建议的话，你们就不会正式选代表了吗？

答：那时候的情况是，每次去谈的话，也不可能全部人都下去，就是谁站在前面的，下去和厂里谈了。也没有特别明确谁是代表。代表的名额也是后来服务部那边建议的。

问：筹款的事情，是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机构那边建议的？

答：也是那边建议的。就是说你们请假出来办事，那个请假的费用啊，收费什么的，要给一点点了。主任那边建议是 10 块钱。我们说 10 块钱肯定不够了。不能每一次不够又再筹，不如一次收 100 块这样了。

问：机构这边不建议你们筹经费的话，你们就不会想到这些了吗？实际上有没有经费的需要？

答：那时候也会想过。每次我请假去办事，大家就支持那个请假扣的工资给我嘛。那时候也想过的，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起来。那时候一些人也不想出钱。怎么说呢，成不成功还是个问号，要是拿了钱又做不成就亏了，顾虑的比较多，心态上也不一样。

问：那怎么又转变过来想法，愿意了呢？

答：我们就叫那些人过来机构这边了解一下。那个时候他们不愿意过来的。后来我们就说谁交钱就收谁的资料，如果不交钱的不帮他拿资料到主任这边来了。

问：会不会有人说交了钱你们才给我办事，会有意见？

答：没有。他们也觉得，人家去给你拿这些资料啊，去复印啊办事啊，人家也要付出啊，给钱是应该的。但也有些人觉得，出了一两百，他坐在那里等结果就行了，什么也不用做了。一说就是找代表啊，去哪里都是代表去啊，都要代表做，他们就都不愿意站出来。一些很简单的事，去饭堂开会啊，或者谈什么事情啊，都不是

全部人来，都是一部分，其他人不愿意来，下班去听一听他们都不愿意。

问：他们交钱之后和之前对你们代表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答：没交钱之前好多事情他们不明白或者没有弄明白的时候，代表又没有拿他们钱，为什么给他们跑那么多趟呢？有些事情就他们自己去做，自己去问了。他们那时候有些人更愿意动，交了钱，很多人就不愿意动了。

问：那代表怎么想？

答：是啊，有些代表说，你们放假了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带小孩，我还要跑到机构学习，还要送资料啊，还要干那么多的事，我要浪费自己的私人时间了。

问：谁交钱就给谁递资料的主意是谁出的啊？

答：好像是时×他们说的。那时候有些人的资料自己不愿意送到机构，想给我们几个人一起送。我们就跟他们说，你又没拿出钱来，我们白给你跑腿啊。就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人是多了，还不如以前人少的时候心齐。好像这次发放假工资一样。发工资的时候呢，那些人挺积极的，一百多个人全部一下子涌过去。我们那些代表还站在后面。有代表都说应该我们先拿钱，才轮到他们啊。

等拿了工资，叫大家轮流去地税局去问一下什么时候补社保，那些人一下子就闪开了。真的。刚才拿钱的时候还那么多人呢，现在一说要轮流去地税局那些人就走掉了，最后 30 个人都不到。真的。

问：经费都用来补助代表什么费用？

答：就是拿那个车费，或者吃了饭了拿那个饭费。其他都没有。

问：经费怎么管理？

答：三个代表管理这个钱。一人拿一部分。

每个人去一趟机构补 20 块钱，因为他们从 LH 那边过来，比较远嘛。之前是实报实销，应该是 15、6 块钱。后来他们就说，我那么远跑过来，那四块钱，还要还给你，有意见。那时候也问了其他员工了，拿了一张纸叫其他人签字，其他人也同意了。我们没拿那个钱的时候，是经过其他员工的同意才这样做的。他们同意做了，我们还觉得这个也不是实报实销，还报多了几块钱，也不太好啊。别人就说，买一瓶水喝，还是要的啊，现在这些钱主要是用在车费啊请假啊这些上面。

如果很多人去上访或者去哪里，开支比较大的话，就是自费，因为人太多钱会很快用完的。现在还剩那么多钱，但是去多几次，钱很快就会花完了。

问：其他人交了钱以后关心过经费的情况吗？

答：不关心的。从来不问你现在还有多少钱，用了多少钱。

问：那你们几个代表之间会关心吗？

答：他们不问，我们几个管钱的也会说给他们听。

问：你们代表从开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会不会有一些矛盾什么的？

答：有时候会有。好像我们就说蒙×，在 QQ 群里说得话比较多，真的去做起来的话，又没那么积极。比如有一次，他跟我们一起和政府的人谈话，他又不发表意见，不出声。有些代表做了代表又不积极了，叫他联络几个人，去哪里哪里，他又不去做了。

还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做代表，但是意见很多。好像玉×，开始要她做代表，她说请不了假，晕车坐不了车。但是我们做了代表，去谈判了，回来跟他们解释，她又会说你们怎么怎么样（谈得不好）。我们就跟她说：“下一次你去和他谈。”她真的去谈了，又总说她自

己的事。她好像是那种如果她的自身利益没有受到什么大的触动她不会站出来的、比较现实一点的人。我们这里一群人，很多都很现实一点的，既不愿意付出又想得到结果的人。

问：代表中间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吧？

答：也有的。有人叫他去开会，或者做哪些事情，他都不愿意做或者站出来，那就退下去了。另外一些人主意办法比较多的，就站出来了。

问：那是你们代表商量一致说这个人不行，才把他退掉，还是他自己退？

答：他自己退。他自己说我不做代表了。我们在签那个代表名单（授权书）给厂方的时候，很多人就退出来了，就是怕。

问：你当时签名做代表害怕吗？

答：厂方也知道我是代表，不写上去他也知道你是代表了。写出来就是明确一下我们这几个人是代表。

问：那你们做了代表之后，厂方的态度对你们有没有变化？

答：没有代表之前，公司有事就发一个公告出来啊。有代表了，就让我们去问其他人的意见，让我们代表通知其他人啊。



问：其他方面呢？会不会更针对你们一些？

答：好像也是更针对一些。比如放假的时候全部代表都放假了，没有一个代表没放假。还有比较积极那些也都全部放假了。

问：首席代表这个是机构这边建议你们选的吗？

答：是。当时讲，有一个首席代表，作用是谈判的时候主要由他提问。

问：首席代表说话的分量是不是比别人更重？

答：也不会的，还是都一样的，每个人都会发表意见的。

工人代表和厂方、政府的交涉情况

问：开会之前有没有想要和对方谈什么？有没有什么分工？

答：临时叫我们过去的时候，没有进去谈的时候，我们几个代表也商量一下怎样提，怎样讲。但很多时候就是商量好了，到跟他们谈了，又不一样了。

开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写好，说好啊，怎么谈怎么谈。

主要是 MJ 跟 HQ 说的比较多，提一些问题。我们其余代表补充说了。

问：之前镇政府怎样通知你们去谈话？

答：镇里面叫我们代表去谈都是通过厂方。之前是那个镇劳动部门的主任跟我们谈的。他说了一大堆的话，好像他说的也挺有道理，好像在帮我们一样，不是站在老板那边的。

他说：“你们这样如果买够 2 年，社保就没法追了，所以你们现在再不追就不行了。你们在厂里做了那么长时间了，是要有社保。我也有朋友在跟你们一起追。我就告诉他，别人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你的那份肯定也有，不用出头。”

问：他的意思是不是你们不要这么多人搞事？

答：是啊。他说：“你们去上访可以啊，不要拉横幅啊，不要走到马路上啊。只要你们不违规的话，其他部门也拿你没办法。”还有我们和机构去公园广场搞中秋活动的事情，他说：“你们在厂里搞什么我们政府部门也管不了的，但是你们到外面去，那么多人聚在一起也不好啊，也要经过很多部门申请啊。”

问：厂方怎样通知你们去协商的？

答：厂方会有人过来通知，让我单独过去，说是去财务处，然后等去了财务处又说让我去人事处等着。估计想给别人造成一个印象，把我叫到财务处去了，说不定是要给我钱什么的，但其实去了那里又把我叫到别处去。

问：他们叫你去财务处，其他工人会不会起疑心？

答：不会啊。他们会说相信我们这些代表啊。一般我们谈完以后，员工都下班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再跟大家说昨天和厂里谈了什么。

那次我们 100 多个人一起去找厂里问社保之后，厂里说不让我们这么多人去，只让去几个人谈，谈完回去再和其他人说情况。我们回复厂里说，之前几个代表去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说过几天给答复的，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没有答复，我们这一百多个人当然来找你们了。

但那以后谈判的规矩还是定下来了。每次去跟人事部谈的代表不能超过 3 个。代表要去必须通过部门同意才能批准出车间。如果谁要是擅自离开车间，部门丢了东西就有可能赖在谁的身上。

问：那你们后来再通知什么事情就没以前那么方便了？

答：是没以前那么方便，以前我们可以去其他部门。但是文员可以出去到其他部门，我们就通过文员传递那些资料。那些文员都不追社保，但有些人会帮我们的。

后来是下班的时候去饭堂商量，12点钟的时候在饭堂聚在一起，谈一下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下一步怎么做一类的。各部门代表说，其他员工有感兴趣的就在旁边听。

问：管理会去那个饭堂吃饭吗？

答：管理和我们是分开的。我们食堂按照职位分高中低档的，我们是低档的。

管理开始不会进那个饭堂。后来可能是他们发现我们总是一大堆的人在饭堂里开会，以前饭堂里没有保安在那里看的，后来也派保安在那里看着我们。以前人事主管都不在这个饭堂吃饭的，后来她也过来吃饭。但她离我们比较远，不会离我们很近的。我们也不管她，她听到就听到了。其实那些保安没有什么的，他们也是打工的，他们也有家属在追社保。只是管理叫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了。实际上我们做什么他不管的。

问：在饭堂开了几次会之后，厂里派保安去盯的？

答：开了好几次会以后了。

问：那厂里还是反映比较慢了？

答：管理觉得我们搞不出什么事。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没什么的。

中秋活动风波

问：之前最早的时候，是你们自己觉得该多叫一些人一起追社保呢，还是主任那边建议你们多叫一些工友？

答：本来之前我们是30多个人嘛。主任就说，你们厂里有1千多人，你们占的比例也不高，肯定是越多人越好了，容易办事，聚在一起力量大了。跟老板谈的话，人少的话对他没什么压力的。

那时候我们在追社保的时候跟每个员工讲，跟厂方搞对抗，他肯定炒我们啊，或者调级、放假，我们都有准备的了。

问：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们的集体行动会不会被安一些罪名？有没有过这方面的担心？

答：就像我们中秋节那次想在广场做活动的事情，开始镇上一直不给批嘛。后来我们厂有个人的房东就在镇政府做事的，就说让我们打电话问一下镇里负责这方面的局长，如果问了他说不行的话，就投诉到镇书记那说他行政不作为嘛。我们也把那个人的电话给了机构的 YY。后来我们等不及了，也没问机构那边有没有给局长打电话，以为他们还是不批准我们的活动，就直接发了信息给镇里的书记，说我们是 HB 的员工，想中秋节在镇广场那里搞一个活动，你们文化局长为什么不批？就这样说的。听说那个书记当时在开会，开完会以后就叫那个局长留下来问这件事情，好像是说了他一顿。那个局长说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是被人诬赖的。他被书记说了一顿，他也不服。后来有天上午，那个局长直接带镇政府、公安局的人来我们厂了。厂里知道肯定是我们搞社保的人弄的这件事了。那个时候就叫了我和 MJ 两个人上去。后来那个局长就说了，说我们诋毁诽谤他，制造不好的影响，说我们制造社会混乱了，说我们这个影响他的人生了，说我们是犯法了，可能要拉我们过去那边去拘留啊，要立案留案底的这样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啊。他问是谁发的短信。我就说是我发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女工问我之后发的）。他就让我留下来，说这件事情现在搞到他头上，被书记骂一顿他心情也不好，他要是被降级了，想不开的话，都会赖在我身上了。还说如果你们去那里搞活动有什么问题、纠纷，都会赖在我们两个代表头上。对我和满基说，我们两个是本地的，跟我们村里哪个书记啊，谈过话，我们的家庭情况他们都很了解。就是在吓唬我们一样了。

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处理好，没有先问清楚机构那边，

又没有打电话问，就发短信。

问：你们和其他工人说这次谈话内容了吗，他们有没有什么担心？

答：我们跟镇政府的什么人谈，都会和其他工人说的。今天晚上谈了的话，第二天中午就会在饭堂里跟其他代表、工人他们说。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压力。我们知道他们说那些话是在吓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违法违规的。因为镇政府或者什么人，他们每一次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都问他们，我们追这个社保犯不犯法，他们都说犯法啊。

问：你们跟政府官员谈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挺好的，谈完之后挺安心的，让你们回去等消息吧，又没结果了的情况？

答：是啊。他跟你说一套做一套啊，你要求他做什么事，他应付你啊。反正现在就是应对你。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镇政府可能会向着我们，会帮着我们。但是说多了，谈多了，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话，那就听他们说了，听完以后就没当一回事了。

有一次去那个镇政府一起和厂方说好了，按我们的要求（1999年开始）补齐社保，后来我们那些人去厂里拿那些通知的时候，却是从2004年补社保。甚至有的做了十几年的还是从06年算。一百多个人去那边拿通知，就20个人符合，其他人都不符合。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给骗了。那时候让我们签名，好多人通知都没拿就走了。政府在口头上说的，没有在纸上写的，没有用。

我们几个代表早都想到厂方哪有那么容易同意啊。我们去了厂里拿通知的时候，之前我们猜到厂里会拉拢那21个人去签名的。因为那21个人签了名，社保搞定了，剩下不同意的人拿到仲裁那里再拖。所以我们去拿通知的时候，提前说好了，如果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全部不要签名。

在外参加会议、学习感受

问：你感觉听专家教授们讲，对你们有用吗？他们都有什么建议？

答：他们跟我们说了很多以前成功的例子啊，就是那些案例是怎么做的，也是给我们一种心理上的鼓励吧。

他们说我们要找到厂方的死穴在哪里啊。（被厂里放假以后）我们也没有找到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很被动。厂方那些人是不管我们在外面怎么搞，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就不理我们了。那天下午放假之后，我们第二天也回到厂里，要厂里给一个解释，为什么厂里其他的人都在加班，我们却放假。他说他们就是没货做，有权放我们假啊。那时候我们有 100 多个人放假了嘛，我们那会也想在员工下班的时候堵在楼梯上，不给他们下班。后来一想我们堵在那里也没有用啊，放假就已经是放了，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厂里又不让我们进厂，不让进车间。我们在那里闹，对他没有影响的话，他也不理的。

为什么没能罢工？

问：代表们开会时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怎么解决啊？

答：听哪一个讲的有道理。好多时候大家意见都挺统一的。个别的时候有一两个意见不一样的话，他都会给其他人作说明啊，解释啊。

问：有段时间不是有些人提出来想罢工了，但为什么没有罢起来？会不会因为之前威胁过你们两个代表，所以会有一些担心啊？

答：也不是怕威胁。当时我们都是跟其他的代表一起商量的，看他们同不同意。因为怕也没有用啊，要做什么都是一起去做嘛，又不是我们两个单独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怕不怕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个部门都是只有一部分人追社保，其他人不参与。比如执模部几百个人，如果只有几十个人罢工，担心对厂里产生不了影响。

而且有些人在怕，不敢站出来。他们觉得，要饭碗也要社保。到了后来被放假没事做，没工资的时候，大家又觉得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候，所有人的自身利益都受到损害了，肯定会站出来了。

问：这些都是大家讨论的结果吧？

答：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办法，大家都说出来讨论一下。也讨论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结果会怎么样，都觉得结果不好的话，也就不想做了。

行动中男女工的差别

问：厂里男工多一些还是女工多一些？去政府谈判的时候呢？

答：厂里女工多。谈的时候男代表多。但女代表话也不少，想到什么就说一下。

女工都不愿意站出来做代表的，比较积极的都很少，就两三个。

但是叫大家去哪里去哪里（集体行动），还是女的比较积极，男的还懒一些。男的每次都是去那几个。但是那些女的有时间的都去了。

代表们和第二批补缴社保工人之间的关系

问：第二批补缴社保的人现在是什么状态？

答：第二批的人也不积极啊。我们要他们去催一下社保的事，他们说不是有你们代表去做了吗，有你们代表去做就行了。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做事，还总是催着问我们怎么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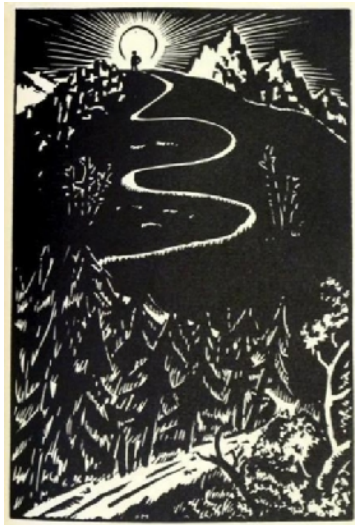
问：第二批和第一批的人有什么矛盾吗？

第二批的人不积极的。所以我们有些代表不想管他们的事。当然，第一批不理第二批也不好，毕竟人多力量大嘛。但是要是我们把他们的事全都揽下来，太累了。第二批当然乐意把这些事情全推给我们做，他们什么都不用管。

好多人都这样认为，我们第一批的，就算我们不去催，肯定有一天会行的，就是时间的问题。我们不用那么急的，就是为了你们第二批才总是催催催的了。但他们第二批的总是在问，第一批的钱交了那么久了还没有结果，他们第二批还有没有希望。就这样想的了。他们就觉得好像那些第一批的都不愿意帮第二批的。

问：他们也交经费了吧？

答：他们也交了钱了。第二批的钱我们都不敢动，因为万一要不行我们要退给他们的。



女工代表 LX（执模部）

“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人家说这个行得通，我们就去做。不犯法的，我们都会去做。”
——执模部代表 LX 访谈

LX 是当时积极参与补缴社保的工人代表之一。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属于典型的在外任劳任怨工作、在内辛勤操持家务的女工。这次对 HB 工人的访谈也是住在她家里，由她来张罗我们每天的食宿和帮忙联系工人。LX 最早想要社保是因为自己做了妈妈，感到社保对自己的生活很有用处，一直想买，却一直买不到。LX 虽然对于补缴社保的行动并没有提出过什么策略主张，但只要大家决定了的事情，她就会认真去做。按她自己的话说，不知道要有什么办法去追，就是想要追。

在 2012 年 4 月 3 号，工人们为了要书面回复聚集在办公楼的时候，因为最后时刻和人事经理发生冲突，LX 被推倒在地。工人们报案后，她作为“受害者”进了派出所，在不到 10 小时的时间内，却先后被“审讯”（态度恶劣地做笔录）了两次。对于一个常年工厂、家庭两点一线生活的单纯女工来说，生平第一次进派出所便被警察们态度蛮横地盘问了两次，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可是她却能挺起胸膛和警察对话。因为她心里坚信，工人们补缴社保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她看起来没有多么聪明机灵，也没有被培训过任何应对技巧，但当意识到警察在诱导她说一些话时，出于保护自己和代表们的本能，给出了机智的答案；也很细心地发现了口供笔录上警察故意添加的一些词句。她表现出的勇敢、机智、细心，除了她本身性格特质，也是在与其它工人配合行动中，在劳工机构

的交流学习中，以及和官府的反复交涉中锻炼而成的。

另外，从警察的态度和提问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但明显偏向资方，而且不停地给工人代表“挖坑”，搜集、制造工人代表的“罪证”，协助公司报复。

打工经历

我是 1999 年 19 岁的时候从广西老家来 GZ 打工。我姐姐在 PY 这边做首饰，一个月工资有两三千。当时他们厂不招人，我就自己进了东方首饰厂。那是个私人小厂，只有十多个员工。我交了 600 块押金，在那里做打磨。我去做了两三天，但我姐姐说那个工作要把手泡在凉水里，对身体不好。我就找主管辞工，扣了我 50 多块，说是一餐伙食费 7 块。

后来去了友利玩具厂的装配车间，大概有几百人。管理不怎么样，不迟到就不说人。车间环境不太好，很多胶皮，味道很大。我们车间还算好的，别的车间更臭。第一个月工资拿到 400 多。早上 8-12 点，中午 12:30-17:30，晚上不上班。计件工资，做的时间长的老员工有 1000 多。可能有好几百人。上班不怎么聊天，都自己做事。我去的那段时间。餐费一元一餐。住宿一个月要扣 120 元。

我在玩具厂做了一个多月，堂哥叫我去 GZ 一个酒楼里做捧菜（负责上菜的服务员），一个月 450 元工资，工衣 200 块押金，辞工的时候退还。虽然酒楼里包吃，但员工餐很难吃，早餐吃前一天的点心（剩饭）。住宿费一个月扣 120 元。老板经理另外坐一桌吃好饭菜。过年的时候有的客人会给红包。站着上班很累，钱也不多，半年后我就辞工了。

在 HB 厂的工作

2000 年赶上 HY 招工，那时候都是招 18-23 岁的人。我 7 月 4 号正式上班。进来以后干了半年的杂活，才到执模部。加班多的时候一个月加 160 个小时，或者 170 个小时，工资能有 3000 多。但我们品质查得很严，经常要求返工，有人都被管理骂哭了。

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工资还是 3000 多，加班少的话才 1500 多。2009 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公司放长假。回来上班后，我们的底薪降下来，奖金加上去，看起来工资总额没有变化，但加班少的月份工资就会少一大截。还取消了年底双薪。

我结婚的时候，请了一个星期的婚假。管理是批了我的假，可是发工资的时候，只给了那几天的底薪，全月的奖金都扣完了。名义上是给了假期，实际上还是把钱扣掉了。那时候我去问管理，我说早知道就不休息了，婚假和请假还是差不多。他就说“哪里差不多，请假你有钱吗？现在不是给你底薪了吗？你都休息那么久，还想要奖金啊！”奖金可是一分都没有发啊，几百块就这样没有了。

刚在这个部门做的时候因为掉货扣了我两百多块。就是在做货的时候，要在石头上打洞，没有拿稳石头飞起来了，掉到别人那里去了，找不回来。因为这个我被扣了好几次钱。

公司有一个医疗室，感冒发烧去那里看病，药钱会从工资里扣。

现在因为追社保被放假，只给底薪 1100 元的 80%，就变成 880 元。

为什么想要追缴社保？

最早在 2002 年听说可以买社保的时候，没有我的份，是师傅指定的名单才可以，一个部门很少的名额。我那时也还没有想到要买。

后来是因为我生孩子的那会，听别人说买了社保就有钱补，生育保险可以补几千块，没买的话就不能补。当时我们生完孩子，工资只拿到几百块。我就觉得，那样子的话，肯定买社保好。像我怀我女儿的时候，产检的钱都用了几千块钱。但还是一直买不到。所以后来听他们说可以追，我就很想追了。

其实就算没了 HB 厂的工作，我也一点都不留念的。我一直在想，如果有哪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追，我一定会去追。我就一直有这样子想的。

一开始，是听我们部门的人说有人在追。我说那肯定要去追。但那会他说只能追回五年。那我说，怎么做了那么久，才追回五年啊。我听到这个就不想追嘛。再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半个月之后，我老乡跟我说，她部门有人去追，已经追到了。那时候他们有人给了一张 DGZ 的卡片（名片）。我一听说可以去追，我就跑过去 DGZ 了，把我和老乡的资料都带过去，找 Z 主任看。那时候，我们部门只有我一个，我也问过其他的人，都没有人愿意追。但我想，我们部门没有人去追，也无所谓啊，其他部门有嘛。那时候听 Z 主任和 H 哥他们说，如果我们团结，人比较多的话，可能追回来的胜算会大一点。那我也回来宣传一下嘛，可开始就没有人愿意。偶尔有人说也去追的，但是真正要去人事部那里报名，说要追社保，就没有人肯去。

补缴社保的经历

刚开始的话，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办法去追，就是想要追。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人家说这个行得通，我们就去做。不犯法的，我们都会去做。我就是这样子想。因为 H 哥他们也给我们举了很多案例说，别的厂有追到的案例。我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怕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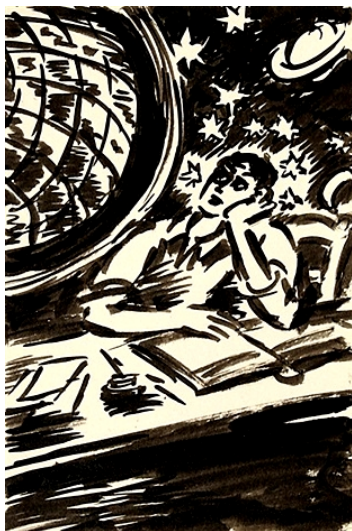
到。讲了一个例子是保安公司的，说他们只是去投诉了，就可以帮他们买了。也经常去听一下他们说追的经验，H 哥也给我们这个平台，去交流，这样子嘛。就比较感兴趣，想快点把他追回来。刚开始不说是代表，Z 主任跟我们说是联络人。那我就说，我们部门只有我第一个人去，那我就先做联络人了。

我回到厂里和别人宣传后，刚开始我们部门就我、小云、还有小罗三个人愿意要。开会的时候说，第一步要把合同拿到手。可是去人事部找公司那份合同书，就没有人肯去。

我们部门的 YH（和 LX 同一个部门，他已在老家缴纳社保，不用在 HB 补缴，但一直很积极帮同事出谋划策）也帮了蛮大的忙，在部门里宣传，开会出主意。第一次我们和其他部门的人一起签了名，去人事部拿合同。然后，有些人看到也心动了。第二次我们部门就去了十几个。再后来，一点一点加进来，一共有 37 个。

很多人是想搭顺风车的，反正有人去追，他只要报一个名。如果要他们去克服困难的话，他们就不愿意。我们后来收钱，很多人问我说“是不是交 100 块钱，就有人帮，什么都不用我做了？”我说：“我不知道啊。”那时候，Z 主任那边是免费帮我们嘛。他们就说，有这样好处啊，那就去追。有人甚至名字都不敢写到联系簿去。去拿那个合同书都不敢，很多人都不敢。

我们以前不怎么懂法律，公司说让签什么就签什么，让按手印就按手印，自己把自己卖了都不知道，还在帮他们数钱。就是因为追社保，才在当中学到了很多关于保护自己的法律的一点知识。之前即使看了有关于法律的书，看了也是白看。反



正我们厂也不会实行，就是一纸空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想到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也不会。就是到机构那边，跟 H 哥还有 Z 主任他们聊天。在他们那里学回来，用法律保护自己。

4 月 3 日冲突及派出所笔录经过

因为 YM 坚持要把“HY”的名字也写上，何经理不写，他们吵了起来，我帮 YM 说话，后来何经理把我推到了地上。其他同事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就我和何经理带上了警车。本来我不愿意去的，其他人说：“去吧，没事的，我们都去派出所等你。”我就去了。进到派出所之后，警察问我想怎么办。他说：“让你去验伤你又不去验，那你想怎么样啊？你又没有什么伤。”我说：“不知道啊，我只知道被何经理打了，怎么知道怎么办啊？”他就说那先做一下笔录，就带我去一个房间里做笔录。

第一次笔录

第一次是先给何经理做笔录，再跟我做的。警察问我怎么发生冲突的。我说因为追社保。警察说：“你追不追社保跟我没关系，我只问你们怎么跟何经理发生冲突的。”我就把经过跟他说了一遍。

他问了很多问题，似乎想证明是我们（工人）有错。他老是问：“他为什么打你，是不是你挡住他，如果不是你不给他走，他怎么会打你呢？”他问我：“你站在哪个位置？”。我说我站在最前面。他就说：“那就是你不让他走了？你不让他回家是不是？”就围绕这个问题反复问。我说：“我们没有不给他回家，我们只是有一些疑问要他给我们解答。”警察说：“他已经给你们解答了。还说如果不行

的话，近期再回复你们。他都这样回答了，你还不给他走？”然后一连串的问题问我“为什么不给他走啊？如果你家里人，你该怎么办啊？你老公有没有来啊？如果你老公两天一夜没有得回家，你会怎么想啊？”

跟我聊天那个警察，是很凶的那种感觉。我就说他太凶了。他说：“我凶吗？我对事不对人。”我说：“你这是对事吗？那么凶！”他说我的表情不好所以他态度才不好。我说：“你还要我什么表情啊，我现在都被人打了，难道你还要我嬉皮笑脸的？”那警察说什么话都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他老是问我“你想怎么办”。他打到你哪里了，伤到哪里了，你哪里不舒服，问这些问题。第一个做笔录快做完的时候，外面的工友打电话给我说：“你跟何经理的（纠纷—），不跟他追究好了，怕到时候追究下来，社保那边麻烦”。我就对警察说“我不追究了”警察说：“不是不追究啊，那就你们两个签好协议。”因为一直被他们问问题，脑子已经一团乱了。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那么多工友在外面，可不可以让她们进来一下？进来陪一下我也好嘛。”他说：“你要她们进来啊？可以啊，打电话给他们叫一个人进来了，只可以进来一个，你想要谁进来？”我一下想到叫 YM，因为 YM 那时候也被何经理打了，她进来应该也是有用的。这时候另一个警察说：“YM 啊，YM 我们调查她很久了，她是搞事的，不可以让她进来。”让我再叫另外一个人。当时我也没想到叫代表会连累到他们，就说 MJ。之后就叫了 MJ 进派出所去。

第二次笔录

第一次笔录是晚上九点半左右就做好了。第二次是等到晚上十二点多。MJ 做完才让我进去做。我做完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我进

去做第二次笔录时警察一上来就跟我说，是何经理把我甩开，在这个事情里面，不管我的事，我只是被人利用。他让我把事情再说一遍，不要说假话。从什么时候到厂里去，谁组织我们去的。我说没有人组织，是我们自己去的。那个社保也说了一点：“你们平常都跟谁谈社保问题？”我就说跟家里人聊了。他后来就问是不是有人带头，我说没有。那次本身也没有组织，是大家说起来要去。大家也没有真正的组织的。这些话，他一问到，我不用想就回答得出来。

他又问我 YM，问我怎么认识 YM，我说早就认识 YM 了啊。第二次还是比较文雅的一个。他说：“你们不给他回家，他才动手的”。之后就围绕 YM 来问，几乎每一句话都围绕着 YM。“你们发生冲突的时间，YM 在你的哪一个位置？”我说：“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她在哪里啊，她在不在我身边我怎么知道。”他问 YM 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说：“你怎么老是问 YM 呢？这跟 YM 有什么关系。”他说：“肯定跟她有关系了，你第一时间要找人证，你都说要找 YM，肯定有关系了。”我说：“我们是朋友啊。”他说：“她是你一个部门的吗？不是一个部门的，你干嘛不叫别人要叫她？”我说：“我们都是朋友，我早就认识她，认识她几年了，我进厂就认识她了，我不能找她吗？”

第二次做笔录好像想从我口中问到对 YM 不利的事情，但一点都没有提到 MJ。第二次做笔录的时候，其实 YM 和 MJ 已经被叫到派出所里了。

第二次笔录的警察问我话的时候语气也很重。他说：“你是个女的，要是你是个男的我就打你了。”还说“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要不要带你去做一下鉴定看你是不是有问题啊？要不然怎么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啊？”这类的话。我说：“那你就打啊。”如果是以前的话，可能会被问得哭起来，但是我就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我不想哭。如果哭起来可能还不会答他那么多话，不跟他聊那么多事。我看他那么凶好像要把我吃掉的感觉，我就拿手机在手里玩，看着要录音的

样子，想吓一下他嘛，其实我手机快没电了。谁知道他真的很认真哦，说：“你在干嘛？”，说着就要抢我手机。我说我在玩手机，他说这里不允许录音。我说：“如果你没有亏心的话，这样子对我问话是很正确的话，就是我录了音你也不怕啦！”他说：“就不许你录音。如果你要记的话，记我的工号，到时候你再去告我。最好你告得我不得坐这个位置，我到时候还请你吃饭。”他还拿我的手机去看。我说你看了。他说：“等一下我把你的手机没收了，拿去扔掉”。我说：“你为什么把我的手机没收呢？我又没做什么，我又没录你音，也没录你像啊，你干嘛没收我手机。”

第一次笔录只有一个辅警，第二次就有三个。好像看你怕不怕那种感觉。

最后他们把笔录给我看，说哪里要修改的，让我再看一次，看完要按手指印、签字。上面有一句话“我们不给何经理回家”，我说这句话我不认同，把那句话划掉了。他说：“那是你自己这样答。”我说我没有这样答。那个警察被我气得满身大汗，很想打人那种感觉，在那里喳喳跳。他说：“你把那句话划掉，那我一个晚上不是白折腾了啊！你为什么又说没有？”我说：“我们没有不让他回家，只是在厂里面找他要一个答复。我们怎么不给他回家了？保安警察一晚上都在那里啊？”最后他就换了种说法，就没那么直接。我当时想算了，反正被他们问了那么久心里也很烦，就签名了。跟他对着谈，心情真的很差。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都不回答他们就好了。

第一次我做笔录没做完，YM 已经进去了。可能紧跟着 MJ 的后面进去的。我是做完笔录坐在外面才知道的。我也没想到 MJ 也要做笔录，我在外面等了一个多钟，后来他出来了。我就听到 YM 的声音，MJ 出来时我说我都不知道 YM 也进来了。后来我跟 MJ 说，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伤，不如不追究何经理的责任吧，MJ 也认同，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了，怕追社保的事有点麻烦。后来 YM 又出来了，我们坐在那里聊天，还可以啦。我也跟 YM 说不追究何经理的责任

了，她没有说什么。后来又叫 MJ 和 YM 进去做第二次笔录。YM 没进去几分钟，就出来拿水喝，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她就说：“可能被他反咬了”。第二次做笔录的时候就已经被何经理反咬了。那时候我好像还没签不追究的协议。

何经理出来，说要打电话，他手机没电了。那里面的人（派出所前台）就叫他去打。他就打电话叫司机过来，以为他们很快就可以出去了，他叫人送东西给他吃。等他打完一阵子，有电话找我，我手机也没电了。我也要求打电话，前台就说不可以打。我心想，他在那里打电话，那些人就那么温和，我去就不给打。

我做完笔录的时间，政府的人就去了，书记什么都去了。老板去的时间是第二天十一点。我没看到，因为那天晚上两点半我出来，还有很多工友在那里。他们叫我先回去收拾，我就回来了，也不怎么睡得着。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去派出所门口那里，那时候 YH 还有 HJ 和制版部的一个，一共三个人在那里等。他们说还没出来，后面有同事睡醒了再来派出所换班等。之后我大概十点多回去的。老板他们是十一点多过来的，我没看到，是听其他人说的。



工人积极分子 YH（执模部）

YH 可以说是 HB 工人维权队伍里的“军师”角色。他本人并不需要和其他工人一样需要补缴社保，而是同在一厂工作的妻子需要。但他仍作为联络员加入了工人代表的队伍。有人质疑过他，毕竟他和其他人不同，不是真正的“当事人”。不过，YH 一直积极参与工人代表的讨论，机构的学习，出谋划策，几次重要的集体行动他也参与其中，最终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个人经历

1995 年 8 月我从河南老家出来打工，到现在差不多 20 年了，做过保安、帮厨、服务生。2001 年 4 月份进到 HB 厂。那时的工作不太好找。服务行业用工比较少，工厂有需要的时候用工量才会大一点。



2001 年的时候需要人介绍才能进厂，现在大部分工厂还是需要人介绍（才能进）。当时（进厂）还要交押金，几年后才退。

2001 年 HB 厂大概有 2000 人，在 LH 那边。当时厂里所有人都是熟人介绍的，要不然不招。进厂需要三证：身份证、未婚证、劳务证。很多厂招工时都要这三证。劳务证是在老家开的外出打工证明，要 30-100 元，属于变相收费。我有个朋友在这个厂，先把我老婆介绍进去，后来我想跟我老婆在一起上班，也介绍进去了。进厂还需要面试，一般有人介绍都能过。当时进厂不需要学历，除非工

作有需要。进 HB 厂之前我的那份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 550 元。

工厂的工人，湖南、广东、广西比较多，还有本地人也比较多，一直都是这样。以前很多人想进来这里工作，350 元的工资都肯做。

以前我们厂主要做金（首饰），也有做其它的，但比较少。现在是什么单都接。2009 年开始接银（首饰）的订单，铜是 2011 年开始接的，但铜的单比较少，银的多。

劳动条件

刚进厂时试用期 6 个月，没签劳动合同，生手底薪 250 元，医药费 10 元，餐费 66.6 元，还有全勤奖（是一天的工资）和奖金。进厂后每三个月加一次底薪，包住，不包吃，每顿饭扣 1.5 元，后来有了餐费补贴。工资是计时的，2008 年把底薪改成了岗位奖金，所以加班费就少了。以前是没有岗位奖金的。

开始不知道要签合同，后来政府宣传力度加大了，才知道要签合同。我是 2007 年才签的合同。

这两年才知道有最低工资的规定。以前只知道别人厂的工资高，我们厂的工资低。2008 年政府扩大宣传了，才知道有最低工资的事情。以前工作每满一年，工资会上升 50 元钱、100 元钱，有时也要看关系的好与坏（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关系）。2008 年的时候工资底薪不等，有 350、650、850 元的，有时候同级工资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个别人和师傅关系好，就多涨几十元钱，以前没有标准。现在才有了最低的一个标准，新人是这个价钱，老员工也是这个价钱了。

工资是透明的，有工资单。就给你这个工资，你干就干，不干就拉到，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干的话就忍，就只有这两种选择。

现在 HB 厂的全勤奖、医药费都取消了，也不包住了。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行业有工人的黑名单，我觉得黑名单没那么重要，除非你影响力很大才不会让你进某些大厂，小厂一般不会不让你进去。

工厂管理

我进厂的时候岗位是制模。工厂的分工很细，没什么技术性特别强的工作。那时工厂管理都是高压状态。工人不能出声，不能反抗。到现在这种情况也没什么改变。

罚款是经常事。宿舍的东西坏了罚钱；厂牌丢了，补办要花 100 元，相当于罚款了；上班没打卡也会罚款。一年内，第一次没打卡警告，第二次扣工资。刚开始扣钱是扣半个钟的工资，后来是扣半天的工资。打不到卡的事经常会有。2011 以前如果没打到卡，找师傅证明后，只扣半个钟的工资。现在有人证明都没用了，还是扣半天的工资，就是说上一天班只能拿到半天的工资。

穿拖鞋不让进厂，上班一定要穿工衣，天再冷也要穿，把工衣套在外面。2012 年以后好像没有了这项规定，穿自己的外套都没事了。带吃的东西被保安查到会没收，进到厂里就没事了，车间里没人管。厂里的保安不凶，他们有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安都是湖南的，也是经熟人介绍招进去的。

这个行业没什么机器设备，主要是靠手工来做，技术方面也没什么改进。以前做金的（首饰），厂里怕损失，扣钱很利害的，工人会有心理压力。现在做银、铜，会比较快，觉得没关系了。

工伤不是很多，就算有也看不出来，职业病看不出来，没听说有人因为工伤与厂里打过官司。

2009 年以前工厂人员一直都比较稳定，工人流动性很小，2008 年的金融危机都对厂里没什么影响，有些订单还会外发。2009 年人

员开始流失，是人为造成的，有人说企业不行了，要放长假，而且没有工资，放四五个月的都有。有些人就这样自离了。其实当时放长假的时候厂里是有很多订单的。今年，因为社保的事情，走的人挺多，有个部门已经走了五六十人了。

“讨” 社保对当地的影响

我们厂工人追讨社保这件事，连工厂门口卖水果的老太太都知道，影响比较大。

我们工厂附近有小厂，也有大厂。以前没有看到有别的厂的工人去追讨社保。他们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的厂的员工流动性大，做一两年就走了。有的厂的员工工作几年后，工厂给员工一点钱，把工龄清零，很多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

我们厂追社保的事情传出去后，有其他厂的工人找我们来问，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们。所以附近很多厂的工人其实是知道我们厂发生的事情的。

后来我们听说有的厂的工人也想去追讨社保，但是没有看到有人行动。再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厂的工人（飞鹰厂）也在追讨社保，但是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只是听人提起过。

劳工机构的作用

2009 年之前我们厂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员工要想买社保，必须做满两年。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做满两年也不给买。

后来有一天，厂里突然贴出公告，上面只说可以给员工买社保了。后来向老乡打听，才知道起版部有几个人冲在最前面，去找厂

里，要求买社保。他们（起版部）做了这么多事，之前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听起版部的人宣传了我们才知道。还可以追以前的社保（补缴），但开始不太相信能追回来，没有多大的信心。

后来又知道，起版部的人是从劳工机构获得的信息。

刚开始以为劳工机构是一个工会组织，后来才知道不是。起版部的每一个人都去过劳工机构。后来我们也去，不断学习才开始建立了信心。

那些政策法规经过劳工机构一说，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厂里也有工会，也是最近才知道，工会主席是老板的亲戚。

我们刚开始去劳工机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又不用花钱。从接触劳工机构，到真正向厂里提出诉求，大概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那时觉得这份工作丢了都无所谓，才能坚持下来。做这些事情，要先想清楚，如果瞻前顾后就不要做了。我们觉得把社保追回来对我们以后很有用，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劳工机构指引我们在不触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怎么做，该强硬的时候他们也会提点我们要强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同时又达到我们的目的。如果没有劳工机构的话，我们在法律方面可能就不会把握的那么好，说话也会没有分寸。心里有个底，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就有信心一点。如果没有劳工机构，就算我们想争也不知道怎样合法的去争。做极端的事吧，又没有那么多有胆量的人，不做极端的事吧，很多事又没那么好解决。

选代表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工人们心不齐，没信心做成。后来因为代表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宣传，就坚持下来了。

选代表是机构提出来的，首席代表也是机构提出来的。当时是

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有分工，才会选代表。当时我们相互认识的人之间会交流，但没想到要去选代表，也不会想到做代表之后会经历那么多的事情——要去谈判，跟老板沟通，有事情还要第一个站出来——这些是没想到的。以前以为代表只是负责联络。

当时 MJ 很积极，所以就要求他做首席代表。

XLX 是我们部门第一个追社保的人，她和起板部那边有联系，经常会去劳工机构。他们也叫我去劳工机构，但我刚开始没去。我去了劳工机构之后又叫了 MA 去，MA 以前胆子是很小的，现在可以了。不同部门的人，了解的多了，说的多了，认识的多了，就互相认识了，彼此还是比较认同的。

我个人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

我本身不是代表，但会在背后给代表出主意。因为本身没有社保这方面的需求，在老家已经买过社保，是我老婆有需要追社保。所以我就在背后出主意，然后互相联络一下。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冲到最前面。我不担心厂方知道我在背后帮忙，因为早就不想干了。如果还想做的话就会老老实实的干活，不会去追社保了。

我对社保了解的比较早，老爸以前在村里工作，大姨也在县里上班，他们都有社保。当官的我也了解。所以一些现实状况我都清楚。当官的也要顾全大局的，不可能因为你一小部份人的利益而损害大部份人的利益。不可能因为一二百人而关停一千多人的大厂，这个是事实。如果让自己做官，自己也会这样做。

我虽然不做代表，但说出来的东西有理有据，大家也会听。很多时候他们意见不合，自己会去给他们中和一下。不可能总是站在主观的立场去说问题，也要客观的去分析才行。我在整个车间一直比较活跃，有东西说给大家听。我们车间现在追社保与不追社保的

比例差不多一半一半，因为来了很多的新员工。

现在也面临着追社保的工人现在熬不下去的问题，很多人辞工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法律、罢工、政府

追社保、被放假，这些事我们都不能仲裁、打官司，理由都不充分，拿不出相关的法律（依据），我感觉很无力。

我认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可以团结起来去要。但最主要的是要给厂里施加压力，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坐下来沟通是有必要的，出钱的毕竟是厂方，给厂方压力大的话就容易解决。

但同事们就做不到，很多人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对工作的留恋上，好像离开了这个厂就没法活一样，所以很多人不想与厂方冲突太大。然后就会想着去找政府，而不去找厂方。但是，这些事情不是某一个官员能帮我们办到的。

海×前几天打电话给那个保证解决我们问题的（区政法委的）陈书记，他还怕得罪那个书记。

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书记。书记说：“你们每天十几个人打电话给我，我都要告你们骚扰了，你们不要再打来了。”然后就把手机给挂了。

后来我又打电话过去，我说：“陈书记，我在你上班的时间，打你的工作手机，聊我们工作的事情，这哪里是骚扰你了？”

他又给我说好话：“我也是人，我现在在北京开会。”

我说：“在北京好啊，可以直接汇报汇报这样的事情嘛。”

他说：“我每天都接到几十个电话，天天很多人打来。我已经骂他们（下属）了，会帮你们解决的。我在做事情，我不会不做事的。”

其实一个区委书记也做不了什么事情的，当时他拍板说帮我们

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半信半疑。可能当时他是（要）把这个事情压制下来，但还是解决不了。如果这些事情有理有据，通过打官司能解决，也是一个好的途径。假如法律能在3个月内能把事情解决，那大家就都不会去罢工了，不用撕破脸皮了。但在我们国家人情大过法律。

有时候也感觉很被动，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和厂方闹的时候，厂方就会报警。这个是劳资纠纷，与警察无关，警察就不应该来。昨天厂方就以扰乱工作秩序而报警了。如果要我们国家劳资关系更加和谐，警察的手不要伸得太长。政府适当可以过来一下，事情就可以很完美的解决。厂方报警就报警，过来一两个警察看一下就行了。我们怎么搞不要管，只要不打架就行。但现在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了，会压制我们往前走的决心。昨天警察来的人不多，大概就四五个，每次警察过来都有有点威慑作用。再加上有时候还帮厂方说说话。这个是大家都会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罢工的态度

我自己觉得打官司讨社保不太好，耗时耗精力。罢工的事情是海哥提的，我也坚信有些事情是通过大家的团结才能解决的，不是通过某一个科长，某一个区长去解决。我一直赞成罢工，觉得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可能他欠你的钱，你却找另外一个人要。最终要解决是厂方与工人之间的问题。政府（应该）只是来协调的。也不知道其他的代表清不清楚这一点。

我一直有提罢工的事情。趁赶货的时候，不管人多还是人少，搞个一两次的罢工，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其他人下不了决心。大部份人不同意罢工，我觉得一是怕厂里针对报复，二是怕公安。

首先不管违不违法，政府的手都伸了过来，说白了（工人）就

是怕当地政府。比如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不打架，怎么解决都行。但是现在政府不管有没有打架，过来就说你（工人）没理。如果政府的手不要伸那么长，我们（劳资双方）努力来解决，事情就好办了。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再来充当一个调解的角色，不能太管闲事。

有时候感觉很失望，搞来搞去，没用一样，没什么意义。我感觉经常是在给政府挠痒痒，给厂里挠痒痒，你挠一下他就动一下。要挠就挠破脸，要来就来狠的，这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

大家（虽然）在一起做事，但是想法不一样，（有些人）到现在还留恋。现在都骑在你头上了，你还忍气吞声地在那边默默地做事，辛辛苦苦在那边做事。没做的被放假，做了还是被放假，何必呢？现在大家的思想都统一不了。有些事情要通过大家愿意才行，比如说罢工，我自己愿意。但是只有几个人愿意，是成不了事的。至少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同意才行。

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

我之前和（总代表）说，哪怕是被拘留 15 天，也要把这个事情给拿下来，我有这样的决心。

开小会的时候，也有过关于罢工的交流，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在厂里闹一下，有些人就是不敢，害怕，就没干。

有些人去政府门口的时候也要看去的人多不多，如果人多的话就敢去。去的时候也都是站在后面，不敢站出来。有时候有些人答应了要一起去，但后来又有很多的理由不去。我们那个部门还好一点，其他部门的代表叫不动他们部门的人，自己有时候也不来。我们有时会旷一天工去找政府，有些人要放假的时候才敢去。

昨天让大家交钱交资料的时候，个个都很高兴，很快过来交资料，但平时让他们去开会的时候，个个都叫不动。有一个人第二批

的人还说：“你们哪个帮得到我，你们帮了我什么？”当时就有几个人跟这个人吵了一架。

现在这第二批的人，就是等（结果）。他们也和政府谈过好几次了。但是每一次都上当受骗，总感觉人家说的合情合理。那些人天天讲话，怎么会讲不出道理来呢？

现在的思路

现在我们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就两步。

第一个去找厂里。冤有头，债有主，当时拍板说帮我们解决，我们现在已经把钱交了（厂里），过了这么久，你还不给我们办事？

第二是找政府，只找那个书记，其他不用找。找其他部门，他给你端茶倒水，拿凳子给你坐，服务态度很好。问题是我们是来解决问题，不是来喝水聊天的，也没那个精力和时间陪你聊。去社保那边，他们服务态度也很好，说：“我们是按程序办事的，按正规的程序，按法律法规……”跟你讲一大段没用的话。所以没必要找这些政府部门，他们只是办事的，上面一句话，把事就办了。

这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我现在觉得方向就是这样。但是，其他代表就想找政府部门，一直在等那些部门的消息。等来等去还不都是坏消息。那些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只是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

这一次就被那个陈书记给忽悠了，他说“这个事情春节前帮你们搞定了，你们有电话号码，直接打那个电话。你们该交钱的就交钱。”

当时就被糊弄了，因为有一个关键问题，工龄还没有确认，就交钱了，就上当在这里。

跟政府谈

以前和政府谈判我没有去过，但每一次谈都知道。在谈判之前代表们准备得不够充分，代表之间的意见不太和。每次谈的事情太多、话太多，谈判的目的不够清楚。每次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谈工资的时候就只谈工资，谈社保的时候就只谈社保。有时候就混淆了，一个说这个，一个说那个。那些官员讲话都是很利害的，代表是讲不过那些官员的。有时候人家很生气、很有气势的和你讲，有时候人家又很和蔼的和你谈。我没去谈过，但是也想得到嘛。他们（政府部门的人）说话是有方法的。一会儿把你吓一跳，一会儿又好声好气地和你讲。代表这边要知道我最终是来解决哪些问题的，就不要混淆了。

也可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一直在幕后，如果到前面去谈，说不定也把握不准尺度。

第一次去区政府那边和他们谈，谈了一下子，对方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当时我让工友都站到里面来，我们不走，看他怎么走。后来那个人又回来了，又谈，谈到四点钟，再也谈不出什么来了，他就说，我不可能代表政府，我派人过去。我们谈了半天都还没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人。当时太冲动了，忘记了问他的来历。

每次谈判之前都会有一些分工，谈判的时候录音，还有交通安全，不要堵塞交通。

我觉得吧，这些事情（拖）这么久，是这些代表团结不到一起，这些工人其实好带动，关键是带头人和代表有多大的动力。很多的事安排好，然后代表之间如果没有一个沟通，达不到一致的话，分工再详细，这个事情也很难去做。



工人代表 LCR（执模部）

打工经历

我是广西平南人，1996 年 15 岁出来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和堂哥、亲兄弟在家附近的工地上做泥水活。一般是搞外墙，刷墙。一起在那里做事。我们自己买米，自己做饭。有些老板会拖欠工资，但还不会不给。

后来跟着堂哥一起做豆腐，挑去别的镇上卖。卖豆腐也没挣多少钱。不是因为做的不好吃，是顾客买的时候都会找熟人那边去买，不会因为自己做的好就买自己的。几个月后就去了 HB 了。

HB 工作

我是嫂子介绍到 HB 的，和她在同一个部门。2002 年的时候嫂子就买社保了。我那会还没想到买社保。

我刚进去时做执模，每个月工资底薪 250 元。第一个月的工资有五百多元。那时候工作时间很长，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车间里一直有空调。以前都是做金（首饰）的，车间会有很多金粉。地板上有铺一层地毯，把地毯烧掉，里面会有掉下来的金。

我们部门的工资最低。靠耗金（注）挣工资。耗金（所得的价差）一个月可以赚到几百块，加起来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 2500 元左右。后来耗金从 0.8 降到 0.6。加上做银饰多了，银子不值钱，损耗挣不了多少。

以前有一个 50 多岁的香港师傅很好，大家都一致认为他是为员工说话的，后来管理上被人找了一些漏洞，被人冤枉的抄掉了。他走了没多久就发病死了。

在这个厂工作几年之后就得过且过，没什么能挣钱的办法了。有几次想走但没走成，去找过几家厂，有的因为试工不合适，有的因为别的厂里的规矩不一样不习惯。

我是 1998 年结婚，老婆原来也在 HB 厂。后来为了带小孩子就出厂了。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休了产假，但没有给足假期。怀孕后一直工作到快生孩子了才放假。

我们部门以前女工多，现在男工多。工作都是靠手，不需要太多体力。起版部门男女都差不多，是真正的技术活。

关于社保

我们厂社保还没有搞起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有说能追社保的新闻了。嫂子虽然很早就买了社保，但也没有跟我说过什么。

当时买社保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买一天算一天，很多人买了社保，社保卡还没拿到就辞职走人了。

我们部门 2008 年之前有 300 多人，现在 70 人可能都达不到。金融风暴的时候有一批人走了，现在又走了一批。第一批追社保的有些人找到好一点的工作也走了，走的不多。我学历低，也不是很会说话，做不了代表。我和本部门的三个代表之前就很熟悉。

一般是代表们去劳工机构学习，通知到我的话都会去。我去过三四次，参加的都是法律培训，觉得学了有用。其他的文艺活动就没有参与。

MJ 他们被抓之后，很担心他们出不来了。但我还不会担心政府会抓更多人，因为如果抓那么多人的话会很轰动。

刚听说 MJ 被抓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恐慌，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在里面和何公公（人事主任）吵架的时候，我站在人事部门口附近。

工厂管理

老板总说“能补缴的时候就会给你们补缴”。我是不怎么信的，感觉老板在忽悠自己。

从头到尾我们都不相信何公公，说一套做一套。比如他答应下午接收资料，但下午去找他的时候人都不见了。欺骗员工太多次了，都不相信他。他经常说：昨天的事今天不说，过去的事现在不说。何公公口才很厉害，听说在政府部门做了很久。MJ 被抓后大家都不敢有更多行动，害怕帮倒忙（怕往两个人身上扣更多的罪名），等律师来处理。

奶妈和何公公相比差远了，办事能力不强，何经理是说得口口道道，是个很冷静的人。一般很难激怒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冷静。

当时我们感觉，何公公是故意激怒玉梅。玉梅是文员，平时比较突出，和何公公吵过几次。他应该是想抓到玉梅把柄，时不时故意激怒她，有时候故意去找玉梅说两句话。

第一批处理得差不多了，已经走一条路出来了，第二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也都在政府那边立案了。

不过，第二批人少，不够团结，比较胆小，也会担心他们能不能拿到社保。如果工厂用放长假的办法对待第二批人，第二批人肯定拖不起。第



二批人里大部分是女的，男的不到十个人。第二批代表里就只有一个男的。

注：耗金是指在加工首饰成品时，无法避免的原料消耗。师傅会根据经验设置一个百分比，比如加工 100g 金，允许的损耗是 0.8%，0.8g 金，如果员工熟练只消耗了 0.6%，0.6g 金，那么之间的差值 0.2g 重量的金相对应的价值就可以算作员工的奖励。但是当员工的技术熟练，耗金所得到的收入普遍提高时，师傅就会降低允许损耗的数值，相应降低员工通过损耗拿到的奖励。



工人积极分子 LXY（执模部）

五金厂工作经历

我是广西人，1998 年出来打工，17 岁，连身份证都没有。那时候老家已经有很多人出来打工了。

我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找工作，就跟着到我们老家招工的人出来，进了一个小五金厂，老板也是广西人，厂里只有几十人，小的 10 来岁，大的有 40 来岁。这个厂专门招那种年龄很小或者很大的人。

这个厂做空调配件，都是又脏又累的活。招人的时候什么都不需要填，身份证都可以不要。当时没有听说查身份证、暂住证。

那时候一个月几十块到二百来块的工资都拿过，加班多一点工

资就多一点。有一次拿了三百多，自己觉得还有点多。车间里很热。加班很多，9点10点回到宿舍都是早的。一个月偶尔有一天会休息。每月工资要扣几十块钱水电费，还有几十元伙食费。那时候自己花钱比较大手大脚，一个月下来也存不下钱。

工厂会在外边贴招工启事。一般押一个月工资，自离工资就没有了。有些人工作了一个月，在厂里吃住，然后自离，没有人去要工资，在厂里没有人敢闹。

我在这家厂做了一年，走的时候拿到了工资，但应该是有扣掉一些钱，也不太清楚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 HB 的工作

我找家里要了点钱，2000年又出来找工作，5月进HB厂，刚满19岁，是靠老乡介绍进去的。老乡说这个工厂还可以，比较轻松。2000年的时候首饰厂比现在多，比较集中。

HB厂招工要熟手，有工作经验。熟手会当面试工。生手一定要人介绍才能进去。招工的时候会问你有没有担保人，有的话去核对并询问愿不愿意做担保，愿意的话要签字。进厂交400押金。进厂时写入厂招工表，没有签合同，很多年之后才有合同。有伙食补贴，质量一般般，但比之前的五金厂要好一些。

有的老乡在外面租房，房租很贵，很差劲的房间也要一百多，还是几个人住在一起。

我的底薪250元，周围的厂差不多都是这个价。听说2000年的时候，HB最高的底薪是650元。

我进了执模部，正好是旺季，天天加班，一个月加100个钟，加班费全按1.5倍计算，没有2倍这一说。

厂里的师傅大多数是站在老板那边的。我们部门只有一个师傅，

现在这个做了3年，算是比较久的。老板跟师傅说过：“对员工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有些师傅为员工说话，很快就会被老板炒掉。比如，有师傅向老板反应员工有一些要求，比如：空调坏了要修，这个师傅就做不久了。有一个比较好的香港师傅没做几个月就走了。

我们车间很热，有空调，但是坏了。车间里偶尔有一个风扇，一般会被组长拿走。师傅一般都在办公室，有好的空调用，所以跟他们反映也没用。2011年，有人和工厂打官司，高温津贴，工厂才给换了新空调。

厂里有一个部门全是女工，产假只有2个月。后来追讨的人多了，就给了三个月。

有时候一天做的事情让我们半天做好，没做出来的话就不吃饭，一直加班。

有个师傅待遇月薪过万，加班对他没什么好处。但是员工加班，他也要加，所以他就让员工赶货。后来把这个师傅换走之后，加班就比较多了。

货做不完的时候会拿给外面的人做，外面的单价比厂里要高。

师傅对几个组长或和自己熟悉的人会好一点。有一年工厂发月饼，员工没有，只有师傅有，师傅把月饼带到车间，切开，一人一块。

跟师傅吵架没好处。不想做的时候就 and 师傅吵架。吵架后会让你去人事部拿辞工书走人。

我们部门的组长很轻闲，不用做事，工作量很少，是师傅提拔起来的。和师傅关系好一点的被提拔，但也有些人也不愿意做组长。组长的作用不大。

车间里的文员多过组长，有跟单和收发，和员工接触还挺多的。以前部门一两百人，现在只有四十多个人。以前文员工作量大，分几个文员来发货，现在工作量变少了很多。

我们部门没有文员追社保的，一般文员工龄都不长。追社保时，文员不看好我们，说“你们追讨不到的，老板不会给你的”。懂一点电脑的，都可以做文员，文员工资和员工一样，底薪和加班费都一样。工人加班的时候文员也要加班。

客户给老板的损耗很高，但老板给我们的时候就压低了。要很小心的做，不然的话会亏损。在去年（2010年）的时候，我就做亏过。

丢了货要员工赔，按成品的价钱来赔。有一个同事丢了一个戒指，被扣了7000多元。车间有摄像头，但没多大的作用。赔偿的时候一般是个人承担，除非很多人都接触过这个货品。丢货的事情很少发生，发生的时候会扯多一点人下水，一起来承担。平时都很小心，数目一定弄清楚。

2010年9月1日开始，我们厂开始要缴社保。以前工厂有人知道社保的重要性，就去人事部问可不可以买，人事部会以没有名额的理由去推拖。偶尔也有文员去车间问，但有些人不愿意买。

起板部开始追社保，我才知道社保的重要性。

以前产假工资只有几百块。去年我们部门有一个人追产假，去打官司，后来工厂给她全补回来了。

我去年生孩子的时候，把资料交给文员，但被文员退回来了，她说我的准生证有问题（时间有出入），享受不了产假。



工人代表 HQ（镶石部）

HQ 是广西人，个子不高，比较瘦小，却是几位代表中最刚毅的，也是 MJ 的好搭档。MJ 被关押后，是 HQ 带着其他几位代表想办法营救，联络其他工人、劳工机构、律师，度过维权中最危急的时刻。

2010 年之前我对社保不太了解。以前工厂只给部分人买社保，都是跟工厂关系好、工资高的那些人。工厂给他们偷偷买，都不让我们知道。有一次听说有一个买社保的名额，我因为不清楚状况，就没买，后来想买的时候，工厂不给买了。

厂里刚开始给全部人买社保的时候，我请假在家，同事打电话问我要不要买社保，要买就签名，当时我让同事帮我签名。签名的时候也想到厂方可能会针对我，但是觉得无所谓。开始有很多人签名，后来厂方说要拿劳动合同，很多人认为厂方会报复，就退出了。

后来选代表，每个部门选 1 到 2 个，其他部门都已经选好了，我们部门没有人敢做。开始我以为代表要懂法律，后来其他人说不用懂法律，只是负责联络，我就主动站出来了，那时大概是 5、6 月份，7 月份的时候有了代表授权书。

我之前和起板部那些人不认识，平时见到了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来在追社保的过程中熟悉起来。

我刚开始对劳工机构不了解，知道他们不是政府的机构，所以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劳工机构帮我们又不收钱。有些工友怕它是传销。后来劳工机构组织大家去清远漂流，逐渐对它就了解一些了。

我们部门的人交钱、签名都很积极，但让他们去劳工机构学习的时候就不太积极，会找理由推脱。但是其他行动的时候他们还是

会参与。

我开始去劳工机构之后，了解到其他厂的事情。有个厂有六七十个保安，通过直接找政府上访，追到了社保。这些在劳工机构分享到的经验，我们回去后会跟其他同事讲。

我做了代表之后，车间的师傅会特别注意我，但不会明目张胆地针对我。有一次，师傅通知我们，说去人事部叫我们去谈话。

当时我们就跟师傅说：“追社保是我们跟老板之间的事，跟你没关系。”

师傅说：“这个事情是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你们不要在工作时间讨论这些事情。”

我们部门的师傅没有换过，有一个师傅只比我早进厂一个礼拜。平时师傅不敢对我们（男工）怎么样，但是会吓唬女孩子。他们给女孩子规定了产量，对我们就不敢，师傅也是看人的。以前我跟一个师傅吵过架，之后被他调到了其他岗位。

我们部门追社保的人也分成了两批。当时人事部给我们出了一份补社保的通知，那些一直在观望的人看到我们有了成果，就想加入进来。有了成绩，就有更多的人愿意参加。

当时第二批的人虽然愿意签名，但还是不太敢行动，还是需要我们第一批人带着。

第二批人想和第一批的一起去争取，但第一批的人会有一些担心，就没有让他们加入到一起。后来第一批人有一些后悔，觉得还是人多一点好一些。

开始的时候，第二批的人总是让第一批的人去帮忙办事。第一批人当时觉得比较烦，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一批人和第二批人是社保局那边分开的。社保局的人说，因为已经开始给第一批人办理了，如果把第二批人合并到一起办理，会拖得更久。所以第一批人不愿意跟第二批人合并办理。

第二批人开始追社保与比第一批人晚了三个月。

每次去行动，第二批的代表都不敢走在前面，一般是第一批代表走在前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跟第二批的代表聊聊，没事情的时候说话比较少。

我们在行动之前一般都会通知第二批的代表，他们一般都会过来。

去地税之前，我们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代表坐在一起谈，主要是确定每个人的入职时间和补缴时间。去了地税，拿到了明确的补缴时间表。后来我们去找海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两批代表都有去。

当时去地税的时候，大家商量清明节之后去找厂方。没想到去地税之后第二天就去找厂方了，去的时候也没抓住机会，清明节会有人回家，也不知道老板会不会在。厂方一直没有给我们定补缴的时间表。

去找厂方之前，我们讨论我们的要求，以及大致的分工，但不是很具体。当时讨论决定不把地税给的答复（补缴时间表）给厂方看，因为想让厂方给我们一个早于地税的补缴时间表。当时我不同意，我觉得应该让厂方知道我们已经拿到了地税的答复。去找政府部门的时候我都参与了。

我们去找厂方提要求，何经理说：“工人没有权力过问这个时间表。”

我说：“你说工人没有这个权力，你收了我们工人的一百多万，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过问？”当时在场的劳动局的主任说：“对啊，对啊。”他比较赞成我的看法。

何经理又说：“那就按地税的时间表来补缴。”

我说：“你去年就收了我们的钱，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补缴社保，按程序来说应该是工厂先缴，工人再给钱。按程序走我们也是对的，现在只是让你给个时间表。”劳动局的主任又跟着附和：“对啊，对啊。”

劳动局的主人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先开会，不知道他们说了什

么。然后才和我们一起谈。

谈的时候，厂里有拍照，我们也有拍照。当天晚上也有记者来采访。但是厂方一直不愿意出一个答复。

我们跟厂方谈了三次，每次政府部门的人都在场，很少跟何公公单独谈。

我们围住办公楼的时候，有工友跟何公公聊天，会问他什么厂方什么时候给答复。何公公跟我们聊天，聊了很多个人的经历。他说自己以前开过矿，老爸和姑丈在政府工作。那次从晚上 12 点多一直聊到凌晨 4 点。当时觉得他出来与我们聊天是因为一个人在办公室烦。

我们把他围在办公楼里的时候，镇政府的人也来了，他向他们发过火，说如果政府不帮他，他也不帮政府之类的话。当时我说：“这个是他与政府的事，与我们工人的事无关。”政府的人没什么反应，之后就走了。他们走之前，我们要他们给个答复，他们就让我们解散。但是我们不理他们，双方都还照样僵持。

当时人被抓以后，各部门的代表分别去做思想工作，号召大家没人再集资 200。有些人不愿意交钱，说：“之前已经给了两百了，为什么这么快又要交钱，等抓进去的人出来之后再交钱。”

我们解释说：“之前的钱在满基手上，满基被抓了，现在钱都拿不到，又急需用钱。”

管帐有专人负责，之前的帐目一直有公开。开始是阿珍管账，后来阿珍要去找工作，就交给满基管账，后来满基被抓之后没办法公开。

公开帐户是重要的，之前是说把每次公开的帐目发在 QQ 上。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提议好，但后来就没怎么做到。有些人觉得帐管得有点乱，有人怀疑代表乱花钱，拿出去玩。

集资的钱，开始只用于补贴交通费。后来又收了 200，加了一条，补贴代表请假为大家出去办事被扣的工资。大概是 3 月中旬左

右，开始有工资补贴。没有听到有人当面提意见，但是背后应该会有人说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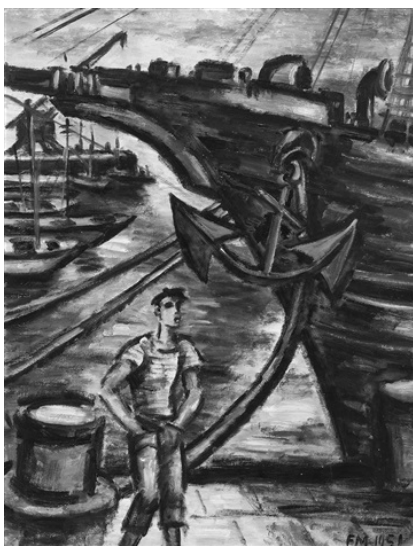
我们包围办公楼那两天的行动，有四五十人参加，如果厂方按旷工处理，到时候我们只能去仲裁。

行动过后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

现在第一批人基本已经处理完了，冲在第一线有点不可能了，因为厂方就会有理由找第一批代表的麻烦。第二批的代表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指点。

两个代表被抓后，厂方是在4月9或19号的时候宣布他们被解雇了。两个代表放出来后，我们大家去接他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没有记者来，饭后赖律师来了。饭桌上主要谈了一些工人需要团结起来的问题。

听段律师说话感觉还可以，比劳工机构的那些律师底气要足一些。



工人代表 YM

YM 是第一批补缴社保工人中唯一一位文员。她性格较为急躁，说话比较冲，很容易和管理层发生冲突。在和大家开会讨论问题时，习惯于讲自己的事情，和其他工人关系较为一般。

打工经历

我 1998 年出来工作，进了 PY 东宝的一家金首饰厂。东宝是当地村民开办的企业，实际类似“工业园”，有很多老板承租它的厂房地皮，开了一批小厂。我进的那家厂有几十个人，老板是香港人。我跟工厂签了两年的“内部合同”，也不正规。在那个厂，我做统计文员，当时文员的职位也要找人担保。我的底薪是 450 元，有加班费，但我很少加班，车间员工加班多，能拿到 1000 多块。

HB 厂的情况

2000 年，我进了 HB 厂，一直做到现在。当时这家厂恰好在搬迁，我被安排在验金房做“收发”文员，跟的是整个部门的单。刚进去时，员工生手的底薪 250 元，文员底薪 450 元，我是熟手，一进去就拿 600 元底薪。厂里每年加一次工资，加一百或者几十块。旺季赶货最忙的时候，员工一个月要加一百多小时，一年大概有三四个月是旺季。不过，收发文员一般不跟员工一起加班。

第二家厂的老板，他大哥还有两间类似的厂，规模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单会外发给两三间厂，老板跟他们有合作。

第二家厂的待遇、工作不太理想，我一直想换个工作，但又有点安于现状。这家厂是发了财的，2008年时，一个月利润也有两亿元。就算金融风暴的时候，也在生产，不会亏损。我在厂里又做“开单”，又做“收发”，见过有时一个月有四五十万件的单。工厂的利润很高，但是也没有给员工分一杯羹。刚进去时，三八节有半天工资，后来三八节的待遇没有了，也不通知大家，说没有就没有了。刚进厂第一年，中秋节有个月饼，搬厂后，中秋节搞过一次自助餐，现在啥都没有了。文员的工资靠部门师傅来加，跟他关系好，就加多一点，关系不好，就加少一点。师傅加工资没什么规律，取决于他个人的决定。

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工资下降了。底薪减了300元，奖金给加了三百，但是加班费少了。当时，我们就算有意见，也憋在肚子里了。因为年龄的关系，我没想过辞工另找工作。我是整个部门做事最多的，因为工作性质，我也从来没有放过假，直到因为追讨社保，被厂里强行放假。

我的部门全是文员，技术含量不高。文员工资比较低，就算是我们组长，比起其它部门的组长，工资也要低一点，所以我们部门留不住人。

老板的乡土观念很重，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我们部门，10个人里有8个是老板的老乡，他们有特权，加工资加得高一点，比如一年加300块，其他人只加50块。另外，老板的老乡能分到比较轻松的活，老板暗地里还给红包。

我们部门的经理，特点是阿谀奉承欺上瞒下，各种坏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这个经理是跟我同年进厂的，以前是部门的师傅，后来把当时的部门经理赶跑了，自己成经理了。以前的经理还好一点，处事比较公正，给我加工资的时候，比较公平。比如给他老乡加150块，给我加100块，我也可以接受。那个经理是老板的老乡，后来被降职了。我对那个经理的印象还不错。

我对人事部门主任的印象也不好，找不到夸她的词。她是老板朋友的老婆，能力不够，做事站在老板的角度。她的管理风格就是帮倒忙，很凶，经常说风凉话，不帮员工。

这次集体追社保之前，我已经想过社保的问题。这家工厂一直有社保配额，但没给过我。我去人事部问过，听其他人说，名额全给了老板的亲戚。老板的亲戚，在社保问题上自由度很大，想退就退，想买就买。我们部门的老板亲戚就是这样，有的人想拿钱出来，就退了，退了以后后悔了，就又买。所以这次集体追社保，我们部门只有我一个人参与了。

在平时，我们部门和倒模部门接触的多一些。我本来已经想辞工了，听说倒模部门开始追社保，觉得很高兴，一心想买。当时老板的某个亲戚跟我讲：如果你们这个样子的话，厂都要被整垮了。她劝我不要争社保。我没理她，心想这么多人在追，你劝得了我，劝不了别人。我怎么可能输呢？肯定要坚持到底。

我们开始追社保以后，老板就让我们走法律程序解决这事。我们就去政府部门沟通、请愿。一开始是以书面的形式，后来去市政府请过愿，我是员工代表。后来也去区政府信访过。当时老板对我们说：“政府让我给你们买，我就买。”听了他这句话，我觉得他在忽悠。我都不信他的话，因为他经常忽悠人。就说加工资这件事，我觉得我做好分内的事，不需要给你拍马屁什么的。虽然加工资需要老板批准，我没有讨好过他。这几年老板似乎一直在做假帐，说工厂亏损。他怎么可能亏损？生产成本一直在降低，好多订单外发了。大家一直怀疑老板说假话，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2010年12月，我们补缴社保款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人事部新来的经理。他来这个厂上班的时候，我被工厂放假，所以没见到他。听同事说过这个人针对抗争员工的所作所为，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好。

2011年3月5日他奉资方的指示，放我的假。因为我的放假单

上工资计算方式比较含糊，跟他第一次正面接触。我要求他改的清晰一点，他说：“你好特别啊！”。他不肯改，我就拒绝接受这张放假单，照常上班。晚上下班，我打卡打不了，去找他理论，要拍照取证。他不让我拍照，把我的手机打落在地，还威胁我，说什么要找人打我之类的。我就跟他说：你最好去告我了。我当时报警说人事部经理恐吓我，派出所的人才肯过来。但是我没拿到出警回执，派出所说这是劳动部门的事，跟警方无关。经过这场风波，人事部经理才给我换了一张放假单。不过，给我强制放假之前，虽然我是工人代表，厂里并没找过我的麻烦。

3月29日，我们十几个被厂方强行放假的人回去上班，结果被叫到厂里的卡拉OK室，让我们“学厂规”。当时我说：“让学厂规，你先学好，我们都学几年了，先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再说。”说到请假，我说：“有父母的员工，父母病了，肯定要请假，没有父母的，当然可以不请。”经理就叫我不讲话，我就不出声了。当时他念了一遍厂规，似乎是为了证明我们知道厂规了。他念厂规的时候，有一个保安在场，还有人用一部摄像机录像。

过了不久，我们在服务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当时大家提了几种方法，包括去政府请愿。但是最后觉得请愿不太可行，因为政府已经答复了嘛，所以还是直接去厂里行动，效果比较可靠。有人提议堵车间门，后来考虑到可能有法律问题，就否了这个提议，考虑不要跟厂里发生冲突。

当时我觉得一旦行动，可能老板会叫保安打工人。以前我们的代表上楼找老板谈的时候，在场的保安就扬言要打人。这个厂，负责厂区的保安是“内保”，负责厂区外面的是“外保”。内保有10个左右，外保有10多个。听说他们的工资、加班费是不一样的。内保跟着厂里的员工一起加班，有加班费。至于老板的那帮同乡，就算我们把车间门堵住，就算老板下令他们打人，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动手，大家都是打工的嘛。

4月2号那天，人事部经理刚开始很冷静，显然设了一个圈套给我们钻，感觉他在配合我们演戏一样。这个圈套就是先取证，然后把我們整垮，告诉我们谁有资格说话。他说是想帮我们解决社保问题，其实一直在拖延，想把我们拖垮。那两天，早上他起来跑步放歌什么的，是故意骚扰，想激怒我们。后来地税的人来了，不收他的文件。他显得有些愤怒，似乎觉得政府部门没把他放在眼里，那个感觉真假参半吧。我不知道文件内容，应该是和缴社保有关。地税的人计算了厂方应该补缴的金额，据说因此还加班了。发生冲突的时候何经理有些焦躁，急着冲出去。

那两天一夜，虽然人事部经理不能办公，其他文员都是照常上班。那些文员听他指挥，不跟我们交流。那段时间，大概有四个保安、四五个警察从头到尾在场。

被抓的经过

当时我们一群工人到了派出所，警察喊我们两个人（我跟MJ）的名字，让我们进去。因为有一个同事在里面，我以为是协助调查。第一次、第二次做笔录的时候，我问警察：我们只是协助调查的，你怎么问那么多？在派出所还可以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给区政法委副书记打了两次电话，他说不清楚是什么情况，要先调查。

在派出所的时候，问了我三次：刚进去的时候；凌晨四点；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三次问的问题有些不同，第二次审问，问了什么时候厂里给我强制放假，放了多久。我就问他：放假有什么关系？他说：想了解多一点。每次审问，只有一个人边问边记录，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似乎在旁听。每次问话，有时一个多小时，有时两个小时。那个问话的警察看到我是外地的，就说他也是外省的。

问话的时候，我说过4月2日警察从头到尾都在现场，但是发

现审问者并不记录我的有关证词。他问：这件事是谁组织的？我说：不是我组织的。他问：那是谁？我说：不知道。我只跟警察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我说：我看到很多工人在现场，问他们怎么回事，然后我也有一样的诉求，所以就参加了。审问人员说我“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可以轻判，但是我这份口供会加重案情，会重判什么的。他也不解释为什么会“重判”。每次做完问话记录之后，就让我签字。签字时，我发现内容跟我说的有出入，我说“几十个人”，他写“三十个人”，我跟他说：我不明白，我怎么可能挨个数有多少人？他就说：这个问题不大。凌晨四点问话的时候，我问警察：为什么不让我走？他说：我们看了你在现场的录像，叫什么非礼啊，不准经理走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时我想可能有点麻烦，就打电话给熟悉的服务部工作人员，她说：不用怕，最多是民事案件，扣留不超过 24 小时。后来我被转到看守所，家里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以为只扣留二十四个小时，没必要让家人担心。去看看守所的时候，戴了手拷，警方出了一份书面通知。出发之前不知道转去哪里，问警察，也只回答“等消息”

在看守所的时候，听狱友分析案情，似乎有点严重。当时无法接触外界，就开始考虑后果，担心给家里惹麻烦。因为需要姐姐签律师委托信，她知道之后非常激动，哭得厉害。我感觉特别对不起家人，让他们担心。姐姐知道我在追社保，也支持，但是不想我出事。她也是打工的，在 GZ 洛溪那边。

关在里面的人，肯定都想尽快出来。我在里面的时候，也没考虑这么干值不值，事情已经发生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后来见到律师，我的情绪才稳定下来，还有那么多人帮忙，都说罪名不会成立。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感谢应该感谢的人。

从看守所出来时，警方通知我，说过些天会给我打电话。在看守所，只问了一次话，都是问事情的过程。后来也没有其他人找我谈什么，也没说不让离开 PY 之类的。不过，律师建议我回避，所

以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尽量不去厂里那一带。

4月19日，厂里出通知把我开除了。5月2日，我去交社保钱的时候，见了一次人事部经理。他查看了电脑记录，核对我该交多少钱，然后给我盖章。公事公办，没交流。当然，我是不想回那个厂上班了。

我跟 MJ 被抓之后，好多一起追社保的工人都有些犹豫了，不知要不要追下去，会不会被抓？大家的心态发生很大变化。

因为工人追社保，据说厂方做了很多假帐。有小道消息，说厂方应负担的社保缴费部份，以后由政府来出。是否如此，我就知道了。



工人代表 GGQ

个人工作经历

我是广东河源人，家里有个哥还有个妹妹。哥哥比我早一年出来工作，在工厂做手袋之类的工作。妹妹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 HB，后来嫌工资太低，做了六七年后走了。

2000 年 6 月快 19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和表哥出来打工。表哥的朋友的妹妹介绍我进 HB。开始是生手，做普通员工，工资底薪是 250 元。刚进去时就开始干活。第一个月每天加班，工资有 700 多，寄给家里了。那时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候加班到半夜两三点。

那时候没有淡季，一年到头订单都很多，很兴旺。以前很多厂做 K 金，现在很多都做银。

2005 年工资底薪大概 500 多，加班少了一点，每月工资一般在 800，900 左右。

以前旧厂有四五百人，搬到 LH 镇后有 1000 多人。当时搬厂时老员工有补贴。在 LH 做够三个月的每个人还加 100—150 元左右。

我是做倒模，计时工资。可以申请去其它部门，但一般调换部门需要关系。有些部门需要熟手，所以即使申请了一般也不让去。

只有一个部门的主管不是香港人，其余都是。香港主管经常骂人。2005 年香港主管的工资有八九千。主管的技术还可以，每个工序什么都能做，也要干活。

金融风暴前，2007 年的时候工资只有八九百块，那时候晚上一般都不加班了，一天下来所有的活白天都做完了，晚上没有事情可

以做。工资减少，岗位津贴，底薪都少了。那时候自己没有想和公司争什么，已经有一两年没什么加班了。没有加班的时候没加班的话一般都是去网吧上网。

关于追社保和做代表

2003 年左右我结的婚，老婆也是 HB 的，是老板的老乡。她 2005 年的时候买的社保。她 2011 年辞职回家带小孩了。那时候买社保是有名额限制的，名额会派给师傅，师傅想派给谁都可以。名额大部份是给了老板的老乡。我们的师傅很凶，不敢和他吵架。

知道能补社保的事。当时也知道老板不会同意，觉得会很艰难。不过我早就不想做了，工资太低，2010 年的时候工资只有 1000 元左右。当时我在周围收码，所以没有辞职。卖六合彩，一周收三次，收入在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比工厂的工资还高，也比较稳定。当然这个也有风险，如果被警察抓，会被罚几万。

2011 年 5 月份一个工人代表，也是我同事，问我要不要参加追社保。我是 2010 年买的社保，觉得能追是好事，就参加了。那个同事后来慢慢退出了，我就站出来做代表了。

做代表主要是商讨、跑部门、联络、去劳工机构开会、通知其他工人，等等这些都是代表在做。工厂知道我是代表之一。十多个代表都有授权书，表明我们是工人代表。写这个授权书主要是为了保护代表。通知厂方之后，工厂就不能解雇代表。之前代表没公开，有人被抄掉，后来就写了授权书给厂方，方便保护代表。授权书劳动站那边也有一份。

代表里面有五六个比较积极，其余不那么积极的可能是在做炒根（临时工），也可能有害怕相关部门找麻烦的。我觉得代表个个都希望被抄掉，这样可以拿经济补偿。

争社保两批人共有 400 多个。我们只是找公司和各部门追社保，不会去做妨碍生产的一些罢工，觉得那样会被抓。而且劳工机构教我们不要妨碍生产，建议先去各部门投诉，违法的事先不要做。

我是最早一批被放假的人，一共有 80 多个人。

被放假之后，我们就很想能够罢工，但是只是放假的愿意，没被放假的不会参与。一两百个人罢工没用，而且是淡季，罢工的话直接让你放假。工厂里的人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老板的同乡，动不起来。还有三分之一是师傅的同乡。

老板的老乡一般是分配到好工作，他们也能享受各种福利。但这几年老板比较刻薄，想尽各种办法减低工资。所以老乡对老板印象不好。当时我们争社保的时候那些老乡拍手叫好，但他们不敢一起争取，怕老板回家乡说长到短。

劳工机构那边不支持我们堵厂门，我们商谈的时候，H 哥也建议我们不要堵口，不要妨碍交通。

去年争社保到现在有很多人辞工，包括追社保和没追的。辞工后也还继续在追社保。有些代表是偷偷的辞工，之前不和大家商量，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代表辞工后就没有选新的人上来。现在还剩六七个代表愿意跑腿办事。其他人都在炒根挣钱，我感觉看我们代表是：吃饱了没事干，白痴，自己受苦。

代表里男的多一些，争社保的人女的多一些，珠宝厂女多男少。经过争社保的事情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不会再害怕管理层了。经过几次行动之后（去了几次政府部门）大家会更团结了。现在没追社保的人去人事部拿东西都不敢去，追社保的人去人事部就比较大胆，骂人都敢。

厂方对待争社保的手法就是拖。奶妈不懂法律，不会讲话，对那些胆小的女性就是骂人。男的去，了，奶妈只会说“会给你解决的”。何经理是在我们争社保的时候被高薪请来的，之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法人代表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何经理处理了。我们找他谈事情，他

就说“只按照法律程序走”，明显感觉到与奶妈的不同。

老板太狡猾，他总说“追讨得到就给你，追讨不到就不给”。

我们一开始追社保，找了很多部门都没用。后来召集了一百多人去 GZ 信访，被陈书记拉回来了，答应帮我们解决。去信访的时候，因为有代表顶着，大部分人当逛街一样，心里没什么压力。我们代表就要做很多事了。第一天开会讨论该怎么搞，第二天去看地形、通知其他人，第三天出发。我们通知的时候一般用 QQ、手机通知，会告知路线及在哪集合。

4.2 事件

我们商量怎么做的时候，想到如果去找公司要回复，将是一个持久战，但当时只想到不答应的话就不走，没想更具体应该怎么应对。

开始的时候没想到公司会算旷工。我们叫其他工人参与，人事部说公司里还在上班的工人也到办公楼来就算旷工，后来我们叫劳动部门的人过来以后，人事部就没再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后来两个代表被抓之后，这个问题又被公司提出来了。

我们评估和保安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平时他们也不管什么，出了事职责所在，会装装样子。

我们讨论的时候认为这样做不会构成犯罪。在行动之前看过相关的资料，劳工机构的书，相关报导都有看过。主任那边是希望我们做，但他们不会参与进来。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

当时本来的目的是找老板，但老板一直不出现，只能去堵何经理，很多人觉得去宿舍围老板，但有人说那个是私人地方，怕违法。我们有人骂何经理，但不会去恐吓。我们只是把门堵住，不会打人，不会去恐吓人，只会是他们来侵犯我们。维持工人秩序方面是代表

在做。

我们那天一到办公楼，警察就来了，派出所，PY 的，GZ 的。何经理联系了很多，但没人理他。有人看到他和老板联系，跟老板抱怨政府部门的人。

何经理后来与我们拉家常，经常说共产党很黑暗。

何经理说“上面的人没让我怎么做，我拿材料也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相在部门的人都来了之后，谈判代表出来之后没什么结果。

连续撑了两天一夜，后来听说何经理和两个代表都进了派出所，我以为何经理要倒霉了，却没有想到代表会有危险。当时都以为代表被关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想过其他问题。

代表被转移到看守所之后，有人建议再去 GZ 上访，但很多人不同意，担心有更多的人被抓。MJ 被抓之后工人的情绪当天晚上有些恐慌。大家在那边议论，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当时会担心政府可能会找我们麻烦。

第二天我们其余几个代表去了劳工机构。在那里商量好给 MJ 他们打官司找律师，如果有费用的话就所有人来平分。当时每个人收 150-200 元左右，收钱的时候有些也不是很顺利。有 90% 的人愿意交律师费。

当时 MJ、YM 两个被抓了之后，社保方面也还一直在更进。



工人代表 F 哥

F 哥是追缴社保的工人中在 HB 工龄最长的几个人之一。他们见证着 HB 从最初几十人的小厂发展到两千多人，工人的汗水如何一点点转变成老板的财富。访谈他时，F 哥还在放假，他希望厂里能不再放假，他能够在这里继续做下去，买够 15 年的社保就好了。后来 F 哥如愿，离开 HB 去外地谋生了。

打工经历：台湾鞋厂

我是湖南人，1992 年跟一个亲戚到 GZ 打工。开始是种树，一个月二三百。当时十七八岁，进厂比较难。我有个老乡在鞋厂做管理，我们就去厂里修房子，修宿舍，是临时工。一个月以后，就安排我进厂做工人了。开始做普工，后来做了两三年电工，一个月五六百。

加班都有加班费。我们做电工好一些，普工就没有休息日。我为了争加班费，也很少休息。

鞋厂车间里，那个胶要用烤箱烤，又热又味。但是我一般不在车间。工厂里没有空调，有风扇，但是有的不能用。工人流动性比较大。夏天热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一次凉茶喝，还算不错。工人大多数都不是广东省的，讲普通话。

工厂老板是台湾人，是跟大陆合资的，有六七百人。台湾老板好多都当过兵，他就要我们做早操。那些组长、课长，骂人很凶，但都是骂流水线的普工，不会骂我们电工。有时候要整条线集合，课长一骂就是一个钟头。我们厂有句话，说是不会骂人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屁大一点事都会骂。做错事会罚款，但是迟到不罚款。

厂里有食堂，伙食还可以，收费，2块钱一天。厂里有宿舍住，有冲凉房，有很多水龙头。有段时间我租了一间平房，就是 GZ 那种老瓦房。一间房两三百，六七个人住，每个人二三十。

我在厂里做了 2 年，工资也涨过。1994 年辞工的时候，算上加班，一个月 800 多，加班费一个钟 9 毛多。赶货的时候一天要上十五六个钟。不赶货的时候，就是基本工资。

那时没有年底聚餐，也没有双薪。只有一年过中秋，厂里搞了一次晚会，所有员工都参加，有抽奖，奖品是相机、随身听一类的东西。

那时也有受工伤的，但是不懂法，没有要过赔偿。一点小伤就在医务室处理一下。

做电工跟拉长关系好一点。机器坏了他们要赶紧找我们修，要是跟我们关系不好，修得慢，他们就要加班。

我们厂女工多，一般都是女孩子。我们车间楼上就是那些管理人员的宿舍。有些管理半夜了 12 点多了还叫女员工到办公室去。听说有一个女孩子不愿意去，后来被抱上楼了。厂里的女工都不敢出声。我们厂的经理在工厂后山建立一个小花园，让我们给他在房子里搞了一个茶室，有事没事就叫女工去喝茶，大家都不敢去，但是不去他就给你穿小鞋。

没有高温津贴。立功了就奖励一件衣服，没有奖金。奖励和罚款都会贴通告，还是罚款比较多。过年只放两三天假。

我们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厂里当官的炒人很随便，让你滚，你马上就得滚。

那时有一家厂叫万宝电器厂，厂里的保安都是武警，其中一个人跟我们厂的一个女孩子好，这个女孩子在厂里被台湾人欺负了。那些武警有一天就冲到我们厂里，见到保安和当官的就打，但是不打工人。后来我们厂的保安，联合隔壁厂的保安，一共 40 多人，去万宝厂堵人家大门口。

当时的治安非常差，经常有抢劫的，晚上一个人不敢出去。有一次我和我老婆出去玩，有三个人，两个对付我，把刀架到我脖子上，一个抢了我老婆 40 块钱。他们没有敢伤人，一喊就跑了。他们跑我还追，追到我们租的房子附近，我们老乡都出来了，他们就怕了。我的一个老乡还把钱帮我要回来了。

后来我们厂在花都开了一家新厂，我就去了那个新厂，但是那个厂一年就倒闭了。我又不愿意回总厂，就辞工了。没拖欠工资。

这两年在鞋厂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后来我会老家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 GZ，1997 年进了 HY 厂。

在 HY 厂

我一个朋友在 HY 厂做保安，就介绍我进厂了。工厂只有不到 100 人，其中工人只有四五十个。我的工作倒模。进厂交了 400 块押金，底薪 250，一直到 2000 年还是 250。加班费一个小时 1.85 元。加班不多，一般到晚上 9 点或者 10 点。旺季加班也不多。淡季没有加班。工厂包住宿，吃饭一块一顿，伙食还可以，因为工厂人少，有汤喝。天热时有凉茶。

但是这个厂本地人占多数。他们讲白话，我听着就有点困难。

厂里香港师傅心情不好就骂人，不准你顶嘴。你越反驳他越骂，不管你有理没理。有时候你去请假，他乐呵呵骂你一阵，第二天还跟你说笑。刚来的员工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乖乖听话。

我也被罚过一次，500 多。有一次，1 克黄金找不到了，值几千块钱，整个部门的人赔钱，一个人几百块。一个月扣一百，扣了几个月。还有去年，有个人弄丢了两颗戒指，一个月扣几百，现在还在扣。

丢东西，可能是丢了，也可能是被人拿了。比如，一个人从上边拿了 50 个货做，给下一个人的时候，发现是 49 个，搞不清出是丢了还是被谁拿走了，就会吵架。

后来工厂搬迁，跟着搬过去就加工资。

我们厂 2001 年就开始有人买社保了。都是那些当官的，还有一些有关系的员工才有。一个车间就几个名额，那里轮得到你啊。

后来这家厂福利越来越差。以前住宿不要钱，现在要扣住宿费。以前过节有月饼之类的，后来没有了。

上班比较自由，说话也没人管。上厕所拿个报纸，也没人管。别的厂跟我们工资也差不多，但没这里自由。做的久了，没有压力，就不想离开了。

厂里可以打羽毛球、篮球、桌球，每年都有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但没人去玩。大部分都在外租房，下班之后要回家。

工厂发展很快，很快就有 2000 人了。开始招聘是要人介绍，后来需要的人多了，就开始直接招聘。金融风暴以前，一直都很挣钱。听管理人员说，我们厂一年挣几个亿。



讨社保

我是我们厂第一批追社保的。我做了这么久，什么也没得到，出去找厂也困难，能买到社保是最好的。

当时也没想过追社保会和工厂发生正面冲突。后来我介绍一个人到厂里上班，一看到是我介绍的，马上就不要了，等于是把我列

到黑名单里了。

追社保时，我们部门收钱比较容易。对我们来说，100 块也不算多。代表去跑这件事情，路费我们总要出一些，也是应该的嘛。

去年 11 月份，厂里开始给我们放假，我就想厂里在针对我们。厂里说是没货做，放我们的假，但又找别人去做。我们去找劳动局，他们说不归他们管。找劳工机构问怎么办，我也去了。劳工机构的人说这样不行，还有个孟律师给我们开会，他讲的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

放假之前已经是淡季了，没那么多货做。上半年没货做，我们就在那里趴着睡觉。本身就没什么货做。我们追社保的只有那么一点人，罢工罢几天也没影响啊。如果我们这些人把厂门堵起来，工厂肯定会有压力，但肯定会找保安。

我们有 100 多人，老板的同乡不敢来打我们，给钱也不会。他们对老板也有意见，因为他们福利也没了，而且没事情做。执模的机损耗标准越压越低，赚不到钱了。老板的同乡走的很多。

我们每个部门都有代表。平时通过打电话和 qq 联络。行动的时候，有人有事就不去。

我觉得我们部门的代表还是能办事的。谈判的时候都是代表进去，我们没有进去。

围工厂办公楼那次，我也去了，不过只有一个晚上。我看到何经理还嘻嘻哈哈的。他也有他的难处。老板不赞成，他也不敢贸然答应我们的要求。

当时大家都嘻嘻哈哈的，跟经理说话都笑着说，没有工人骂他，大家好像聚会一样。保安也不管我们。我们就像请愿一样的。

当时满基和玉梅被抓进去，我感觉没什么大事。我们在派出所坐了一夜，觉得关 12 个小时就会放出来。后来他们被转到看守所之后，我觉得是中了他们的计。他们设了个圈套。

然后就觉得有理没地方讲。老板势力大，不比外国嘛。

人被抓后，又集资，我交了，有一两个没交，我不知道原因了。我觉得应该交。我们没犯法，不应该被抓，我们没犯法凭什么要抓。要证明我们的清白嘛。

当时好像有几个人有点害怕。但是觉得不会影响到我们追社保。只是下次不能这么搞。

工厂给我们放假就是想逼我们离开。我们不走，也不敢炒掉我们。我们就在想有什么好点的办法不让厂里放假。找劳动部门都没有用啊。我是想在这里做到买够 15 年社保。如果真的做不下去，就再说。

我老婆也在这个厂，但是刚来不久，她没有追社保。

我老家盖了房子，花了六七万。有两个小孩。



工人代表 H

我是第一批倒模部门的员工，跟阿甘他们一个部门。

我九四年就出来打工，那时才十六七岁，刚初中毕业吧。我姐姐带我先去了东莞，她比我大三四岁，那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一般都是初中毕业就出来了，没有钱供我们继续读书。我是广东清远那边的人，我们厂里挺多清远的人。

我当时在东莞的钟表厂里做电子表，老板是香港人，厂里由几百人，规模不小。当时那个厂到我们那里招工，我当时只有一张临时身份证，没有卫生证、劳务证，但是我一报名填了个表就可以了，也没有介绍费、押金，我们几十个年轻的老乡包了车就跟着他们去

了。他们是跟地方政府合作的，政府的人送我们过去，两三个月之后还有人来看我们到底习不习惯，所以我们也不怕他们把我们拐卖了什么的。可能政府也需要政绩，请工厂过来的。

我和姐姐进场之后签了合同，包吃包住，也不扣钱，吃的也还过得去，一个青菜、一个肉、一个汤，也不算很好，但跟现在很多厂比起来，算是过得去的。逢年过节有加菜，但是没发过粽子、月饼，时不时堡一些糖水给我们喝。过年的时候会包车送我们回去，不管回哪儿都是报销单程车费，回来就需要自己出钱了。比如有些四川人，他们不可能包车回去，就自己买票回去，然后回来再给他们报销单程车费，他们也是工厂直招的。

我们几十个老乡没有搞老乡会，不会跟外省人保持一定距离。宿舍都是随便分的，我们一起去的就分配给两三个宿舍，全部是女生，男生比较少就分开住。

基本工资好像是三百八，加班费另算，正常工作时间大概是九个钟或者九个半钟，之后才算加班。周日休息，一个月休息四天。但是那时我进的那个部门都不用怎么加班，其他部门，比如我姐姐那个部门就要经常加班。我的工位是组装做手表用的机芯，我们厂机芯和外壳都有做。我做机芯挺轻松的，都是坐着做，偶尔小声聊天也是允许的，只是赶工的时候他就会说，不要说那么多话了。管理不算太严。要求戴工帽，衣服也是像太空服一样的那种，裤子和衣服全部连着，因为装机芯需要进无尘房。房间里有空调暖气，做配件没有冷气不行的，太精细了嘛，手不可以出汗的，所以也需要戴橡胶手套。

我们那个部门有五六条拉，每一条拉都有一个拉长，拉长不用怎么做事的，他只需要看着我们，只有我们上厕所休息时，才需要他来顶班。我们是流水线，速度不算太快，



可以调整的，不会跟不上。有些岗位也不是固定一个人的，如果做不了就会多安排一两个人。

拉长上面是主任，主任上面是主管，主管都是香港人，我们请假一般都要跟主管说，如果主管不在，才可以主任说了算，拉长没有权力批假。不过请假都很好请，那时我看见天气好，想跑出去玩，我就 X 点半之后跑出去玩，但是我们部门好请假，我姐姐那里就不好请了。每个部门都不一样，但都不算太难请。老板有时会来巡查，我们有在厂里看到过他，他隔着厂房的玻璃门在外面看我们，老板是两个人，两兄弟，我们叫他们为大老板、小老板。老板没有在全厂开会的时候来讲过话，一般开会都是主管讲，讲生产之类的，不过也很少开这种会。那时候也有保安，进出门会安检，怕有些人偷表出去，我不太记得清了，应该是用的安检门。在宿舍那里还有两个保安。不过都没有因为投电子表而被开除的事情发生。

那时候也不用上晚班，加班很少，不会每天都加，一次可能就两三个钟，加班还有夜宵吃。我去的那个部门比较清闲，其他部分就比较辛苦了，他们觉得工资不是很多。不过没有押我们的工资，上个月的工资这个月发，我有钱都寄回家里了，没有存钱，那时很少有开银行卡的。家里也没什么钱，有钱就寄回家补贴一下。

我休息时间多嘛，有时候就几个老乡出来玩，逛街，没钱的时候就是闲逛街了。东莞的治安听说很差，我们晚上都很少出去，即使出去都是几个人一起出去。那时候太小，很多东西都不会留意到，所以治安队来查暂住证之类的事情都没有注意到过。厂里没有打球啊、看书啊之类的设施，有卡拉 OK，有一个投影室，我们晚上不加班了就可以免费去看。

后来我为什么辞工了呢，是因为有批货，由于我的部分原因，把它搞得不行了，厂里就把我调离了那个岗位，虽然还是在那个部门，也没有罚款，甚至都没怎么骂我，就说把那批货搞坏了之类的。我就不想做了。他们很快的批准了我的辞工，没有拖，不用提前一

个月，工资在走的那一天全部结清了。还挺正规的。

我辞工之后就去了 GZ，找了个在酒楼当服务员的工作。因为之前在东莞都是工业区，没有什么地方能去，就觉得 GZ 比较好玩一点。

在酒店做服务员做了大概两年，也换了好几家，收入都是五六百左右，不包吃住，需要自己租房子，我们都是几个人一起租那种比较旧的、要拆但是还没拆的房子，所以房租就不是很贵。平均一个人两三百了，将近一半的工资。我是负责端菜上桌的，没有什么小费。过节的时候会有加餐。三八节就是多给一天工资，后来就改成半天，再后来就没有了。也不可以说那天不要工资，要放假，因为它卡着一个部门，不可能女的放假，剩下男的干活。

后来，九九年没做之后就跑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身体不是很好。

两千年就到了这里，经老乡介绍进了 XX 厂。当时我在佛山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两个人一起找工作，想在一起做，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同时要我们两个的，结果两个人都找不到。后来天气比较闷了，住在别人那里不方便，我嫂子在这边，我就问她有没有事情做，她问了一个我的老乡，正好这里有招工，所以就过来这边了。那时我们刚进厂才两百五一个月。

我们四五月份进的厂，六七月份就开始加班了，一直到十月十一月份。那时我身体已经好很多了，因为之前会做一段时间的工，回去休养一段时间。那时过年是分批放假的，所以差不多有两个月的假期，放假我就回家。

每个部门都有香港师傅，他们不会怎么为我们着想，也没有说太凶。但其实他们凶不凶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的联系一般就是请假，请假是可以请的，只不过就是好像不怎么敢请。

我是做倒模的，因为有时候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做，有时候会有一些争吵，可能是因为质量的原因，比如说你说我做得不好，我说

你做得不好，不是我的责任，你的责任之类的问题，不过都没什么，大家都是年轻人嘛，不会往心里去。

我又一次因为厂牌丢了被罚了一百块，就是放在口袋里，出去外面，别人可能以为是钱啊钱包，就被偷了。当时我第二天就要拿钱放假回家了，马上补办了一个，被罚了一百块。不像以前，捡回来就行了，现在是就算你捡回来了，被他知道你掉过，还是要扣你钱。上次我们部门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她的厂牌在厂里面丢了，然后她去上班，我们要打卡的嘛，没厂牌就打不了，只有让她记一下她的厂牌丢了。后来有人找到了帮她放在了保安处，打电话叫她过去拿。她就跟厂里说厂牌已经拿回来了。但是他们说，不行，你的厂牌已经丢过了，还是要扣五十块钱。这是前年的事情了。

抽烟也要罚款的，我们部门有人在厕所里面抽，被抓到过。打瞌睡也要罚，趴着睡就算，我们部门有人打瞌睡时被保安照了相当作证据，拿到人事部，人事部决定罚不罚。保安拿部相机巡查，偷吃早餐啊都会拍下来。不过偷吃早餐没有真正罚过，因为我们也会相互提醒，看到保安来了，马上提醒在吃早餐的人。特别时加班的时候，因为特别累，很多人都想多睡一会，就没时间吃早餐，只有带进去吃了。如果带早餐被保安看到了，就会被没收，但是不会罚款，就只有饿肚子了。保安天天都会拿着相机，频繁的时候一天十分钟走一次，以前没那么严格的，从我们 XXX 开始，就拿着相机到处拍了，以前只是会经常走动。保安在走动巡查的时候如果看到有抽烟的，如果不严重，就叫去人事处写一封警告书，如果觉得挺严重的，就直接罚款五十元，不开单，直接签名，之后贴出公告，发工资的时候扣。从零二年开始就已经有人扣五十块的了，后来也都有。

我们没有储物柜，什么都可以带进去，钱包、手机、钥匙、打火机这些都可以，只是不可以拿袋子，只能拿在手里。我记得零几年，天冷的时候穿了外套，有个湖南的男孩子因为不脱外套（外套

也有袋子），差点跟保安打起来，还被拉到人事处去了。（黄 2）后来好像没有没有罚款，也没有开除，就是训了一顿。

当时刚进厂就觉得这边福利不算太好，比如吃饭是扣一块钱一餐，厂里再补一块，等于是两块钱一餐，饭堂太小了。宿舍也不好，不单是远，而且条件也很差，二楼四楼是宿舍，一楼是冲凉房，冲凉房不仅门是坏的，还会堵上很多水，因为水流下去比较慢，冲凉要垫几块砖头才行。水是在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大锅里烧的，都不太热，因为一边撒，一边装，冲凉还要排队很久，不过我进来那时候，2000 年年尾，他们就搬过这里了。这边要好一点，12 个人一间宿舍，相对来说更暖和一点了，有冲凉房、厕所和阳台，冲凉的水是用太阳能，也有热水房可以给我们提水，一个热水房有十几个水通天，头几年还好，后来几年天冷的时候就没有热水了。喝的水可以在饭堂装，那里有几个水龙头，我们可以打开水过去自己用。过节在最初几年有月饼，但是没有粽子，冬至的时候也有，有一点水果，这一两年都没有了。

之前，我们厂里还有几个人跳楼，总共有三个，05、06 年的时候吧，好像时因为岗勤问题，工作压力大，都是女的，最开始有一个在四楼楼顶哪里跳，后来厂里就用杆子焊住了不让人进去，但是后来又有一个跑上去跳楼了，好像是因为请不到假吧，那时候请假都比较严，我们工人都不准请假的。后来厂里给了 8 万左右的赔偿吧。这几个女孩子都不大，十多二十来岁的样子吧。最后一个是割脉，是我们部门的，好像是因为感情问题，家里压力大，她就割脉了，不过自杀未遂抢救过来了，没死。后来跟她玩得比较好的，守护她的女孩子精神也出问题了，后来好像中邪一样，在上班的时候一个哭一个叫，后来家里就来人把她们接走了。

厂里什么都没提，就跟没发生一样的，宿舍暂时就空出来了，后来住了一些保安进去。二楼最开始是住女孩子的，后来就住男孩子了，有人提出要换宿舍的，也可以搬。老板是惠东人，很信鬼神

之类的事情，他有找人来给房子驱邪。我们听说，每次出了事，他都会找有很大法力的人来驱邪。

保安在我们厂就是帮凶，经理是主谋。大家都是来打工的，说得不好听保安就是看门狗，但是他拍照抓到人了就会有奖励。说是抓到贼了有奖励，但是我们厂白天被人撬了一二十间，保安都没有捉到，那时候还以为厂里会给我们赔偿，结果什么都没有。我的宿舍没被撬，但是东西也经常不见，比如钱呐，贵重的东西，新买的衣服啦，小颖给她爸爸买了个外套，一百多块，还没寄回去就不见了。这些应该是内贼啦，我们就去登记下，然后也没人管。我怀疑是打扫阿姨拿的，虽然我们宿舍有柜子，但是很小，但是很容易被打破，师傅那里也有钥匙，阿姨一个星期过来打扫一遍，那些阿姨看到她喜欢的就直接拿走，她们有的都是有关系介绍进来的，反正保安不管，随便她拿。

08年的时候，我做了八年了，工资就一千，一千零几的底薪，加班费比较少，那时候加班比较多，有一次加了两百个钟，我们那个师傅还买了巧克力来，说加两百个钟的奖两个巧克力。就是加满没有请假，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请假，加班太累了，就会跟他休息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师傅还算不错的，他说累了可以请假，没关系的，可以休息一下，不过有时候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休过一个晚上。

零九年金融风暴过后，我们放了比较长的假，淡季就放假。好像我是十二月份放假，放到五月一号，但其实我三月一号就回来上班，上了一天班，那里不是有张工资单41块吗，就上了一天他就要我放假，那时候，有八个打磨部工友到人事部里去问，就说我们不愿意放假。他们说你不愿意放假你就回来，我安排事情给你做。那几个工友又说为什么你安排我做我就得做啊，我就不做了。后来大概有五个也找过劳动部门，我记得最后他们只赔了几千块钱。他们因为这件事就不做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也跟他们一起去跟那个奶妈谈，后来他说你要放假就放假，不放假我就安排个地方你在

那里静坐。

那我这两个月就去正泰打工了，可是只做了两个月就跑了，他们是一个玩具厂，五六号发工资，比较随和，没什么压力。我做的工作就是做好了车子打包绳子，把纸皮放在车子上，我用绳子绑在纸皮上。是计时的，工资好像有一千，加班不多，一天就一两个钟。后来要上夜班，我就不做了，他也很快就批了，虽然他们不好招人，但如果是主动离职，不是被炒掉的，下次还是可以进去的。但是呢，他们做事还是挺严格的，对玩具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因为是小孩玩的嘛，有一点点边会刮手都要返工的。流水线速度很快的 我那个岗位两个人做都来不及，别人的都有两三个人和一两个机动帮忙，我们就只有两个固定的，我们就会很累。他本来需要三个人，可他只有两个人，所以我们就很累了。后来我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那个部门的组长就很凶。

吃饭是饭卡可以充钱进去，在那卡里扣钱，就不需要用现金的。又要拿钱又要打菜，那个菜就脏了。这样就比较干净，而且这样就没那么容易被偷钱了。

这两个月我分别拿了 1000 和 900，因为第二个月没满一个月。

在买社保之前我差不多干了十五六年，都没有考虑过社保的问题，那时因为我们是出来打工，感觉好像是临时工，以为社保是那些有工作有单位的人才能买的，感觉好像很高大，离我们很遥远。那时没有想过社保的事情，我们厂是有名额的，或者师傅想给谁买就给谁买。我进这个厂那时都很少有人买。

我们老板的徽州老乡挺多在我们厂的，不过我们车间没有，因为不是技术活，就很少安排他们来我们这儿。他们可以预支工资，我们就不行。

我对奶妈的印象就是，凶巴巴的，他有事儿找你，就笑咪咪的。说话有点结巴，口才还是可以，就是说话不太流利。社保这件事我是去年开始搞的时候才知道的。

工人代表阿英

工厂的员工基本都是外省人，本地（广东）人才几个，四川湖南最多，江西的也有不少。手表全部都是出口的。

拉长，本地人和外省人都有。我也不知道怎么选的。拉长奖金比我们高一点。

有全勤奖。还有特别奖，每个人都有，多少不一样，但差别不大。

我在手表厂做了差不多七年，1998 年辞工回老家结婚，隔了 6 年，2004 年又出来打工。有人介绍，我就进了 HY 厂的倒模部。

那时候生手刚进厂，底薪是 250。我老公也在这个厂，他比我早了四年进厂。

2004 年加班好多，我都怕了，哭都哭了几次啊。7 月份进厂，正好是旺季，每天都要加班到 11 点、12 点。淡季有事做，只是没班加。之前在手表厂一般加班到 10 点，最忙的时候才加班到 11 点。

倒模不难学，绝大多数都是女工。刚进来试用期三个月。加班多的时候，工资有 600 多块，加班费按 1.5 倍算的。



隔了那么多年没有做事，刚进 HY 厂觉得不习惯，好累。但也没有想过要换厂。附近有正泰厂，但全部是流水线。

我们部门里的师傅都是香港来的，2004 年时有两个人，一个凶，另一个还可以。师傅平时都很随和

的，但你请假他就很凶。刚开始他不批，但如果你实在有事，他也批准，不是很苛刻的。

师傅的工资很高，可能一万不止，而且他们拿双份工资，大陆有工资，在香港也发工资。

我们的工资，刚开始是一年调三次，现在是一年调一次。我挣这么点工资就是贴补家用。

我老公做电金，工资也很少。旺季一个月最多 1200，要加很多班。我那时候一个月加了 160 多钟头才拿 630，现在工资单还在身上呢。现在想起来，我就想说这样子我都熬过来了。

小孩放在乡下，我们把钱寄回去，家婆带。

那时候我们租房子，130 一个房间，带厕所的，走廊可以做饭。后来房租涨到 150 块钱，但只涨过一次。现在好多房子的房租都降了，有些从 170 变成 150 或 140。因为工人少了好多。正泰厂没事做，又解雇了很多。HY 厂给工人放假，一放几个月，也不给生活费。

我们附近那个正泰厂，员工做到 9 年就被炒了，不会让他们工作满十年的。不过炒了会有钱赔，我们厂炒掉就没有钱陪。正泰组织员工出去旅游，我们也没有。他们逢年过节有东西发，我们也没有。

2004 年刚来 HB 的时候，发过水果，还有三十块钱，也就一次。三八妇女节放一天假，后来放半天，再后来就取消了。之前我们待遇也挺好的，后来“祖爷”来了，“奶妈”来了，那一年好多福利都没了。就是他们几个人研究怎么对付我们这些员工，替老板着想。

组长工资比我们高，底薪不一样。他们加工资，一部分加到底薪里，一部分加到加班费里。他们工龄长，有的做了 20 多年，我们没法比。现在进厂的新员工比老员工划算些，一进来底薪就高。

平时如果做错事，组长肯定要说，但是我们那个工种，很少会做错事。

奶妈（人事经理）凶巴巴的，我们好讨厌她，她欺负人，剥夺

我们员工的福利。我没怎么跟她接触过。我们在 GZ 的厂里没有开过全厂大会，深圳厂就事情就会开全厂大会。深圳厂进厂 3 个月就给买社保，GZ 就没有这么勤快。

我在手表厂买了六年了社保，后来就退了，拿了钱，很可惜的。

2008，2009 年，我的底薪 690，没有加班，加上奖金一百多，也就七八百的样子。也没想过走，因为这个厂不累，不会催你做事，比较自由。上厕所没有限制，还可以聊天。

打卡迟到会扣钱，一个月加在一起超过一个钟就扣。以前有全勤奖，现在也没了。

那时候有医疗室的，简单的包扎、感冒拿药不用钱。每周二四六有凉茶，一三五有汤水。以前在深圳手表厂一块钱一餐，早餐五毛钱，不过伙食没那么好。

2008 年 5 月和 6 月，我放假两个月，回老家了。7 月 1 号又开始上班。有人放 5 个月。

我在家的六年里生了三个小孩。我是农村户口，第一胎是女儿，就可以再生一个。第三个是超生的，2004 年超生费罚了一万多，东凑西凑。读书要看户口，罚过钱就能上户口，就能读书。

2008 年金融风暴到现在，HB 厂待遇越来越差。工资调整了，底薪一部分调成岗位津贴，年终奖也没有了。我们也抱怨。

我们那个车间有冷气。我们车间比较自由一点，工种简单一点，工作本身比较轻松，材料本身也不值钱，做坏了丢掉就行了。别的部门做金银的就不行。

待遇差了，但我们也不想走。主要原因是年纪大了，不想走来走去再换工作。如果我们出了厂就不做了，就回老家了。

首饰厂偷窃

首饰厂有工人偷东西，每年都会有一次被抓到的。我也讲过偷东西被抓到的。有一个人，做一款首饰，要求 50 件，后来一看有 51 个，她说怎么会多一个，就拿走了。

深圳工厂罢工

我在深圳手表厂，有一次因为大家觉得工资不合理，闹过一次。我们就不做事了，坐在那里。经理来了，问干嘛不做事，我们说工资不合理啊。闹了一天不做事，经理也很怕的。全厂人都不做事。

我们觉得加班很多，工资怎么那么少，好像没人都少了一两百块。每个部门的主管带头的。经理和老板的亲戚都来让我们不要闹，说老板肯定会把钱补给我们。我们闹了一天，老板就答应把钱补给我们了，我们就不闹了。厂里也没有惩罚我们的主管。

我有亲戚一直在深圳的厂做，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有。

我们才闹了一天，别的厂闹的更厉害。他们有人发传单，还上街了。罢工，最后还是员工赢了，深圳这种事好多。

追社保

我们厂其他工友搞社保，我们都听说了。她们会跟我们说：“哎，你们来跟一起搞社保。”大家就都知道了。

我在深圳的时候买过社保，后来辞工退保了，当时把钱拿出来，自己花了。当时不知道社保有这么多用处，后来觉得可惜了，所以听她们说搞社保，我就想参与。

她们追社保的时候，征集签名，我当时请假回家，没有参与。她们都是秘密的，我当时没签名，都不知道她们做了什么。

第一批人已经在追社保了，后面的想要参与，要签名，交钱。有的人想去找他们第一批的问一问情况，他们不说，除非签名，交钱，一起追，否则不讲。就是你要明确表示要追社保了，他们才跟你讲。

我们都知道了社保的好处，但是第一批人怎么行动的，他们不跟我们说。怕被厂方知道。

当时我们不知道搞不搞得到，所以想先等他们搞到了再说。

我老公也在厂里，他们那个部门好像都很怕事，没有搞。我老公跟我说，你自己爱搞你去。他还教训我，说去搞了又能怎么样。他那个部门十几个人，都是老员工。

我们也有点担心，第一批人补完了，厂方不给我们其他人补。

我们第二批人是去年 11 月开始追的。当时我还是有点犹豫。

我们部门的香港师傅，说让我们不要闹了，但是不会为难我们，不得罪人。

我们去围人事部两天，后来厂里按我们旷工处理的。

后来去市政府请愿的活动我都去了，请愿都是女工去的，代表都有我们的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就去了。以前我没有去过政府，当时有一帮人去，我也没觉得害怕，也没有要闹事，就没觉得害怕。如果说是一个人，我就不敢去了，说真的。

去地税好像是 4 月 1 号。之后，代表们让我们回厂，要求厂方给我们答复。当时我们找何经理要答复。我也不怕厂里炒掉我，炒了就给我赔钱，我就是想叫他炒掉我。

何经理平时笑咪咪，笑里藏刀那种。出了事情就好凶，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一样。等一下没事了，就又跟你说笑，讲他家里的事情。等到起冲突的时候又凶巴巴的。

我们就围了两天，第三天要回去上班，不回去就是旷工三天，

开除没钱赔。

第二天下午就把代表抓到派出所了，然后我们就到派出所等他们放出来，有几十个人。后来听说不会放出来，大家心里都不好受，乱抓人嘛。还有一点紧张。

两个代表被抓，我们有集资，准备打官司。我们部门有一个人不愿意交钱。

厂里的香港师傅通知说，所有人都给买社保，不追的也给买，那些人就不想在交钱参加集体行动了。

厂里大部分人不追社保，因为他们还想再这里做事的么，一追的话就炒掉了。不追社保的本地人多，小孩在读书嘛，怕丢了工作。

厂里通知都是口头的，就说是稳住那些人啦，不要再闹事。

去年的时候，派出所的还找到本地员工的家里，跟他们买爸爸妈妈说，让他们劝儿子不要搞事情了。家属就以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公安的人都来了。这个人是我们部门的男工，他是第一批追社保的。后来他偏不退出，他说既然走到这样了还退出干嘛！

有一次去 PY 信访，第二天，警察就找到参与行动的员工家里，要他们不要再搞了。他们也不怕，照样搞。

我是 1999 年进厂。2002 年工厂给员工买社保，都是有指标的，关系好的才给买。当时人事部经理是那个“奶妈”，她就给她的亲戚朋友买了社保，关系好的才给买，有些一进厂就给买了。有些人没关系的，在厂里做了 17 年都没有买。

厂里有些员工还是老板的亲戚和老乡，这些人中有些都没有买社保。他们签名给人事部要求买社保，奶妈就说：“你都是老板的亲戚你还要这样搞啊？你快点不要搞了。”

工人代表 MXM

MXM 是个性格活泼的女工。代表们开会时，她的笑声最大，鬼点子最多。大家在商议去市政府上访时，她不知哪里看来的新闻，提议模仿一些抗议中，一人举一根苦瓜，表示工人很“苦”。

打工经历：制衣厂

我 2000 年出来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在从化的一个制衣厂剪线头，老板是哪里人我不记得了。我表哥在厂里做管理，我跟着他出来打工，就进了这家厂。从化以前属于 GZ，现在是从化区。

那时厂里有一千多人，挺大的厂。早上 8 点上班，每天加班到半夜两三点，没有双休日计时工资，加班费 1.5 元，一个月工资五六百块。管吃住，因为厂里四川人多，全部是辣的，我是广西的，不习惯。

我们主管是四川的，很凶，总说我们做得慢。我那时候刚出来，年轻气盛，有一天就跟他说，你怎么不来做，我不做了。

我才做了三个月，就实在顶不住了。每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你说怎么熬得住？我表哥叫我不要走，我就说这不是人干的，天天加班到两三点，我不要这个工资了。

工厂不批准辞工，我走的时候，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有拿到。进厂的时候没有收押金，但是要看身份证。

制衣厂的工作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要加班，我表哥也没办法照顾我。厂里很多都是外省人，很少讲普通话。我自己刚出来，讲普通话，害羞不敢说，感觉不适应。

在 HB 厂

离开制衣厂之后，我进了市桥一家酒楼，包吃住，伙食比工厂好一点，还有宵夜。工资一个月 450 左右，服务员五六百，没有小费。做了半年，酒楼倒闭了，酒楼经理说，她跟 HB 厂的老板比较熟，想进厂就跟她一起去。我们几个人就跟她进厂了。她进厂后做人事主任，我们做普工。

酒楼经理有个外号叫奶妈，但是我们跟她也不是很熟。她说这个厂有全勤、有奖金、有带薪假。我那时候没地方去，也不想再去酒楼做了。听她说这个工厂很好，就去了。

这个工厂也是一样要加班。新员工是生手的，底薪一个月 250 元，然后慢慢升。

这个厂加班不像在制衣厂那么晚，最多到晚上 11 点。那时候刚出来，看在钱的份上，辛苦也无所谓，还受得了。说真的，只要不太晚，那时候还是很喜欢加班的。

底薪 250，连加班费、奖金算在一起，最多 600、700，没有 1000。

HB 的以前的管理不太严，有种自由的感觉。比如上厕所很自由啊，做得慢也没人说。现在不行了，以前没主管的，现在有了，做得慢就要被说。主管记得你这个组做什么、做多少，和其他组比一下就知道做得快还是慢了。总之，前几年有了主管以后就没那么好了。主管每天要给我们计数，看看有没有达到每天规定的数量。我又不是计件的，你给我计数，我就有压力，感心里面不舒服。

2008 年以前，每天的标准产量是 700。新主管来了以后，说我们很懒散，都不知道有没有在做事，然后就开始搞计数，说做得多加薪。有的人就开始拼命地做，做到 800，主管就夸奖他做得快。他又拼命地做，又做到 100。后来越做越多，现在都到 1300 了。我就说，做得多又没有奖金，而且说加薪，后来也没有加。那时候就相信主管说的话了，所以我说压力都是自找的。我就觉得我们员工

笨，你追我赶，做得很累，唉。

我从 2001 年开始在 HB 厂一直做到现在。以前过年有年饭，八月十五聚餐打过火锅，还发过月饼，这些后来就都没了。回家车费是不报的。不过有“双粮”，就是年终奖。

年终奖不是一下子取消的。开始给一半，后来给 30%，再后来就没有了。那时候应该是很大意见的，但是没有说出来，个个都没办法，不懂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心里抱怨一下。

2008 年之前，底薪涨到 1000，加班费按 1.5 倍计算，我一个月已经能拿到 3000 多了。2008 年金融风暴，调整工资，减了底薪，全厂都减了。大家虽然都在议论，意见很大，但是没人说。其实那时候应该提出来的。

厂里员工流动性很大。人往高处走啦，各方面的压力都有的。打工的都是这样。

我家里穷，为了挣钱，就在这家厂一直做做做。后来结婚了，我老公在我们厂附近一家模具厂工作，是技术工，坐办公室，用电脑的，比我们轻松一点，一个月工资将近 4000 块。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好。而且我们厂相对自由一点。不像有些厂，比如那个正泰，上厕所都不行，还要上夜班，我就不想换地方了。



追讨“社保”

2004 年申请买社保失败

大概是 2004 年的时候，有一天我请假没上班。第二天，我同宿舍的同事跟我说她买社保了。我说你怎么

不叫我，她说你不是请假了嘛。然后我去找人事部主任，就是之前酒楼的那个经理，那个奶妈。我问是不是可以买社保了，我也想买。她说：“你以为你想买就买啊？！”就这么一句话。我听了很气，就走了。后来听说要有名额才能买，厂里有人走了（离职），其他人才有机会买。

我那个同事当时买了房子，就是 2004 年的时候，交了 3 万定金，在建的房子，1 平米 1000 多，很便宜了。我开始还以为买了房子的才可以买社保，那时候不懂。

那时我老公也跟我说，打工的买社保有用，以后有保障。我老公买了 10 年多。

对我们这些当时从酒楼跟过来的人，奶妈一点也没有照顾。

我们家现在才买了房，在我老公老家那边买的二手房，20 万，150 平，1000 多一平，算是很便宜了。我老公是广东梅州的，不是大城市。

买房子不是为了回去养老。现在钱不值钱，存银行里就贬值了。买房就当保值吧，反正房价不会跌。钱是我找我老公的姐姐借的，不用利息，慢慢还喽。

我是怎么参与追讨社保的

开始我不知道我们厂有人在追社保，过了几个月我才知道的。有一天在食堂吃饭，听到有人说追社保的事情。那时我还觉得不可能，哪里斗得过老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我都不相信。

回家我跟我老公说这件事。我老公上网查了一下，说有可能的。他说你们工资这么低，别人追（社保），你也有权利追。然后我就想，我也要追。

我们部门其他人的态度

我们部门有一个香港师傅，他说：“你们这些人真笨，飞蛾扑火。要追，也要看别人追不追的到。”他真的是这样说的。

我说：“这是我自己的权益，我一定要追。你们香港人买了，肯定就不想追了。”

他跟我说他没买。我不管他，我说我就是要追。他说，你要追就追，但是不要在车间里搞，不要影响工作。

我们部门五六十人，大部分人都在看戏，看你行不行，看谁先死，就是这种态度。

选部门代表

我们部门最后有 18 个人参与，但是没人愿意当代表，肯定是怕麻烦，也怕老板，个个都这么想。

有一天在篮球场开会，每个车间要追社保的派代表参加。我们车间没人站出来，他们就让我去当代表。我就说我这个代表是被逼出来的。

我也想过，当了代表，这个工作可能就做不了了，但是我想要是能追到这么多年的社保，打不打这份工都无所谓了。

待遇最差就是现在了。2008 年开始，底薪就开始一点点地减，从 1200 一直减到 860。底薪那么低，加班加死都挣不到那么多钱了。

我老公对我工作的事情无所谓，能追到社保也值了。

代表的职责

代表要收钱，通知其他人去开会。要经常去劳工机构那里，我

晕车，每次都吐，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一般不去。

我们车间收钱很快，大家都说代表不用交钱了。其他车间，好像执模车间就不行，他们说代表也要交钱，因为代表又有份的嘛。

我们车间，一开始是我提议说，既然大家没有人愿意做代表，那代表不用交钱了，因为做了代表出钱又出力。大家就同意了。后来我做了代表，还是交了钱，因为不想因为这点小事被别人说什么。

第一批和第二批

我们部门第一批追社保的有十多个人。后来又有了第二批人，也是十多个人。看不惯第二批人，没怎么跟他们沟通过。

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劳工机构要我们的社保清单。说好了我们一起去社保局打印，然后我送去劳工机构。清单都打印出来了，有一个人的老公打电话来了，说问过一位律师，律师说追社保不可能的。她就信了，当时说不追了。一起来的几个人，跟她关系好，听说不可能，都不追了。

那时候我脾气很暴。我说，怕什么，大不了再找工作。真的，那时她老公离她那么远，一个电话，听说不可能，几个人都不追了，气的我一肚子火。我说，以后什么都别问我了。最后我不管她们了。我们都很反感这种人。

还有一件事，那时去劳工机构开会，劳工机构让我们签名，有人一听要签名，立刻就滚了几个。现在她们又跟着第二批人一起追，我都懒得管。

开始的时候，不管是去劳动局还是去找厂里的人事部门，第二批人都不跟我们一起。后来看到我们有成果了，才开始慢慢积极起来。那时我们就把那些不参与我们行动的人的名字划去，这样严格一点，不要他们（跟我们一起）追了。

老板表态与政府谈判

老板给我们全体工人开过一次会。老板说：“如果社保局要我买，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去社保局，我派人跟你们去。”

跟政府谈判，我也去过。开始去的时候，我也害怕，不想进去，大家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我进去都不知道说什么，我没读过书，蔡和强他们说的多一些，说的细一些，大道理我不会讲。去了几次之后，我就不怕了。

我们提出（诉求），写出来（诉求）的那种，他们（政府）回答。我们不同意的，就会反驳的嘛。有时候我们还会跟他们拍桌子，海×就跟他们拍过桌子，谈判嘛。

去跟政府谈的时候，我们有分工，有第一发言人，有第二发言人。开始蔡和强说的多一点，不能每个人都说的嘛。后来我们都会说话，会补充。

那时做代表，跟大家用 qq 群联系，很方便。在车间里，大家一排排的坐着，也很方便。

去政府的时候，有的代表也有不去的。有说不舒服的，有说要带小孩的。有的人是因为害怕不去的。

我跟他们说过，每个人都要去，不能不去，这是你们自己的权益。反正我说过，总是不去，超过几次，就不要你了。虽然这样说，但有时还是很多人都不去。他们觉得有人去就行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思想。

组长

我们听说执模部门也有人在追社保。我们车间的一个组长说，我们去人事（部门）问问（他们的）结果吧。我们重签过名字，签

完了要去人事部。组长就怕了，不敢去了，还发火了，把签名的资料都撕了。后来他都没有再参与了。我们都说，再来我们也不要你了。

后来，凡是参与了组长，都被厂里降职了。上面这个组长的事情是降职之前发生的。

派出所外守夜

MJ 他们是代表啊，被抓进去了，我们都是一伙的嘛，应该在外边声援的嘛。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外边还能看到他们在里面坐着，没有上案子。我想，他们看到我们在外边，心里也有个安慰。在里面肚子饿了，让我们在外边的买东西来吃，也方便。要是一个人都没有，心都凉了。

第一天，守到凌晨 4 点，听说不可能放出来了，大家商量没有睡觉的回去睡觉，早上再来。我就回去睡觉了，睡到早上 8 点，我怕没人去（派出所），就又跑出去，看到有人去了，就又回去睡。10 点，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又跑出去。我老公说，你真忙啊，饭都不用吃了。

我自己守了两天。有两三个人中间跑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走。他们就说顶不住，有人又说年纪大了。我说，就你年纪老，我们还不是都三十几岁。我就想，这些人平时听组长的话，现在我是代表，是不是也要听我的呀？第二天守夜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第一天有跟我们一起守夜的人，我就说，我记得你，你昨天没通宵，今天晚上不准走。他说他眼睛疼。我那时气呀，我说我一直守着，还不是眼睛痛。最后他还是走了。

4 月 1 号的行动

4 月 1 号的行动，我就是听说要搞个大的嘛，他们说了，我们也觉得有道理。我没有去劳工机构。

那天，我们把何经理堵在了办公楼里，就是要一个结果嘛。我对那个何经理个人没什么意见，在我的立场，我感觉他有一点点站在我们工人的立场上。

他被我们堵在办公楼，还叫我们坐下来聊天。何经理说他也是打工的，也不想跟我们发生冲突的。他说老板让他冲出去，他不想。他说他也是打工的嘛，冲出去肯定要抓人的。他说我们都不要冲动，一冲动，警察就会抓人的。

有 4 个保安一直都跟何经理在办公室，保护他。他们一直都有拍照（拍我们）。

我老公的对我们维权的说法

代表们被抓进派出所，我们肯定也怕，紧张啊。我那时饭都吃不下。但是我老公说没事，不用紧张，这个构不成犯罪的。他这样说，我感觉他好像什么都懂。

我们的行动，有的我会跟他说，有的不会。我老公跟我说不要冲动，不要打架。

我老公好像很懂政府的样子。他一直跟我说，政府是很黑暗的，派出所特别黑暗。他说你进去，白的变成黑的。

反正我老公对政治那些很懂的。他很了解历史，他恨共产党，他说共产党是骗人的，共产党没一个好的。他说国民党好，天下是国民党打下来的，共产党骗下来的，我们一生下来就被共产党骗。他坐办公室，用电脑编程，具体我也不懂。反正学历比我高，什么

都比我懂。

那时我做代表，我老公说我是很傻的那种人，打麻将连一块钱都会算错，怕我做代表被连累，让我不要做，说我们是乌合之众。我老公就说我不行，傻傻的，什么都不懂。反正我老公说我什么也不行。

为被抓的代表凑钱

两个代表被抓之后，我们开始凑钱。我们部门每人 200。后来在饭堂，有人问不是 150 吗？我说我们部门都是 200，我问到底是多少。有人说最低 150，看你良心。我就说良心值多少钱，他们两个为我们（才被抓进去），要多少就直说，不要为了这点小钱，内部闹翻了。我部门没有意见，但是我有意见。

我跟我老公说了这件事情，我老公说我这样说不可行。人家给 150，你说人家没良心，不要为这些小事闹翻是不是，集体的事，给一百五，就说没良心，说不过去嘛。

第二批那些人，好像有的都没有交钱。我听到一个消息，他们说老板准备宣布破产，第一批的给补，第二批就没有了，所以那两百不是不给，要等事情搞定了之后再给。真的有这样的人。

第二批那些人也有代表，我很少跟他们沟通，他们之前不积极，我懒得跟他们说话，反正就是跟他们合不来。

我们有的代表经常去跟第二批那些人沟通，我就没去过，因为后来我上班了嘛，真的没时间。

对政府和工厂的关系的看法

我们都是乡下出来的，什么都不懂。政府和有钱人勾结，以前

听说过一些。但是这次是亲身经历的，太黑暗了。

那天何经理被我们困在里面，他说来之前，厂里原来的人事部主管就给政府送过钱，意思就是（让官府搞定）我们这些追社保的。他还说，他来了之后，又给了一份。具体送了多少没有告诉我们，反正是送礼了嘛。何经理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困住他的第二天晚上，何经理都跟政府的人翻脸了嘛。我们通宵堵何经理那天晚上政府的人也来了，但是不管他。何经理就说，搞不好，大家一起死。他说他手里有证据（送钱），说要把那个什么书记拉下台。

何经理，我感觉会一点阴谋。

不是冷静，是一点头脑阴谋的。前天我们去交钱，我坐在他旁边，他跟我说他要跟谢作新说对不起。他说他跟警方还有路洪说了不关蔡的事，只针对谢玉梅。蔡的老婆来了，他也跟她说不要担心。

何经理之前跟谢玉梅有矛盾，谢玉梅在人事部的时候把他的手机都摔了。他第一个放她假，她就拿手机录下来了。何经理说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后来我们放假，何经理让我们去学习厂规，有些员工就很激动，顶撞他嘛。他就跟我们说，现在你用什么态度对我，以后我就用什么态度对你。

何经理告诉过我们，说千万不要冲动，到时候不是你能控制的。反正我就知道政府是很黑暗的，

珠宝行业黑名单和未来打算

厂里现在还是放我们假。要是厂里愿意给赔偿，我就愿意走，另外找工作。这样拖我，我就找兼职，反正找不冲突的工作，只是弄得我现在很忙。肯定的要买社保的，已经买了十一年了嘛。我不担心找不到有社保的工作，就算进了珠宝行业的黑名单，去商场做

也可以呀，有社保买的，所以就是上黑名单也无所谓。

我是不知道黑名单的作用有多大，我没遇到过。我听说，有的同事见工的时候，工厂会查身份证，如果在黑名单上，不可能进珠宝这一行。很小的厂肯定就没有这个事情了（黑名单），很多厂没有挂牌子，都是小黑厂。

进黑名单的人主要是因为偷了工厂的东西，因为罢工进黑名单就没听说过。而且这个黑名单是珠宝行业协会搞的，没有加入协会的小厂，就见不到这个黑名单。所以，只要愿意做，随便都可以找到工作。实在不行还可以转行，女孩子好转行，男的，尤其是技术工，就难一点。但是还可以进黑厂啊，然后自己把社保买完。

我没想过做组长。我那个组长就坐我旁边，还不是跟我一样。他拿底薪和加班费，我还不是也按底薪算加班费。我家有一个小孩，不用我带，没有压力。现在厂里放我假都无所谓。我们买了房子后压力大，就没有再生小孩了。家里老人肯定要我生，但我老公也不想要多生了，房子还没有装修，而且还欠几万块钱。

工厂里发生什么事情，尽快搞定就可以了，然后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无论是什么事情，都要去告它（工厂）才行，像什么节日呀，假期呀，不去搞它，就没有，太黑暗了。搞完社保的事，我可能就要转行了，作为一个打工的，哪有精力时间去搞这些，为那点小的（利益），就付出了那么多，划不来。

我做够十年了，但是没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我们几个人寄了一份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书面通知，结果工厂没反应。我们去问，法律规定是七天之内没答复的话，就是默认，所以现在我也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我觉得老板不会炒我们，他要赔那么多钱怎么会炒我们呢？

配石部门代表 QSZ

配饰部门不是珠宝加工厂的主要部门，在起版部的工人宣传之后，才逐渐参与到追缴社保的活动中去。这个部门的员工绝大多数为女性。QSZ 是在上任部门代表离职之后才做的代表。在和她的访谈中也能感到由于工人整体十分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技巧，所以即便作为部门代表，她对于整个事件的认识和收获还是十分有限。能够支撑她坚持到最后的是劳动者朴素的感情和工人在几次集体行动中建立起的集体观念和工人间的情谊。

第一份工作

我是清远人，1999 年出来工作，当时 18 岁。进的第一家厂在顺德，是亲戚介绍进去的，是一个本地人开的十几个人的小印刷厂，几个老板合伙开的，外省人比较少。我在那边做了大半年，要三百元钱押金，离职的时候退还了。印刷厂包吃包住，工资 300 多。很少加班，一般赶货的时候加班。当时分印刷和手工两个工序，我做印花。厂里很大的气味。当时进厂需要就业证，毕业证，未婚证。就业证是搞未婚证的时候一起办的。有一个男主管很差劲，对员工很苛刻，只要工人停下来就骂人，也不让打瞌睡。厂长还挺好的，不会骂员工。过年会一起去吃年夜饭。老板请过员工吃饭。在里面做了半年，不加工资，刚开始进去 250 元，半年才加一次工资，加到 350 元钱。有一些老员工熟手的话工资大概有六七百。我嫌工资太低就走了，辞工比较好辞。走的时候没有结算工资，后来让同事帮忙拿的。

在 HB 工作

从印刷厂出来之后就进了 HB。进厂时工资也是 250 元底薪，但是表姐、堂妹在这边，有伴。进厂第一个月拿了 500 多元钱。之前 3 个月涨一次工资，涨了两三次之后就 1 年涨一次。涨工资涨的很少。

进来时是配石，做了一年多，后来才转做其他的。配石就是找合格的石头，配颜色一类的。工作时需要用放大镜，不过很少用，除非是很严的一些货。我天天看石头，视力下降得很快。

2005 年的时候，我们部门大概 500 多人。一个月连加班费的话能够赚到 1500 元钱（加班厉害的时候）。我们部门没有加到通宵。最后那个工序的部门才会有加通宵的状况。每个人的工资状况不一样，高的会多五六百左右。部门全部是计时的。

普通员工最多只能晋升做到组长和主管。这两年才有员工被提上来做主管。以前没有主管，只有师傅。我们部门有两个香港师傅。一个管钻厂，一个管金厂。

师傅是香港的，对员工不是很好。数错数的时候会被骂。他们一个月大概几万元钱，叫他们“师傅”，但其实都没有教过下面员工技术。

组长对员工还挺好的。我没有想过当组长，组长其实很受气。组长做的不好的时候，主管会骂他们。员工有时候也会骂组长。我有时候也会向组长发脾气。我们部门的组长什么事情都要做。

人事部之前那个女经理比较凶。一点笑容都没有。对何经理的印象是很狡猾。他有时候很凶，又有时候嘻嘻哈哈，他骂人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害怕。

我们公司大老板在国外拉客户，小老板在这里帮忙打理工厂。老板对我们争社保的态度是越来越不好，主要是拖延。这个小老板不是很会说话，一般都是回避，感觉没什么学问。让他站出来和大

家说两句话的时候都会脸红。

我是前几年结婚的，结婚时放了 7 天假，会扣津贴，现在婚假只有 3 天了。产假连一个月都不到。

2008 年全厂工资下降，工资下跌了一两百块。当时很不开心。但个个都降了工资，也就没人再去问了。公司下调工资是贴出通知出来，贴出来后也没有人去反对。贴出通知后还让我们把合同上的底薪改了。不改的话就自己走人。有人因为这个事情走人的。2009、2010 年那会挣的钱大概有 3000 多（加班很厉害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大概有 2500 元左右。我感觉工厂的待遇越来越不好。以前本来有年终奖，一年一年减少，现在没有了。以前三八妇女节有一天工资，后来半天，到现在啥都没有了。

在我们这里，被发现偷东西的话就开除了。我们都是老实做事，没有讨论过怎么偷偷带东西出去。

追缴社保

2010 年以前没有想过社保的事情。当时不知道有社保的事情，对社保不太了解，有些人已经买了社保，但不会跟其他人讲买社保的好处。2002 年买社保的那些人都是组长、老板的亲戚。起版部追讨社保的时候，大家都想要买，买一天算一天。我们部门 2008、09 年有一百多个人，现在只有几十个人了。

当时追社保时听了其他人说的情况，觉得可以追得到。当时是想着就算老板会炒掉自己也无所谓，在这个厂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在这里做了太多年了，出去之后再不想进这一行了。

当时代表说要集资的时候觉得这个钱是需要给的，没什么其他的想法。刚开始我们部门代表不是我，后来那个代表辞职了，其他人也不愿意做代表，就让我来顶。在工作的时候师傅盯得很紧，在

车间里根本不敢说社保的事情。师傅时不时会走过去第二批代表那边聊一聊。师傅不太清楚我是代表。我当代表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代表的职责。在部门只是联络一下其他人。我们部门在集体行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愿意去，第一批的人大家都很团结。第一批有 15 个人，第二批人有 8 个。第二批人有代表，平时联系不多。第二批人里有一些是第一批的时候因为害怕，中途退出来了后又参加第二批的。第二批里面的代表也挺积极的。因为我不太会讲话，没怎么去过劳工机构学习，很多人去行动的时候我就会去。我去了几次政府部门，当时也没有害怕，可能因为人很多吧。有些人可能会害怕，但没说出来而已。在行动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人害怕就躲到附近公园里，离得我们比较远。

我因为追社保，过年前被公司放假了。过年的时候公司因为赶货，打电话让我回来上班，我没来，后来货赶完之后又让我放假两个月。我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已经在开始追了。我老公不是这个厂的，他以前也追过社保，现在老家。老公也很关心并支持我追社保的事情。

我觉得当时我们去办公楼围住何公公应该能达到目的，因为大家都说能。我们在办公楼待了两天一夜。不过最后他们被抓的时候我没在，正好回家轮班休息去了。当时听到两个人被抓进去，我觉得很害怕，睡都睡不着觉，害怕他们在里面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后来代表们又集资 150 元钱，我部门的人都交钱了，大家也愿意交。



第二批工人代表 HJQ

HJQ 是我们当时能够联络上的为数不多的第二批工人里的代表。他的兄弟在 HB 做保安。他的部门也比较特殊，是由另外的香港人单独承包并注册的，工龄算多久，社保能够追多久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对能否补缴社保信心不足。访谈时，他们社保还没有最后定论，对第一批工人也有些牢骚。

打工经历：佛山南海五金厂

早先的时候，我在佛山南海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小厂，三四十人，生产自行车配件，老板就是佛山本地人。那时候男工找工作相当困难。我到人才市场，交了 130 块钱的介绍费，包找到工作为止。如果你觉得他们帮你介绍的工作不合适，可以不去。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找到这个五金厂。这个人才市场倒是没有骗我们钱。

我也有老乡在那里的工厂工作，但是那些厂只招女工。而且我的老乡都是普工，也帮不上忙。只能自己去找工作，我感觉 1999 年那个时候，工作很难找。

五金厂，一个月工资 500 块，两班倒，10 个钟，那个机器也要休息 2 个钟。当年这个工资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太热，那时没有空调，都是吹风扇。不收押金，但是押一个月工资。包吃住，因为五金厂工作比一般工作辛苦一些，有油和油漆那些东西。那时我觉得吃的还可以，两菜一汤，过节过年还有加餐。

这个五金厂一般不招人，招人也是通过人才市场介绍来的。当时一个月休息两天，当年算是不错的了。倒班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有时候半个月一次，看订单。倒班的时候可以休息一到两天。

工厂的生意还算可以，产品不是出口的，都是在国内卖。老板1999年的时候就买了好几台车。

工伤是有的。有工钱，还给医药费，还有些赔偿，就是赔的少。如果是小伤，就没有钱了，受伤了不想上班，可以请假。我没有受过伤，其他人有受过伤，最严重的是磨钻头的时候沙子进到眼睛里。我们工作时间不算太长，10个小时，不会打瞌睡。如果时间太长，从早上八点钟上到晚上十一二点，那就很容易出问题。我们10个小时，中间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实际工作9个半小时。我觉得还算可以。

我们这种小五金厂没有流水线，一个人一台机器。我是用那种小机器做螺丝。把铜片或放进机器，用手压一下，就变成螺丝了。没有那么危险。

这个厂是1995年开的。我是初中一毕业就跟着老乡一起出来打工了。找了两个月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问别人借了130块钱，交的中介费。

那两个月，就是住在老乡那里，这个住一下，那个住一下。那时查暂住证，很严格。他查你就跑嘛，反正都是一片一片的查。什么时候查就不清楚了。运气不好被查到了，交钱就可以放出来。没钱的就抓进去，让人来赎。

那个时候，发现附近查暂住证了，我就开溜，没办法嘛，感觉有点像日本人来了一样。

那时候刚出了工作，第一次自己挣钱，感觉心情相当好。我先还钱，就是找工作那两个月借的钱，大概用了三到五个月才还清。

我做了一年就离开了。这个五金厂在铁皮房里，很热的，而且还很脏，每天手都黑乎乎的，穿的衣服也是脏的。我们那时候十七八岁，喜欢干净一点的。

我是将近过年的时候辞工的，跟老板说觉得做这个太累，而且太热也受不了。老板也理解，因为他也知道五金厂都是年纪大一点

的人干的，年轻人少。

打工经历：台湾日用品厂

从五金厂出来，我进了一个台湾厂，1992年开的，也是小厂，六七十人，生产洗衣粉。这个厂早上要做操，8点开始，做完操，8点半马上开工。我就说，我是出来打工的，干嘛要这么多花样，受到控制的感觉。如果是冬天的话可能对身体还有好处，但是夏天太热，受不了。我在五金厂做了一年，周围都熟悉一点了，就自己找到的这家厂。我做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就离开了。

那时候很多台湾人跑到这里投资，很多台湾小老板。

工资还可以，试用期1个月，将近400块，过了试用期就算是正式工了。工作时间有点长，一天最少11个钟。中午、晚上有吃饭时间，但不算在工作时间里。

这个厂也是包吃住的。那时候我们找工作都是找这种包吃住的，因为没钱去租房子住。现在像GZ，不包吃住，几千块的工资都很难生活。现在外边吃快餐都涨价了，但主要还是租房子贵。

这个台湾厂，有些师傅是老板从台湾带来的。管理人员一般都是大陆的。管理很严格，不准聊天，上厕所要跟主管申请。

这个厂是流水线作业，都是分工来做，都很简单，比如贴商标，封口之类的。工作比较轻松，就是时间太长。洗衣服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散装那种，拿回来贴个牌子，搞个包装。这样利润才高。

这个厂是楼房，没那么热，工作环境相对舒服一点。

我做了七天就走了，工资没拿。试用期不做满一个月，不给工资的。我进这个厂，也没有交什么押金，要交的话我们也不敢进，怕走的时候押金拿不到。押身份证的厂我就不进，因为我们出来唯一的证件就是身份证了，如果押了身份证我去哪里都不行。

打工经历：做了一天的日本厂

离开台湾厂，我自己又找了一个日本厂。我已经在工业区生活了一年了，不像刚来的时候，两个月都找不到工作。这个日本厂就招年轻人。

日本厂简直太严格了，严到无法理解了。我进去做了一天就吓跑了。

招聘的时候都很严，问你这个问你那个。要求一切要听上级的指示，不能犯一点错，犯错就罚款。

这家厂做衣服，织布料，再加工成皮服。有机器，很吵。厂里有几百人。这个厂女工多，女的好管理。以前的企业招女工不招男工，男工难管。如果男工一多就起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工厂两三百个人，男工如果有两百个人，那两百个人当中都是老乡的话，老板也会有点怕怕的。

日本厂里的管理人员很多，有小组长，有班长，有大组长，还有拉长。日本人的厂里真的很多管理，我都很怕，真的。他们就在那里来回转，也不生产。

这些管理人员，上下班规规矩矩的排队。

这个日本的工资还挺高的，一个月七八百块，但是管理太严格了，像我这种年轻人肯定会犯错的，感觉那种严肃不好，就不想做了。

在 HB 厂

Hb 厂好像是 1994 年开办的，，以前我的很多老乡亲戚都是在这个厂工作。2000 年 3 月份，亲戚介绍，我就过来了。这家厂开始是在市桥，2000 年 10 月份搬到现在这个地方。我进厂时，交了 300

块钱押金。工资底薪 250，有加班费，1.5 倍的加班费。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很满足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些厂，加班费 1 块钱 1 个钟，很低很低的。

搬厂的时候也有人不想过去，工厂给加工资，一两百，我自己加了 100 块津贴。不愿意过去的也没赔偿，算是辞工了。

刚进厂，都是我的亲戚教我做事。那时周六晚上不加班，一个月工资有五六百。搬厂以后，宿舍离工厂有四五公里，很远的。我住宿舍，因为那时住宿舍不用钱。

我在手链部，有一点技术，我跟着亲戚学，一两个月之后，感觉自己可以了，就自己拿货做了。

试用期过了，底薪可以调到 300 或者 350。一般一天上 11 到 12 个钟。相对来说这边熟人多一点，也不觉得累，而且那时才 19 岁，也不感觉很累。以前我进那么多厂都没有礼拜天，到这个厂我就体会到有星期六、星期天。以前在佛山，一个月休一次，现在一周休一次，感觉比佛山的工作要好。

底薪是一年调一次。250 调到 350，调到 450。后来调到五六百，加班的话就能够拿一千一百多。

我 2008 年结婚，老婆也是这个厂的，现在小孩都 3 岁了，也在这边，我们自己带。我老婆是 2004 年进的厂。现在也在追社保。我们是第二批追社保的，受第一批人的影响。

我没想过去当组长。师傅是香港人，又是我们老板的亲戚，你做的再久也没用。那些香港师傅看不起我们外地人。

我们厂请的这些香港师傅蛮奇怪的。没什么能耐，有个香港身份证，然后就拿高工资了。他们就是盯着你做事，你勤快就好一点，想偷懒就被他发现。现在我们追社保，他们就盯的更紧了，上班下班都对着你，就是看你不顺眼，但是有法律保护，他不敢炒你，就是想让你自己走。让人感觉很难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减了底薪，本来有 960 的底薪，降到 880，

加班费就少了，我现在对工资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但是很多亲戚在这里，就不想走了。我有两个哥哥都在这个厂，我对这个厂还是有些感情的。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年了，人毕竟有感情的嘛，如果工厂不是太苛刻，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走。

我们这个厂 7 月到 10 月是旺季，加班比较多。淡季都是一天 8 个钟，一个月休息 8 天。现在的工厂基本都是计件工资，我们厂还是计时工资，听说要改成计件工资。

我印象中，这个厂总体还算可以，只是现在这几年好像走下坡路了，越来越差。

追讨社保

讨社保前，工厂社保缴纳情况

我们不懂法律。我们部门旁边的一个部门以前跟工厂闹过，2011 年工厂就帮我们买了社保。2011 年之前，我们都没有买过社保，工作了七八年了都没有买过。

以前也我也想买社保，但是不懂，只知道有的工厂给买，有的没有。以前问过劳动局，他们说这是工厂的事情，工厂愿意给你买就买，不愿给你买就不买喽。

我自己去问过劳动局，然后陆陆续续有其他人去问。

2004 年的时候，工厂有 2000 多人，当时好像只给几百人买了社保。我们工厂第一批买社保就是 2004 年，有老板的亲戚，有老板的老乡，香港师傅还挑出一些看得起的员工给买了社保。

我们部门特别一点。我们的那个香港师傅 50 多岁，原来是大陆的，去香港后又回大陆。我们部门就是这个香港师傅承包下来的，有点像小老板这样的感觉，他就不帮我们买，明说了不帮我们买。

牛气哄哄的，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就踩我们这些内地人了。

金融危机放长假

2008 年过年，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吧，放假到 5 月 1 号才上班，放假也没给工资。2009 年 12 月放假，放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工资。

放假这么长时间，工厂有些员工就走了，这个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

2008 年放假那么长时间，没有工资，去劳动局去问过，但是没用。他们说管不了，工厂没货做，不能白养你。

很多人去工厂闹过，要上班，要么解雇。工厂就说，没货做，上班也没工资。

以前放假，工厂不会给我们开放假单的。现在讨社保，知道了这个法律，才知道放假还要发工资。

我们以前找厂里，都是找人事部的那个女的，外名叫“奶妈”，脾气就是比较暴躁的一个人，动不动就发火。她来厂里至少六七年了，靠跟老板有一点关系才进来的。

请假要通过人事部，请假条要交给她。以前请短假，师傅批就可以，后来就不行了，就是讨社保之后。

反正追社保之前，她的态度就好一点，追社保之后，她就对这两百多个人看不顺眼了。讨社保的人占工人总数将近九分之一左右，有些人她有点印象。

放长假我就回老家过年，那个时候正年轻，反正也无所谓。

我在老家 2002 年就盖房子了，那时 2 万就能盖，现在 5 万都不止。

对第一批追社保的人的看法

我们部门的人追社保，都算是第二批了，我们没有跟第一批人一起。

第一批追社保的人是我们隔壁部门的。我们平时跟他们接触少。他们部门跟我们有区别。他们工资比我们高，高到三四千、四五千的都有。我们跟他们合不来，玩不到一起。说句不好听的，他们部门的人在我们厂里是这很吊的。他们都是技术工，所以工资是最高的。没追社保之前，他们有的人底薪就有两三千了，加班的话，工资超过五千的有好几个人，一半人都有 4 千以上。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有钱的看不起没钱的。虽然我们都是工人，但是说的也是实话。

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二批人，觉得追到社保的可能性很小。听第一批的人讲过社保，但是没有头绪，还是感觉很盲目。为什么我们第二批后来又站出来了呢？因为老板答应给第一批的人买社保了，叫他们去签字。我们就觉得有头绪了，既然给他们 130 多个人买了，为什么不给我们买呢？

老板的打击报复

我们第二批人签名大概是 2011 年十月份左右。签名的有 90 多个，后来有人怕了，就退出了。签了名，老板就开始针对我们了。第一批那 130 个人，星期六星期天不让他们加班，本来星期六星期天加班是双倍的嘛，但是就不给他们加。

我们这个部门平时也会商量，但是跟第一批人没有直接联系。第一批人有什么消息，所以也不会跟我们说。因为我们部门跟别的部门不同，我们这里有小老板，也没有人参与第一批人，所以就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哥和我老婆在别的部门，但是也很少跟我们说他们（第一批人）的事情。第一批人怎么去签名的我都不知道。

第一批人签名后被老板针对，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肯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工厂做了这么久，老板也不会怎样。他们（第一批人）有，我们就去追，不追，在这个工厂也没有什么发展。

我们也不怕老板炒我们鱿鱼。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他炒，就要赔钱。而且感觉这个厂已经走下坡路了，感觉做不了很久了。实在不行就换厂，现在总没有刚出来的时候那么困难了，心里面没有什么大的压力了，工作也是好找的。有很多老乡，走过很多地方，所以只想把社保买了。说起来打工十几年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不会怕没饭吃。

工厂从11月开始给第一批人放假了，我们部门也有被放假的。没什么害怕的，有保底工资，总好过以前放假没有工资吧。

对工厂违法的态度

放假应该发工资这个事情，我们是在第一批人签名之后才知道的。那时我们第二批人跟第一批人连在一起。放假有工资第一批的代表说出来的。

我们知道，没追社保之前，这个厂扣了我们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很强烈的心思去跟工厂对抗。我们这些打工的，心理是这样的，觉得这份工作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嘛。我们毕竟是打工的，也不想去闹太多的事嘛。

开始我们不懂，到底有没有法律规定社保可以追以前的。后来知道中国这个法律是有的，但是政府执法严不严，也是个问题。还有，政府贪官污吏太多了，人家给一点钱就把他买通了。

第二批的代表

我们第二批人有 50 多个，选了 10 个代表，但是只有两三个积极的。

开始我们第二批人没有选代表，因为我们跟着第一批人走了将近半年，每一次行动，我们也会一起去。

我们 10 月份签了名，然后第二年 3 月份选的代表。因为第一批人已经买到了，我们就要靠自己了。

每个部门都需要一两个联络人，把消息告诉部门其他人。代表，事实上只是联络一下而已。他们第一批的人打电话给我，我再告诉他们部门的其他人。代表都是负责联络固定的几个人。

我是去年 12 月去劳工机构学习的。我知道第一批人去劳工机构学习。但是我们没签名之前，没想去学习什么的，就靠一批人带头。我们的想法，就是等第一批人有眉目了，我们再去了解那些事情。像他们第一批人，开始的时候搞了半年都没有一点眉目，而且感觉他们懒懒散散的。

我们第二批人很多都是跟着走的心态，不会努力去争取。现在厂里放假，主要针对第一批人，我们第二批大部分人还在上班。

（这就是分化，先把第一批打的差不多了，再收拾第二批剩下的五十多个人）对。

现在也没办法，因为有班上你也不能旷工啊，请假也难请。

别说开会讨论，现在我们第二批人都很难联络。代表之间，也就两三个人平常有沟通，但是没用。其他那几个代表，有什么



事情找他，都是爱理不理的。换代表更加没用。

那次去围人事部，我们第二批人也全都去了，因为也是为了大家的事情嘛。那时还在上班，算旷工，旷工一天半啊，肯定要扣钱，但是还不知道扣了没有。

去年的时候，区政府、市政府，我们第二批的都去过。不过那个时候是放假，因为厂里没货做，第一批和第二批人全都放假。



工人代表 XLX 的弟弟

佛山照明的工作

家里种了批把树，但是没人去管。有时间就卖一点钱，没时间就让它自己从树上掉下来。我们自己是不吃的。除了枇杷，老家还种柚子，板栗，桔子，黄苹果。

1996 年，我 17 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坐车到南海。有一个阿姨和舅舅在南海那里打工，就奔着他们去了。哎，当时我一个人，转了 3 次车才找到的。

当时我表哥介绍我进了佛山照明的一个分厂，有 1 万多人，厂里有四栋 7 层的宿舍楼。没有收押金，看了身份证。进厂住宿舍，必须要买很多东西，还有棉被，必须买全了才能住宿舍。因为你没有的话，他们担心你搬进去会偷别人的。当时我自己带了钱出来。

进厂后我的工作是为灯泡做点焊，不刺眼，就是手感觉有点烫。

没有抽风机，所以有很大的烟味。另外我当时也听不懂普通话。当时我那个班长是湖南人。

工资是计件的，当时我干了 20 天就有 1 千了。加班不多，周日休息一天，那时候我干活很快，班长也很看好我。

不包吃。有食堂，买个饭卡去吃。菜还可以，有鸡腿什么的，还能加菜。我只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五金厂的工作

后来出了这个厂子以后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东奔西跑，才找到个五金厂。我没有学历很难找工作。当时查暂住证还是很严的。所以就不敢出门。要是出门被抓的话就要罚一两百块。找不到工作还要因为暂住证被罚的话，就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进了这家五金厂之后，我干了五六年。

我弟弟也来这里打工了，他有同学在这里做厨师，就过来了。

我在五金厂做冲压工，很危险啊，很多人都没有手指了。我也受过伤，不严重，手伸进去的时候，机器突然坏了，压到一点点，当时把我吓坏了，手被压着的时候以为这只手就没有了，结果伸出来一看，没有事耶！

但是一个月工资有九百到一千左右吧。工资是计件的，做出一个货算一份钱，也不用打卡上班，就看你做出的货有多少。刚进厂大概六七百吧，很少加班。出厂的时候一千二百多吧，但都是靠加班的。一千二百是最高时候，一般都是一千左右。

工厂经营越来越好，老板买了一台车，又盖了个几百万的房子（别墅）。买一台大电视都是多少万。买一棵树都五六万。

五金厂做锁头，出口的，对质量要求比较高。

以前厂里的宿舍是铁皮房，很闷热。后来工厂搬了，条件好些

了。我走的时候还是铁皮房，有人会在上面洒水降温。

我在五金厂工作六七年，没有听说过罢工。也没有听说过因为工资太低或者拖欠工资停工半天之类的事情。我们厂发工资很准时，发现金。偶尔会晚一点，也就两三天。老板娘负责发工资，她儿媳妇管账。

工厂人数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不断有新产品出现。老板的儿子有时候买锁回来拆了研究，有时候找大师傅一起研究。

组长工资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不怎么做事。组长会把好的工位安排给他的亲戚做。好的工位工资比普通的高五六百。有些配件工价高一些，就能多拿钱。这样会造成矛盾，但是跟组长说了也没用，你跟他关系搞得不好，他更加可以整你。

有时候也会给组长制造点麻烦。比如有时候做的少了，他的人做的多了，就拿自己的名字跟他换一下。因为是全部做好了一起数，所以他也不会发现。

厂里有的人做了 10 多年，现在还在那里做。老员工也没有什么优待。我在厂里的时候，工人流动性不大，因为每个月工资都比较稳定，也不用加班。

当时工作好找，五金店很多。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就不想再找五金厂了，因为太危险。前年的手指就被压伤了，工厂也没有赔钱。去告他或怎么样，他当然不会赔钱给你。他给你治好了，你如果还想继续在那里工作，他就不会赔钱。我堂嫂的手指又接上去了，勉强还能用，呆了挺长时间。

进厂的时候没有安全培训，只有个师傅告诉你机器怎么用。那时也没听说过有受伤的工人告老板要赔偿，好多人治好了还继续干。

在这家厂还是赚了点钱。当时家里的电器（电视阿，冰箱什么的）都是我在抢购的时候买的。还拿钱养我父母和我弟弟。那时候差不多每月都寄钱回去，差不多能寄九百多块，一千块钱。

后来到了首饰厂就一分钱也存不下了。其实我不打麻将，也不

抽烟喝酒，那个钱不知道怎么就花了。不过那时候家里也不需要钱了，弟弟妹妹也都工作了。那个时候反而还花了我妹妹的钱。特别是出厂没有工作又得交房租的时候。

误入传销

我为什么离开这个家五金厂，说出来都不好意思，我给人家骗了。我有个老同学，七八年没见了，突然到处打电话找我。我问他有什么更好的工作机会。他说有一份工作，是在商场卖东西，经理人很好。我过去的时候他来站台接我，路上他说：“你看那台车漂不漂亮，你想不想买？”我说那哪里买的起阿。他说只要你努力，很快就能买得起。

结果那天去了他们那里，看到很多人睡在地上。他就说你今晚在这里挤一下。他那天还带我去买菜，还是他掏的钱，算是见面礼。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叫我起来去培训。后来去了另外一幢宿舍楼，刚进去就看见很多鞋子摆在那里。我就脱了鞋子进去。就在那里听了几天培训，坐得屁股都痛了。就讲怎么赚钱，用普通话。

后来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弟弟打电话让我去拿些东西，他们要问东问西的，不让我出去。我就说怎么整天关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做呢。或者去哪里都有人跟着。

他们没有扣我的身份证，还帮我搞了个暂住证。

后来我同学也不去了，我就说我不干了。他们说不行啊，要不等你同学回来再走吧？我说不等了。他们还拉扯着不让我走。我就拼命地走了。

我待了一个星期左右。天天吃青菜，水豆腐。不过在那里饭不用自己做，衣服也不用自己洗。他就是想让你留下来骗你的钱，让你买八百多块钱的保健品。

频繁换厂

跑出来之后，到我阿姨那里，找了个手机厂，做了几天又换工作。因为要实习半年，工资很低，只有 250 块。后来去了个厨具厂，发现也差不多。然后又去了一家金厂干了一年多，本地人开的小厂，压两个月工资，但是工资高，算上加班费，一个月能赚 2 千，过年还有双粮。不过那时候花钱厉害，还没拿到粮，就拿金子去卖了。

频繁换厂有好几种原因。有时是因为想找个工资高一点厂，有时是听别人说要换一个环境才能学到新的东西。有一间厂是因为给主管骂了就不想做了。当时有个配件找不到了他赖在我头上，中午吃饭的时间不让我吃饭，要我在车间找。我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当时生气了，配件要我赔一千多块钱，我要做两个月才赔得起，干脆不做了。有的厂我还没领到工资就走了。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从早上 6 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 6 点。



管理上，这些厂都差不多。首饰厂要严格一些，上下班前都要洗手，要点数量，为了安全。

现在我在顺德给我堂哥做事，他承包了工程，做电缆光纤一类的东西。包吃住，每月两千二百。顺德治安差一些，老听到有抢劫的事情。走着路就有人抢劫。

工人代表 XLX 的丈夫

五金厂

2003 年我出来打工，当时十八九岁，进了顺德的一个五金厂，是我哥介绍我进去的，当时他就在那个厂打工。

五金厂有七八十人，顺德本地老板。计时工资，每天 28 块，8 个钟，没什么加班。做一天算一天的工资。没有休息日，除非没货做。不包吃住。请假比较容易，说一声就行。五金厂不是流水线，各做各的。看见过受伤的。

厂里有组长，负责每个人的产量计数，还负责考勤，请假什么的。组长一般不用做事，除非赶货的时候。组长的工资比我们高。

组长上面有主管，都是顺德本地人。那个主管很好说话。每个月发工资都很准时，最多拖一两天。在厂里很少看到老板。

厂里做计件的工资高，一个月有一两千块。我不想去做计件，因为太辛苦。那些做计件的人，都是二十七八岁那种，上班都忙着赶货，不愿意跟我们聊天。

中秋节发过月饼，过年回家不给保险路费。

厂里我的老乡不多，都是普工。像我这种十八九岁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都是二十七八岁的，也有三四十岁的。厂里工人流动性不大。工人之间都很熟，有些工人是顺德本地人，大家平时都一起玩。

附近都是五金厂，我感觉找工作不困难。我也想换个工作，因为觉得工资低。

下班以后，有时跟工友一起去商场，有时候看电视，有时候打

打麻将。我跟我哥租房住，房租 110，有一个房间，厕所是公用的。是那种铁皮屋顶，有时候很热，睡不着。

我们一般是吃快餐，一顿两块三块。

我的工资没有涨过，一直都是 28 一天。

工厂管理不严格。上班打卡，迟到时间不长的话不会扣工资，迟到一个钟半个钟，只扣这段时间的钱，不会罚款。一般没有旷工的，有事不去厂里，打个电话就行。做坏东西一般拿去修，也不会扣工资。

我们常员工之间，员工和主管很少吵架或发生矛盾。

那时候在顺德要办暂住证，自己去办，100 多块钱。我没有被查出暂住证，听说别人被查出。

进厂的时候没有压证件，只登记了身份证。辞工的时候也很顺利，我都没有去厂里，就跟我哥说了一声，让我哥帮我领工资。

我们厂做锁头，卖到那里不知道。

厂里有五个车间。

那时买马的人不多，现在就多了。我一直都没有买过。那时打麻将有时输赢几十块，有时输赢两三百。

那时顺德治安的情况，偷单车的多，偷抢的没怎么听说过。

首饰厂

2004 年我就到大罗塘这边的首饰厂做了，一直到现在。当时是同学介绍我进去的，正好镶石部招人，能跟同学一起做事，也可以学点技术，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工厂有一两百人，进厂交 1500 块押金。那时所有的首饰厂都要押金。我进厂的时候月工资六七百，加班有 1.5 倍加班费，一般每天上到晚上 10 点，也不觉得累，首饰厂都有空调的。

这家厂的老板是哪里人，我不知道。主管是广东人。组长教生手做事。我在这个厂做了一两年，后来辞工，1500 块也没有退给我。

没有年终奖，有全勤奖，一个月几十块，过年过节也没有请吃饭。

工资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算的，计件，又有加班费。一个月工资 1500 是有的。

当时换工作都是因为不开心，不开心就走了。

当时工厂里打架是有的，主管被杀没听说过。当时有的厂不招某个地方来的人，因为偷东西，偷金子。

后来到 HY 厂，因为我老婆也在这个厂，一家人在一起好一点。我一直做镶石。刚到 HY 厂，我每月工资 1200，880 的底薪。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时候，HY 厂给我们放假。

我去 HY 厂之前，进了三四家首饰厂，感觉都比 HY 好。工资和福利待遇都要好一些。当时 HY 管理上轻松一些。

有的厂管理很严格，产量要求高，我们一般做不到。

我对 HY 厂的香港师傅没什么印象，也不知道他们的工资是多少。

2010 年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买社保，因为不知道还要在这个厂做多久。那时候对社保也不了解。



工人活动家 CHH

CHH 因为自身的维权经历以及在官员前的强势气场，在 PY 珠宝工人中比较突出。他是劳工机构的理事，并且将此印在名片上。工人都称他为 H 哥，因其工人身份，很多工人更觉得他比 Z 主任还亲近一些。

我们只访谈过他一次，因时间有限，主要是他在接触劳工机构之前的工作及维权经历。HB 事件结束之后，他自己创建了一个劳工机构，介入了一些工人集体事件。

进珠宝厂之前的打工经历

30 岁之前，因为孩子小，我一直在老家。种过两年地，也没学会，后来做点小生意，也很难做。在外边打工一个月还能挣一千，后来就出来打工。

我 2000 年出来打工，先去的深圳。没技术，想进工厂进不了，当时男的 30 多岁不好找工作。女的 30 岁还可以找工作，七八百，九百，一千的工作都能找到。

我在深圳呆了一年。做过几个月保安，一个月 600 块钱。工资低，想走，但是找到新工作之前不敢动。那时候查暂住证，抓人抓的厉害，所以一般都穿保安的衣服出去。

后来一个堂哥介绍我去一个工厂当装卸工，跟车出去，卸货，一分钟 3 块钱。那时候骗加班，一个月能赚一千一二。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休息日，就是一分钟 3 块钱。厂里一个月还扣我 50 块钱。不押工资，也没有买社保。我就是临时工。工厂里面有正式工，但我进不去。

珠宝厂打工经历

当学徒

我 2002 年到 PY 进了珠宝厂当学徒。交了 3000 块学费，学了半年左右，没有工资，不管吃不管住，免费给工厂干活。算上学费，我当学徒半年左右，自己总共花了 1 万多块。有的学徒学两年，有的学三年。

那个师傅看你年龄大，也不好好教你。教你一点点，他知道你学不全就不会走……

听说 1995 年之前，这里都是广东人，到 1998 年之后，就有广西人，湖南人。广东、广西和湖南，就这三个地方的人比较多。

有些小孩子做学徒，都是跟着亲戚朋友，住在亲友家里，在厂里学两三年。

出师，当组长

学完之后，做了四五个月，就升我做了组长，管七八个人。

我们厂那时有 500 多人。每天加班 4 个小时，一般周日休息。算上加班费，一个月有一千一二。

工厂不管吃住。我在外面吃饭、租房子。当时房租不贵，180 一个月。房间有厕所。

住出租屋被人偷过。那时候应该买个保险柜，因为老是不想请假，东西放在屋里就去上班，结果就被撬了。那一次搞得我很惨。

当了组长，多了 300 块的工资。一个月能拿一千四五。组长自

己也要做事。

罚款、赔偿

珠宝做坏了要赔，要罚款。有的人做坏了很多，最后一个月连工资都没有。现在像我们做了十几年也未必不出错，但是一般我们都可以修好。

罚款标准是总公司来定。做的首饰达不到标准就罚款。比如说，厂里给你 100 克黄金，做 100 个货。规定交货时要有 97 克。如果交了 97 克，不赚也不亏。假如你才交上来的 95 克，那就在你工资里面扣钱。那如果你交了 98 克，发工资的时候会奖你 1 克的钱。这个标准总的来讲还可以，大家可以接受。赚和亏都是你自己的技术问题。

工厂管理

老板是香港人。主管经理级的全部都是香港的。组长也有江西、湖南那边的，也不一定都是广东人。

主管安排工作，我就负责找人去工作。没有跟主管发生过什么矛盾。

厂里有计时的工作，也有计件的工作。计时的工作难度大，比较复杂。计件的工作比较简单。但是往往计件的工资拿的工资高一些。

计件的工作会有跟主管的关系问题。比如，我是管事的，你对我好，我就给你发比较好做的、赚钱的货给你做，一个月能拿到 6000。

我管的组是计时的，但是工作也不算太复杂。

福利

我们厂每年都抽奖的活动，但是太假了。奖金 500 元以上的全都是主管经理级别的人。我就只抽到过一些小礼品，小雨伞一类的。

我们厂没有年终奖。春节过后回来上班，也不发红包。但是年底会吃一顿饭。

打官司

我们每天下班要交接工作，确定没错误之后，大家就下班。

我们上班的时候留下的金粉，全部藏在一个人那办掉，他办完换成金，那正常打个比方这应该办成 10 克，那他就说我才办了两克，全场的都一起，不是就我们一个部门的，那他就叫你这个部门的人每个人要罚 1000 块钱。理由就是说人家跟他说少了啊，所以每个人就罚 1000 块钱啊，其他部分都罚在一起啦。他就是说主要是我们这个部分有几台机器，那个砂轮，他说有可能是那种地方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啊，工人做完之后收工确认 OK，

那几个工友都承认了，同意罚款，因为他们想保住工作。

我就不答应。我说我要答应就是承认我们做贼。然后工厂因为我不承认，就要开除我。当时我就想无所谓，反正我现在也不愁找不到事做。我说你把工资给我算了，押金退给我，我就走。工厂什么都不给，就给我写了一个开除我的东西。

进这家厂的时候，我交了 500 块押金，每个工人都要交押金。没有签劳动合同。

然后我去找劳动局。劳动局的人说工厂在沙湾镇，要我去找沙湾镇的劳动站。我就去劳动站，把我自己写的材料交上去。劳动站的人不收，说要打印的。然后我就跑去让人打字，交上去。他们让

我等电话通知，等了解情况了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一直拖拖拖。我打电话问他们，他们说正在处理，还是让我等电话。我去找他们，他们还是让我回去等电话。

当时很纠结，想去找工作，这个事情又没解决，不找又不行。后来我有一个老乡说有一个机构专门帮助劳动者伸张正义。其实我当时不相信，因为劳动局的人都那样嘛。

后来没办法，我就打了个电话，试试喽。当时是一个女律师接的电话，说让我过去跟她谈谈。她说只要我按她的要求提供证据，马上就帮我处理。她说，像我这种情况，就不光是要回押金，还可以要赔偿费。算出来总共 9 千多，不到 1 万。

仲裁结果，除了社保，百分百支持我的诉求。当时我还不不懂什么是社保，仲裁书里就清楚的写明社保与此案无关。

仲裁结果下来，工厂要 15 天内给我钱，已经生效了嘛。刚好第 15 天，工厂就打电话让我去拿钱。

这个过程我学到了很多。刚开始我被开除以后，工厂保安不让我进工厂大门。我去找劳动部门，半个多月，跑程序的过程中受了很多气，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去一家公司做了个小管理员。刚上班一个星期，那个律师就说找劳动局没用，找一百次都没有。那个女律师很专业，让我申请仲裁，仲裁必须 7 天内决定是否立案。她教我这个方法就行啦，刚好一个星期，劳动局打电话让我去拿开庭通知书。

我们工厂的法人代表是本地人，听说我告他，觉得很没面子。他说从来没人敢告我，我整死你。

当时我拿了开庭通知书之后就回去上班了。那个法人代表就叫他的一个亲戚带着人，到我工作的工厂里找我的主管，让我的主管 1 个小时之内要把我交出去，否则就让我的主管下不了台。

我是我的一个老乡介绍进的这家厂，我跟这个主管也很熟。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了，他就说没事。

我跟主管说，你让他们别走，我 15 分钟后就到，你让他们一个也别走。当时我也来气，我用主管的电话打过去，我说要是他妈你敢动我，我就把你弄死。然后等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人影都不见了。

后来我又打电话给那个法人代表，我问他是不是叫人来找我了。他不承认。

其实原来厂里的同事告诉我来找我的人是谁了，是个看网吧的混混。我就问法人代表是不是让这个人来找我了。

法人代表就承认了，他说有天晚上跟那个混混喝酒，说起这个事情，这个混混就说要来了解我到底在哪里上班，是什么背景，住哪里。

我说行啊，你现在过来，我带你去我住的地方。

他听我这样说，第二天又找我。他说：“算了吧，你就撤诉吧，退一半押金给你。”

我当时还退了一步，说今天把工资和押金全退给我，我就撤诉。他说他不能。

后来他又约我到茶馆谈，说他老爸和劳动局的局长是战友。我说我不撤诉，我就要那张仲裁结果，输了我认。

其实，还没正式立案之前，沙湾派出所他全买通了，我气得不得了。有一天下雨，我骑摩托车，他开着大众，他说你不要搞事了，我说我这也算搞事吗？他说你告到哪里我买到哪里。

仲裁受理之前，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受理，我就叫了记者去采访。保安问记者有没有预约。记者也很屌，说我不需要预约，你上去问。

老板说：“我花多少钱也不会给他开这个先例。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邻厂追讨社保

欠缴社保是普遍现象。同在 LH 镇的飞鹰摩托车厂的几位工人们通过老乡的关系，找到了 HB 的工人代表询问追缴社保的过程。当时 HB 工人社保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工人们把自己那份补缴的钱交到了厂方。大家围坐在工人代表 HQ 家的小屋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讲述多少有些杂乱。但当一位飞鹰厂的工人问追社保要先找哪个部门时，HB 的工人代表几乎个个都强调——不要找工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劳工机构建议工人先去找工会，结果工人们白费了力气。因此，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地说出口来。当然，这也说明工人们还是把工会当作政府的一个部门，而不是工人组织。

飞鹰厂的几位工人刚开始在公司内追缴社保的事情，HB 厂的进展对他们来说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但同时，因为看到的只是 HB 工人已经得到的结果，以及工人们经过将近一年的磨合而产生的默契，还没有了解到工人曾经做出怎样的努力才有今天的结果，飞鹰厂的几位积极工人抱怨同事不积极、不配合较多。

工厂情况

飞鹰厂是民营的，以前在石基，是个拖拉机厂，1996 年搬到 LH，开始生产摩托车。老板是江门人，以前在台湾打工，他打工的那个台湾厂的老板看他不错，就支持他回大陆开厂，从经济和技术上支持他。

一开始，我们厂从台湾进发动机，都是组装好的，运到大陆，轮胎都是配套的，直接装好就可以。一台车很贵，七八千，万把块钱的都哟，很赚钱的。

那个发动机是很好的，台湾雅马哈。后来我们厂慢慢地发展起来了，一个台湾技术，一个日本技术，再一个我们厂的名声，现在的产品是中高档产品。一台普通的 CG 车，外面的卖两千多，我们的卖三千多，品牌嘛。主要是销往国内。

我们厂 2000 年以后就很红火了，人最多，最红火的时候是 2004 年到 2006 年。一条流水线一天最少生产 500 台车，加班加点地干。

我是 1999 年进厂的，那时工厂的生意已经很好了，在行业内名声很大，一般人很难进。有老乡在厂里，也要有个一官半职，介绍才能进去，而且还要用钱买。我们都是花钱进去的。

我们厂 2008 年换过一个老板，正好那个时候金融危机嘛，老板说不妙，他就不搞了，要办理破产。

我进厂做普工，1999 年的时候，一个月 450 块的工资，还有绩效奖、工龄奖。那时一个月估计工作 26.5 天，周日有时还要加班。上够 26.5 天就算全勤。

那时加班多，一个月加班费也有八九百。平时加班 1.5 倍，周六日 2 倍，一直都是合法的。

其他福利方面，工厂每个月都组织当月过生日的员工聚餐，跟老板一起吃饭。我是 8 月份的生日，生日聚餐吃过 4 年，在食堂吃，加餐，老板跟我们一起吃，一起聊天。感觉挺有人情味，感觉自己也是厂里一分子。老板会问你家住哪里，自己有什么想法。

2004 年到 2007 年这 4 年，每年都有 10 周年纪念奖，就是工作满十年的员工，工厂给奖励，奖品有戒指、手表、现金等等。

我们厂吃食堂有饭卡，九几年的时候，每个月补贴 120 块，就是四块五一天，现在还是 120 块，多的部分自己出钱。

以前厂里包住，不收钱，水电费也不收，现在收钱了。

我们厂男工多，现在一般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像我们这种 40 岁的很少了。小孩子，不愿意上学，到外边又怕变坏了，不如送到厂里挣点钱。厂里外地人多。很多都是父母在这里打工，把孩子

送到厂里。

我来的时候，厂里有七八百人。生产线增加了，肯定要增加人手。以前一条线最多的时候 130 多人，

2008 年之前，还有年夜饭，很隆重，去宾馆吃，全厂人，包括搞卫生的。租了个车队，30 多台车。那时我们厂很好，GZ 日报上都有报道。我们的摩托车出口 30 多个国家。那时那些老外，合作伙伴，都会来吃年夜饭。

我们厂附近还有模具厂、电子厂、陶瓷厂。

年夜饭的时候还请那些明星来演出。从 1999 年，一直到 2008 年，基本每年都搞。

2008 年以前，有年终奖，大概是一个月的工资。2008 年金融危机，没有，09 年没有。2010 年之后又有了，但是标准不一样，做满一年，一个月一百五，一年就是一千八。满半年 120。每个人不一样，一年比一年多。我以前 100，前年 150，去年 170，今年最少 180。

2008 年之前还有津贴，现在也有。2004 年到 2007 年，还发过半年奖，那个时候生意好嘛。

2008 年之前工资福利没有降低过。2008 年，这个厂基本上已经解散了，人很少了。

金融危机的时候，主要是订单少了，那时候像法国、美国、巴西，特别是欧洲国家，基本上都不要了。出口欧美，一台整车，所有费用扣除能赚一万块钱。

老板管理不善，把厂里的七八个部门都承包出去了。事业部最赚钱，老板也是江门的，一年能挣两千多万。老板什么都不操心，就是收钱，有问题他也看不见。

2010 年换老板的时候，厂里还有三四百人。以前没有签过劳动合同，2010 年的时候签的，签的无固定期限合同。换老板的时候也没有给我们经济补偿，那时候不知道这些事情。

新老板以前是店里做副总的，搞销售。现在厂里还是做那个牌

子的车，配件牌子也没变。合同上公司的名字也没变。

先前的厂在外面已经失去了信誉，很难采购到东西，于是新来的老板用了个权宜之计，用新公司的名义进行采购。

讨社保

我们是怎么开始讨社保的

我是做品管的。要说追社保，都想追，但是很多人不怎么着急，产线员工钱紧，追到了还要自己交一部分钱。

我们现在不同的车间，一共有 30 多个人在追社保。我们先是问其他人，看看还有没有人想搞事，到劳动局去投诉。反正就是闹，不闹的话老板也不会理睬你，闹了才会有反应。

我们以前也不关心社保，是去年 XXX 开始搞，我们才有了这个想法。去年 12 月，他们有人来向我们宣传，讲这个事情要怎么搞。我们跟他们有联系过。

厂里不把我们去上访当回事，根本就不怕。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觉得我们肯定搞不下来。

我们去上访，政府让我们准备户口本原件，这种东西都放在老家的，很难弄。我们搞了两三个月才凑齐，然后政府那边又没有回音了。政府就是找借口。

收活动经费的矛盾

我们的材料都收不齐。人家 XXX 那边互相之间都很熟。我们就只有四五个人跑来跑去。交通费都要自己出，收他们每人 30 块，

那些人还觉得贵。现在 30 块钱坐个车买瓶水很快就花完了。我们跑前跑后，那些人就是不领情，觉得我们做事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还不满意。这个就不跟他们计较了，他们都是些乡巴佬。

我说我们活动需要经费，要求每人 100，但是先给 30。他们问我们能不能搞定，我只能说尽力去争取，尽力去做。他们不知道这里的艰辛，觉得这种事情三十块钱就能搞定，所以我觉得挺伤心的。

其他人没有跟我们几个人一起行动过，他们说请不到假，走不开。我们几个有时候请假，有时候早退。后来请不到假是有原因的，社保局告诉我们经理，说我们老是到社保局去闹。经理就来说我们。

我们检验部门，没那么严格，不像生产部门，接到了死任务一分钟都不能走。有时候我们早一点晚一点下班都无所谓。

收集材料

整件事情，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收集材料。政府说，买社保必须要登记，身份证复印件之类的证件必须要齐。户口复印件就是要知道你的户口，还有要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进厂的，你必须要有证据。

户口就收集了 13 个人的，然后交给劳动监察。社保局态度还行，但是一问到事情进展的如何就开始打太极，总说正在处理之中。

我们先去的社保局，他们也是要我们先把材料整理起来。比如哪个时候进厂的，户口所在地，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有几个代表，代表确认签名等。之所以派代表是因为人去太多了不好协调，所以要代表先和他们谈。

交了材料，政府说只是走完了一个程序，还要看我们跟公司协商的结果。我们找老板谈，他就说没钱，没那个能力，要是有钱的话就协助我们办理。

去劳动监察投诉，去社保投诉，信访，人大

我们进厂的时候，每个人扣了一千块钱，后面进来的人就不扣了，但是这一千块钱现在还没有还给我们。我们就去劳动监察投诉。除了押金，还投诉没办社保。本来还有加班费，但是没人抱怨，就没投诉了。

一开始去社保局，我们看到期限是六十天。期限到了我们去找他，他就说是六十个工作日。然后我们等了六十个工作日，他又说我们差什么材料。反正他就是推拖，然后我们就去找了信访局。

三月份去了区里的信访局，投诉他们不作为。信访局说他们和社保是一个部门的，投诉没用，就这样把我们推回去了。所以现在很无助。

后来还找了区里的人大。我们去找人大的 XX，还没找到，去的时候他在开会。我们把资料留在那，后来那个 XX 打电话说已经收到了资料，正在处理这件事。因为人大有监督权，其他部门不作为他们可以监督，也是走程序。

之前和劳工机构联系过，就是那个曾主任，他告诉我们下一步该跑哪个部门。现在该走的流程都走完了，也没什么地方可跑了。

然后就没有再跑了，因为没信心，基础政府部门都跑过了，没用。我们厂的那些人没有跟我们去找过政府，他们不会去的，他们就指望你能搞定了，这对他们就是最好，他们根本不想跟你去。

他们有些人可能想做到几时算几时，也没有说一定想要在这个厂再待下去。这个厂现在这个情况也不可能再待下去了。你待着也没用嘛，工资还这么低，什么福利都没有。

现在我们去找过的政府部门，什么答复都没有，反正他们总说在办理之中。

跟老板谈

上个月跟老板谈了一次，我们去了五六个人，上班的时候去找的老板。我们约过几次，过了4个礼拜，老板就是不见我们。后来有我们一个人急了，说：你要是老不见的话，到时候我就去做出点什么极端的事情来。然后常务部的那个经理就跟我们谈了一次。谈了没用，他也不能拍板。他先来安定情绪，让我们不能做得太过火了，也没有什么。

厂里知道我们的情况，也知道我们的要求，我们给他们发过邮件。



公益律所指导记录

背景：公司贴出通告因经营困难从 2011 年 11 月 17 号开始放假。一共有 89 名工人放假。工人在被集体放假之后，找到劳工机构咨询建议。劳工机构介绍了邻市的公益律所过来给工人们讲解法律意见。

时间：2011 年 11 月 19 日

地点：某酒家会议室

人员：HB 工人，劳工机构职员 HM、Y、H 哥，公益律所 M 律师、H 主任

（简单翻阅工人的书面材料后）**M 律师**：你们公司的放假通知，其实是停工通知。停工通知需要支付停工期间的工资。各地标准不同，GZ 是放假第一个月足额支付工资，第二个月起支付之前个人工资的 80%。

Y：因之前工人追社保，所以现在被放假的工友里 87 人有 85 人被放假。

M 律师：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停工之前还是超负荷开工的话，那其实不符合厂里的说法。厂里需要证明确实因为订单不足才停工的，是否向劳动部门反映过？

工人：向区政府反应过。没有明确回应。

M 律师：有没有公司的信息？现在看，从法律上讲你们没有诉讼理由。老板不想开厂了，可以关厂，或者停工。这是经营自主权的问题。这属于温和的洗牌方式。

工人：如果停工 6 个月后，老板又炒掉，工龄经济补偿会不会

很少？

M 律师：不会，应该是按照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工资标准计算工龄补偿。除非 GZ 地方法官有什么别的解释。目前厂里有多少工人面临不合理的社保待遇？

工人：1000 多工人，80%的工人没有社保。

M 律师：如果要谈判就要有筹码，也就是凑人头。哪个部门最关键？最有分量？

工人：起版、电金……

M 律师：具体工序是怎样的？

工人：一个部门做完，货物流到下一个部门。

M 律师：厂里到底有没有经营困难的情况？

工人：没有感到公司真的经营困难，但我们没有确凿的数据。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没有很困难。我们怀疑有一些单外发了，但是没证据。

M 律师：厂里在开工也有可能亏损。有可能是早先的订单，现在做就亏了。这些需要具体了解。何况只要公司需要还可以做出亏损（的账目）来。另外是否亏损，这不是不给工资的理由。员工的工资和公司是否亏损没有关系。

就算是厂里拿真账，也可能是亏损。哪个工厂做账会是赚钱的？这叫合理避税。而且你们厂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从工商注册资料上来看，出资方股东是一个公司，不是个人。你们厂的挂名厂长说话不一定算数，可能就是挂名，决策权还是在香港那边。

H 主任：现在有无证据证明厂里是因为订单减少开不了工？这样的话，就说明大家认为厂方不是因为订单减少。之前工厂有没有过这样放假的安排？

工人：2009 年之前有过，说是自愿放假的就签名。去年没有。

H 主任：现在可以说他现在单方面改变劳动合同，需要通过员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同意。现在我们不管他是什么理由。他现

在放假的方式就不对。程序上就不对。我们不用管它什么理由要放假。现在要进行集体谈判。现在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是，程序的武器。厂方的行为不符合劳动法、工会法规定，厂里任何大的变动需要经过工人的同意。我想大家也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维权。厂里有工会吗？

工人：工会主席是老板的老表（亲戚）。

H 主任：如果企业的工会不管用，还有一个思路是，我们可以联名，把大家的要求写出来。一份交给上级工会，一份交给厂里工会。具体内容可以写：我们有如下诉求，希望得到支持，如果无法满足，那么工人会采取自主的方式和厂方解决。首先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合法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法律依据。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表达了一个比较守规矩的做法。先向工会汇报过了，是我们逼不得已的一个行为。使相关部门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方面。因为很多部门非但不帮忙反而起坏作用。他们可能心理上想帮老板的，但是我们这样做他们的地位就会比较尴尬。现在厂里工人涉及到社保问题的人有多少？

工人：厂里 80% 的人都没社保。参与补缴社保行动的有 200 多人。第一批补缴社保的人里被放假的有 80 多人。

H 主任：工人的工龄构成情况？

工人：追社保的 200 人里，工龄 10 年以上的很多，最少也有 4、5 年。

H 主任：那为什么只有 200 多人追？

工人：大部分是因为工龄较短。有些是怕失去工作，有些是老板的老乡。

M 律师：那你们第一批是都没买过吗？

H 主任：这几百人是分散到各个部门吗？

工人：只有一个部门的人全部都没参加。

H 主任：其他人只是旁观吗？

工人：有些师傅说，他们第一批追到了自然有你们的份。

H 主任：具体是什么情况？

工人：最早的时候，找老板给我们买社保，老板说你们走法律途径。我们第一批人就给社保局写了投诉信，社保局回复说应该补缴，但要确定入职时间。第二批工人看到以后也就开始追。但是社保局的通知并不是说就能马上执行，要和厂内协商。现在和政府、厂方协商后，厂里口头说从 2004 年开始补缴。

H 主任：现在这个情况属于劳资矛盾，我们把政府拉进来，政府就给了这样一个态度。我们认为劳资矛盾，我们自己解决。S 市有一个日资厂，因为工间休息的 45 分钟厂方不算工资的问题，上个月开始罢工。厂里新工人不是很多，所以很多老工人就追要这十几年的每天 45 分钟的加班费。很多工人，保安、文员都参加了。这种情况下，老板就愿意和工人去谈。老板问一些去找他的工人，是不是代表。因为这之前有很多例子，政府把一些工人代表抓到派出所去了，工人就不敢说自己是代表。而日本老板，他们看到罢工造成的损失之后就愿意和工人谈，希望能有个解决方案。工人就找到我们，我们介入后通过一些技术上、法律上的程序，让工人可以站出来，又不受到打击。这样工人站出来以后，老板不应该打击我，而应该感谢我。另外还有一个工人信任的问题，因为工人代表也可能被其他工人怀疑被老板收买了。所以工人代表不能只代表自己，要代表全体工人。打个比方。工人觉得能涨到 80，代表觉得可以涨到 100，那么谈的时候应该提出多少呢？不能脱离工人的整体意见。工人代表如果日后完不成任务，会丧失信任。具体在谈的时候，老板提出一个提议，员工代表可以说我们决定不了，需要问大家的意见。日后如果面对面谈判，谈判技巧也很重要。代表面临着资方和身后工友的双重压力。

现在说回日资厂，他们产生了工人代表，也有我们的介入，谈了好几轮。最后得到了一个高于工人预期的结果。这个案例成功的

关键是给了企业一个压力，罢工半个月，老板已经承受不了了，只能和工人谈。

你们的工人代表怎么产生的？

工人：我们一直比较积极的人，就把名单提出来，让大家签字表态承认我们是代表。

H 主任：员工签字的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签字以后就表明自己的意见了。现在最有效的方式是厂方和员工的谈判。

工人：现在厂方不和我们谈，要我们去找政府谈。

H 主任：现在为什么你们没有和公司形成一个谈判的局面呢？我们总结最有效的和厂方谈判的条件是，第一是工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诉求。统一诉求，工人要团结。二是，让老板知道工人的压力。好比说本田，罢工 20 天，公司损失 20 个亿。开始工人也和老板谈过，老板说只涨一百块，爱要不要。后来工人有了一个大的行动造成压力，对企业生产造成影响，才有一个压力。刚才说老板不和工人谈，让他们和政府谈。其实就是没有给厂方造成压力。

M 律师：他通知里涉及到一个歧视，为什么只放了老员工的假却让那些新员工做工。这是一个歧视。厂里要放多少人的假。

工人：具体数字不确定。只留 200 人做工。

M 律师：官方什么态度，说是无法核算工龄？

工人：可以核算，但是正在核算。

Y：现在我觉得是社保局的回复比较积极了，厂里不愿做，所以才进行放假

工人代表：因为工资是 2004 年开始才从银行转账发的，才能证明我们的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之前的怎么核算都不清楚。

工人 1：入职证明、工资单应该在厂方那里一直保存。

工人 2：厂方说只保留 3 年。

H 主任：现在是两条路。一方面是，打官司。一方面是和厂方谈。现在社保局是支持补缴的。和厂方谈是属于另外一种，不走法

律途径，不走信访途径。现在打官司不是好的选择，估计大家也不想打官司。现在这种集体性的诉求最好还是劳资谈判。现在是怎样给老板形成一种压力机制。工人越团结，老板越害怕。

H 哥：老板是看你们有多少行动。有一点行动了就会有一些让步。现在就是让老板来找工人谈。

M 律师：老板为什么放假？有可能是因为老板迫于压力，怕给你们解决社保之后，其他人也会起来，所以利用放假把你们和其他人分离开来。现在设法把放假和社保联系起来，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让老板坐到谈判桌上。

H 主任：团结表现在很多方面。1，大家诉求是否统一。2，行动中大家是否统一。行动中有些人会受到外界压力而承受不了。需要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签字、公开信，向社会公布。我们是否有活动经费？让大家团结到一起。而且要做的不是口头的团结是真正的团结，能做到了，就不会说搞活动，没人去。比如说，工人代表要让其他工人及时了解进展，不要让其他人成为旁观者。而在工人代表受打击时，其他工人又该怎么做？详细方法不用我们作介绍，工人自己就会找到方法。比如，老板要开除工人代表，那么其他工人捐助工人代表维持生活再找工作，并同时再选代表。这样老板意识到自己的办法没用就不会再做了。

M 律师：团结的人越多，工人代表越安全。社保局的回复说明该补缴，那这份通知就该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知道。

H 主任：咱们国家，咱们工人不能成立工人组织，只有工会，很难团结。大家都是个体存在，所以现在不太容易一下子团结到一起。所以会有很多人想法不一致。现在我们是小规模团结，没有这个就没有将来更大规模的团结。

M 律师：你们的团结也是有效果的。比如现在公司给了你们合同，放假的事情也给表态了。大家也看到了团结起来的重要性。现在大家共同的诉求是社保，还有停工、和将要被停工的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去问政府也不会有明确答复。现在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谈判的前提是团结。每个厂的具体情况不同，团结的方式也会有不同。

H 主任：现在厂方口头答应 2004 年开始补，那么工龄 5 年左右的就满意了。现在大家多和其他人交流，意识提升的过程。问其他工人现在的想法，可能有些人会提出涨工资，增加福利，等等，会有很多不同的诉求。咱们现在要统一诉求，最后可能有不同的诉求，那么，好比说，5 个人是这个诉求，5 个人是那种诉求，那么我们 10 个人今天一起去要求这个诉求，明天一起去要求那个诉求，这样不要分开。因为我们是一个阶级。厂里的其他工人可能今天社保问题和他们关系不大，但是明天他会遇到别的问题，那么他们是该站起来保持同一个态度还是怎样。

如果现在仅仅是按照“和自己无关的就不理”的话，我们是不希望达到这种状态的。我们今天帮他们了，他们明天可能帮我们。总之，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要向其他人进行宣传。

工人：我们能不能自己另外成立一个工会？

H 主任：工人不能随便成立自己的组织，不能成立独立工会，需要工会部门认同。也不一定非要工会才可以谈判，像本田里就没有工会的声音。只要你是工人代表，不管是不是工会的，老板就得给你们谈。沈阳 KFC 的案例里，工人提意见，老板扭头就走，根本不理。就是因为工人没给他们压力。

工人：现在就是老板没压力。很多人旁观。

HM：你们也要看你们是怎么对待旁观者的？不能只是排斥。

H 主任：刚建国的时候，工人是当家作主的，有很高优越性的。再说到建国前，真正的工人也不多。所以那会都不能说是有一个有力的阶级。咱们历史上都没有这么一个团结的先例和基础，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身边的人不够团结是挺正常的现象。

M 律师：我的观点是我们要想办法团结扩大。工人团结起来了，

老板就害怕了。老板就会主动找你们谈了。

工人：我们 200 多个人停工没多大力量。

M 律师：你们全厂工人都保持统一的诉求，如果大部分人都能团结到一起的话，老板就不会用这么无聊的手段了。西方国家对于集体行动有规定的。

工人：我们是 200 个人，但是这里面还不团结。如果周一我们 200 个人团结停工，算不算违法。

M 律师：我这个律师身份，不合适做明确的解答。

工人：如果要停工……

M 律师：你们都要被放假了，和停工有什么区别吗？你们现在都已经被游离到工厂之外了。你们再做什么还有什么用吗？如果说你们的行为第一没有结果，第二会对自己产生伤害。老板把你们从生产线上踢出去了，就已经是避免了这个问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团结其他还在生产的工人。

工人：那些人都是麻木的中国劳工了，有些人已经有放弃的想法了，有些人害怕被辞退，想留在厂里。

M 律师：集体行动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阿针：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天时了。

M 律师：有一个开始罢工了 17 天，最后还是没达到目的复工了，老板是有一个预期的。后来看到工人更团结了，才开始谈。

工人：那批想 2004 年开始补社保的，如果让他们先补缴了。这样会不会团结其他人？

M 律师：可能有作用。不过损失一部分人。

H 主任：工人群体的问题还是要群体去解决。不要被分化了。那些人同意了，可能就退出去了。工人代表要代表所有人，要考虑各个年龄段的。

工人代表 2：我们昨天也是说，不给 2004 年的签。

H 主任：不要强硬地说，要解释清楚。

H 哥：要跟他们讲清楚要害。不然可能现在同意了，以后又变卦。

H 主任：现在还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和其他人统一思想。

工人代表 1：一方面跟工人解释，要他们等一下。一方面和政府要书面答复。

工人代表 2：地税局的不可能只打 2004 年的，会把全部的都打出来。

H 主任：我们再写一个公开信，我们工人对公司放假这样单方面做一个决定是不同意的，要有怎样的结果。要大家签字。要（政府）出面让工人和老板进行谈话。就算是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也是能团结多少算多少。

H 哥：社保问题没什么好谈的，必须从入职补齐

H 主任：停工是无效的。

HM：那现在应该具体怎样做？

H 主任：该上班就上班。

工人代表 3：现在已经不能打卡了。

工人：现在是不是算终止劳动合同？

M 律师：这不算。

工人：就只能打官司了？

H 哥：打官司只能是输。

工人：他现在说放假就放假，不是终止合同是什么？

工人代表 1：不是终止合同。

H 主任：大家是想恢复工作还是怎样？

工人：恢复工作。

H 主任：工厂是哪天的通知。

工人代表 1：第一批是 11 月 15 号开始的。

H 主任：今天我们是法律咨询指导的方式来参与的，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既然你们要求上班，那么你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去上

班试试？

工人：工厂不让进。

H 主任：那我们写一个公开信。首先是我们不接受公司的安排，公司的安排不符合规定。我们和公司的问题不想扩大到社会层面，就是说，我们不想造成社会影响，但是保留我们自发进行抗争的权利。就是说在道义上声明我们的。我们交到上级工会，交到劳动部门，企业。我相信企业会有所反应。现在是厂方关闭大门，把工人赶到社会上。我们现在就是表态，我们是本来不想造成社会影响的，我们是为政府考虑的。那么我们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那么既然已经说明我们是不想闹的，先礼后兵。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可行。我们要商量好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和其他工人进行沟通。工人代表之间的分工要分好，谁去对付哪一方面。我们工厂里其他人，对于现在维权的人的声援。我们希望他们声援，说明，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明天也可能发生在你们身上。

我们劳资方面的问题就在内部解决，不扩大到社会层面。一方面争取政府的一些可能的支持。

H 哥：政府虽然无能，但还是要争取支持。

H 主任：现在就是说不让政府捣乱。让他站在一边。

H 哥：就像工会虽然没鸟用，但是把他拉出来，给他通报进展等等。

H 主任：包括媒体的作用

H 哥：前两天联系媒体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有一些负面的言论。我们的 qq 群是 100%政府盯上的。明天有两个记者来 PY。把那些图文材料都拿出来。然后他们再去厂里了解情况。现在确定省总工会的一个人会下来了解情况。你们先计划一下地点时间。

M 律师：因为工会已经介入了你们的事，那么每一步都要向工会反映。只要他不提意见就说明他默许了。书面反映情况。可以让员工们签字委托工人代表，然后工人代表就可以有权利代表工人。

M 律师：现在我们就是要先写联名信，快递给老板，注明不同意放假的安排等等。

题目就是不同意公司关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的异议书。内容就是不同意公司的放假安排，保留工人追究的权力。寄给公司法人。寄给工会，如果不开回执的话。

H 主任：当面也有当面的好处。工会至少应该会有表面支持的表态。不表态就是默许。

工人代表 1：那我们还有没有权力和厂里要求谈？

H 主任：可以谈。我们没有解除劳动合同。

工人代表 1：我们想看全厂的工友愿不愿意一起签名，就是有关放假的事情。

H 主任：就是需要厂里的工人都知道，厂方的这种行为是需要经过大家同意的。

M 律师：企业里流行两种惩罚方式，一种是不让加班，一种是放假。谈判呢，就可能会提出高于法律的要求。合理的高于法律标准的要求也可以提出来。

工人代表 2：我们去劳动局要求解读厂方的放假通知，会不会对补缴社保的要求有影响？

H 主任：不会。

M 律师：厂里的这个通知，应该要有明确的放假时间、放假期间待遇、周期。

H 主任：总结一下，给政府的意见书切入点有三个。第一，厂方这样做，补缴社保的行为是违法的。第二，安排工人放假不让进厂的合法性是受到质疑的，厂方做出放假的决定是不合程序的。第三，工厂把我们这么多人赶出工厂，造成社会不和谐因素，本身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四，给政府提出这些，能够比较好地解决，也对他们有好处。第五是尽量团结厂内的人，对工人队伍本身工作要加强。

工人代表 2: 政府信访办要不要送？

H 主任: 工会和劳动部门就可以了，信访和这个是两个渠道。

工人: 第二批可以不接受公司放假安排吗？

H 主任: 第一批也可以不接受啊。这么多人被放假，即便公司和工会商量的工会同意，只要大家不接受的话也不行。企业、工人的问题企业内部解决，希望政府过来调查情况，协调处理。我们觉得工厂这样做我们不满意，能发动全厂工人更好。

工人代表 2: 代表都在第一批放假里，第二批没什么人愿意站出来。

H 哥: 厂里就是要把你们这些人隔离出来。

H 主任: 还是要做工人的团结工作。咱们说到工人代表的保护，谈判过程中会写到里面，但是还是工人对于工人代表的实际保护。很多工人选出来以后，都想我们把代表选出来，你们就去做吧。这样代表是没有真正的含义的，只是名义上的，这样的话代表出了事，别人就退到一边去了。代表选出来，别人不能撤，要能继续支持。这样，才不怕老板报复。有了支持，我们给政府、厂方的一些东西才有力量。

刚才那位工友提到打官司。我们 L 律师事务所，是全国第一家劳工律师事务所，只给工人打官司，不帮老板。我们已经打了好几千官司了。但是越多我们越发现，很多个人维权官司里面，官司只解决个人的情况，不解决全体的。因为一打官司，我们 70 多个人的集体诉求就变成 70 多个官司了，这样力量就分散了。一打官司 2 年多，个人精力投入很大。还不一定能赢，即便赢了，钱也不一定拿到。所以不管投入来讲，还是结果都是吃亏的。所以我们发现官司不能解决全体工人的问题。打官司的话就把你们引入歧途了。

工人: 为什么老板这么强？

H 主任: 个体工人面对老板永远是弱的。为什么设定集体谈判呢？就是避免打官司。避免时间、司法上面的浪费。比如我们现在

支持的一个 1000 个人的维权，如果是打官司就是 1000 个官司，要打上半年。会造成很大的司法浪费。所以说集体协商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而且现在据统计，个体劳动案件逐年减少，集体的增多。

M 律师：你们要是打官司，很难找到合适的诉求去诉。社保已经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了，法律不能解决。社保问题广东省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后记

当天的会议是我来做记录。原定下午 16 点的会议，工人们早早到齐了，聚在一起聊天。有 4、5 个面生的工人，其余几个都见过。打听了一下，有 3 个是第二批的，有几个第一批的以前没见过。一共有大约 15、6 个工人。**HM** 向我们介绍说，从 **S** 市请来有集体谈判指导经验的律师，因为堵车，要晚些到。

16 点 50 左右，一个带黑框眼镜的胖中年男出现了，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问清楚是要开会的地方，要见的人以后，一边说他是 **H** 主任的同事，**H** 主任马上就到，一边大步流星走到预留的位置上。

首先由工人大概介绍了一下情况。遇到工人的讲述和律师的提问对不上，或者工人讲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机构职员 **HM** 和 **Y** 会主动进行补充。律师一边讲，一边有人提出不同疑问。尤其一个叫阿明的工人，一直和律师提相反意见。**HM** 还有几个工人就给他打手势，意思是让律师先说。这个律师了解情况以后做出论断，有关放假的事没法上诉。边讲，边强调，他说的是 **S** 市的情况，**G** 市这边的不是很清楚，或者不知道 **G** 市这边的法官有没有什么新的解释。

又过了 25 分钟，**H** 主任终于到了。**H** 主任长得很白净，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语气听起来比那位 **M** 律师稳重些。他看了那几份材

料，又了解了一下情况，开始讲话。不过他电话一会一个，开始都在屋里接，后来有一个说信号不好，到外面去接了。

H 主任讲的时候，M 律师时不时和他咬两下耳朵，让人觉得神秘秘的。两位律师都在不断地强调工人要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并且他们 L 律所能够发挥作用，基础也是工人团结。然后讲到工人要团结确实会有困难，因为从建国之初起就……（此处略去 200 字）。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工人们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太多表情。我猜是神游天外了，我叹了口气，也有人叹了口气，这时 H 主任大概是意识到工人们不感兴趣，便自觉地将话题拉了回来。

开完会后去附近的大排档吃饭。20 个人大概吃了 200 多元。我开始以为是劳工机构出钱，却原来是工人掏腰包。难怪今天中午在镇上开会时，几个工人不再去饭馆吃饭了，而是自己做饭。大概集资款又用的差不多了，而现在很多工人放假，也需要节约着用钱，不然再找其他人集资就不容易了。

那个开始一直和律师抬杠的阿明，是第二批追缴社保的工人。脸长得比较有棱角，眼睛挺大，眼神有点发直，说起话来挺冲。吃饭的时候和他了解了一下情况。他和他老婆都在 HB 厂里，一个做了 11 年，一个做了 7 年。他在开会的时候一直和律师抬杠，说现在谈不拢就要打官司。他开始没去追社保，主动向我解释说是因为他之前是被亲戚介绍进厂的，亲戚和老板认识，顾及情面不好意思追。而现在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头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坚持打官司，他说他不是要坚持打官司，而是说如果谈判不成没结果，就只能打官司了。并说他对法律略懂一二。问他为什么懂法，他沉默了半天，很犹豫说还是不说样子。我说，要是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他还是说了，他以前是学过法律的，亲戚在北京有家律师事务所。他在那里帮过忙，但是自己没有拿到毕业证。后来进厂做的普工。因为他之前老和律师抬杠，遭到 H 哥和几位工人排斥，H 哥红着脸跟他说“不要再讲了，下来单独跟你说”。他没听，还是抬杠，H 哥训他说：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后来他又也因为没分清住房公积金就是社保的一部分，又遭到耻笑。两个律师对他倒是比较有耐心的样子。京腔律师还总是略带调侃地对他说“清楚了吗，兄弟”“明白了吗，兄弟”有工人问他干嘛老跟律师争，他说，当然要跟他们争。工人说，他们是来帮咱们的，又不是害咱们的。后来，YH 又提到他好几次，笑话他说连公积金是不是社保的一部分都不清楚，还老和律师锵锵。

过了几天，问起工人代表事情进展如何，YH 摇着头苦着脸，工人不团结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



2015 年·某车灯厂工人罢工 历程



A 厂基本情况

A 厂是一家是生产自行车车灯的台资厂，于 1998 年在深市 L 区建厂，主要生产车辆用灯、反光片，产品外销欧美，为法国 AXA、

德国 Messingchlager 和 Buchel 等知名自行车品牌供货。该厂有员工 83 人，从未缴纳过社保、公积金。2010 年之前，周末加班也仅 1.5 倍工资。

老板和总经理是台湾人。老板（董事长）本人在台湾，主要负责接订单。一个月才去一次厂里，主要去看总经理那里的账。老板是不管生产，也不管工人的。所以工人对老板没什么好感，但也没什么恶感。做得久的工人都知道，老板很抠门。举个例子，工人代表霞姐的亲戚以前在 A 厂当保安，有一次看见董事长让另一个保安去给他买早餐，保安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杯一块钱的豆浆、几个包子，回来被骂了一顿，“一块钱的豆浆你自己喝，你再给我买个五毛的”。A 厂门口有个小店，早上有的员工起晚了，炒点米粉当早餐吃。霞姐觉得那家店酱油放太多，米粉又干，“我都吃不下去，去年的时候，他儿子天天吃。你说他多么会过日子。他都不是铁公鸡，铁公鸡还能掉个锈，他纯属不锈钢的。”

据说总经理 D 在创业的时候就跟着老板了，原来是老板工厂里的一个员工。后来老板来大陆办厂，就让他过来做总经理，全权负责工厂的生产和管理。在大陆十几年，总经理慢慢扎了根，全家人都在厂里，还在当地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不仅给儿子找了个湖南媳妇，还给自己找了个湖南情人。据说这个情人除了他老婆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了。总经理还让儿媳妇和情人的亲戚都到厂里来做工作。他老婆、弟弟、儿子、儿媳也都在工厂担任管理。除此之外，他还认了一个广东人做干儿子，让他负责收厂里的“废品”。这个“废品”主要是厂里注塑机压坏的产品，经总经理干儿子回收后，做成半成品，再卖到厂里，以此获利。除了总经理家族的人，很多工人也是沾亲带故的，夫妻、兄弟姐妹，表亲、甚至有的一家三口都在里面。

员工评价，“D 总是个笑面虎，跟他聊天的时候感觉和蔼可亲。不过慢慢就知道了，这人其实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不可以请病

假，只有事假，还要看他高不高兴；婚假，丧假，产假，都是事假；孕妇他可以给钱，但要写事假。D 还很虚伪，他通过管理死死控制员工，却又想在员工面前装好人。比如说，有的员工家里有事要请假，写了请假条，主管找 D 批，D 不同意。后来员工直接找到 D，D 却说是主管自作主张不批他的假，然后给员工批了假，自己做好人。

总经理 D 还特别会省钱过日子。除了扣老板给的一些福利，他还让女工去给他家刷锅洗碗、收拾房间、打扫卫生，然后在工资里给帮忙的女工发点奖金。厂里也没有专门的清洁工和绿化工，卫生都是让员工甚至基层管理去打扫。厂区里的草长高了，就安排男工去拔草。这几年来，随着底薪的增加，还逐渐取消了以前的一些福利，比如食堂和宿舍。

除了福利待遇要省，劳保用品、体检这些也是能省就省。员工用口罩、手套，需要向组长申请，组长则说要向主管申请，后来申请又说没申请到，员工觉得象在“求人”人一样。体检则已经很多年没有了。A 厂有一个特点，所有员工不是固定在一个岗位，而是轮流做。有毒有害岗位也一样。但有的人做了十年，才体检一两次而已。

工厂只有品牌安排查厂时才会装装样子，把工厂大肆清洁一番。有一次查厂的人说工厂没有娱乐设施，资方就搬了一个乒乓桌出来，说是提供给工人的；资方还会拿一个药箱摆在车间里。这些装样子的设施和物资，等查厂的人走了就收回去了。

2013、14 年，由于加班比较稳定，工人的工资基本能拿到三四千。但 2015 年春节之后，慢慢发生了变化。总经理开始把订单外发，还找外发厂的员工叫来厂里学经验。订单外发后，加班减少，工人的工资逐渐降到两千多。员工心理逐渐产生不满情绪，一些老员工觉得这是要逼他们走。而员工不走，也是希望留到最后有一点经济

补偿金。有一名受访员工说道：“如果老板⁴懂做人的话，给员工补点钱，或者有点班加就算了，这些员工其实都很好说话的”。

工厂存在的问题

当加班比较稳定，工资还不错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可以忍。但这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平常积累的各种矛盾就开始凸显了。工人在诉求书里清楚地罗列出了 A 厂存在的很多问题：

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工龄短的有三至五年，长的甚至十多年。我们在这里工作就是希望公司发展壮大后，使我们的生活有个依靠。但事不如人愿，我们遇上无良老板。他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糊弄我们不懂法律，一直不给我们缴纳住房公积金、社会养老保险、员工在高温下工作也没有高温补贴。2011 年才开始有五天的年休假，每天要提前十分钟上班，不给加班费，还无故克扣员工工资，员工婚、育、病、工伤、丧假都没有工资。每月还分两种方式发放工资（一次以现金方式发放，一种通过银行转账）逃避责任。工厂使用危险化学物品又不发给员工防护用品，也不给补贴，不为员工做体检。

由于 A 厂老员工比较多，有一些人超过十年工龄，而且有几名女工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她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其实是养老保险补缴的问题。实际上，早在 2011 年，相关部门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曾对 A 厂进行调查，要求厂方必须购买养老保险，老板通过欺骗的

⁴ 其实是总经理，但平常员工都习惯把总经理说成老板。

方式诱使员工放弃缴纳养老保险。

一位员工称：“当时厂方发一张单，让愿意买社保的人在上面打勾，不愿意买的就打叉。管理层跟员工说：你们很多人是外地的，养老保险买了将来也转不回去，辞工走了也得不到；你们工资本来就不高，还要养家糊口，扣了保险你们钱就少了，最好不要买。听他那么一说，一些员工就想着不买算了。当时全厂只有十来个员工买了。”此后，有新员工进厂，资方也没有为他们参保。

在访谈中，他们还提到限制上厕所和疑似搬厂的问题。

A 厂的生产部门里面是没有厕所的，上厕所得去另外一栋楼的二楼。厕所门口还有个垃圾桶，上面蚊虫飞舞。A 厂没有清洁工，也没人去清理。总经理担心员工在厕所玩手机，竟然把厕所锁上了，每天只有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各开放十分钟。期间也有员工生气把锁砸掉了，但很快又换上了新锁。上厕所的时间不允许超过十分钟。如果被总经理或者老板发现上厕所时间太长，可能晚上加班都加不成了。工厂工人工资低，要想多拿钱全靠加班，所以限制加班也成为了管理层一项控制工人的特权。

另外，还有消息说工厂打算搬离龙岗。在当地待得比较久的老员工都知道，大型房地产商在附近建了楼盘，把地都收购了。A 厂所在的这一片，附近其他厂几乎都搬完了。A 厂所在的地皮，买的时候才三百多万，而现在市值好几个亿。未来，A 厂所在的村，将成为该区的中心地带。工人甚至还听说工厂要搬去惠州⁵。综合各种消息，工人们感觉前途无望，反叛的种子已经悄然播下。



⁵ 实际上后来搬到了离 A 厂十几公里的、同区的另外一个村。不知道是公司一开始就打算就近搬厂，还是的确考虑过搬去惠州。

情绪的酝酿

阳姐 2005 年 10 月 29 日进厂，到 2015 年已经将近十年的工龄了。她是工人当中最早有“权利意识”的人。原因是她 2010 年受了工伤，在治疗的过程中，认识了关注工人权益的 B 机构。阳姐通过他们了解到了工伤工人应有的权利，此后更是积极参与到 B 机构的日常工作当中，成为 B 机构活跃的义工。在此过程中，除了参加文艺小组、女工小组的一些活动外，她还学习到了很多与工人切身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2015 年之初，公司加班开始减少。她开始针对工厂的一些问题进行抗争，包括要求公司赔偿“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差额、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等。同时，也积极向其他员工宣传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女工的“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向刚生过小孩的女工介绍产假工资的规定等。总之，阳姐在前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向工友宣传法律，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以及争取的可能性；二是连接了工人和机构，让机构有机会介入和帮助 A 厂工人的集体维权。

阳姐认为，正是这些行动，让工厂视她为眼中钉。

3 月份，阳姐的合同即将到期，她要求工厂跟她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在此之前，工厂从未跟任何人签订过无固定期限合同。当她提出这个要求后，资方并没有同意。阳姐多次找人事部门理论，最后在 3 月 12 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但从那以后，公司就不让她加班了。阳姐的事情很快在全厂传开了，也引起了一些工人的不满。实际上，由于加班少，大部分人的心里已经开始蠢蠢欲动，都在默默关注阳姐的事情，想看她到底能争取到什么。

之后又发生了一件让员工感觉很寒心的事情。4 月 3 日，一名女工因为没有达到工厂要求的产量，被管理关到办公室“面壁思过”。“面壁”期间不能做任何事：不能工作，也不能玩手机，就傻坐在

那里“反省”。她要求回到车间上班，主管不同意。被主管和经理责骂和呵斥后，该女工感到身体不适，晕倒在车间。而厂方却认为这名女工是故意装晕，连救护车都不愿意叫。后来看她真的躺在地上不动了，才用厂里的车把她拉到医院。在 A 厂，让达不到产量，或者不听话的员工面壁，是很平常的事，员工对此非常不满。

我们采访的一位女工也谈到过她的“面壁”经历。由于管理安排她站着上班，而同样工位的另一个工人却可以坐着上班，她觉得很 unfair，就找管理反映，其间发生口角，说她不服从管理，让她去办公室“面壁”。坐了两天，人事经理让她写了检讨书，调了一个岗位，还停了一个星期加班，才算作罢。A 厂管理之粗暴，可见一斑。

4月8日，人事部工作人员拿着一大把笔和纸条，让大家选择是否缴纳社保。到车间的时候，一位工作了九年多的男工骂道：“他妈的，你们还在忽悠人，还在愿不愿意的，现在哪个厂不是必须给工人买（社保）！”。快到下班的时候又说，签字买的、态度不明确的，一律强制买。不愿意购买的，逐个叫到办公室去，让他们签一份切结书。后来，有关部门去调查，管理又把那个切结书撕了，最后给所有人都买了社保。

过了几天，发工资条的时候，阳姐发现她被扣了缴社保的钱。她又跑去办公室质问管理人员：我既没说买，也没说不买，你凭什么给我买？包括阳姐在内，许多工人都觉得，以前工资高的时候不给我们买，现在才这么点钱，又要给我们买。既然要买，那就给我从入职开始补。



从联名信到罢工

一群工龄长的工人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女工 R 在访谈时愤愤不平地说道：“老板把我们逼到这样子，我们心里不平衡，一下子爆发了。就像一个气球，有能量装得下，那个气球实在是装不了了，一下子就爆炸了。”工人代表阳姐也说：“十多年没罢过工的厂，肯定存在不少问题，一下子就爆发了。”

一些工人酝酿着写一份联名信。经过讨论，针对工厂存在的问题，列出了九大诉求：

- 1、按我们的实际工资补回我们从入职至今的社会保险（养老、失业）；
- 2、按我们的实际工资补回我们从入职到今的住房公积金。
- 3、补回欠发员工的高温津贴；
- 4、补回欠发员工 2011 年之前未安排年假的补偿；
- 5、补足 2010 年前双休期间的加班费；
- 6、补足每天两次提前十分钟的加班费（每天共计 20 分钟）；
- 7、补足无故欠发的工资（罚款、婚、育、病、工伤、丧假）；
- 8、足额发放防护用品，每年要为员工工作一次体检。
- 9、开放洗手间，还回员工尊严。

联名信写好后，共征集了 53 个签名。签名的主要是普工。一些积极的男工也去找过主管们签字。生产部有两个主管，以前本来厂里有两条线，各做各的单，一个出口一个国内。后来两条线合并为一条线，两个主管都想表现好一点，以后当唯一的老大。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们自然是慎之又慎。起初其中一个主管签了名，不过在快递寄出去之前，他发现名单上只有他一个主管，又把名字划掉了，因为“只有我签，有点碍眼”。他私下表态：“我家庭条件在这

里，不方便出面，搞成了，我请大家吃饭。”虽然没有签名，但在后来的罢工过程中，这名组长也暗地里帮助罢工工人，有时候通风报信，有时候买点水给大家喝。而另一名主管，一开始就没签名。下面的组长们，有的签了名，后来看到主管没签，也把名字划掉了。他们对工人的行动是支持的，但是不出面。

联名信的末尾，工人要求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5 日前给出书面的答复。信寄给厂方一份，同时也寄给了六个相关政府部门：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市劳动局，龙岗区工会，龙岗区劳动局，社保局，人力资源保障局。

联名信递交后，总经理通过人事部给主管打电话，一个一个叫员工上去谈。一些老员工担心这样会被老板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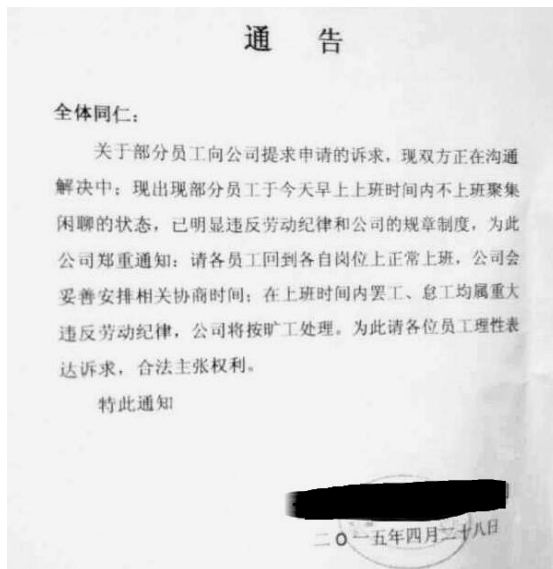
4 月 23 日，迟迟得不到回复，这些老员工找到总经理 D 交涉，同时质问他私下一个一个找员工谈话，居心不良。D 称：“我们要了解每个员工的心声。”员工表示，我们不要一个一个谈，要谈大家一起谈。

大家还提出一名员工工伤的问题。A 厂为了节省成本，不请清洁工和园林工，厂里有的地方草长得很高，管理层安排男工去拔草，其中一个男工用力过猛把肋骨撞伤了，差不多两个星期都没处理，而且休假还要写请假单。那个员工很老实，普通话也说不好，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交涉的结果是，D 表示工人的诉求已经呈报给老板，并承诺 25 号之前会有答复，让员工耐心等待。工伤员工的问题也会处理，但需要走程序。

这一天的“沟通”是工人主动找到 D 的。员工大约十来人，刚开始吵吵嚷嚷的，你一言我一语说一通。其间，有的人讲话声音大，而且听起来很有道理，众人立即鼓掌。当工人质问 D 为什么不给那个工伤员工申报工伤时，D 说道：“你们误会了！”这时候也响起了全体人员的掌声。总经理接着解释，“在我这里我绝对会处理的……要先去社保拿单回来填报”。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刚开始总

经理声音还挺大，但员工人数比较多，而且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来，D 的语气就慢慢软化了。其中一名以前担任组长的男工这时开始调和：“是主管说 D 总你不同意（认定工伤），我说他怎么能这样说。而且工厂这么多人，你也管不过来嘛。”D 也想收一收了，接着说“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我”。一个大嗓门的女工说道：“D 总，你能理解我们，我们就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因为主管给我们传的话就是，D 总不同意的。我们不误会你去误会谁嘛？”D 回道：“我的电话都是公开的，有问题直接找我。”最后 D 再次承诺，一定会在 25 号之前回复。工人并不是相信总经理的承诺，但是毕竟时间还没到，也没必要撕破脸。于是最后在一片和气中，众人散开了。

当天，资方贴出通告，要求员工选出五名代表，次日下午召开座谈会。工人在车间选出了九名代表，并作出了相应分工。这个选举也不是正儿八经地选，大家七嘴八舌你提一个我提一个，本人同意就算是工人代表了。除了 P 第二次进厂，工龄不到 2 年，其他人都是五年以上的，最长的有十年。



工人代表基本情况及分工⁶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龄	年龄	谈判分工	是否被抓	解聘日期
1	阳姐	女	10	48	首席代表	✓	5月13日
2	二月	男	2	36	对外联络	✓	5月13日
3	霞姐	女	10	44	“打手”		5月13日
4	悦姐	女	8	46	文书		5月13日
5	阿红	女	7	35	会议记录		未解聘
6	小原	男	10	32	对内宣传		5月13日
7	阿志	男	9	40	未分工	✓	5月13日
8	阿珠	女	5	30左右	未分工	✓	5月18日
9	桂姐	女	10年 左右	40多	后退出		未解聘

4月24日，资方安排法律顾问跟工人代表谈。工人本来以为至少会有一个表态或者回复，但律师表示：“我今天是来了解情况的。”谈完工人觉得律师就是来摸底的，没有实质的作用。最后约定4月27日给工人一个答复。

4月27日，律师借口要开庭，把谈判时间推到28日。

4月28日第二次谈判。总经理D没有出面，谈判现场除了8名工人代表、公司法律顾问、人事经理外，当地劳动站、社保站、住房公积金管理处、街道办等部门都有人去。法律顾问表示，按照深圳的法律，社保和公积金只能补缴两年。政府部门则建议工人去仲裁，还说可以给工人找免费的律师。谈了半天没什么结果，公司法

⁶ 虽然选出了9名代表，但此后的谈判等集体活动，主要是8名代表参与和主持。工人代表桂姐是组长，后来因为家庭经济压力退出了，其他员工表示理解。表格中姓名为化名。

法律顾问叫工人代表把诉求列一个清单，他拿去给老板。后来那个法律顾问就消失了，再也没来过厂里。

政府部门提出的仲裁，工人认真考虑过，并向公益机构工作人员 C 咨询过。C 表示，如果严格按照法律途径走的话，时间会比较长，而且立案后工人还得继续上班，不上班就违法了。而工人也考虑，“当时厂里货也往外发，模具也往外搬，就想着说不定厂就要搬走”，而如果能跟老板谈的话，哪怕打个折，工人也愿意接受。所以继续罢工，要求谈判，是比较快捷、有效的办法。谈判期间，工人在车间已经无心上班，开始怠工。

28 日下午，公司贴出了《关于申请书的回复》，对工人的九条诉求一一进行了回复。其中，社保、高温津贴、每天提前上班的加班费、婚、育、病、丧及工伤期间的工资，都只补两年，并同意严格发放和管理防护用品，下半年开始体检，开放洗手间等。关于诉求书的第 4、5 条，要求补回 2011 年之前未安排年假的工资和 2010 年前双休期间的加班费，“公司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同意接受”。

员工对此并不满意。前面提到过，公司从 4 月份开始强制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保，一些工龄长的员工觉得，要缴就应该从入职开始缴。A 厂的员工绝大部分年龄都是三四十岁左右，大部分工龄在五年以上。9 名代表中，比较积极的 7 名，平均年龄 40 岁，其中 6 人工龄五年以上。而联名的 53 名员工，有 27 名工龄超过 5 年。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养老保险要缴满 15 年，达到退休年龄才能够办理退休待遇。如果在深圳缴满十年，还可以办理延缴延退。所以补缴两年的养老保险，到退休年龄还买不够十年，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意义。除了养老保险，其他各项，员工也希望从入职开始补。

公司还另外贴出一张通告，威胁工人“已明显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在上班期间罢工、怠工均属重大违反劳动纪律，公司将按旷工处理。”

4 月 29 日，一些员工得知工厂有一批货急着赶出来运往上海参

加展销会。总经理打算把货外发给别的厂做，并准备好栈板要拉出去了，外发厂的货车已经到了厂门口。工人立即赶到厂门口阻止。罢工由此拉开序幕。

总结一下，由于加班减少，工人心思开始活动；阳姐被取消加班、面壁女工被吓晕、男工拔草受工伤、强制缴纳社保等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公共议题”，工人怨气逐渐累积；传闻工厂要搬厂，及订单外发直接引爆了罢工，导致工人决心来跟工厂算个总账，把工厂一直以来欠工人的东西，全部要回来。



罢工第一阶段：工人守厂

罢工第一天（4月29日）

罢工后，工人索性把铺盖卷和锅碗瓢盆到搬到了厂里，开始轮流守厂，在工厂做饭、睡觉，守住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情绪发酵和热身行动，全厂的人都知道现在要向资方争取什么，但工人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准备好罢工，或者说选择什么时机罢工。

总的来说，这次罢工的根本原因在于加班少，工资降低。长期以来又累积了各种矛盾，而且都这个节骨眼了，资方还打算把订单外发，着实激怒了员工。女工S描述当时的心情：“很气愤，我们全

厂的人都坐在那里，都觉得很委屈。”

厂方贴出《关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员工回复的答复》，里面强调，同意公司方案的，与公司签订《同意书》；不同意的，建议走法律途径。厂方还“特别提醒”，工龄两年以内的员工，已经满足了他们的条件，建议他们复工，并签订“同意书”。这个“答复”旨在分化新老员工。不过，新员工并没有动摇。

新员工和老员工在诉求上，是有所差别的。所以对于资方的回复，态度也不一样。对于老员工来说，补缴养老保险是最重要的诉求，因为他们工龄长，而且即将面临退休。对于新员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并没有那么紧迫，补缴两年毕竟也聊胜于无，而且他们离退休还早，以后继续缴就行了。不过，这次罢工的主心骨，都是老员工，新员工被动跟随的比较多。这群走在前面的老员工，工作时间长、懂法律、有决心、有斗争性和号召力。他们会主动跟新员工做解释和沟通工作。而且即便是新员工也担心，厂方承诺的部分恐怕没那么容易兑现。

“产品是我们做的，我们有权利说话”

29 日，资方叫快递去厂里拿一个参展样品，被员工拦下了。为了把货拉出去，资方报了两次警。第一次说员工在厂里闹事。当地社区民警过来了，了解情况后表示：“这是劳资纠纷，公安局是执法部门，这事不归我们管。”总经理也没出面，警察就走了。晚上，经理又报警说厂里打架，又是那个民警过来，工人说总经理都没下来，我们打谁？那警察一看根本就没有发生打人事件，就离开了。工人知道那一批样品很重要，就锁在办公室，不限制人进出，但不许拿货出去。

后来还有一次，总经理召集主管、文员和亲戚们开会，给他们

下命令抢货。其中一个文员已经怀孕了，大概总经理觉得工人们不太可能跟文员动手，这样出货会比较容易。当时有两板货贴好标签要出货到国外。总经理说：“我今天必须出货，你们做好准备吧。”他看工人没动静，又来软的。他说：“这个货不出去，客户会罚我款，要违约金的。”看工人无动于衷，又让工人配合，拍个阻拦厂方出货的照片，表示这不是他的责任。工人觉得很好笑：“违约是你的事，不能出货是你的责任，干嘛配合你？”后来总经理只好拍了货的条码，给客户发出去。

其实这次出货，工人已经提前从一个主管那里得到了消息。总经理的盘算是，他安排人去抢货，工人阻止，他就报警说工人打人。抢货现场，总经理的儿媳带着那个怀孕的文员站在装货的栈板旁边。工人代表霞姐在访谈时回忆当时的情形：

“要是我们去拉她（孕妇），他们也会说我们打她了。

我跟员工说，就像打仗一样，要先把地理优势占了。我们围了过去，孕妇就去厕所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栈板）前后坐满了。我们员工风言风语地说，真是傻，就算老板给你钱，万一有点什么，怎么办。”

那个文员不到三十岁，怀的第二胎。还有人去劝她：“你自己有身孕，别不拿自己的小孩当一回事。”工人也做好了准备。女工围在货周围，如果有人去拉她们，也说自己怀孕了。工人代表二月说：“他首先用孕妇来吓唬我，我也可以用孕妇来吓唬他啊。他也不知道我怀孕没怀孕啊，是不是。”总经理儿媳在那里瞪着工人，眼睛黑溜溜的。孕妇回了办公室，没再出来抢货。

此后的半个月里，发生过无数次资方安排的“抢货”，甚至找来了一些五大三粗、不明身份的人来跟工人对峙，不过最终都没有得逞。这些后面都会谈到。值得探讨的是，工人采取堵厂门、不让出货的方式，背后的道义逻辑是什么？工人认为，既然工厂欠了我们

这么多，现在又不解决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谈判）也得不到积极回应，合理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些用我们的劳动做成的产品，工人也有发言权和处置权。用工人代表 P 的话说：“这个产品是我们做的，我们有权利说话，老板不过来跟我们谈清楚，这个货就不要出去展销。你谈清楚我随时都给你们出货，不会不讲道理。”由此可以看出，工人守厂不让出货的目的很简单，只是希望资方能好好跟他们谈，谈得好，就可以出货。

罢工第二天（4 月 30 日）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罢工的。为了发动更多人参与，积极工人在打卡时询问员工要不要罢工。如果不愿意参加，就跟她们讲道理：“这个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管理人员去上班，工人代表也会跟他们解释罢工的目的，并告诫他们：“你打卡可以，不要上班。”开始罢工时，总经理的亲戚是不参加的。工人代表分头去劝说他们，还表示：“这个钱也不是总经理的，是老板的钱。”最后普工几乎全部参与了罢工；文员、人事主管、生管主管、财务经理等少数人还在办公室，但也因为罢工而无事可做。这些人比较怕老板和经理，担心因为罢工而影响自己的工资和前途。

4 月 30 日劳动局，社保局、公积金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来厂里跟工人谈。总经理再度消失，连一瓶水都没给政府部门的人准备，工作人员有点生气。社保站站长表示养老保险只能补两年，两年以外的可以跟资方谈，用补现金的方式私了。

罢工期间，总经理 D 偶尔会打电话给两个男工代表，表示这事他做不了主，他代表不了老板。他说：“今天我要是站在老板这一边，我良心上过不去。如果我要是站在你们这一边，我又对不起老板。”工人就觉得你既然作不了主，以后就不要管了。我们现在谁都不谈，

就是要老板出来。

下午总经理回到工厂三楼的宿舍后，消失了几天，并传出消息说他出去了。工人很清楚他就在三楼，因为厂门被工人守住了。“这里一只蚂蚁都没法爬出去，他从哪里飞出去？”不过工人也没有戳破，总经理消失期间，没有直接上楼去找他，他的老婆、儿子、儿媳、孙子，都可以随时进出厂。工人代表 P 表示：“不把我们做的产品带出去就行。我们不限制人家的自由，那样违法的事，我们也知道。”

守厂期间工人的状态

工人轮班在工厂做饭、睡觉。以前没罢工的时候，周末如果不加班，很多员工会去别的厂做临时工，或者拿点手工外发，挣点钱贴补家用。罢工后，大家都不去做临时工了，守在厂里，聊聊天、玩玩手机。如果不是工作日，有的女工还会拿着十字绣去绣。如果有突发事件，守厂的人会立即通知没在厂里的人过来支援。

生产部的管理人员没有参与守厂，但暗地里会支持工人，给他们买点吃的喝的。工人代表也很清楚他们的处境，并表示理解。

总的来说，气氛还算活跃，大家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虽然在厂里守夜睡不好，不过吃饭还是要尽量吃好。食材都是工人自己买了带到厂里去，谁想吃什么就买一点带过去。做好了，有的人还会拍照传到 QQ 群里。



工人对罢工的预期

对于罢工可能的结果，有的人比较乐观。“我认为老板会很爽快，总经理也应该是的。大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应该很爽快地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大家相互协商啊，应该都很好说。”（工人代表悦姐）也有员工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我预期这次事会很长。老板这个人特抠，他说过，你们去告吧，我有的是钱。总经理也放过这样的话：老板的钱不是好拿的，他宁愿花一个亿，把钱砸在这些部门身上，也不会是你们身上花一千。”（工人代表霞姐）

工人代表二月，2008 年第一次进厂，2011 年辞职，2013 年再次进厂，前后一共在 A 厂工作了将近五年。加上他是总经理的亲戚，照理来说是比较了解老板和总经理的。他起初也抱着很大的信心。其中一个理由是，附近很多厂搬厂都赔了钱，而且工人也成功争取到了住房公积金、高温补贴之类的。“我们附近很多厂，像三×厂、合×欢早两三年要搬厂，都闹了，都赔了。合×欢之前也是什么都没买，有的买了养老就没住房公积金，有的有公积金就没高温补贴。他们罢工后都补到了⁷。奥×斯五金家具厂比较大，几千人做事，两个厂要合并，没班加，员工去要钱。跟老板谈判，老板说赔少点，一年两千块钱。他们以前住房公积金没有买，员工一说，老板就把钱全部打到工人账上了。全部是男工，很齐心嘛，一说补什么老板就补了。不像我们这个老板这么小气，拖拖拉拉。以为我们这个厂员工好说话，老板没想到我们厂员工一下子都这么齐心。”既然法律规定，而别的厂也成功争取到了，那 A 厂应该也能争取到。这

⁷ 应该是住房公积金和高温津贴都补到了。2015 年，按照当地的政策，养老保险只允许补缴两年。因为住房公积金是劳资各出一半的钱，最后这个钱都可以取出来。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只负责资金的缴存和发放，当中不涉及政府的利益，所以工人投诉要求补缴后，通常会很快得到积极回应，并且可以从法律开始实施的时候——2010 年 12 月——开始补缴。

是一部分工人的想法。

另外，虽然大家都知道老板这个人很抠门，但还是抱着一种幻想。他们认为，总经理贪了老板很多钱，老板其实也被蒙蔽了。以前老板想另外安排一些高管到厂里来，都被总经理给排挤走了。总经理的儿子、儿媳、女儿占据了工厂的关键位置，老板安排来的人，总经理表面上和和气气，暗地里动手脚，最后搞得那些人都呆不下去。利用买“废品”、克扣工人年终奖等福利待遇，都是众所周知的。但工人认为，这些老板都不知道；如果老板知道了，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诉求，说不定会让步。

第六天（5月4日）

五一劳动节放假三天，总经理在楼上躲了三四天。工人很清楚，目前主要的筹码，就是被拦下的那一批打算运去上海参加展销会的货。展销会共十天，过了这十天就展不了了。工人设想，“谈得好就把这个货出出去。如果谈不好，我们一定不会让他出出去的，就算他报警也好，抓人也好，我们绝对不会让他出的”。或许，工人潜意识里觉得事情至少会在这十天内解决。

之前总经理一直说自己只是传话，把工人的诉求呈报给老板。现在，总经理表示他要接手了。5月4日早上，六七个代表跟总经理谈。工人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法定的没商量，法律外的讨价还价（商量）”，还要求总经理D签字。最后D在上面签了，工人觉得这也是一个胜利。

经过上午和下午的谈判，总经理还是坚持每一项最多补两年。工人并不是坚持一定要完全补完的，正如他们在要求总经理签字的单上写的，法律强制的部分该补的一定得补，没得商量；法律没有强制的部分，可以讨价还价。代表们早有耳闻，深圳市目前还没有

补缴养老保险超过两年的，那么超过 2 年的部分，就是“法律外的”。有工人代表提出，从入职开始，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按照每人每年 4000 元标准打包赔偿给工人。总经理没有明确回复这个要求，而是借口出去找律师咨询，溜走了。

下午工厂还贴出公告，仍然坚持 28 日的方案，并且威胁员工已经违法。员工对此结果十分不满：“今天谈了都没意义，还是回到原点；我们现在谁来都不谈了，就等老板来。”

此时工人代表霞姐特别担心新员工熬不住，毕竟资方的方案，对于新员工来讲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诉求。“我们（参与联名的）53 个员工，两年以下的新员工有 23 个。”新员工诉求已经达成，随时有可能撤出。这时一些老员工也会给新员工分析，“现在的方案虽然是给你们补，但是是按照什么标准补？实际工资还是基本工资？而且公积金还要分两次一年补完，两千块钱一个月在这里，你拖得起吗？”实际上，很多员工参与罢工，都抱着要离开的打算的。既然不能久留，那最好一次性能争取到他们应得的权益。

晚上，资方再次安排人到厂里拉货。两个巡逻的开着巡逻车在前面带路，后面跟着一辆宝马。到工厂门口后，其中一个人自称是警察，要进去把货拿走。工人围着他要证件，还给他拍照。那人发脾气。工人则表示：“你有执法权，我们有监督权，不属于侵犯肖像权”，“你不是领导也不是员工，没权利带走我们做的货。老板给我们解决完问题后就可以拉走，你有本事把我们问题解决完也可以把货搬走！”那人一看，货是拿不到了，赶快走了。

第七天（5 月 5 日）

总经理给劳动局打了电话。劳动局的人到工厂，跟工人说堵厂违法。他们还带着一份《深圳市龙岗区劳资纠纷分级分类处置工作

资料汇编》。工人不明就里，还拿去复印了一份。根据工人提供的音频资料显示，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在现场主要是劝导工人不要影响企业生产，罢工、堵厂们已经“过火”了。

“你们真的过火了，我为了你们好才过来的，明白吗？你们有很多途径可以走，一早你们就知道仲裁最多支持两年。”

“这个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国有企业，这是私有企业，知道吗？所有生产资料都不是你的。你可以商量，但是你不可以影响他的生产，知道吗？这就过了。”

“他违法在先你也不能这样处理，企业知法犯法政府会处罚他。”

关于工人的各项诉求，劳动局工作人员的意思大概就是只能补两年。工人觉得不合理，另外还不忘抓住机会控诉厂方：“昨天他们叫黑社会过来，威胁我们人身安全。他可以叫劳动局，叫黑社会干嘛？”

第八天（5月6日）

5月6日，政府部门第三次到厂里跟工人谈。此前，政府部门到工厂来跟工人谈，基本上还是作出“中立”的样子，尤其是对于所谓超过2年时效的部分，他们还建议工人跟老板协商，让老板补一些钱。而这次劳动局会同各大部门来到工厂，言谈之间已经非常不耐烦了，开始对工人指手画脚，非常强势。而总经理则气定神闲地跟政府部门的人一起坐在工人代表对面，右手边是劳动站站长，左手边是街道办副书记。

政府部门与会人员：劳动站的站长、副站长、当地社保站站长、公积金中心负责人、街道办副书记、派出所两名所长、综治办主任、社区书记等

资方代表：总经理

劳方：工人代表七名

谈判内容：养老保险最多补缴 2 年，以本人实际工资为基数；公积金从 2010 年 12 月开始补，以本人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为基数。其他各项也基本都是按照两年为限，超过两年的不予追溯。

整个谈判过程由劳动站站长主导，按照工人的诉求，由相关部门负责人逐条回复。总经理坐在那里，几乎没有发言。虽然工人此前很少跟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但他们大多年纪比较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也没有怯场，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政府部门的回复提出质疑。劳动站站长态度比较嚣张，声音也比较大，每次说完话都喜欢带一句“懂吗？”或者“知道吗？”

诉求逐条谈完后，工人再次问道：“是否法律规定强制补的期限是 2 年，超过两年的部分还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追溯？”劳动站站长表示：“如果你不答应，可以通过法律去起诉他；如果你不答应又不复工，厂方有权利开除你，知道吗？三天内算你旷工。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工人一听这话，就有点火，声音也提高了。派出所和街道办的则赶紧出来调和，这才让沟通得以继续。

下面是一部分现场对话摘录：

工人：养老保险两年以内必须补，两年以外，我们可以找厂里补钱是吗？

劳动站站长：法律法规规定只补两年，如果你们跟厂方联系，厂方说补你钱的话，我们也不支持。包括这两年，都不允许货币补助，懂不懂？

工人代表霞姐：法律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他（公司）那个时候就该给我们买（养老保险）。

劳动站站长：对，所以就给你追溯两年，重新把两年给你买进去。懂吗？

工人代表悦姐：法律说追溯期两年，有没有说超过两年不允许

追究？请给我们一个答复！宪法有没有规定？

社保站站长：你们如果要追溯超过两年以上的权利，可以申请仲裁或者行政复议。

工人代表悦姐：那你们今天的调解都白调解了？

社保站站长：我们是基层工作人员，法律制定不是我们制定的。

工人代表悦姐：法律是今天颁布的还是4月1号颁布的？

派出所所长：不要揪着一个小问题，继续往下。

劳动站站长（高声）：如果有（补缴）超过两年的，我枪毙！我负责！！

.....

街道办副书记（温和地）：今天我第一次到这个厂，以前也没见过你们老板。假如大家对他们的解释不满意，还有疑问，或者还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通过仲裁、法院起诉。如果通过法院起诉，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律师也不是我们养的，是一些法律援助，你们不用出钱。我们感觉到，工友的诉求，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来解决。我相信厂方，只要法院判决，一定可以执行。我们的诉求，要通过合法途径，不要去堵厂门、拉横幅、不要影响工厂正常生产秩序。再一个，我们有些员工还在上班，不要阻拦人家上班，这个也不合法。至于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有什么



（村委的治安巡逻车辆停在工厂附近）

么不当的，你也可以行政诉讼，觉得他们偏袒厂方、有不合法的言行，你一样可以通过行政复议。

诉求逐条谈完之后，工人要求总经理表态。总经理也学着政府

部门的口吻：“刚才一致通过的，厂方会照办。至于超出（两年）的，这个我这里不能告诉你。我们是以法律为主，法律是这样，我们要照办；超过这个东西，我不能承诺。”

整个沟通，除了公积金补缴年限可以追溯到 2010 年 12 月法律实施的时候，其他的都跟以前一样，只能补两年以内的。工人甚至私下议论，认为政府部门被资方收买了。

晚上，资方再次找来物流公司人员来拉货，被工人阻拦。资方报警后，来了十几、二十个巡逻，还有带着枪的警察。这次来的人最多，不过工人也不怕。工人跟他们讲了罢工的情况和诉求。带头的一个治安人员喝了点酒，跟工人说：“我们的职位也只有这么大，管不到这么多事，就是维护下治安。厂里也是违法，你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对的。”总经理看货还是出不了，生气地抱着手走开了。警察和村委巡逻的人走了之后，又来了两个戴着“巡逻”袖章的老头，说是来工厂守夜，以防工人在厂里闹事。他们还跟工人诉苦，昨天另外一家工厂罢工，也叫他们去守夜，喂了一个晚上蚊子。工人那天晚上做了黄豆炖猪脚，还给两个来守夜的人一人盛了一碗。

此前，工人在白布上手写“还我社保，还我住房公积金”、“工作辛苦十余载，一头青丝变白发”，制成条幅挂在厂门口。傍晚总经理报警后，村里巡逻的人过来时取掉了，称：“挂在那里难看”。



（工人在厂门口挂的条幅）

第九天（5月7日）

5月7日下午五点多，资方贴出一张通知，将前一天劳动局回应工人的内容都写了上去，谎称是跟工人代表协商达成的协议：“以上是经过和员工代表协商认可，在此之外的如有异议，大家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工人怒撕通告，找总经理理论。总经理又称，该通知是劳动部门出的。该通知还要求：“员工必须马上上班，不得影响公司正常运作及进出货。三天内正常上班既往不咎，三天内未正常上班的，自公告之日起视为旷工，公司有权依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的规章制度处理。”

工人撕掉通知后，继续罢工。

第十天（5月8日）

维权打油诗（一）

本人今天四十五，维权罢工好辛苦
老板躲避不见面，经理总想捞好处
十日协商无结果，经理急得找政府
政府出面搞不定，违法哪能打马虎
无奈又来求代表，让我出货我作主
多次用计被识破，又让警察来吓唬
警察看了扭头走，工友拍手经理哭

维权打油诗（二）

十天维权慢悠悠，老板躲避不出头

经理急看要出货，一哄二骗三忽悠
本是七号出粮日，八号公告无理由
问他缘由难辩解，老板上海参展后⁸
如今物价见天涨，家有老小难护口
工友维权齐守厂，你拼我凑齐动手
采摘野菜为活命，罢工维权何时休

（工人代表悦姐，发于个人微博⁹）

A 厂一向是每月 7 号发工资，已经到了该发工资的时间，可大家都没有收到发工资的短信。下午贴出通告称将于 5 月 11 日发放。

下午三点二十，总经理召集工人开会，工人没去。工人觉得总经理是要把他们引开，好搬货出去。后来只有一些总经理的亲戚去开会了。工人代表小原也跟去了，他站在总经理旁边，用眼睛瞪着那些去开会的工人。总经理说今天必须要出货，如果出不了，客户那边会罚款。讲完后就回了办公室。

外面，总经理的儿媳带着孕妇去现场准备出货。这一部分前面有详细介绍，就不再复述了。孕妇回去后，总经理又带着主管们出来了，准备用小商务车把货拉出去。曾做过基层管理的工人代表小原，当着总经理面大声质问几个主管：“你们几个主管跟我们对抗还是跟老板对抗，今天随便你们，我看你们是做汉奸还是做共产党！”其他人也在旁边劝说他们：“都这个时候啦，你们还要护住老板？你们想下你们的后果，以后万一我们走了，老板会留你们在这里做吗？！他会一个一个收拾你们的。”总经理见状又回了办公室。

工人听小道消息说老板次日就会回厂。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罢工和交涉，工人已经不再相信总经理了，都希望老板来了能有个结果。

⁸ 指 5 月 13 日上海展销会结束后

⁹ 工人代表悦姐罢工期间她写了十几首打油诗发在自己的新浪微博。

这天，包括副理在内的两个管理，在厂内打扫卫生。工人更加确认老板要来了。

第十一天（5月9日）

听说老板回来了，但并未露面。工人在工厂守厂。有人提议打麻将，最后没有打。大家还是保持着警惕的，一有风吹草动，立马通过QQ群、电话、微信互相通知。

第十二天（5月10日）

维权打油诗（三）A厂罢工维权政府出面应该如此吗？

社保本应早该买，只赔两年不应该
住房公积金政府事，为何我告你才来
铁皮¹⁰高温本应给，两年补偿何由来
超时加班十多年，也是两年来交代
五六十人共一厕，男人进去女出来
年休五天早规定，却把工人当傻呆
就补二年不同意，政府到底为谁来
婚丧证明早给你，却讲男该女不该
儿女都有继承权，工厂报销耍无赖
三八节日早已定，却说法规不存在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署
你来调解不依法，工人谁不把你骂

¹⁰ 指厂内的铁皮房，里面温度很高。

（工人代表悦姐，发于个人微博）

第十三天（5月11日）

维权打油诗（四）心在烧心在跳，这种作法搞砸了（节选）

如今维权十多天，老板躲着不见面
叫了两个律师来，一个不管二使坏
早上指脚又画手，工友不怕他气走
下午叫来黑社会，来抢产品他不对
我们工厂我当家，老板这样他违法
工人心急先报警，这种作法实不行
要想解决要诚意，老板不来事不平
律师讲那明天看，还让政府来转弯
警察听了也说行，他没违法不抓人

（工人代表悦姐，发于个人微博）



（5月11日不明身份人士到厂内抢货现场）

5月11日可能是整个罢工期间，除了最后一天抓人之外，最严重的冲突。上午，一个自称公司法律顾问的男子来到厂里，大声喊着要求工人去开会。语气嚣张、强势，称“开会的算上班，不开会的算旷工。”但工人气势也不弱，要求他出示授权书，没有授权书就不承认他的“法律顾问”资格。当时总经理就在他旁边，也没有说什么，不过就算他说了也不管用，工人一口咬定没有授权书就不跟他谈。“法律顾问”说授权书在车上，离开了一会儿。再回来时，还是没有授权书。

下午，“法律顾问”带来了6个身上有纹身的彪形大汉，还把一辆小型货车开进了仓库。彪形大汉抽着烟，下身着短裤、上衣掀起来露出白白的大肚皮。“法律顾问”称他们是公司的新员工。工人立马警戒，女工们一个挨一个围着货坐成一圈，男工则在外围用手机准备拍照和录像。不知是谁报了警，一个警察也来到了厂里。不过警察从头到尾都只是看着，并没有介入。

“法律顾问”指挥大汉们去搬货，女工们手挽手站了起来，不让他们搬。工人表示：“说这些货是我们做的。我们不认识你们。我们得保护公司财产，不可能让你随便把货拿走。”对峙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瘦小个男子，拨开了一名女工跳上了货堆。女工大喊：“打人啦！打人啦！”瘦小个爬上货堆就开始搬箱子，并越过女工们的头顶扔给了外围的几个壮汉。壮汉们则把箱子搬上车。女工们都掂着脚、举着手去抢箱子。两个男子指着女工的鼻子大声喊着什么，不过这时候场面很混乱，谁也不管谁在喊什么。另外一个男子也开始去搬货。几名女工则爬上了他们开进来装货的车，另外几名女工则爬上了货堆。货堆和货车，都被女工占领了。

这些大汉们只是受命来搬货，何况旁边还有警察，并没有真正打算跟工人起肢体冲突。女工们七嘴八舌大声叱骂这些来抢货的人，大汉们只好停了下来。其中两个胖子还开始笑，大概他们本来打算只是装一下样子，吓唬一下女工，把货拉出去就能完成任务了，根

本没有预料到女工会如此团结。总经理不跟工人直接交涉，而是站在背后跟抢货的大汉们说：“今天货必须要出。”收到命令后，他们又开始把身边的一些箱子往旁边另外一辆商务车上搬。

抢货不成，“法律顾问”只好带着六个壮汉离开了。

工人去派出所报了警。警察表示：“你们放心，明天会有五六个部门来处理，如果今晚有人来，马上打我们电话。”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否那个时候政府已经开始准备打压工人了呢？

这次空前的紧张气氛，也让工人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我们说，今天的力量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今天看到我们 A 厂的员工都是真正的能豁出去的人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员工代表二月）。工人代表阳姐在 A 厂干了将近十年，她表示，工友们从未像这次罢工中如此团结过。以前大家连聚会都很少，下班了也是各回各家，感情没有特别深厚。这次罢工，大家为了相同的目标，一起打地铺守夜，买菜在工厂做饭吃，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工人们轮班守厂，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守厂的人一吆喝，其他工友也会马上过来。有一个女工友只在厂里做了几个月，有一天晚上听说厂里有动静，听到消息后冒雨骑自行车赶回厂里跟大家站在一起。

到这个时候，工人的信心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一次又一次顶住了政府部门的压力，一次又一次地挡住了前来抢货的各种不明身份人士。警察也一次又一次表示不会介入劳资纠纷。工人认为，只要坚持，一定会胜利。

第十四天（5 月 12 日）

头一天的冲突中，工人代表霞姐在冲突中被货砸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要求总经理派人带她去医院检查。后来总经理派了一个生产主管带她去医院。经过检查，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挫伤”，

开了一些药。虽然厂方同意她回家休息，但她还是到厂里跟工人一起守厂。

一日无事。工人们还在讨论头一天抢货的事情。男工夸女工们是“现代花木兰”。

第一阶段小结

这一阶段，资方虽然强硬，但也很狼狈。老板从台湾回来后，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那么他到底在做什么？也许在指挥总经理对付工人和出货；也许在积极游说各部门，要求政府强力介入罢工，恢复工厂秩序。这一切我们都只能靠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板肯定没有闲着。

罢工期间，工人实际上控制了工厂，阻断了生产，并且不允许出货。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罢工，但不支持罢工，甚至反对罢工的工人和管理层，事实上都起不了任何作用。而同为工厂最底层的保安，也用行动支持罢工工人。有工人代表提到，以前总经理进工厂，保安都要向他们敬礼、问好，给他们开门。而罢工后，保安连门都不给总经理开了，他们表示，工厂现在工人说了算。这也是他们后来被调岗，工厂用六个保安公司的保安替代他们的原因。

工人信心的来源，除了现实中的力量感——用身体阻止资方和黑社会出货；对老板的幻想；还来自其他工厂的经验（附近其他工厂搬厂，工人的诉求得到了满足）；以及公安、政府部门貌似中立的态度：这种劳资纠纷，我们不管。

罢工，意味着秩序的变化，劳资关系的翻转。日常工作中，资方是绝对的控制者。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售者，连带身体、自由和尊严，一起出售给了资方。在这个案例中，大部分受访工人都表示，如果有足够加班，工资不受影响，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忍受的。且不

说长期不为员工缴纳社保、公积金，即便是遇到大龄女工被劝退、老实员工受工伤得不到处理、上厕所受限制、关黑屋子、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问题，也只是默默在员工心里累积了怨气，直到工资降低甚至工作不保，工人才开始团结起来抗争。

一场罢工，一旦形成几个比较强有力的核心，构建了一整套话语，就能吸引到哪怕是最为保守的一群人参与。而那一套话语，其实包含了工人对自己权利的理解，和基于这种理解之下的一种群体自信。在中国，是没有罢工违法一说，而且罢工也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情。但即便是这样，工人也需要一种**正当性**，这样才能说服自己和别人参与。这种正当性，可以是法律的，也可以是道义的。比如说工厂没有给工人依法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是违法。当地政府基于利益进行曲解，认为养老保险最多补缴两年，工人就要求超过两年的部分进行折现补偿。工人罢工、堵厂门、阻止出货，实际上颠覆了工厂的日常管理。但在他们看来，因为产品是工人生产出来的，现在工厂违法，又不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工人不让出货也是正当的。



罢工第二阶段：溃散

第十五天（5月13日）警察涌入厂区抓人

早上上班带同事，前去报案要回执。
厂方叫人伤她了，昨天检查要报销。
工友都在厂里面，劳资纠纷来维权。
老板叫来百警察¹¹，他们要钱把他抓。
先把代表开除掉，其他不赔也好搞。
工友维权有错吗？警察为何把人抓！

（工人代表悦姐，发于个人微博）

工人们听说老板5月9日就回来了，但一直没有露面。政府部门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表面同情，慢慢变得不耐烦，甚至警告工人不要违法。5月11日的冲突，是否让政府下定决心要压制工人，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政府要出手了。工人的信心和斗志也将在被镇压之后从峰顶跌至谷底。

5月13日一大早，厂里就来了十来个戴着“治安巡逻”的红袖章的人；后来又来了六个保安公司的人，带头的穿着便衣。过了一会儿，公告栏贴出两张公告，一张是开除六名工人代表的通知书；另外一张是更换保安的通知书，将原来的三名保安调离门卫室，由保安公司调来6名新的保安代替。通告贴完后，总经理又叫人开着货车进了仓库。

¹¹ 实际上警察的人数并不多，大部分是“机训队”和带“治安巡逻”袖章的人员，他们听从警察指挥。

平常搬货，总经理都是指挥别人动手的，这一天却跟他的儿子——工厂的经理——亲自上阵了。工人还没意识到这个变化，或者说意识到了，但没有深思。她们像往常一样围住货不让搬。总经理搬了一个箱子。一名女工过去抓住不让搬，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在旁边立即摠住了女工。女工大喊“打人了！”，并转而抱住了经理的腿。另一个女工则抱住了总经理儿子的腿。戴红袖章的人掰着女工的手指和胳膊拉了一会儿，没有成功，就慢慢松开，站在旁边看着。两个便衣男子开始用摄像机摄像。不知是有人报了警，还是警察早就在外面等着了。大概五六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为首的是当地派出所所长¹²。所长进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卷着的 A4 纸，对工人大声喊着：“你们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法¹³”（没错，这所长把法律的名称都说错了）。然后在车间里转着喊：“该搬货搬货，该生产生产，马上恢复正常。”



¹² 在 11 日劳资政谈判中，每当遇到因为劳动站站长强势压人，工人大声反驳而要进入僵局时，这位所长多次出来扮演调和的角色。而抓人这天，所长几乎是马上变了一张脸。

¹³ 应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这时陆续涌进来上百名身穿制服、肩章和背上都印着“机（×区）训”的字样的人员。据代表 P 说，“开了两个大巴车，可能有 90 个人左右吧，加保安十多个，治安巡逻的几十个，派出所的民警、便衣警察那些，全部加起来，最低都有一百二十个人。”工人总共五十来人，而国家却派出了两倍以上“兵力”来协助资方出货。工人有些傻眼了。

几个便衣和警察都现场录像。工人纷纷也拿出了手机拍照和录像。但很多拍照的工人也被带走了。一名女工正用手机录像，警察说了一句“这个也带走”。女工大声质问：“为什么你们可以拍视频我不可以拍呀？！”但还是被带走了。工人代表 P 也拿着自己的家用摄像机对着现场录像，被警察发现后，几个人跟着追。最后五六个人按住他，制服后押上了警车。另外一名工人代表 U，一直站在外围，既没录像也没拍照，但他还是被抓了。他回忆当时被抓的情形：“我一直在看那个派出所所长，他认识我。我刚好从厂里出来，在大门口，他看到我了。他说代表，你跟我走，跟我上车。我想着跟你上车就上车嘛，有什么关系。我以为只是到派出所去调查一下事情的原因，录一下口供嘛，不知道要把我们关一个晚上。早知道打死我也不去了，妈拉个巴子。”另外，抱总经理父子俩大腿的几名女工也被抓了。

现场一共 9 名工人被抓，除了代表 P 和 U，其他 7 名为女工。其中 4 人是代表，另外 5 名是工作一年左右的新员工。抓人后，机训队就一排一排地站在剩下的工人面前，防止他们去抢货，直到资方出货完成。

另外一边。由于工人代表霞姐在 11 日的冲突中受伤，悦姐和小原（均为工人代表）陪她去派出所报案并索取回执，刚好避开了警察在厂里抓人的一幕。还有一名代表阿红，因为平时比较老实本分，在冲突中也没有很激烈的行为，所以没被抓。

三名刚从派出所回来的代表接到通知，他们已经被开除，不能进厂。剩下的员工在厂里没了主意。很多女工坐在那里哭，心里既委屈又愤怒。一个一向老实本分的员工说：“我都想把派出所给炸了，我们又没犯法，凭什么这样子抓人！”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蒙，不过很快就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一些工人去找

总经理要说法，总经理没找到，却碰到了5月11日带人抢货的“法律顾问”。下面是他们交涉的部分记录：

工人：我们没有带头的，都是维护自己的权益。

顾问：如果开除的错了，你去申请仲裁，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双倍哦。我告诉你，法律有规定，如果错了，双倍，明白不明白？

工人：等一下，这几个人是有双倍的赔偿金，是这个意思吗？

顾问：如果企业做错了，开除错了，可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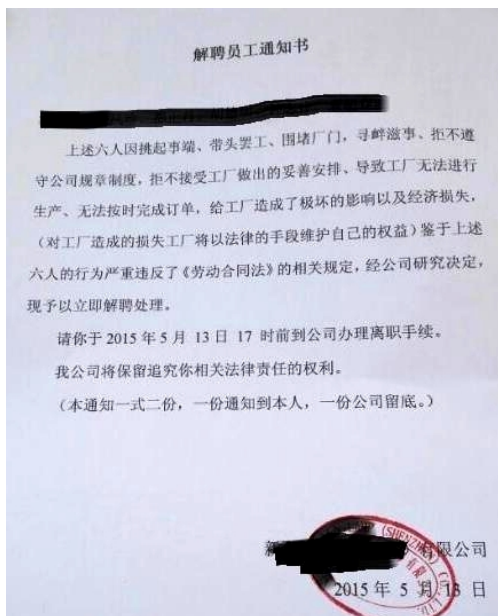
工人：先不要说钱，你是律师，你把她们请回来。

顾问：我请回来是吧？我到哪里去请？

工人：那是我们的员工，是我们的同事。她们有困难了，我们都跟她们站在一起。

顾问：真的？所以你们很团结是不是啊？实际上，没有任何必要。

工人：你听我说，当初是D总让我们选出代表去跟他谈，她们没有



带头，都是维护自己的权益，每个人都是代表。你把我们的同事请回来。

顾问：放回来？我来协调，行吧？

工人：可以啊。

工人：那你还有把这个公告¹⁴……你说怎么办？

顾问：怎么办？开除了就是开除了。

工人：那她们 6 个人是干嘛了，为什么要开除她们啊？她们犯什么法了？

顾问：这个写的也很清楚：挑起事端，带头罢工……

工人：全部（工人都）罢工，不知道吗？

顾问：我告诉你啊，小妹呀，维护你的诉求，要通过正当途径。

后来也没谈出个结果，“法律顾问”就借口总经理找他，离开了。



¹⁴ 指开除工人代表的公告

中午，工人在附近的公园碰头，决定下午集体去派出所要人。工人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一个挨一个坐着。后来那个带头去厂里抓人的派出所所长来了。他质问工人：“你们这是在干嘛啊？是在向我们示威吗？！”男代表小原过去解释：“我们想知道我们（被抓的）员工在这里什么时候出来，要有个结果，人有没有受伤”。所长说“你们回去吧，坐在这里没用的”。

除了在派出所等待，工人代表小原跟一些工人去了区内的其他部门，比如区公安分局投诉科、检察院、关人的派出所等。小原觉得有点“稀里糊涂”的。大家心急又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该找谁，反正觉得相关的部门都去一下，至少比坐在那里干等好些。

其间，两名组长订了三十份快餐，一人一瓶水送过去给工人。

晚上派出所所长看到工人还坐在派出所外面，就把小原叫了过去。在小原的要求下，见了代表二月和阿志。见完后，所长说，“人给你看到了，没事了，你们先回去吧。人明天早上会送到厂门口的”。大家这才各回各家。当问及代表被抓是否感到害怕，员工代表阿红说：“我们怕还是怕，但我们代表的心还是连在一起的。当时我们恨不得抓进去的是我们，能放他们出来我都情愿换他们出来。”

关于被抓的人在拘留所的情况，他们的口述里面有清楚的讲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第十六天（5月14日）

我们维权不犯法，糊里糊涂被人抓
工友见状心难受，我们陪你大门口
派出所长慌了神，明天早上就放人
抓了九个放了七，两个不放是何意
派出所里蹲一夜，连个证明也没给

你们这样抓工友，工厂辞退找理由
授权选的六代表，全部都被开除掉
老板违法赔两年，有谁不服上法院
你们维权就这样，逼死个人也无防
如今法制管天下，求求政府说句话

（工人代表悦姐，5月14日发于个人微博）

抓人后，工人的步伐开始乱了。一部分员工回到厂里，打卡但不去车间做事。大部分人则在外面继续行动。

被抓进派出所的几名工人分别录了口供，又叫他们写悔过书，说写了就能放他们出去。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写。工人代表阿志很快写了一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抢货这种行为。另外几个不会写的赶紧照着抄。14日上午11点多，派出所陆续放了7个人。抱着总经理大腿不让出货的女工代表阳姐和一名女工芬姐则迟迟没有放出来。

外面的工人并不知道被抓的工人什么时候会放出来。代表P出来后立马给他们打了电话。三十多名工人步行去接他们，见面后众人相拥而泣。

厂方贴出通知，称：“提前十分钟加班及高温补贴等，将按之前公告之规定，在员工签字后7个工作日内发放至员工银行账户。”工人的银行卡也收到两笔钱，大概三四千元不等，估计就是公告的提前十分钟的加班费和高温津贴。工厂同时警告：“请其他员工正常上班，尽快回到工作岗位，公司对以往的行为既往不咎。如不正常上班，则按旷工处理。”企图以此分化瓦解工人集体，破坏工人团结。工人坚持共同进退，不达目的不复工。不过一些新员工对资方已经彻底失去信任，萌生去意。

第十七天（5月15日）及之后的情况

5月15日，工人再次发出联名信，要求让工人代表无条件复工，及重启谈判。虽然经历了工人被抓，而且还有两个人没放出来，但此时工人还是紧紧地抱成一团，签联名信时，仍有48人署名。



5月18日，资方再次开除7名工人，其中1人为工人代表。至此，应厂方要求选出的9名代表，除了一人因为家庭经济压力退出，一人因为平常比较老实没被开除，另外7人都被解除劳动关系。工人前往当地劳动站求助，要求劳动站出面，找资方出来跟员工谈判。总经理来到劳动站，表示老板已将此事委托给律师，次日律师会来劳动站跟工人谈。19日，资方律师并未出面，并表示让工人去仲裁，劳动站则表示“老板躲着，我们也没办法”。

经讨论决定，未被开除的员工先回厂里；被开除的员工在厂外，找劳动部门要求资方出来谈判，同时准备走法律途径，申请仲裁，

为被开除员工和被拘员工讨回公道。5月19日，最后2名被抓的工人获释，其余工人复工。

让未被开除的员工复工，这是工人集体决定的，一方面避免资方更大规模解雇工人，另外一方面，想让先把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补上再说。一些人表示，补完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就辞工。工人复工后，资方并没有立即打击报复，而是给他们安排加班，稳住工人。老板最清楚，工人只要有加班，有钱赚，别的事情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虽然心里有很多委屈、不满，但钱还是要赚，日子还得过。所以一些工人留下来继续工作，也不打算辞职了。

抓人之后，原本期望通过集体的力量让被开除的积极分子和工人代表复职，并重启谈判。不过，这个时候工人手里已经没有了筹码，厂内工人行动能力也有限。资方可以继续以各种理由搪塞工人。总经理再次改口，称老板已经授权给律师，自己做不了主。

去政府部门，也只是没完没了的各种投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口头表示同情和支持工人的诉求，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程序走起来是漫长的。工人最不愿意走的就是法律途径，他们很清楚，打官司司拖的时间长，而且就算赢了，老板不给钱，还可以继续拖。更何况打赢官司的机率并不大。

剩下的工人，行动了一段时间，看不到希望，就开始退缩。一些年纪较轻、工龄短的工人，找工作也比较容易，就离开了工厂另谋生路。而那些年纪偏大，35岁以上的工人，本来平常就老实本分，又担心工作不好找，就留下来继续做。

厂方虽然同意了补缴社保和公积金，但还是给被开除的人设了种种限制。有的人想着两年的养老保险补缴了也没有有什么用，还要自己掏钱，就只想补住房公积金。按说这是没问题的，因为社保和公积金本来就不是一个部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资方却告诉工人，厂里的人可以只补住房公积金，不补缴养老保险，这样厂里也能省一笔钱；而被开除和离职的工人，却必须两样一起补交。

另外，他们被开除的，照理来说是有失业金的，虽然钱不多，但好歹也是钱。但厂里和政府部门都告诉他们，如果领了失业金，就不能补缴养老保险了。

打官司，以及工人的矛盾

工人在罢工期间就已经了解到，法律程序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利的，花时间不说，最后也不一定能够拿到钱，所以他们都希望用集体的力量逼迫老板出来谈判，最终达到他们的诉求。不过 5.13 抓人之后，这个希望已经破灭，资方根本不再理会他们。在工人看来，这个时候除了打官司，也别无他法了。而且，时间拖得太久，没有工作，大家也很难再坚持下去。

到 5 月底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去做临时工，如果维权的事情有需要，就跑一趟。阳姐抱怨说，临时工也不那么好做，人家都希望你去了能连续干上一段时间，一天去、一天不去，很多工厂都不愿意要。而他们这种四十岁以上的，不管是男工还是女工，都不太好找正式工作了。到六月初，8 名工人代表中，两个人回家，一个回厂上班，一个找了新工作，剩下四个四十多岁、不好找工作的继续在外面跑。总之，对工人来讲，这个阶段，打官司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机构有着明显的分歧。

机构对打官司是不抱期望的，也很清楚不太可能赢，只是想借这个动作争取时间，把工人的队伍继续维系在一起，同时做一些其它的事情。机构也知道工人的想法，但这个矛盾并没有公开来讲，因为机构觉得，很难叫工人仅仅为了控诉、揭露，去打一个不会赢的官司。

最初机构推荐了一个曾经在人权领域工作过的肖律师。不过一

些工人觉得这个律师比较年轻，而且沟通比较困难。工人把打官司当作救命稻草，希望很多问题尽快跟律师沟通清楚，但对于律师来讲，这只是他众多官司中的一个，并没有跟工人同等重视。工人经常给律师打电话，律师总是很忙，要不是没接电话，就是接了电话也没详谈。加上找律师期间，机构工作人员去江西考试，离开一段时间。回来后，有时候也联系不上。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工人对机构和律师的不满，他们觉得律师和机构不重视他们的事情。

在是否信任机构方面，工人分了两派。杨姐、二月、大侠等人比较信任机构；悦姐、小原、阿志等人跟机构没那么熟悉，也没那么信任。在联系肖律师和机构存在困难那短时间，悦姐另外找了律师。据她说是路边看到，然后进去跟律师谈了一下，里面的律师还是她老乡。那个律所的律师声称，他们打官司只收一人 1200 元，通过调解，一个月就能搞定。据律所称，他们跟村委很熟悉，所以有机会调解解决。悦姐跟其他代表说了一下这个情况，除了本来就跟机构不太亲近的一个代表，就连最最信任机构的阳姐，以及霞姐，几乎都决定要跟悦姐一起另找律师了。二月应该还是希望找机构推荐的肖律师，另外一个女工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不过那个时候，机构工作人员小成要去外地考驾照，大家都比较着急，就拿上资料去找那个律师了。在谈的过程中，律师在费用方面又改口了，说仲裁、一审、二审各收一千，最后如果要强制执行，还要提成 15%。阳姐算了一下，如果赢了官司，她自己那部分赔三万二，提成就要四千八，加上前面的三千，就七千八了。女工阿慧的诉求金额本来就只有万把块钱，算下来她要出四千多块，她表示：“又没有说百分之百能赢。赢的话我赚五千，输的话我要赔几千呢，那我还不如不搞呢。”算起来，这个律师的费用比起机构推荐的律师，贵得多。而且，这个律师一开始说得非常浮夸，各种不切实际的承诺；第二次见面却说得非常困难，费用也大大增加。就这样，工人又开始打退堂鼓。

就在同一天，肖律师知道他们要重新找律师，也有点着急，赶紧给工人打电话，一连打了好几个都没接。工人想着，以前联系你怎么都联系不上，心里有一口气，不愿意理他。大概是考虑到新找的律师也不靠谱，还不如找机构推荐的律师，所以后来还是联系了肖律师。

肖律师的收费，之前是说一人两千，13 个被开除的工人准备打官司，一共收费两万六。后来有 4 个人退出，其中一个只工作了半年多，本来就赔不了多少钱；一个回了老家；一个打算做麻辣烫生意；还有一个因为律师费而退出。

因为律师费而退出的阿慧，工龄比较短。她认为工龄长的人金额多，工龄短的人金额少，应该按照工龄长短来计算律师费用。而这样，工龄最长的人可能要交三四千块，人家也未必同意。最后还是按照律师的要求，一人出两千。阿慧退出。

决定请律师后，又发生了一件大家都没有料到的事情。工人代表的核心之一，二月，回老家了。照理来说回老家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一回去基本上就联系不上了。工人代表之间本来就有了各种矛盾，他这个纽带没了，工人就更散了。我们从二月老婆（也在 A 厂工作）那里了解到，二月的妈妈在家病重，多次打电话给二月。当然电话里并没有直接叫他回去，而是说“你不回来也可以，等一下出太阳我就慢慢地爬过去（看医生）”。听到这种话，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坚持不回去的。其实之前二月的哥哥嫂嫂他们就多次劝他不要出头。不管有多大的矛盾，就算不看总经理的面子，也要看表姐的面子。二月妈妈病重，他哥哥嫂嫂都不回家，就叫他一个人回去，而且还是用那样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方式逼迫他回去。我们也有理由联想，也许是总经理间接给了二月家里压力，二月的家人又逼迫他不要再积极参与维权。再加上本来维权看起来也没什么希望了，二月顺势也就慢慢退了。

6 月 18 日，9 名被开除工人向当地劳动部门立案仲裁，要求工

厂支付违法解雇的双倍赔偿和一个月代通知金。7 月开庭，仲裁驳回工人诉求。后来一审二审均败诉。工人一分钱没有拿到。

被抓的工人对当地派出所的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来也败诉。

男工和女工的分工

A 厂的工人，女工居多，男工较少。工人代表中这一比例也很突出，最初选出的 9 个代表里面仅有 3 名男工。由于之前的经验，工人心里都比较清楚，资方也好、警察也罢，其实都不会真正对他们动手。所以在每次起冲突的时候，往往女工站在前面；男工主要是拍照或者靠边站。刚开始的一些冲突，比较儿戏，一冲突总经理就报警。久而久之，工人潜意识里觉得，总经理就这点手段。5 月 11 日的冲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激烈，女工面对的是六个不明身份的彪形大汉，从体力上来讲她们是弱势。但气势上女工不输敌人，不但敢于大声斥骂那些来抢货的人，还直接动手去夺回装货的箱子。在 5 月 13 日政府介入抓人的当天，站在前面的也是女工。男工代表 P 是因为录像被抓；另外一名男工是在外围围观，准备离开现场时，被警察骗上警车的。

很多罢工中，都会安排女工站在最前面，这个策略可以避免快速、直接、严重的冲突和打压。一旦发生冲突和打压，工人的信心会受到打击，甚至导致工人队伍被打散。不过，如果政府决心介入了，男工和女工站在前面，唯一的区别可能只是冲突的严重程度。在 5 月 13 日的抓捕过程中，男工 P 只是因为录像，被十几人围着，最后按在地上制服。女工则比较少大力反抗，一般一两个人就能对付。



（十多人上阵制服摄像的工人代表二月）

工人代表的作用和分化

A 厂这次维权中产生的代表，虽不是正儿八经公开选出来的，但普遍是大家公认敢说敢做、有社会经验的人。每个人各有个性和特长，分工也比较明确。

前面提到的阳姐，在选代表的时候，被推举做首席代表。一方面是因为比较早接触劳工机构，对工人权益有一定认识，对劳动法律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罢工之前，她在工厂也做了很多事

情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其他人的士气，展示了一种反抗的可能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阳姐跟机构有联系，如果她做首席代表有利于得到更多外界的援助。阳姐之前在机构参与各种活动，一定程度上给了她发挥的空间，她个人也得到一定的成长。后来又在机构的帮助下，开始从一些小议题开始抗争，慢慢带动全厂的抗争。到后面罢工，甚至也可以说是在她的带头之下搞起来的。也是因为她，机构才有机会介入这场持续半个多月的斗争。不过，随着斗争的持续和深入，阳姐的局限也慢慢显现出来。她的个性和能力并不适合做工人领袖。工人把她摆在首席代表的位置上，主要是因为她跟机构的联系，和罢工之前的付出。罢工期间，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当她无法胜任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然后就会开始抱怨。抓人之前，她的抱怨是觉得自己做得比较多，别人做得少，别人不理解自己之类的。而抓人之后，她的抱怨又变成觉得大家都在孤立她，什么事都不通知她。不过虽然她有各种抱怨，但在机构工作人员面前，总想表现自己“正能量”、积极的一面，好像一个小学生希望获得老师的认同。

工人代表里面，阳姐和悦姐的矛盾是最明显的。悦姐在工人当中算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读到高中毕业，以前在其他工厂还做过中层管理，有能力、有想法。平时喜欢写点东西，还有记日记的习惯。悦姐刚进 A 厂一个月，管理层还提出让她做组长，不过当组长不仅要熟悉全部二十几个工序，还要会修机器，她就不干了。悦姐这个人比较精明，愿意跟工人集体站在一起，并且在各种行动中都积极主动。她很清楚，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会让个人的利益变成现实。她也很清楚，阳姐其实并没有与“首席代表”相称的能力，经常跟阳姐针锋相对，讲的话看似有理，但缺乏基本的包容和理解，不利于团结。

面对这种情况，工人代表霞姐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工人之间彼此爱说一些闲碎话，她可能平常也有这样的习惯。但在集体行动

中，她更能站在集体的角度考虑问题，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如何跟其他代表和工人沟通，以保持更大程度的团结，这方面她可能更在行。霞姐作为一个工人代表，可能在A厂的所有代表中，是最为合格的。机构工作人员评价她“是典型的工人领袖”。她点子多、敢说敢做、有社会经验、在工人中有凝聚力。由于社会经验丰富，以及在工厂工作时间比较长，她对形势判断也比较准确，因此不会抱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以前主管也推荐她做过组长，但后来干了不到半个月，不愿意受夹板气，就不干了。她说：“我这个人好交友，本来跟大家相处得很好，因为当组长，大家都用敌视的眼光看我。我就交钥匙了，不干组长了，不适合我。”她老公曾在工厂工作过几年，后来去了别的工厂。她儿子在罢工期间还在工厂。不过他儿子并不是很积极，有时候也会因为担心她的安危而劝她不要太冒头。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人代表，男工二月。他跟总经理也算沾亲带故。他和他的哥哥、嫂嫂、老婆、妹妹、表姐等人都在里面工作过。他之所以积极参加，一方面是对总经理本来有着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罢工让他看到了某种实现自己权利的希望。对总经理的不满，是因为长久以来积累了各种怨气，用他的话总结就是：“总经理不把我们当亲戚看”。第一，作为总经理小三的亲戚，他们拿的奖金普遍比总经理儿媳的亲戚少一两百块。第二，总经理非但不给普通工人批假，连他们兄弟这种亲戚，家里父亲病重了都不批假。第三，之前二月兄弟两个知道厂里食堂要承包，后来总经理承包给了一个“外人”，而没有承包给他们，这也让二月兄弟俩很愤怒。

在罢工期间，二月的主要任务是“对外联络”，也就是跟机构，和机构介绍的媒体，以及其他团体进行联系。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不仅仅做了对外联络的工作，在内部也起到了很好的团结的纽带作用。他对机构比较信任，几乎跟阳姐一样信任。一般机构有

行动或者策略上的建议，他都会积极去跟其他代表和工人做沟通和解释工作。所以机构工作人员后来联系比较多的就是二月，甚至超过了首席代表阳姐。不过二月本人跟阳姐关系也比较好，他这个人不爱说闲话，做事从大局考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阳姐甚至有点依赖他，有事都会跟他讲，跟他商量。其实，直到被抓后，他都还有很大的决心要继续维权。5月24日，前面提到的那家鞋厂几名工人代表跟一些工人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二月去参加了。现场一位工人代表表示“我愿意（为工人）挡子弹！”的时候，二月也站起来说“我也愿意（为工人挡子弹）！”所以后来二月后来不明不白退出，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另一位负责内部联络工作的代表小原，他的作用主要是信息传达、工人召集等。他以前是做组长的，每个月奖金都有一千五百元，后来没做了。在罢工的前期，也很积极。不过5.13被打压后，慢慢也失去了当初的激情。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5.13抓人后，本身有一些害怕；另一方面，机构工作人员主要跟阳姐和二月联系，他本身不太了解机构的思路，加上有时候他去联系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老联系不上，心里就有了更多的疑虑。他提到，有一次去找机构工作人员，打了六次电话都没人接，而且对方也不回复电话。后来在跟律师联系的时候，律师也老不接电话。直到他们决定换律师的时候，那个律师才打电话来跟他们沟通。

还有一名男性工人代表阿志，四十岁出头，在厂里干一些杂事，因为是男性，为人比较鲁莽，据说老板都比较怕他。另外，老板对二月和小原也比较客气，也许是因为A厂女工比较多，而这几个男工比较敢于跟老板争论。所以他们三个都被选作代表。但并没有证据表明阿志在罢工期间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每次发生冲突的现场，都是女工站在前面，男工在后面。而当老板想给工人传话的时候，总是找阿志和小原这两个男工。

政府的角色及对罢工的影响

罢工第一阶段，政府各部门基本上是各行其是，并没有统一的行动。公安部门关注的是，工人是否有打架斗殴、堵路上访等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没有的话，顶多告诫两句，不会主动介入劳资纠纷。

罢工后，劳动部门很早就到了工厂，但老板不在，总经理也经常不露面。他们到工厂除了照本宣科告诉工人所有诉求都只能追两年外，还私下告诉工人，法律强制规定的之外，可以跟老板协商，用现金的方式补给工人。当然这一说法在5月6日被劳动站站长收回了，至少在养老保险方面，不同意工厂以现金的方式补给工人。对于工人的罢工和守厂行动，他们也警告过工人“过火了”，还说“旷工”超过三天可以算工人自离。但他们实际上是不能、也没有手段强制工人复工的。对于工人的罢工更多是默认的状态。

当地政府也一样，只要工人不影响社会治安，基本上不管。在整个罢工期间，只有一天晚上派出了治安巡逻到工厂守夜，发现工人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就作罢了。而代表政府部门的治安巡逻人员，作为“临时工”、底层工人，他们理解工人的诉求，并私下口头表示支持他们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

出现上面这种情况，是因为政府还没有下定决心介入这场罢工。在珠三角，遍地是工厂，罢工有时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很多是几百、上千人规模的工厂。政府也好，工人也好，对罢工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值得立马警惕的。A厂罢工的人数少，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在机构的建议下，放弃了上访、堵路等可能引起政府马上打压的行动策略。整个罢工比较平和，对社会也没什么影响。

几乎同一时间，在广州的一家有两千七百多人的鞋厂里面，发生了半年来的第三次罢工，情况跟A厂类似，他们要求工厂支付搬

厂的经济补偿金，以及补缴入职以来的养老保险。不同的地方在于广州的那家鞋厂已经明确通知要搬厂，而 A 厂还停留在猜测。这家鞋厂的罢工虽然没有主流媒体的报导（估计是因为政治压力），但因为人数多、斗争复杂（从最初酝酿到 5 月份，共经历了三次罢工，六次谈判），以及劳工机构高调介入，几乎吸引了所有的关注工人斗争的力量。相较之下，在国内只有一家劳工 NGO 和一个微信公众号在关注 A 厂工人的斗争。

后来之所以政府会介入，一方面应该是老板跟相关部门做了某种沟通；另一方面，罢工持续的时间很长，相关部门多次到厂里沟通，工人还是坚持要回全部的“欠账”，不接受相关部门只能补两年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些诉求当中，养老保险是政府最不愿意让步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工厂要交钱，还意味着补缴成功后，政府需要给更多外来工发退休金。2013 年，当地养老保险条例出台，规定养老保险可以补缴；但直到 2016 年底，也没有成为现实。政府用了一个非常低能的借口：“补缴细则未出台，无法操作”。工人要死咬着从入职开始补缴这一点，无异于跟政府对着干。

时间越拖越久，政府部门越来越失去耐性。当政府决定“要管”以后，形势立马翻转。由高层某一部门牵头，进行跨部门的协调。公安机关、武装力量直接介入，与资方密切配合，调离保安、开除工人、强行出货、抓走工人代表，可谓一气呵成。虽然国家还没有打算真正使用暴力，人抓到派出所也只是象征性的警告，但已经足够让工人退却了。

工人几乎立马溃散了，虽说剩下的代表还强撑着去派出所要人，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工人一下子失去了信心。接下来，有的工人复工，有的辞职、请假，总之，不罢工了。

在机构的支持下，最后经商议决定，让还没有被开除的工人回厂工作，被开除的工人代表则到政府各部门奔走，上访、投诉、准备诉讼。同时发出公开信，要求让被解雇的工人复工，以及重启谈

判。但此时工人已无筹码：既无团结一致的工人集体，也无法掌握生产。工人到各部门投诉的结果，也只换来一句话：走法律途径。

后话

到今天，A 厂罢工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官司全部输了。被抓的 9 个人，还在公安系统留下了“扰乱单位秩序”的案底。只有二月，因为当初被抓的时候，他用的摄像机在跟警察抢夺的过程中损坏，派出所一直想还他摄像机，但他要求把案底销掉，否则就不去领。如果他不领，这个案子就没法结案，所以两年多以来，不断有人联系他，让他去谈谈。今年终于同意给他销了案底，并把摄像机还给了他。

被开除的 13 人当中，年轻的人都另外找了工作，年纪大的人，有的回家带小孩，有的进不了工厂，转入了服务行业。像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阳姐，目前在一家医院做护工。代表中的三个男工，两个转行做了电工。留在工厂的，不时有点加班。

而工厂也如当初工人所猜测的，在 2016 年 12 月份搬了地方，不过不是惠州，而是离原厂十几公里的另一个村。积极的人都离开了，剩下的人也没打算争取什么。按照法律来讲，劳动合同内容（工作地点）变更，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但是工厂几乎毫不费力就搬走了，工人没拿到一分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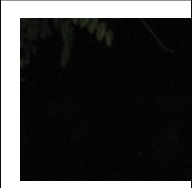
当初的 8 个代表，仅剩一个阿红还留在工厂。回想那次罢工，阿红觉得有点害怕，“连派出所的都来抓我们”。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突然受到政府的强力打压，让她突然感觉失去了支撑。一个访谈者问她，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她想了一下说：

“我们就是比较底层的人，平民老百姓，一般吵架都很少。我

们的生活都很平常，上班，下班带孩子。大部分都过的那种平平凡凡的生活，吃的也是简简单单。假如说再来一次，我就会想，大不了干不下去就辞工。和我一起逛街的那个工友也说，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做这些事情。”

“我自己的亲戚说，就算给我钱也不愿意担惊受怕。”





联系电邮：

factorystories@protonmail.com



2010 年•南海本田罢工核心积极分子自述

2010 年•珠宝厂工人持续一年多的争取社保行动

2015 年•车灯厂工人争社保公积金的罢工历程